

雲漢 1号

雲漢

2023年3月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目次

从语法角度看先秦汉语“难”的词义滋生路径

——兼论“难 VP”的同形异构及其来源……………雷 塘洵… 1

試論“使”“令”表假設用法的演變機制及特徵……………辛嶋 雲青… 14

略談“非”的上古音及相關問題……………野原 将揮… 34

關於《道行般若經》的一處斷句“正使舉珠出去”……………林 智… 48

六朝文人における虞韻唇音・云母字と魚韻の通押現象……………三輪 大樹… 51

試談敦煌變文中的兩類名量詞及其語義功能的差異……………松江 崇… 71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茶を淹れる動作」……………荒木 典子… 83

日中近代訳語における「日中欧分業型訳語」……………李 瑤… 94

証拠性から見た動詞「知る」の文法化序論：

雲南チベット語・西南官話における「知らんけど」の用法……………鈴木 博之…109

漢代の西域と敦煌の羌族……………柿沼 陽平…128

从语法角度看先秦汉语“难”的词义滋生路径

——兼论“难 VP”的同形异构及其来源*

雷塘洵

Summary In a polysemous word, multiple reasonable ways to extend the meaning of words are existed, an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is word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proper derivative path. Take "nán" (难 *difficult*) as an example. When this word is read in 平 level tone, it means "*difficult*", which belongs to the Predicative-Stating Adjective, whose unique argument is event. When it is read in 去 going tone, it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难 "*to fear, to worry*" or "*to prevent*." It is putative derivation from the adjective 难 "*difficult*" to the verb 难 "*to fear, to worry*". The event argument of the original adjective becomes the object, and the EXPERIENCER is added to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new word in this derivation. An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verb 难 "*to fear, to worry*" to the verb 难 "*to prevent*," it is causative derivation. The EXPERIENCER of the original verb is converted to the PATIENT and the AGENT is added to the new word in this derivation. In Pre-Qin Chinese, "nán + VP" contains three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homomorphic forms and analyses the source of them.

Keywords: the phonetic-semantic relation; derivative path; homomorphic forms; "nán" (难 *difficult*)

1. 引言

在一个多音多义词中，词义滋生的路径有时 would 存在多种可能性，这对音义关系、语义演变乃至词汇类型学中共词化（Coindexifications）的研究造成困扰。词的语法表现可以帮助确定该词的滋生路径，本文以“难”为例，从语法上的特性入手，描述“难”的音义关系和句法表现，从语法表现重新梳理该词的滋生路径。

在古汉语中，“难”表示“不容易，做起来费事”之义，是常用的表示难度大的词，属于人对事件的评价。该词在读音、词义和句法上都很复杂。《集韵》收录四个读音：（1）那肝切，泥寒开一平（*_cnan），源自上古泥母元部平声（**_cnan）：“《说文》：‘鸟也。’一曰艰也。”（2）乃旦切，泥翰开一去（*nan[˥]），源自上古泥母元部去声（**nan[˥]）：“阻也，古作難鷓。”（3）囊何切，泥歌开一平（*_cna），源自上古泥母歌部去声（**_cna）：“难却凶恶也。《周礼》：方相氏率百隶而时难。或作罍，通作雒。”（4）乃可切，泥哿开一上（*_cna）：“榦榦，木茂。或作‘难’，通作‘雒’。”

根据《说文》，“难”的本义是一种鸟，见读音（1）。“困难”义是“难”的假借义，与之有关的读音是（1）（2）（3）。孙玉文（2011、2015）详细介绍了“难”的音义关系的既有研究，重新梳理了“难”的音义关系，可列表概括如下（词义编号为本文所加，根据编号层级可以反映出滋生路径）：

* 本文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汉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研究”（22FYYB048）的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中若有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表 1 “难”的词义滋生路径（孙玉文 2011、2015）

泥寒开一平 cnan (<泥母元部平声 cnan) 《广韵》那干切	泥翰开一去 nan ² (<泥母元部去声 nan ²) 《广韵》奴案切	泥歌开一平 cna (<泥母歌部去声 cna) 《集韵》囊何切
原始词：——→ #1 不容易，困难，形容词。	滋生词：——→ #2 使遇到困难，阻碍， 被阻止，动词。	词义构词： #2.0.1 遇到的阻碍，遇到的障碍。名词。 #2.0.2 用手往下按住，动词，字作“推”。
	分别引申为：——→ #2.1 拒斥，排斥，拒绝。	引申为： #2.1.1 特指驱除疫鬼。（又音为囊何切）——→ #3 驱除疫鬼。 #2.1.2 特指心理上相互排斥，仇恨。 #2.1.3 特指用言语来排斥别人的观点，争辩， 诘问，反驳，诘难。
	#2.2 担心遇到障碍， 畏惧，担心。——→	词义构词： #2.2.1 使畏惧，害怕，震慑。动词。 #2.2.2 祸乱，乱事，灾难。名词。

从表 1 中可见，“难”的变调构词发生在形容词“不容易，困难”与动词“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后者是去声用法的词义滋生起点。去声“难”的意义很复杂，又引申出两系，一系为围绕“拒斥，排斥，拒绝”义滋生，另一系围绕“担心遇到障碍，畏惧，担心”滋生。

如果仔细分解语义，原始词#1 是一个描述事件属性的形容词，其描述主体是动作或者事件名词，而滋生词#2 是一个具有使动义的动词，与之相关的两个事件参与者都是人、物等实体。这两个词义之间有一定的跳跃性。如何解决这种跳跃性的问题？分析不同读音下与“难”的句法表现，确定与之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属性，或许可以细化“难”的词义滋生路径。

2. 形容词“难”的述谓性

在先秦汉语¹中，有一类形容词与动作事件的关联密切，与人或物静态属性的关联较远。形容词能够对谓词性短语进行陈述的特性，可以称为“述谓性”。具有述谓性的形容词为述谓形容词。（详见邵永海 2002、雷塘洵 2022a）

“难”属于述谓形容词，表示“困难，不容易”之义，读平声。从先秦汉语的情况来看，“难”做定语的极少，只调查到“难物”“难事”两种情况：

(1)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老子》第六十三章，38 页）

(2) 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墨子·兼爱中》，65 页）

例（2）中的“难物”表示“难事”之义，“于故”即“迂故”（从孙诒让说），指行不通的事情。这两例中“难”虽然作定语，中心语仍然是表示“事件”的“事”这一类的抽象名词。同样地，“难”一般也不进入“NP+难”这一类格式：

(3)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202 页）

(4)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孝乎？”（《论语·为政》，17 页上）

(5)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84

¹ 本文所说的先秦汉语，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传世文献所记录的古汉语，不包括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更古老的出土文字资料中记录的古汉语。

页)

在形式上，上述三例中“难”的主语是 NP，但这些 NP 表达的均为事件义。例（3）中“犬马”“鬼魅”作为实体并不能对其评判难易，能够评判难易的是“画犬马”和“画鬼魅”这两件事情。例（4）“色难”，表示“维持好的态度很难”，例（5）表示“聚拢人才很难”，《孟子·滕文公上》有“为天下得人难”（98 页下）。相当于“色”和“才”都指具体的事件。

“难”更多的用例是与谓词性成分相关联，表示对事态的评价，如：

（6）间诸侯，**难**。（《左传·襄公十九年》，585 页下）

（7）会同**难**，嘖有烦言，莫之治也。（《左传·定公四年》，946 页上）

例（6）和例（7）中“难”作谓语，其主语是 VP。从注音材料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难”读平声。²如：

（8）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庄子·说剑》，1017 页）音义：语难，如字，艰难也，勇士愤气积于心胸，言不流利也；又乃且反，既怒而语为人所畏难。司马云：说相击也。

（9）《说**难**》曰：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2148 页）索隐：说音税。难音奴干反。言游说之道为难，故曰说难。

（10）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史记·十二诸侯年表》，511 页）索隐：下奴丹反。

（11）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易·大有》注，46 页上）音义：何难，依《象》宜如字，一音乃且反。

例（8）《释文》注平去两读，并辨析了两读时的词义差别，取首音读平声时，“语难”指言语困难，“言不流利也”，“难”作谓语，进入“VP+难”格式。例（9）“说难”为《韩非子》篇目，《索隐》将“难”注为平声，解释为“游说之道为难”，“难”作谓语。例（10）“难”陈述“欲一观诸要”，为“VP+难”格式，根据注音应读平声。例（11）大有卦《象传》作“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二者相联系可知“何难何备”是反问的表达，就表示“易而无备”之义，这里“难”和“易”是反义关系，故读平声。“何难”相当于“不难”，“难”做谓语。

“难”发生转指后，指“困难的事”，也可以说明“难”与事件的紧密关联，如：

（12）历试诸**难**。（《书·舜典》，34 页上）旧题孔安国传：试以治民之**难**事。音义：难，乃丹反。

例（12）《尚书》原文中的“难”发生指称化，表示“困难的事情”，在语境中指“治理人民时的难事”，传文中“难”做定语，根据《释文》都应读平声。

“难”还可以进入“难+V”格式，表示“V 是难的”，在语义上“难”表示对 V 的陈述，如：

（13）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年》，147 页上）

（14）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119 页下）

（15）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893 页）注：言**难**逐。音义：臧孙以难，如字。注同。

例（13）“难测”是“难+V”结构，在语义上表示“预测（大国的行动）是困难的”。例（14）“难说”“难事”是“难+V”，在语义上表示“说服、事奉是困难的”。例（15）“臧孙以难”表示臧孙用有困难来答复昭公；杜预注中直接说明了“难逐”，“难逐”也是“难+V”结构，根据旧注读平声。

² 因“难”注平声的材料少，在选取注音资料时，适当将材料扩大到秦代以后。

上述例子都说明“难”具有述谓性，属于述谓形容词，其主体论元是事件，即使与名词性成分相关联，所关联的名词性成分也是事件名词，或在词义上概说一个事件，如“事”等。

3. “难”的词义发展脉络

词义关联的最小单位是两个义项之间的联系，即二义关联。在二义关联中，必有一个义项为原始义，另一个义项为滋生义。在梳理一个词的义项联系时，首先需要确定二义关联，再将不同的二义关联进行组合，最终建立起该词的词义发展脉络。如果只从逻辑来分析词义，二义关联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性。如何排除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可能性呢？利用词义演变的渐变性的方法。渐变是词义自然演变的一种类型，渐变性的常见方式是保留一部分原始义的语义要素，消去、改变或增加一些新的语义要素。³因此，在建立词义引申脉络时，其中包含的每一项二义关联都应最近，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词义引申脉络在解释上最简洁。在分析多音多义词的词义关联时，应尽量遵循这一原则。

孙玉文（2015）认为“难”的变调构词发生在“不容易，困难”与动词“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之间。“使遇到困难，阻碍，被阻止”的语义描写比较复杂，实际上三项词义描写都可以视为“使遇到困难”的语义变体，这个词的论元结构里要求致使者和被使者两个语义角色。而实际上，读平声的形容词“难”的主体论元是动作事件，若分析为从形容词直接通过使动构词形成“使遇到困难”之义，中间还缺一个环节，即需要解释“使遇到困难”的致使对象（即“遭遇困难”的当事）如何出现，这样的演变具有跳跃性。下面尝试借助不同义项中“难”的语法表现，重新梳理“难”的词义演变路径。

3.1 意动构词：由“困难”到“惧怕”

形容词“难”表示对事态的评价，在逻辑上隐含一个评价者，评价者一般是叙述者。当评价者呈现在语言表层中时，“难”的描述主体（也就是所评价之事）就转变成宾语，这可以分析为形容词表示意动。当意动义固定，滋生出心理动词表示“惧怕，忧虑”义，变调构词读去声。这属于意动构词，“难”注平去两读的材料可以作为这样演变的例证，如：

（16）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左传·襄公二十四年》，610页上）音义：之难，如字，又乃旦反。

（17）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左传·昭公十六年》，827页下）音义：之难，乃旦反，又如字。

（18）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嗇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论语·尧曰》“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集解，179页下）音义：难，乃旦反，又如字。

例（16）和例（17）中的“难”有平去两读，两句内容基本相同。以例（16）为例，当“难”读去声时，“贿之患”和“令名之难”是两个宾语前置结构，原型分别为“患无贿”和“难无令名”，“患”和“难”是同义词，都表示“惧怕，忧虑”之义，宾语前置句保证了句式整齐，“患”和“难”也能够押韵，形成语音修辞。当“难”读平声时，可分析为形容词的指称用法，表示“困难的事情”，与之相对的“患”指“忧患”之义。例（18）“惜难之”也有两读，说明可有两解，首音读去声表示“担心，忧虑”之义，又音读平声，表示“认为困难”之义，“之”代指“出纳”一事。从上述三例注二音的情况来看，读平声的表“困难”义的形容词与读去声表示“惧怕，忧虑”的心理动词在语境中存在歧义。

³ 词义演变具有复杂性，并非所有的词义演变都是渐变的（比如典故义的产生，比如受类推而发生跳跃式演变）。本文遵循如下原则：在梳理词义演变路径时，在没有特殊证据证明发生过跳跃式的演变，则尽量按照渐变的方式梳理词义发展脉络。

读去声的心理动词“难”可以带谓词性宾语，这里适当扩大了一些材料，如：

(19) 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左传·昭公元年》，698页上）音义：是难，乃旦反，下注并同。

(20) 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左传·成公二年》，424页下）音义：不难，乃旦反。

(21) **难**以游戏烦大臣。（《左传·哀公十四年》“君惮告子”杜预注，1033页下）音义：难以，乃旦反，下文及注同。

(22) 言皆所以为深邃，**难**人发见之也。（《礼记·檀弓上》“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郑玄注，149页下）音义：难人，乃旦反。

(23) 谓**难**其妨己业。（《礼记·内则》“加之事，人待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郑玄注，521页上）音义：谓难，乃旦反。

(24) 言我问女，女无以我长故**难**对。（《论语·先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孔安国注，100页下）音义：难对，乃旦反。

例(19)中“吾不能是难”即“吾难不能”，是宾语前置句。其上文云：“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杜预注：“自恐未能信也。”这里的“难不能”与“吾未能”相照应，杜预注中用“恐”来对应“难”，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我害怕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难”与下文“患”押韵，形成语音修辞效果。例(20)多被分析成意动用法，注音材料明确反映这里当读去声，表示“惧怕”之义。例(21)—(24)中的“难”见于注文，也处在“难+VP”的句式中。

除了“难+VP”格式外，也可以带体词性宾语，如例(25)和例(26)：

(25) 敬叔有怨于懿伯，**难**惠伯也。（《礼记·檀弓下》郑玄注，191页上）音义：难惠，乃旦反。

(26) 我心惮暑，忧心如熏。（《诗·大雅·云汉》，661页下）郑笺：王心又畏**难**此热气，如灼烂于火。音义：畏难，乃旦反。

(27) 有弥济盈，有鷩雉鸣。（《诗·邶风·匏有苦叶》，88页上）毛传：深水，人之所**难**也。音义：所难，乃旦反。下同。

例(27)中“难”进入“所”字结构。根据上下文，“所”提取的成分“深水”是名词性成分。

心理动词“难”是由形容词“难”意动构词而成，但与形容词“难”表意动的用法不同。在有的语境中，“难”只能分析为心理动词，不能分析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如：

(28) 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左传·襄公十三年》，555页上）音义：难其，乃旦反，或如字。

例(28)中的“难其人”，根据注音当读去声，表示“担忧”之义，即“忧虑所统帅新军的人选”。或音为平声，只能理解为表意动的“难”，“认为存在困难”。根据上文的分析，形容词“难”的意动用法，其宾语只能是事件，而例(28)中“难”的宾语是“其人”，若按意动理解，必须分析为“认为选择统帅新军的人选很困难”，这种解析是增字解经。因此陆德明将这种理解注为或音，是不正确的读音。

由“惧怕，忧虑”转指“所惧怕、所忧虑的事物”，即“祸患、灾难”之义。由“忧虑”到“祸患”存在平行引申，如“忧”“患”等词都具有这两个意思（参孙玉文 2015：1349），兹不赘述。“难”表示“祸患、灾难”的例子如下：

(29)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左传·隐公五年》，62页上）音义：之难，乃旦反。

(30) 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左传·成公十七年》，482页上）音义：难将，乃旦反，下同。

(31) 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左

传·昭公三年》，721页下）音义：多难，乃旦反。

3.2 使动构词：由“惧怕”到“拒斥”

形容词“难”经由意动用法引申为心理动词表示“惧怕，忧虑”义的“难”之后，“难”就获得了一个当事角色，可以充当主语。由心理动词进一步使动构词，表示“使感到惧怕、忧虑”之义，原始词表示“惧怕，忧虑”的“难”的当事不再充当主语，转为受事（或役事），再增加一个施事，如：

（32）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蕃其君舍以^难之。（《左传·哀公十二年》，1026页下）

杜预注：难，苦困也。音义：以难，乃旦反。注同。

这一例中的“难”表示“使感到惧怕、忧虑”的含义，“之”指代卫君。卫侯与吴相会，却最终没有与吴国结盟，因而吴国人围住了卫侯的官舍。这种行为“无礼”，有恐吓的意味，在这一语境中的“难”可以理解为“恐吓”。“使感到惧怕、忧虑”，因而可以妨害阻碍对方的动作行为的推进，进而产生“阻碍，拒斥”之义。从“惧怕”到“拒斥”，属于使动构词。这两个意义相关联的平行例证，如“慑”表示“害怕”和“威慑”，“威”表示“震慑”和“畏惧”（音变构词为“畏”），“吓”表示“惊吓”和“恫吓”，“恐”表示“惊恐”和“恐吓”，等等。在句法表现上，“阻碍，拒斥”之义的“难”，不仅可以带人或者有意志的事物做宾语，也可以带事件成分做宾语，如：

（33）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壬人，蛮夷率服。（《书·舜典》，43页上）旧题孔安国传：难，拒也。佞人斥远之，则忠信昭于四夷。音义：而难，乃旦反。

（34）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644页下）音义：难之，乃旦反。下“惧难”同。

（35）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吕氏春秋·简选》，80页）

（36）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礼记·檀弓下》，172页上）郑玄注：圣人不明说，为人甚恶之。音义：难言，乃旦反。

例（33）根据旧注，“难”表示“拒斥”之义，“难壬人”就是“拒斥奸佞之人”。例（34）“齐人难之”与“楚亦许之”相对，“难”表示“拒斥，拒绝”之义，“之”代事。例（35）谈晋文公的军制，没有诸侯能够抵挡，对军队的抵挡就是一种拒斥、阻碍。例（36）中“难言”进入所字结构，“所”提取的是言说的内容，即“死之道”，而郑注说“圣人不明说”，可见这里的“难”表示“拒斥，排斥”之义，还原回去则“难”可带谓词性成分做宾语。

“阻碍，拒斥”之义，不仅可以指物理意义上具体的阻碍，也可以指抽象的阻碍，词义范围较广。从“阻碍，拒斥”进一步引申，又可以表示：（其中与孙玉文 2015 相同的引申路径从略）

（一）障碍，险阻。这种用法多出现在汉以后的文献中，如：

（37）我之怀矣，自诒伊阻。（《诗·邶风·雄雉》，86页下）毛传：阻，^难也。音义：阻难，乃旦反。下同。

（38）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或伏牲其上。（《仪礼·聘礼》注，283页下）音义：为难，乃旦反。

（39）泥^难不通。（《论语·子张》“致远恐泥”包咸注，171页下）音义：泥难，乃旦反。

（40）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1411页）胡三省注：难，乃旦翻。

例（37）毛传用“难”训“阻”，即“险阻”之义。例（38）“道路以险阻为难”，直接说明了“难”的词义。例（39）中“泥”和“难”是同义连用，“泥”有阻滞之义，“难”

表示险阻，故而不通。例（40）又见于《后汉书》，是“险”“难”同义连用的情况。

（二）表示“驱除疫鬼”，这是在“拒斥”义的词义结构中增加了特定的对象，是特指构词。如：

（41）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殴疫。（《周礼·春官·占梦》，382页上）郑玄注：难，谓执兵以有所难却也。……故书“难”或为“雎”。杜子春“难”读为“难问”之“难”，其字当作“难”。《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音义：始难，戚乃多反，刘依杜乃旦反。注以意求之。雎字亦同。

（42）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礼记·月令》，305页上）音义：国难，乃多反，后及注同。驱疫鬼。

“难”是一种仪式活动，主要作用是“驱除疫鬼”，这就是对特定对象的拒斥。郑玄注和《经典释文》中都反映出这个意义可以有“乃多切”和“乃旦切”两读。应是由表示“拒斥”的“难”经过变声变调构词之后的结果，可参例（42）。

（三）表示“仇恨，排斥”之义，如：

（43）谷圭以和难，以聘女。（《周礼·春官·典瑞》，316页上）郑玄注：谷圭，亦王使之瑞节。谷，善也。其饰若粟文然。难，仇雠。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齐侯平莒及郟，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音义：和难，乃旦反。注同。

（44）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人》，214页下）郑玄注：难，相与为仇雠。音义：之难，乃旦反。注及下同。

（45）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战国策·秦策一》，95页）高诱注：难，犹敌也。

例（43）—（44）中的“难”，郑玄注用“仇雠”来解释，在例（43）中做宾语，在例（44）中做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在例（45）高诱用“敌”注“难”。所谓的“仇雠”就是一种相互拒斥，不能接近的状态。《论语·宪问》中如下例：

（46）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149页）音义：怨难，乃旦反。

杨伯峻《论语译注》（1980：149）翻译为：“贫穷却没有怨恨，很难；富贵却不骄傲，倒容易做到。”这是将“难”和“易”都分析为谓语。上文已经讨论“难”做谓语表示“困难”义时读平声，而这一例《释文》注为去声。这样的理解和音义配合的情况不太吻合。这里的“难”可能要按照“仇恨”之义去理解，与“怨”同义连用，表示“怨恨”之义；与之相对，“骄”“易”都有“轻慢”之义，也是同义连用。（参见雷塘洵 2022b）

（四）表示“诘难，责问”之义，这是一种言语上的拒斥，在方法上做了限定。

（47）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隐公元年》，37页上）杜预注：明郑伯之志在于杀，难言其奔。音义：难之，乃旦反。注同。

（48）大夫相杀称人，此其称名氏以杀何？（《公羊传·昭公元年》，273页上）何休注：难八年事。音义：难八，乃旦反，二年注同。

（49）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诗·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618页下）音义：论难，鲁困反，下乃旦反。

例（49）孔颖达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这说明“诘问，辩难”源自一种在言语上的拒斥。例（47）和例（48）是对春秋笔法的说明，使用特定的词语，表示对人或事的一种责难的态度。

由“诘难、责问”义进一步指“辩难时的言语或观点”，多见于汉以后的文献，如：

（50）记问，谓豫诵杂难杂说，至讲时为学者论之。此或是师不心解，或学者所未能问。（《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655页下）音义：杂难，乃旦反。

3.3 小结

经过上述讨论，“难”的词义及其滋生路径可以调整如下：

表 2 先秦汉语“难”的词义滋生路径（调整后）

泥寒开一平 cnan (<泥母元部平声 cnan> 《广韵》那干切	泥翰开一去 nan [˥] (<泥母元部去声 nan [˥] > 《广韵》奴案切	泥歌开一平 cna (<泥母歌部去声 cna> 《集韵》囊何切
原始词：————→ #1 不容易，困难，形容词。	滋生词（意动构词）————→ #2 惧怕，忧虑。	引申为： #2.0.1 祸乱，乱事，灾难。
	引申为（使动构词）————→ #2.1 使惧怕，阻碍，拒斥。	引申为： #2.1.1 障碍，险阻。 #2.1.2 用手往下按住。（字又作“摊”） #2.1.3 驱除疫鬼。（又音为囊何切）→ #2.1.4 仇恨，排斥。 #2.1.5 诘问，责难。
		#3 驱除疫鬼。

在渐变式的词义发展过程中，会保留一部分原始词的语义要素，同时产生新的语义要素。词义在演变过程中，每一次小的创新仅仅会改变词义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创新的积累之后，演变起点处的词义和演变初终点的词义就可能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在文献材料充分的情况下，在确定滋生路径时，如无特殊条件，可以参照“一次只改变一个要素”这样的渐变原则对词义（或词义的义位变体）进行编排，从而优化词义的发展脉络。

本文遵循这一原则对“难”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当“难”发生词义变化后，词性和句法表现也发生变化，通过滋生前后词所关联的语义角色，可以建立起词义之间的脉络。比如从述谓形容词“难”到心理动词“难”，在原形容词中表示事件的语义角色的基础上，增加了当事；由“惧怕”到“拒斥”，进一步增加了施事角色，当事角色和事件角色则转为宾语。通过确定对这几个语义的“难”的句法分析，可知从形容词“难”到表示“拒斥”义的“难”之间存在链条缺失，很难认为是直接变调构词而成。语法分析为优化词义引申路径提供了观察角度，因此在分析词义演变路径时应重视语法分析。

4. “难+VP”的句法与来源分析

4.1 “难+VP”的歧义

根据上文对“难”的词义分析，可知“难+VP”结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

(51)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邠孙，邠孙以可，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893页）注：言难逐。音义：臧孙以难，如字，注同。……劝，劝公逐季氏也。

(52)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韩非子·五蠹》，394页）

(53) 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国语·鲁语下》，198页）《补音》：不难，补音乃且反。

上述三例中“难”都构成“难+VP”结构。例（51）的语境是鲁昭公想要去除季氏，臧孙认为季氏难逐，邠孙认为季氏可以逐走，并劝昭公动手。杜预注中的“难逐”，补全是“季氏难逐”，表示“季氏难以被驱逐”，其受事主语是“季氏”。《释文》注读平声，下文记为甲类。例（52）中的“难”与“易”相对，表示“为谋易，为计难”，下文记为乙类。将例（52）与例（51）进行比较：例（51）“难”之后为一个光杆的动词“逐”，在语义上

“逐”表示受动；例（52）中的“难”为复杂 VP，在语义上表示主动，例（53）中宋庠《补音》注为去声，表示“畏惧”之义，下文记为丙类。

甲、乙、丙三类的书面呈现形式基本相同，但甲、丙两类的意义和读音不同。乙类没有注音，从词义和后代语言的情况来看，恐怕读平声为宜。现代汉语中“难+VP”表主动时，“难”被分析为助动词，读平声。⁴

虽然确定“难+VP”格式中“难”的读音和意义，对分析“难+VP”结构的性质十分关键。不过，在文献中有不少“难”的用例没有相对应的音注材料，这需要依照语境和句例进行判断。

4.2 甲类格式：“难 V”

在甲类格式“难 V”中，“难”后的动词一般为光杆形式，表示受动义，整个结构的主语在语义上是动词的受事。甲类结构的格式存在争议，或分析为状中结构，如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2009：528）对“难”词条的处理；或分析为述宾结构，如巫雪如（2018）、任荷（2021）。

甲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54）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韩非子·孤愤》，58页）

（55）吾固患韩之**难**知，一从一横，此其说何也？（《战国策·韩策三》，1007页）

（56）**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6页）

（57）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韩非子·用人》，153页）

（58）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119页下）

（59）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韩非子·初见秦》，5页）

例（54）和例（55）中“难 V”进入主之谓结构的用例；例（56）和例（57）中“难 V”充当定语，构成组合式定中结构；例（58）和例（59）中“难 V”与其他形容词并用。例（59）中的“轻”和“难用”从不同侧面描述“赵氏之民”的特性，“轻”与“难用”并列；例（58）是对君子和小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特点的说明，整个短语表示性质义，也是一种静态的描述。说明“难用”具有形容词性，属于谓词短语。

“难 V”具有程度义，可整体受程度词的修饰，如例（60）；还可以用于比较句，如例（61）和例（62）：

（60）是故约食、焚舟、菑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墨子·兼爱下》，79页）

（61）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战国策·楚策三》，538页）

（62）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庄子·让王》，980页）

例（60）用“至”修饰“难为”，表示程度最高；例（61）将“得见谒者”和“得见王”的难度与“见鬼”“见天帝”进行比较；例（62）是差比句，魏牟作为万乘大国的公子，其隐居的难度比布衣之士要大，比较的对象是魏牟与布衣之士。

（63）夫民，不**难**聚也。（《庄子·徐无鬼》，861页）

（64）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韩非子·说疑》，308页）

任荷（2021）认为，例（60）的程度词“至”和例（63）中的否定词“不”修饰“难”，因而否认“难”充当状语的可能性。其实“至”“不”并非修饰“难”，而是修饰整个“难 V”，请看下面的例子：

（64）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韩非子·问田》，303页）

⁴ 如朱德熙（1982：66）将现代汉语的“难+VP”中的“难”视为助动词，吕叔湘（1999：405）认为“难+动”中的“难”的作用类似助动词。

“难”和“易”是一对反义词，句法表现基本平行。例（64）的大意是：治理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否定词将表示程度的“甚”和“易”隔开，而“未”否定的是“易处”而非“易”，因此只能分析为“甚+未易处”。

上述例子说明“难V”是具有程度性的谓词短语。若从结构整体的意义与其组成成分的关系来看，整个短语的性质与两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有相似性，两个成分都可以成为核心。从外部功能来看，当“难V”格式充当定语时，定中之间需要有结构标记“之”，这与形容词一般直接作定语的特性有别，而与动词短语充当定语时添加“之”的性质相同。从内部结构来看，“难”属于述谓形容词，述谓形容词可在状语和谓语位置上对谓词性成分进行陈述。因此，从语言的系统层面来看，这一类的“难V”结构可以分析为状中结构，而不能分析为述宾结构。其实这一类结构中的“难”的功能类似于日语中的接尾词がたい，改变了动词的语义，使得整个复合结构具有形容词性。

4.3 乙类格式：“难+VP”

乙类格式“难+VP”多见于战国中后期的文献之中，如：

（65）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340页）

（66）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238页下）

（67）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604页上。按：“卑”原本误刻作“车”，今正。）

该格式可以进入“所”字结构，由“所”提取“难”之后VP中的宾语，也可以直接提取“难”之后的成分：

（68）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167页）

（69）夫舍万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难行也。（《战国策·魏策二》，841页）

（70）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难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齐兵矣。（《战国策·魏策二》，830页）

（71）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礼记·聘义》，1030页上）

例（68）中“难犯”与“易去”相对，在“所难犯”中“所”提取的是“犯”的受事成分，即“重罪”，这说明其原型是“难犯重罪”。例（69）在“所难行”中“所”提取的是“舍万乘之事而退”。这两例属于“所”提取“难”之后VP的宾语。例（70）和例（71）“所难”，“所”提取的是“难”之后的成分，这说明“难+VP”格式应分析为述宾结构，再结合例（68）和（69）“所”越过“难”提取VP中的宾语，说明“难”是一个助动词性的成分，这与现代汉语的分析基本一致。试举助动词“能”为例，例（72）“所”越过“能”提取“及”的宾语，例（73）“所”提取“能”的宾语。

（72）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孟子·梁惠王下》，46页上）

（73）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孟子·梁惠王下》，47页下）

4.4 “难+VP”的来源分析

乙类述宾结构的“难+VP”与甲类状中结构的“难V”是否存在联系呢？巫雪如（2018）、任荷（2021）认为“难+VP”的这类用法是从“难”的意动用法发展而来。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在实际语料中却很难举出真正的表意动的“难”后接VP的例子。她们举出的例子，有的明确注去声，或者存在平去两读的情况，实际上是丙类表示“惧怕，忧虑”义的“难+VP”，如：

(74) 吾不^难为戮，养吾栋也。（《国语·鲁语下》，198页）《补音》：不难，补音乃旦反。

(75) 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左传·昭公十六年》，827页下）音义：难，乃旦反，下同，又如字。

例（75）虽有平声又音，但非首音，且“难”与“患”押韵，可知此处读去声在语音上更和谐；“难”读去声表示“惧怕，忧虑”之义，与“患”在语义上也一致。

本文认为，乙类“难+VP”是甲类“难V”中V进行扩展和重新分析的结果。首先，这两个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语义关系上，从“难”与VP的语义关系来看，“难”也可以分析为对VP的陈述，这与甲类“难V”的情况基本相同。在语法关系上，“难+VP”和“难V”的内部成分能够对应，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也相同，存在语法同构的基础。这是将两个结构关联在一起的理由，但是这种分析还面临一项困难：该格式由受动到主动，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先秦汉语中，“难”和与之句法平行的“可”“足”“易”等述谓形容词，都有后接“以VP”的格式。“以”可以引出工具、凭借、原因等语义角色，在“难+以+VP”格式中，“以”的宾语提前至主语或话题位，如：

(76) 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左传·隐公四年》，56页下）

(77) 司武而桡于朝，^难以胜矣。（《左传·襄公六年》，516页）

(78) 腓大于股，^难以趣走。（《韩非子·扬权》，33页）

这些提前的成分进一步抽象化或者复杂化，变得不可还原。例（76）“济”在语境中可指成功，成功的难度比较大，而“众叛、亲离”是凭借，指凭借众叛亲离的条件成功很难。例（78）也是如此，凭借“腓大于股”的腿，快走很难。

“难+以+VP”格式与“难V”格式有相通之处。在形式上，“难”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宾语都被提前。⁵在“难+以+VP”格式中，“难”后接的是介词“以”，介词短语不具有独立性，故在“以”之后还有VP，“难”之后成分变得更复杂。这一调整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先，整个格式不再要求“难”之后的V为光杆形式，为复杂VP形式的进入提供了基础；其次，“难”与“以”的关联更密切，不再与“以”后的VP发生关联，是重新分析的基础；而且，“以”所能引介的语义角色比较丰富，比如原因、凭借、工具、方式等，因而“难+以+VP”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语义解读空间。这些原受“以”支配的成分提前之后，相对独立，也更容易变得复杂化。

(79)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孙子兵法·地形》，172页）

(80) 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200页）

(81) 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庄子·人间世》，150页）

(82) 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国语·齐语》，231页）

例（79）在远形这种地形上，双方势力相当，凭借这种地形和态势做挑战很难，“以”为谓词短语“挑战”的引介凭借性成分，“远形”“势均”的形式简单，与“以”的关系比较明确。例（80）“以”引介的是“治棘刺之端”的工具，即削刀，现在棘刺之尖容不下削刀的刀锋，因此凭借削刀来雕刻棘刺之尖很难。例（81）中“易以伪”“难以伪”中“以”

5 更重要的是，这两类格式中，“V(P)”与“难”的语义关系是不变的，都表示“VP难”之义。那为何上文将甲类格式“难V”分析为状中结构，乙类格式“难VP”分析为述宾结构？其实，乙类格式中“难”做助动词，也有学者分析为状中结构。而且，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可以不相同。甲乙两类的表层结构都是“A+VP”，如果陈述重心在VP上，就是状中结构；重心在A上，就是述宾结构或述补结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这项演变其实是陈述核心的调整。

为“伪”引介的是方式成分，分别为“为人使”（被人欲所驱使）和“为天使”（被天理自然所驱动），这个成分就复杂化了，可还原性也比较差。例（82）中“难以”前的成分更加复杂，可以分析为不同的小句。在“VP1 难以 VP2”的表层形式中，VP1 和 VP2 可以共享同一个主语，如例（81）中“为人使”“为天使”和“伪”的主语为同指关系，例（82）中“速得志”与“有攻伐之器”的主语有同指关系。随着 VP1 的复杂化，“难以 VP2”也获得了小句的地位，“难”之前获得了一个空位，通过无标记形式与上文构成衔接，这两点加起来意味着“难以 VP2”前的空位可以填入 VP2 的主语，而不再是“以”的宾语，“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

（83）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商君书·慎法》，41 页）

表主动义的乙类格式“难+VP”恐怕是由“难+以+VP”中“以”的脱落、消失之后形成。从时间关系来看，“难+以+VP”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而表述主动的“难+VP”主要分布在战国晚期的文献中，可为这项演变提供时间上的线索。

在“难+以+VP”中，“以”悬空，只能附着在“难”之后。在语音上，“以”是以母之部字，存在弱化丢失的可能性。“可以”在形式上与“难以”平行，王力（1989：243—244）、大西克也（2008：152）等均举出“可以”省作“可”的例证（见下），“难”属于平行的情况。

（84）平日可以取妻、入人、起事。（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秦除》17 贰，361 页）

（85）凡月望，不可取妇、嫁女、入畜生。（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朔望忌》118，538 页）

5. 结语

“难”是先秦汉语中常见的表示难度形容词，该词的词义非常复杂。首先可以确定“难”在先秦汉语中被编码为形容词，属于述谓形容词，带事件论元。在确定“难”的述谓性之后，根据“难”滋生词所带的语义角色的差异，可以确定“难”的不同词项，以及词项之间的演变关系。“难”由形容词“困难”到动词“惧怕”，属于意动构词，而由“惧怕”到“拒斥”又经历了一次使动构词。

“难”包含的词项复杂，造成“难+VP”歧义：甲乙两种情况中“难”都读平声，都表示做某事很难，其中“难 V”被分析为状中结构，其主语为 V 的受事，“难+VP”被分析为述宾结构，其主语可以为 VP 的施事。丙类以“难”读去声表示“惧怕”之义，进入“难+VP”，表示“惧怕某事”。甲乙两种情况是同形异构引起的句法歧义，丙类格式属于词义不同造成的歧义。从来源上看，乙类格式“难+VP”可能是“难+以+VP”中“以”脱落的结果。“难 VP”由受动向主动的演变途径，可能与汉语语态表达系统的调整有关，还有待深入研究。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难”的性质也逐渐变化，逐渐产生了一些做定语的用例，至汉代时也可以充当这类抽象名词的谓语，如：

（86）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老子》第六十三章，38 页）

（87）征声洪者，则其事难；羽声差者，则其物乱。（《风俗通义·声音·羽》，278 页）

这是先秦汉语述谓形容词式微，与述体形容词合并的表现。与“难”同属述谓形容词的“速”“迟”“可”“足”“易”等词，在这项系统调整中的表现与“难”有同有异，有的演变为普通的性质形容词，有的演变为助动词。述谓形容词为何会走向衰落，这个问题涉及到形容词词类地位的变化，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难度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的表述策略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英语、日语中编码为形容词，Tariana 语、Semelai 语编码为状态动词，Papantla Totonac 语编码为副词（参 Dixon

and Aikhenvald 2004: 111, 289, 167)。在一门语言中，难度义是否编码为形容词，是测定该语言中形容词词类地位的重要参数。从类型学角度看难度义的编码，或许能为上述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引书目录〉

-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仪礼》《周礼》《左传》《论语》，《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
-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中华书局，1963年。
- 《广韵校本》，周祖谟，中华书局，2004年。
- 《宋刻集韵》，〔宋〕丁度等编，中华书局，1989年。
-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中华书局，1983年。
-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国语补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史记》，〔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
- 《战国策》，〔西汉〕刘向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
-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
- 《老子注》《墨子间诂》《商君书》《韩非子集解》《孙子十家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
- 《风俗通义校注》，〔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
- 《睡虎地秦墓简牍》，《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参考文献〉

- 大西克也 2008. 《再论上古汉语中的“可”和“可以”》，《中国语言学》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雷塘洵 2020. 《先秦汉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雷塘洵 2022a. 《先秦汉语的述谓形容词》，《语文研究》第2期。
- 雷塘洵 2022b. 《〈论语〉“贫而无怨难”旧解一则》，《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 任 荷 2021. 《先秦汉语“难”字句的句法结构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
- 邵永海 2002. 《〈韩非子〉主谓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孙玉文 2011. 《以“难”为例谈如何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以及词义发展线索》，侍建国主编《基于本体特色的汉语研究：庆祝薛凤生教授八十华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玉文 2015.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 巫雪如 2018. 《先秦情态动词研究》，中西书局。
- 杨伯峻 1980.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第2版。
- 张双棣，等 2009. 《吕氏春秋词典》，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Dixon, R. M. W. and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雲漢』1号，2023年3月26日）

試論“使”“令”表假設用法的演變機制及特徵*

辛嶋雲青

Summ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i* (使) and *ling* (令) from causative verbs to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 This development requires 2 prerequisites: (a) an extremely high degree of bleaching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causative in the *shi* (使)/ *ling* (令) sentence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b)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shi*(使)/ *ling* (令)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s well that the two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 mentioned above, are mostly used in situations which have happened already. Such a hypothetical sentence is used mostly to describe an irrealis event. In addition, sentences containing th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shi* (使) can express situations which are extremely unfavourable to the speaker. This function of *shi* (使) could probably be the origins of the conjunction *jishi* (即使). In compound structures, in which *shi* (使)/ *ling* (令) are used with other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 their role is to control the function of the conjunction in the sentence.. The features of the two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ogether with compound structures were retained in Middle Classic Chinese as well.

Key Words: causative verb,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irrealis event, compound structure

1. 研究背景

“使”“令”具有多重功能。在上古漢語¹，“使”“令”作為使役動詞，表示“派遣”或“命令”某人做某事。從此義發展到因為某個事件，致使某人或某事物發生狀態變化。“使”“令”還可以表示說話者希望某種變化發生而進行祝禱的內容。除以上用法外，“使”“令”還是假設複句中的假設標記。“使”“令”從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歷史發展展示了它們在語法化過程中從實詞到虛詞的演變，這一演變機制在漢語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至今已有較多研究成果，但本文認為，對於演變機制及語義特徵的論證還有進一步完善的餘地。本文將嘗試對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

1.1 假設複句的定義

關於現代漢語複句的定義，太田辰夫(1958)²、朱德熙(1982)³等皆有論述，按照邢福義(2018:3)，“複句”指“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分句的句子”。按照複句中分句與分句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分為：因果類複句、並列類複句和轉折類複句。因果句、推斷句、假設句屬於因果類複句；並列句、連貫句、遞進句屬於推斷類複句；直轉句、讓步句、假轉句屬於轉

* 本文得到了《雲漢》匿名審稿專家的具體指教及中肯的修改意見。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¹ 本文所言“上古”“中古”按照太田辰夫(1988)的方法——上古包括商周、春秋戰國、漢代，中古包括魏晉南北朝，近古包括唐五代、宋元明——劃分。太田 1988:4。

² 太田辰夫(1958: 61f)原文如下：復文とは、2個以上の述語を有する句を複述語句という。

³ 朱德熙(1982: 215)原文可概括為：複句是由比詞組高一個層次的東西（句子形式）組成的。

折類複句。複句標記指連結分句、標誌相互關係的關係連詞。

沿用以上現代漢語複句分類方法，則亦可稱上古·中古漢語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語義關聯的分句的句子為“複句”⁴。也同樣可以按照前後句語義關係分為：因果類複句、並列類複句和轉折類複句等。以下例是類型中一部分，例如(1)是以“故”為標誌的因果複句，(2)是轉折句複句，“然”是表轉折義的標記，(3)是假設複句，“若”是其標誌，(4)是並列關係的複句。

- (1)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左傳·隱公五年》1-46) (因果)
- (2)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左傳·成公十二年》2-858) (轉折)
- (3)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左傳·僖公四年》1-292) (假設)
- (4) 不敢從，亦不敢言。(《左傳·僖公二十二年》1-394) (並列)

以上(3)“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分句之間是假設和結果的關係。對這種關係的定義名稱，不同學者表達方式不同⁵，本文稱之為“假設複句”。

關於本文所論假設複句，在句法結構上可分為以下四種：

- (A)前後句都沒有假設標記。如(5)。
- (B)前句用“若”“苟”“使”“令”等假設連詞，後句沒有表示結果的副詞等。如(6)。
- (C)前句中沒有假設標記，後句用表示結果的副詞“則”“必”“將”等表示結果。如(7)。
- (D)前句用假設連詞，後句使用表結果的副詞等形成呼應。如(8)。

- (5) 殺女，我伐之。(《左傳·宣公十四年》2-755)
- (6)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左傳·僖公四年》1-292)
- (7) 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左傳·隱公九年》1-66)
- (8) 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君何面目以見員也！”(《國語·吳語》628)

本文將探討的是假使複句中的假設連詞“使”“令”的生成機制，以及假設“使/令”句的語義特徵及句法結構特徵。

1.2 關於表假設的連詞“使”“令”的生成機制及語義特徵的先行研究

太田辰夫(1958:338)就曾指出，連詞“使”源自使役，演變為表假設⁶。呂叔湘(1982:412)認為，“‘使’‘令’二字的頭上還有時還可以再加上‘如’‘若’等字。這一類字的句子多半表示與事實相反的假設”。對於“使”“令”從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演變機制及其特徵的問題的研究，以對“使”的研究為主，近年的主要先行研究有以下七篇⁷，其中以張麗麗(2006)最為詳盡。

⁴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互為說明或補充的前後句，本文不認為是複句。如：“男也，其名曰友。”(《左傳·閔公二年》1-263)

⁵ 呂叔湘(1982:406)、洪波(1998:376)稱之為“假設句”。張麗麗(2006:1)、劉承慧(2010:221)、梅廣(2015:80)稱之為“條件句”。

⁶ 原文如下：“使”は使役から転じて仮定・縦予にしばしば用いられるもの。

⁷ 除以上七篇以外，龔波(2017)對上古漢語假設句從語義特徵、句法功能、假設句標記形式演變、假設範疇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因沒有涉及“使”“令”的語法化及其語義特徵，故未算入此七篇之內。

1) 洪波(1998:376-377)認為，漢語的實詞虛化與句法結構及其所蘊含的句法語義密切相關；實詞虛化的機制有兩種：一是認知因素，一是句法語義因素。對於“使”從動詞虛化為假設連詞的機制，洪波(1998)提出，使役兼語 NP1+“使”“令”+NP2+VP 的結構中，NP2+VP 部分使可以獨立成句的，為“使”的虛化提供令句法條件。如果一個複句中，NP1，即“使”表示的致使者(agent)是不存在的，那麼“使”就處在句首的位置，而它的使役意義也就弱化了。其後的部分又可以獨立成句，因而假設條件分句的假設意義就逐漸依附於“使”上，是它虛化為一個假設連詞。

2) 徐丹(2003:233f)認為，“使”字句虛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主要動詞動作性的減弱。

3) 邵永海(2003:276-280)指出，“使”字句表致使義時，“使”虛化，當致使的主體是隱含的成分時，遞繫結構以主語缺省的形式使用。包含“使”的小句所表達的假設義是由其所處的位置賦予的。前後兩個小句之間存在假設關係，前句自身一般沒有表假設義的形式標記，這種遞繫結構造成“使”語法化為假設連詞的直接誘因，原本是由小句及其所處的句法位置表達的假設義，後來由“使”表達。

4) 張麗麗(2006)認為，漢語條件分句具有多項話題特徵，這一認識是漢語使役句成為條件句的重要基礎。當有一個非實然句作話題或前提，就可能被當作條件分句。使役句具“非實然”的特性，又常作話題和前提，這是它成為條件分句的重要前提。對“非實然”的假設，張麗麗(2006)稱其為“背離事實(counterfactual)”，指出“該句式或是設想與過去事實背反的情境，或是設想不符合現狀的情境”。

5) 劉承慧(2010:233-236)從“使”的功能角度論證，它可能始於注記言說者欲使為真的條件，延伸注記反向推論的前提，認為“使”源自表達非實然的致使概念，當言說者內心期盼與事實有出入，“使”注記的條件(假設)就與事實相反。

6) 高婉瑜(2011:192-208)對漢語常用假設連詞演變進行了研究，認為假設連詞“使/令”形成的動因包含語義、語法、語境、邏輯條件。“使/令”語法化為假設連詞的機制是轉喻、類推、重新分析。

7) 梅廣(2015:102-107)指出，“使”本來是一個動詞，發展為假設標記，是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結果。“使”表假設常偏重不願見到，不願發生之意；戰國晚期以後，“使”作為假設標記大量使用，發展出表主觀認知以為可能性低(難以置信，難以想像)的特殊用法，並認為，這種用法可能發展自辯論語言。論者駁斥對方，用“使”的假設句來否定對方的命題。辯者提出一個荒謬的假設，以得出一個更荒謬的結論，即傳統邏輯所謂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之屬。

以上諸位學者的研究各具說服力，其中部分觀點本文基本認同，但同時認為仍存在值得商榷之處以及可以完善的餘地。本文試圖從“使”“令”自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演變著眼，對其發展演變的機制以及其特徵進行探討。

2. 假設連詞“使”的演變機制及語義特徵

2.1 “使”的多重語義功能

“使”自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演變，其表使役義的功能的抽象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因此本節首先在先賢時人眾多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對“使”的多重語義用法做一簡單梳理(2.1.1~2.1.4)，以此展示“使”在語法化過程中逐漸發生的演變。

2.1.1 “使”的表使役用法

古代漢語中存在有一種 NP1(causer)+“使/令”+NP2(causee)+VP 句法形式的“使/令”句，表示 NP1(致因者)通過某種行為或手段對 NP2(被使者)產生影響，使 NP2 做某一行為(VP)。該句式在上古就已存在，表“派遣使者”及“口頭命令”義的“使”“令”作為第一動詞，

表達 NP1 派遣或命令 NP2 做某一行為的語義，是此類“使 / 令”句的起點。如(9)是夫人王姬派遣帥甸進攻並殺死了他，(10)晉曆公派遣呂相與秦國斷交。

(9)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左傳·文公十六年》2-622)

(10) 晉侯使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2-861)

同時也存在這樣的表使役的“使 / 令”句，“使”“令”表達一種指示，NP1 作為使役的“施事者”(agent)，通過有意識的間接的行為使“受事者”(causee)做某種行為。NP2 生命度較高，VP 的動態性很強。如(11)(12)。

(11)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1-473)

(12)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左傳·哀公十一年》4-1665)

2.1.2 “使”表狀態變化的用法

上古漢語中也有並不典型的表狀態變化的“使 / 令”句用法。通過 NP1 (致因者的某種行或致因事件) 致使 NP2 發生某種結果或狀態的變化。在這類用法中 NP2 既可是有生，也可是無生，VP 的動態性較弱，如(13)中 NP2 是“水”；(14)中 VP “不聰明”表示一種“聽不清看不明”的狀態。

(13) 何故使吾水滋。《左傳·哀公八年》4-1648)

(14) (無極) 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左傳·昭公二十七年》4-1488)

戰國時代後這類用法逐漸增多，NP1 的位置上出現了具體表現引起 NP2 發生某種結果或狀態變化的原因或手段的事物主語。這一變化顯示出表使役的“使 / 令”句中“使”“令”的使役功能的逐漸抽象化(bleaching)。

2.1.3 “使”表祈願的用法

辛嶋雲青(2022)指出，上古·中古漢語還存在一種表達說話者的祝禱或祈願的“使 / 令”句，在中古漢語中，〈表祈願的“使 / 令”句〉已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構式，其句法形式為：“使 / 令”+NP+VP。

(15)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韓非子·內儲說下》5-183)

(16)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韓非子·顯學》5-356)

(17) (百千眾生) 皆作是言：“願使我等於未來世，說是(v.l.⁸ 此)妙法覺悟眾生，如今文殊師利法王子覺悟眾生。”(《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T9-273b)

(18) 此人施辟支佛食，發於邪願：“使我於王舍城中常獨殺羊賣肉！”(《阿毘曇毘婆沙論》T28-377c)

這種表達說話者的祝禱或祈願的“使 / 令”句在發展過程中，如(15)~(18)所見，沒有形式上的 NP1，也沒有可設想的語義上的 NP1。在這樣的“使 / 令”句中，NP2 不再是受 NP1 影響的被使者。在沒有致因者或致因事件以及被使者的“使 / 令”句中，“使”表使役

⁸ v.l. = *varia lectio* (寫本或版本的) 異讀。

的語義功能已經極大程度的抽象化。在漢譯佛典中，表祈願的“使／令”句用例數量眾多，VP已不僅限於形容詞或表狀態的動態性較弱的動詞，動作性較強的動詞也可被用做VP。例(17)中VP“說”，(18)中VP“殺”“賣”分別是NP“眾生”“我”可操控的動態性較強的動詞。

2.1.4 “使”表假設的連詞的用法

除以上動詞的用法外，“使”還作為連詞，用於假使複句中。以下(19)(20)中，“使”是表假使的標記。“使”句後多用“則”等表示結果，前後形成表假設義的呼應關係。“使”用做假設連詞時，表使役義的語義功能已經基本消失了。

- (19) 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君何面目以見員也！”（《國語·吳語》628）
- (20)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韓非子·用人》5-154）

2.2 “使”字句演變為假設複句中假設分句的條件

本文認為，“使”字句演變為假設複句中假設分句，需要以下兩個前提條件。

（一）“使”表使役義的語義功能的抽象化。只有在“使／令”句中“使”不再具有使役的意義，才可以有通過前後複句語義關係產生表假設的可能性⁹。如前2.1.所述，“使”具有多重功能，在從表使役到表狀態變化的演變過程中，“使”表使役義的語義功能逐漸減弱。在表示祈願時，“使／令”句已不存在致因者或致因事件，這就意味著期盼NP（即表使役及狀態變化的“使／令”句中的NP2）發生某種狀態的變化時，這一變化的產生對於外力依賴已經非常微小，“使”表使役義的語義功能抽象化的程度極高，這就為“使”演變為假設連詞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見例(21)，產生“吾早死”“國及季子”的事態變化，它所依賴的外力NP1是極其微小的。

- (21)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說苑·至公》344）

（二）“使”用於句首的句法結構。“使”位於句首的句法結構的“使／令”句有以下三種情況：

- （A）當表使役或狀態變化的“使／令”句中NP1是隱含的成分時，“使／令”句便以NP1欠缺的形式，將“使”用於句首，如(22)。
- （B）“使／令”句表命令的直接引用時，“使”用於句首。如(23)“使樂正子春來！”是齊人說話內容的直接引用。
- （C）“使／令”句表祈願時，“使”用於句首。如下(24)。

- (22)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左傳·襄公元年》1-11）
- (23) 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韓非子·說林下》5-144）
- (24)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莊子·天地》3-187f）

⁹ 如前1.2所歸納，洪波(1998)以及邵永海(2003)皆有相關論述。洪波(1998:375)指出，“漢語實詞虛化的機制兩種：一是認知因素，一是句法語義因素”。邵永海(2003:278-279)亦指出，“表致使義的‘使’‘令’進一步虛化，有時表示造成某種結果，這種用法表明其語法化程度的加深，同時也為‘使’的進一步虛化為連詞創造了條件。本文贊同這二位學者的觀點。

以上三種“使/令”句的用法為“使”用於句首作為假設標記提供了句法結構的可能性。

除以上兩個前提以外，還需要一個必要條件，即“使”位於句首的“使”字句和後句在語義上是假設和結果的關係。(25)前句“使”雖位於語義的句首，但表派遣義，與其後“子庚弗許”在語義上是轉折關係。(26)前句“桀、紂為匹夫”與其後“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在語義上具有某種關聯，在因果、假設、條件、累加等類型的複句中，解釋為假設複句最合理。前句“使桀、紂為匹夫”中，“桀、紂為匹夫”不是一個受外力影響而產生的結果，所以“使”不具有使役功能，是一個假設連詞。

(25)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左傳·襄公十八年》3-1041）

(26) 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韓非子·難勢》5-298）

2.3 假設標記“使”的生成機制

本文 2.1 展示了“使”的使役功能逐漸從強到弱的抽象化過程。在表祈願的“使/令”句中，“使”的使役功能極其微弱，為“使”演變為假設連詞提供了前提條件。

當使役的語義功能極其微弱的“使”位於句首，且“使”字句與其後的句子發生語義上的關聯，而這種關聯可以理解為假設與結果的關係時，如果前面的“使”字句中沒有“若”“如”等假設標記，後句也沒有“則”“固”等表示結果的副詞，那麼表示假設的意義功能就很可以附在這個不具有使役功能的“使”上。這時“使”就可理解為假設連詞。

在“使”演化為可以用作表假設連詞的發展初期，也有一些其表使役或表假設的語義界線模糊的用例，如例(27)，後句可以理解為表示結果，即“那麼敝邑就知道該怎麼戒備，以抵禦意外”。前面的“使”字句既可解釋為使役，“讓臣得以祭祀軍鼓”，也可從與其後的分句的語義關係來判斷，解釋為假設句的連詞，“如果臣得以祭祀軍鼓，“那麼敝邑就知道該怎麼戒備”。

(27) 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左傳·昭公五年》4-1271）

而(28)中前半部的“使”字句“使”位於句首，在它之前沒有，也無法設想一個致使發生“爾多財”這樣變化的 NP1，因此它可能表祈願。然而其後還有“吾為爾宰”，由此形成了前後句語義上的關聯。“使爾多財”為後面的句子提供了一個話題，那麼就很容易被理解為，“如果你擁有很多財富，那麼我當你的管家”。而此兩句中除“使”之外沒有表假設的標識，後句也沒有表示在這樣的前提下產生結果的副詞“則”等。如此，這樣的句子結構中“使”就很容易被解釋為假設標記。

(28)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史記·孔子世家》6-1932）

(29) 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7-2369）

(29) 同理。“秦破趙”與“趙得全”在句法結構上是平行的，二者的發生源於受到外力影響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這兩個“使”不是使役動詞。“秦破趙”與“君安得有此”，以及“趙得全”與“君何患無有”是假設與結果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由於兩對前後兩個分句的結構以及其語義的因素，所以即使沒有表假設的標記，也不影響對這一假設關係的理解。但因為前句有不具使役功能的“使”，那麼表假設的語義就會依附在“使”上。

2.4 假設“使”字句的特徵

以現代漢語為例，如果以假設句發生的時間為基準，可以把假設分為對未然和既然情境的兩類。從以下例可知，對未然情境的假設，既可能真正發生，成為現實，也可以在說話者的認知中沒有實現的可能。假設內容既可以是說話者希望發生的情況，也可以是說話者不願發生的情況。如(30)(31)是對明天將發生事件的假設，(30)“明天天氣好”是可能發生的事件，是說話者樂於見到的情境。(31)“明天考試”是一個不會發生的事件，也是說話者不樂於見到的情境。(32)和(33)是對現狀的假設，這個假設與現狀相背。(34)(35)是對過去事態所做的假設。當假設的情境是現在和過去的情況下，從說話者說話的情境而言，假設多與事實相背¹⁰。

- (30) 要是明天天氣好，參加校園節的人會比較多。(假設有實現的可能。自造句)
 (31) 幸好期末考試是下星期。要是明天考試，我肯定不及格。(假設沒有實現的可能。自造句)
 (32) 要是我是你，我就去參加校園節。(假設與事實相背。自造句)
 (33) 要是這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很多事都無法做。(假設與事實相背。自造句)
 (34) 要是昨天天氣好，參加校園節的人就會很多。(假設與事實相背。自造句)
 (35) 要是昨天下了大雪，參加校園節的人就不會那麼多。(假設與事實相背。自造句)

2.4.1 “使”字句假設句多表既然的情境

按照假設情境發生的時間，上古漢語中“使”字假設句也可分為以下兩類：(一)前句提出對未然情境的假設，後句指出必然性或可能性後果；(二)前句提出對於現狀或過去的既然事實提出的假設，後句指出必然的結果。

以下例(36)~(39)都是對未然情境的假設。(36)提出“如果天下人都能在法令範圍內充分發揮智慧和才能，在法令範圍內竭盡力量”的假設前提，後句指出由此可能產生的後果，“君主在外動則勝，在內治則安”。(37)在“秦欲屠趙”的假設前提下，指出結果可能是“不顧一子以留計”。(42)“不聽臣之計”和(43)“王若不留”的假設前提下，指出必然的結果“禍必構”和“不德王”。

- (36)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韓非子·安危》5-147)
 (37)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戰國策·秦五·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上-279)
 (38) 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韓非子·存韓》5-13)
 (39)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戰國策·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齊》上-160)

(40)~(42)是對既然事件的假設。(40)既然事實是“你活著回來了”，但如果發生了“驪龍而寤”或“宋王而寤”這樣的事件，那麼其後果就必然是“子尚奚微之有哉”和“子為齏粉夫”。(41)“如果襄子在晉陽令不行，禁不止”，那麼結果就應該是襄子失去了國家，晉

¹⁰ 不可否認，現代漢語中存在一種對過去發生的事件姑且認定的假設，如：

甲：我昨天沒去圖書館呀。

乙：如果你沒去，那我看到的是誰？（引自龔波 2017：303 例（3））

對此龔波(2017:303)的解釋是，對話中乙對甲陳述的事實並不確定。

陽沒有了君主，不會有人替他守城。而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襄子在晉陽被圍，即使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鍋灶進水，百姓也沒有背叛，證明君臣關係密切。這是一個對現狀做出的假設情境。(42) 假如靖郭君一切都聽臣（齊貌辨）的話，那么靖郭君也不會遭受今天這樣的迫害。“聽辨而為之”指涉的也是對既然事實的假設。

- (40)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莊子·列禦寇》3-214）
- (41) **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韓非子·難一》5-268）
- (42) **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戰國策·齊一·靖郭君善齊貌辨》上-310）

在我們探討假設時可以通過與假設連詞“若”“如”進行比較，明確“使”字句的語義特徵。本文對《韓非子》和《戰國策》所見假設“使”、“若”、“如”字句進行了考察，結果列表如下。

表 1 《韓非子》中假設“使”字句及“若（如）”字句統計表

	總數	既然情境	未然情境
假設“使”字句	16	11 (68.8%)	5 (31.2%)
假設“若”字句	37	11 (29.7%)	26 (70.3%)
假設“如”字句	3	0 (0%)	3 (100%)

表 2 《戰國策》中假設“使”字句及“若（如）”字句統計表

	總數	既然情境	未然情境
假設“使”字句	17	12 (70.7%)	5 (29.4%)
假設“若”字句	81	5 (6.2%)	76 (93.8%)
假設“如”字句	4	0 (0%)	4 (100%)

從上表可知，《韓非子》和《戰國策》中“若（如）”字句和“使”字句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假設“若（如）”字句多指涉未然情境，這樣的用例分別佔總體的 70.3 和 93.8%，而假設“使”字句多指涉既然情境，用例分別佔總體的 68.8 和 70.7%。

雖然假設“使”字句指涉既然情境的假設是比較普遍的用法，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使”也可用表達對未然情境的假設。如前(36) (37)以及以下(43) (44)。

- (43) **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戰國策·秦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上-181）
- (44) **使**臣得進辯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重申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發而為狂，無意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戰國策·秦三·范雎至秦》上-186）

本文認為，假設“使”字句多指涉對既然情境的假設是其語義特徵之一，這也是引發假設“使”字句多表非現實情境的原因之一。

2.4.2 假設“使”字句多指涉非現實的情境

2.4.2.1 對張麗麗(2006) 相關主要觀點的分析

張麗麗(2006:9-13)指出,“上古漢語假設連詞‘使’字句大多屬背離事實(counterfactual)一類。該句式或是設想與過去事實背反的情境,或是設想不符合現狀的情境,或是設想不符合常理的情境。‘使’字句不指涉可能發生的條件,因此幾乎不指涉未來的事件”。並通過比較《史記》中所見假設標記“使”和“若”的假設句證明此觀點。以下引用張麗麗(2006)對《史記》中“使”“若”假設複句所做統計表。

表3 《史記》中假設“使”字句及“如”字句統計表(對張麗麗 2006:12 表進行了調整)

《史記》	背離事實	可能情境	列舉用法
假設“使”字句	42 (76%)	1 (2%)	12 (22%)
假設“若”字句	1 ¹¹ (1%)	82 (92%)	6 (7%)

對於張麗麗(2006)的論點,本文有以下三點看法。

(一),使用語料《史記》距離“使”假設義的產生已有一定時間間隔,或亦可選擇戰國秦漢時代的文獻作為參考。

(二),如本文 2.4.1 表 1 和表 2 所示,“使”字句也用來設想未然事件,在《韓非子》和《戰國策》中分別佔 31.2%和 29.4%,不僅如此,設想未來發生的假設有一部分具有實現的可能性。如(45),如果“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那麼“動則勝,靜則安”。(46)如果“您認為我說的對,那麼就請施行”。(47)如果土偶“逢疾風淋雨,壞沮”,那麼結果是“復歸土”。由此可見,張麗麗(2006:12)“‘使’字句不指涉可能發生的條件,因此幾乎不指涉未來的事件”的看法尚值得商榷。

- (45)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韓非子·安危》5-147)
- (46) 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戰國策·秦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上-181)
- (47) 夜半,土梗與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泛濫無所止。”(《戰國策·趙一·蘇秦說李兌》中-603)

(三),張麗麗(2006: 11f.)對於“使”字句“背離事實(counterfactual)”解釋為三種類型:與過去事實背反的情境、不符合現狀的情境、不符合常理的情境。舉了以下兩例說明“不符合常理的情境”。

- (48)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呂氏春秋·離俗覽·為欲》6-248)(引自張麗麗 2006: 12 例 18a)
- (49) 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史記·齊太公世家》5-1504)(引自張麗麗 2006: 12 例 18b)

(48)如果民沒有欲望,君主即使賢明,也還是不能用他們。因為沒有欲望的人,尊貴、富饒、長壽都不足以鼓勵他們,也不足以禁止他們。而有欲望的人不敢作亂,君主可以利用的地方就多。因此“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

¹¹ 此例是“若”與“使”連用的雙音節詞,“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史記·楚世家》5-1734)。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史記》中單音“若”字句 100%表可能情境。

也”，以“欲多”“欲少”“無欲”來做對比。(49)是晏子對於景公“可禳否？”的回答，即，神可以來用咒語祈求消除彗星帶來的不吉，也可在消災後離開。其後是“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即百姓的疾苦深重，君主讓一個神來祝禱，怎麼能勝過萬人之口呢。“君令一人禳之”似可證明，此處“使”字句表達的假設至少在說話者的認知範圍內是可以實現的。

張麗麗(2006)沒有對區分“符合常理”和“不符合常理”的標準做出具體說明。本文認為此處有必要進行明確的定義。

2.4.2.2 假設“使”字句多指涉非現實的情境

本文以假設表達的情境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性為標準，將假設情境分為“非現實情境”和“現實情境”兩類。

表“非現實情境”的假設包含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對既然事實——過去發生的事實或現狀——進行的假設。例(50)“如果桀、紂是匹夫”和(51)“以往假如燕國不從周朝的土地撤離”是與過去發生的事實相背的假設。因為是對既然事實所做的假設，那麼指涉的情境多與事實相背反。(52)(53)是與現狀相背的假設。(52)造父是著名的善御者，“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所以“使造父不能御”是一個不符合現狀的假設。(53)蘇秦詢問“假使我像尾生那樣講信用，像伯夷那樣廉潔，像曾參那樣孝順，具有這樣的高尚操行，是否可以為大王效命”之後，燕王承諾，蘇秦說：“有此，臣亦不事足下”，說明假設表達的是與現狀不符的情境。(一)類的假設是“非實然”(counterfactual)的假設，是不符合既然發生的事實或現狀的假設。

- (50) 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韓非子·難勢》5-298)
- (51) 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戰國策·燕一·蘇代謂燕昭王》下-1072)
- (52) 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5-259)
- (53)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性，而以事足下，不可乎？(《戰國策·燕三·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下-1047)

(二)，假設情境是在普遍認知範疇或說話者的現實世界無法實現或實現可能性極小的虛擬情境。關於“現實”(realis)與“非現實”(irrealis)的對立，已有很多學者進行過研究。本文以尾上(2001)¹²為基準劃分“現實”與“非現實”，對於在現實世界尚未實現的事態，以及在說話者的現實世界中不存在或超越說話者經驗範圍的事態，稱之為“非現實”事態。如(54)前面講述的是“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即“某人因為花費三年時間玉石刻成逼真的葉子，就被供養起來”，韓非在闡述自然之道與法治的關係，指出聖賢傳道憑藉道德教化，不是依靠小聰明和投機取巧，因為如果“天地三年才成一葉，那麼有葉子的植物就太少了”。由此可見，在韓非的認知中，“三年成一葉”是一個“非現實”的情況。(55)前一句已明確

¹² 尾上(2001:49)相關處原文如下：「非現實事態は、話者の現実世界に存在していない事態（話者の立っている現実世界で話者が経験的に把握していない事態）。「現実領域は、話者が立ってものを言っているこの世においてすでに起こってしまった領域、既の実現した領域であり、非現実領域は、この世で未実現の領域、推理・推論・仮想世界など観念上の領域、この世で既実現ではあるが話者の経験的把握を超えたよくわからない領域である。」撰寫過程中本文參考了戶内 2018:100-103。

表示，虎勝於狗在於它的爪牙這一普遍認知，那麼“虎釋其爪牙”就是一個未然的與普遍認知相背的虛擬的假設¹³。

(54) 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韓非子·喻老》5-122）

(55)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韓非子·二柄》5-27）

另外，〈NP“而”〉這樣的句法形式也可證明一部分假設“使”字句表現出非現實假設的特徵。如(54)用的是〈NP“而”〉。邵永海(2003:282)曾指出，主謂結構之間插進“而”字造成的各式往往充任假設小句。戶內(2018:57-87)指出，此種NP“而”構式中“而”後表示的是與事實相反的情境，〈NP“而”〉賦予了一個說話的背景前提，表達了這個背景前提與“而”後的情境相反，顯示出說話者認為〈NP“而”〉的內容是一個不可能設想事件的主觀意識¹⁴。

按照戶內(2018)，(54)從天地所持的性質而言，“三年而成一葉”是一個與其性質不相容的情境，使用〈NP“而”〉的形式，顯示出說話者意在營造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情境的主觀意識。

(56)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意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以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韓非子·秦五·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上-279）

(56)呂不韋去趙國遊說，希望趙國放了在趙國的人質秦公子異人，理由是“公子是秦王寵愛的兒子。假如秦國真的要攻打趙國，也不會因為一個王子的緣故而耽誤滅趙大計，這樣趙國就空有人質了。但如果讓他回國繼位為王，趙國以厚禮相贈，公子不會忘記大王的恩義。而且孝文王已經老了，一旦駕崩，趙國雖然有異人為質，但也沒有資格與秦國親近了”。此處前後分別通過“使”和“若”兩個假設句列舉了趙國“不放人質”和“放人質”的兩個選擇分別產生的不同結果。一般而言，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假設句表示列舉選項時，大多是非A即B，其中一個選項是可能實現的情境。而這一例前一選項使用了“使”和〈NP“而”〉，表示說話者企圖說明，他自己主觀認為，對於秦國而言，“屠趙”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態。與此相對，“若”字句表現的假設更具有實現的可能性。¹⁵

¹³ 關於例(55)，第二個“使”位於句中，所以不能將其理解為假設連詞，而“虎釋其爪牙”與“狗用之”在句法結構上是平行對等的，或許前一個“使”不作假設連詞解釋亦可。但本文傾向於，前一個“使”的使役義已極微弱，可視為假設連詞。

¹⁴ 原文如下：「NP而」文は、後項との対比のもと、前項 NP/NP1 の百科事典的知識・フレームに関わる性質やコンテキストで付与された性質を前景化し、その性質と相容れない事態が起こる或いは起こったことを、後項で述べる戸内(2018:76)。

「NP而」文は命題内容に対する話し手の意外性を表現ができ、同時にその命題内容があり得ない/あ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主観をも表せる。戸内(2018:83)。

原文使用的是“前景化”，本文做了調整，懇請原文作者海涵。

拙文修改過程中，此處得到了《雲漢》匿名審稿專家的中肯且詳盡的指教，特表謝意。

¹⁵ 《韓非子》中以下一例比較不易判斷，很值得討論。

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韓非子·解老》5-100）

這也是一個〈NP“而”〉的構式。在普遍認知中，迷路者“聽知者的意見”是一個可以設想的事態，然而，或許在說話者韓非的主觀意識中，“迷路者”的性質和“肯聽知者意見”不相容，也就是說，之所以“失路”，是因為“不肯聽習問知”。因此或許在韓非的認知裡，這是一個非現實的假設。

在判斷假設情境現實或非現實時，說話者的主觀意識和認知的問題不應被忽視。就如前(49)“**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從說話者的認知而言，“神祝而來”並非一個非現實情境。

“現實情境”也有兩種，(一)指“使”字句表達的假設指涉未然情境，而這種情境有實現的可能。見例(57)(58)。(二)用於列舉，而列舉的假設可表現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也可能是對現狀的列舉，(59)列舉“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和“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兩種假設情境，其後提出相對應的結果。(60)趙奢對平原君指出的“假如安平君愚蠢”和“假如安平君聰明”的兩種情況，安平君必居其一，這兩個假設的情境都有可能是真實的現狀。

- (57)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韓非子·安危》5-147)
- (58) **使**臣得王計之，不如予之。(《戰國策·趙三·秦攻趙於長平》中-693)
- (59) **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韓非子·難一》5-270)
- (60) **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分成；**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跑必處一焉。(《戰國策·趙四·燕封宋人榮盆為高陽君》中-751)

本文按照以上分類方法對《韓非子》和《戰國策》中所見假設“使”、“若”及“如”句進行了考察，結果列表如下。

表4 《韓非子》中假設“使”字句及“若”“如”字句統計表

《韓非子》	總數	非現實情境	現實情境
假設“使”字句	16	10 (62.5%)	6 (37.5%)
假設“若”字句	37	2 (5.4%)	35 (94.6%)
假設“如”字句	3	0 (0%)	3 (100%)

表5 《戰國策》中假設“使”字句及“若”“如”字句統計表

《戰國策》	總數	非現實情境	現實情境
假設“使”字句	15	10 (66.7%)	5 (33.3%)
假設“若”字句	81	4 (4.9%)	77 (95.1%)
假設“如”字句	4	0 (0%)	4 (100%)

通過該統計表，我們可以看出假設連詞“使”和“若”在假設複句中具有不同的語義特徵。“使”字假設句多用於指涉非現實情境，具有表達虛擬情境或與事實相背的傾向。

而“若”“如”字句多用於表現現實情境的假設¹⁶，見例(61)。同時也有極少“若”字句表“非現實”情境的假設，見例(62)。

- (61) **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韓非子·存韓》5-13)
- (62) **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戰國策·齊一·靖郭君善齊貌辨》上-310)

¹⁶ 白兆麟(1998: 586-593)對《左傳》中假設“若”字句共300句進行了統計(“如”字句共8句)，證明“若”字句基本指涉可能發生的未然的情境或事件。梅廣(2015:87)指出，“若(如)”語義中性，不帶任何主觀心理含義，是最常見的上古假設標記。

如果我們借鑑張麗麗(2006)統計結果，即在《史記》中凡指涉背離事實的假設幾乎都用了“使”字句。如注(11)所示，張麗麗(2006:13)所舉《史記》唯一表示背離事實的“若”字句——“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史記·楚世家》5-1734）——也是與“使”連用的雙音節詞。可見從上古漢語中期到後期，“使”在表達非現實性假設的語義功能不僅沒有弱化，相反卻更加顯著，根據需要，使用“若”表實然情境的假設，使用“使”表非實然的假設，因此形成了“若”和“使”的語義功能差異的進一步擴大。不僅如此，“使”的表非現實性假設的語義功能還擴展到了與其他表假設的連詞並列組成的複合結構，如：“苟使”“若使”“如使”“假使”等，見例(63)，“予欲富”是既然的非現實的假設，雖然與“如”連用，但顯然“使”是複合結構中語義功能的中心語字，複合結構的雙音詞依然保持了“使”的語義特徵。

(63)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公孫丑下》1-176）

2.4.2.3 “使”字假設句可表非現實情境的原因

關於假設連詞“使”可以指涉非現實情境的理由，一些學者已進行過探討¹⁷。本文在2.1.3已闡述，“使/令”句可以表達祈願未來某種事態發生。祈禱或祝願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尤其在上古漢語中，“使”多用於祈求神靈保佑或祈禱疾病被治好等願望的實現，如(64)“希望文考甲公和文母日庚的亡靈使你們的兒子（於戰爭中安定身心，並）萬年侍奉天子，不要產生過錯。”¹⁸

(64) 癸曰：嗚呼！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唯昏事（使）乃子癸萬年辟事天子，毋有尤于厥身。（《冬戈方鼎》《殷周金文集成》2824）（引自大西2009:14）

在該例中，NP1（方鼎的器主過世的父母）是無法命令或致使他們的兒子“萬年侍奉天子”的，因此是一個祈願句。在表示祈願的語境裡，“使”表示的是一個非現實的情境。這就與假設“使”字句多指涉“非現實”情境具有了共同性。

這種表示祈願和非現實的假設具有某種關聯的現象，我們在其他語言也可看到，它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例如，梵文中祈願法(Optative)可表願望和假設義。在表示非現實情境的假設和其結果時，常用祈願法表假設前提，用持續法(Conjunctive)表結果¹⁹。以下(65)中，*pra-√nī*（給予〔懲罰〕）的第三人稱單數（指“國王”）祈願法，後句 \sqrt{pac} （烤）是第三人稱複數（指“強者們”）條件法(conditional)，二者呼應，表示“如果國王不毫不猶豫地懲罰應該被懲罰的人，那麼強者就會像烤插在鐵串上的魚那樣（欺負）弱者”。此處原典語言“如果國王不懲罰應該被懲罰的人”表達的是一個在未來實現可能性很小的假設。

¹⁷ 張麗麗(2006:15)認為，“使”字句表背離事實的假設的根源在於“使”虛化過程中的“持續(persistence)”現象，是使役動詞的致使特性保留下來所致。既然要受外力推動才能成立，那麼實際上就是不成立的。

梅廣(2015:106)認為，戰國晚期以後，“使”作為假設標記大量使用，發展出表主觀認知以為可能性低（難以置信，難以想像）的特殊用法。這種用法很可能發展自辯論語言。論者駁斥對方，用“使”的假設句來否定對方的命題。辯者提出一個荒謬的假設，以得出一個更荒謬的結論，即傳統邏輯所謂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之屬。

¹⁸ 辛嶋雲青(2022)引用過這個例子。這是一篇方鼎的器主向過世父母祈求庇佑的祭告文書。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黃庭頤(2017: 40f)。大西(2009:14)指出，“使”的主語“昏”指父母之靈，大意是父母的神靈讓兒子能夠長年侍奉天子。“使”字的語義非常接近致使。

¹⁹ 有關說明詳見辻1977:296, 298。原文概括如下：〔條件法(conditional)は〕Skt.においてはもっぱら実現性のない仮定を含む条件文の前提(protasis)及び帰結(apodosis)の中に用いられる。

- (65) *yadi na praṇayed rājā daṇḍam daṇḍyeṣv atandritaḥ,*
 如果 不 帶來(懲罰) 國王 懲罰(賓語) 應被懲罰的 不膽怯地
śūle matsyān iva apakṣyan durbalān balavattarāḥ
 鐵串 [被插的]魚 像 烤 強者們 弱者們
 (《摩奴法典》7.20 引自辻 1977:298)

在拉丁語中，表示發生在未來實現可能性低的假設(irreal conditional)時，設想前提(Protasis)用持續法(Conjunctive)未完了過去形，結果(Apodosi)同樣用持續法未完了過去形。持續法用於非事實的想像的事態，也可表示與現實相背的祈願。下例(66)essem 是動詞sum(“是”)的第一人稱單數持續法未完了過去形，意思是“我想成為鳥！(如果)我是鳥(就好了)”。(67)動詞sum(“是”)的第三人稱單數持續法未完了過去形 esset，與 habeō(有)第二人稱單數持續法 habērēs 相呼應，表示非現實性的假設，“如果沒有和你自己一樣高興的人，怎麼會是這麼大的快樂呢”。

- (66) *utinam avis essem.*
 ~ (事) 鳥 是 (引自吳 1977:65)
 (67) *Quī esset tantus fructus..., nisi habērēs qui illīs aequē āctū ipse gauderet?*
 疑問詞 是 大 快樂 如果不 有 不定代詞 這 一樣 行為 自己 高興。
 (引自吳 1977:160)

德語亦如是。(68)是中古德語，其中 sende 是動詞 senden(“給”)接續法第三人稱(此處指“神”)單數，(69)hätte 是現代德語 haben(“有”)的接續法第一人稱單數，指“我”。(70)wärest 和 könntest 是現代德語 sein(“是”)和 können(“能”)的接續法第二人稱單數。

- (68) *daz mirz got schiere sende!*
 神啊！快些給我那個(時刻)吧。
 (69) *Wenn ich doch zeite hätte!*
 如果我有時間(就好了)。→希望我有時間！
 (70) *Wenn du ein Fuchs wärest, so könntest du dich durch deine Schlaueit beliebt machen.*
 如果你是一隻狐狸，你可以通過你的狡猾贏得人們的喜歡。

現代英語中也有用過去分詞表示祈願的用法，如(71)。過去分詞可以表示不符合現狀的祈願，如(72)。假設法也可以表達說話者認為的在未來實現可能性很小的假設。如(73)。

- (71) *God bless you!*
 (願)上帝保佑你！
 (72) *I wish I were back home.*
 我想回家！(引自江川 2016:256, 例 172 (1))
 (73)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were to lose the secret of making fire?*
 如果我們忘了點火的秘訣，那會發生什麼？(引自江川 2016:249, 例 173 (3))

對於說話者而言，對神靈發出的希望某種新事態發生的祈願，祈願是非現實的，它能否實現具有不確定性。這種非現實性和不確定性與表示與現狀不符或在未來實現可能性極小的假設具有共同點，表現在印歐語言就是動詞的變化形式上的相同。表現在上古漢語，就是可以表達祈願義的“使”演變為可以表現不確定能否實現的假定連詞。Hopper and

Traugott(2003:88)認為，包含在語境中不明顯的語義可通過特定的詞轉換出來²⁰。上古漢語“使”在表祈願時，其內容表現的是非現實情境。其中包含的非現實性及能否實現的不確定性的語義功能在假設複句中“使”字句顯現出來，致使它可以表達非現實的假設情境。但是，本文必須承認，“使”表達的祈願是希望某種事態的發生，而連詞“使”表達的假設也可以表現說話者不樂於見到的事件。或許“使”隱含的表樂於見到某種事件發生的語義沒有轉換到假設連詞“使”上。

與“使”相比，表假設連詞“若(如)”源自比況義，即 A “像” B，A 和 B 多是具體的人物或事件，如(74)“吾子之德”是具體且具現實的。

(74)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左傳·文公七年》2-564）

(75)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左傳·襄公二十一年》3-1057）

當“若(如)”作為表假設連詞時，比況的語義也延伸到假設複句中，如(75)“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假設及其結果“無法禁止這樣的行為”都是具體且現實的。

動詞“使”和“若(如)”的語義的差異造成了二者作為假設連詞時的語義功能的不同，產生了“使”多指涉非現實性假設，“若(如)”多指涉可能實現的假設的差別。

2.4.3 “使”字句亦可指涉極端條件的假設情境

假設“使”字句有時可以指涉指說話者不樂於見到的或條件極端惡劣的未然事態的假設，它表達的是，即使在說話者最不樂於見到的極端不利的假設條件下，其後結果的實現也不受到影響²¹，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使”表假設讓步的萌芽。如(76)“使”後有三個假設情境，“加之以幽囚”和“漆身”都是對未然可能發生的極端惡劣的可能事態的假設，其後用兩個反詰表達強烈的意願，由這樣兩個分句的語義關係，我們可以解釋為“即使把我囚禁，終身不能見大王，我也不憂慮”“即使被渾身塗漆，我也不覺得可恥”。(77)“逢疾風淋雨”“壞沮”都在土梗的認知範圍內對未然可能發生事態做出的最壞的假設，但即使如此，最壞的結果也是“復歸土”。而“若(如)”表類似義的語義功能決定了它作為假設連詞時，假設情境具體且具有現實性，其語義功能很難得到這樣的擴展，即使在表達說話者不樂於見到的假設情境時，後句也多為客觀的與假設情境對應的結果，如(78)，表達的是“若是打了敗仗，就提著腦袋來見您”。

(76) **使**臣得進辯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重申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發而為狂，無意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戰國策·秦三·范雎至秦》上-186）

(77) 夜半，土梗與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泛濫無所止。”（《戰國策·趙一·蘇秦說李兌》中-603）

²⁰ 原文是：Indexing or pointing to meanings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only convert, but are a natural part of conversational practice.

本文撰寫過程中此處參考了張麗麗(2006:10)。

²¹ 上古漢語表假設讓步時多用“雖”“縱”等，如：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力，大功不立。（《韓非子·觀行》5-146）。“即使”表假設讓步大約不早於魏晉時代，裴松之對陳壽《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所做注，“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漢語大詞典》第2卷531頁例。

(78) 若[□]有敗之者，臣要求挈領（《戰國策·秦三·魏謂魏冉》上-174）

2.4.4 “使”字假設句的句法結構特徵

此外，“使”作為假設標記一般用於假設複句的句首。“使”具有表達使役義功能時，其句法結構為 NP1 + “使” + NP2 + VP，表示 NP1 使 NP2 做某一行為或使 NP2 發生某種狀態的變化。因此，“使”用作假設標記時，有必要用於句首，否則會產生“使”前的名詞或主述結構是 NP1 的可能，造成“使”的意義上的混亂。

而“若”“如”表“類似”義，其句法結構為 A + “若 / 如” + B。“若（如）”表假設義源於此²²，故用作假設連詞時，這一句法結構也延伸至假設複句中，“若”“如”可用於 NP 後，見例(79)“大王若以此不信”，(80)“子如不言”。

(79)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韓非子·難言》5-14f）

(80)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論語·陽貨》1-379）

3. “令”從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演變機制及其語義·句法特徵

對於假設連詞“令”的演變機制問題，研究成果甚少，多順帶在對“使”的論證之中²³。其中張麗麗(2006:17)提出“‘令’沒有明顯的從使役到假設的演變過程。幾乎一出現在條件分句，就是成熟的條件連詞。也有可能是受到‘使’字的類推(analogy)”。本文認為這一看法尚可商榷，故在此贅述“令”從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演變機制及其語義·句法特徵。

本文認為，“令”也具有從使役動詞演變到假設連詞的語法化過程。

“令”同“使”一樣，也具有多重語義。自上古漢語始“令”是使役動詞，在 NP1 + “令” + NP2 + VP 的句法結構下，表口頭命令或間接的使役，如(81)“令”表趙文子減輕諸侯的貢品而看重他們的禮儀的口頭命令。(82) NP1“宛”的有意識的間接行為，讓漢軍選擇良馬。

(81)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傳·襄公二十五年》3-1103）

(82) 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史記·大宛列傳》10-3177）

(83) 吾故系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史記·蕭相國世家》6-2019）

從此演變出“令”字句表狀態變化的用法，如(83)通過故意將丞相蕭何關押起來這一行為，致使百姓知道高祖是昏君。VP“聞”動態性較弱，是百姓(NP2)無法自主操控的一個事態，此例是表狀態變化的“令”字句。

在上古漢語使役動詞“令”可表說話者口頭命令的直接引用，如例(84)“讓當地的官員養活他！”。此外，“令”也可以表達說話者的祝禱或祈願，如(85)。這種表達說話者的祝禱或祈願的用法在中古漢譯佛經中得到了極顯著的發展，不僅用例數量急劇增多，VP也可以是動態性較強的動詞，如(86)“行”“教化”“淨”是 NP（“我”，指眾生）可以操控的

²² 關於“‘若’從‘類似’義衍生而來”的問題，以下學者皆有論述，以龔波(2017)最為詳盡。劉承慧(2010:225-226)、梅廣(2015:92-94)及龔波(2017:265-301)。

²³ 邵永海(2003)、梅廣(2015)均有言及，但針對“令”的論證極少。

邵永海(2003)指出，“使”“令”虛化為假設連詞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使”“令”由表示客觀現實意義事件的實義動詞虛化為表示導致某種理想中的結果。第二階段，由表示某種現實的結果進一步虛化而成為假設連詞。“使”“令”虛化為連詞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邵永海(2003:281)。但邵文對於何謂“‘使’‘令’表示導致某種理想中的結果”沒有說明。

梅廣(2015:107)提出：“令”用於句首，用作假設標記出現在上古晚期。

動態性強的動詞。

- (84) (景公) 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說苑·貴德》102）
 (85)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說苑·至公》344）
 (86) (眾生) 起大意願：“**令**我常當行禪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放光般若經》T8-92c）

“令”經歷了從表實義的使役動詞到表狀態變化，再到表祈願的變化過程，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令”的表使役義的語義功能逐漸弱化，到了表祈願的“令”字句中，這一功能已經極其微弱了。

句法結構上“令”用於句首，以及“令”在語法化過程中表使役義的語法功能已極大程度的抽象化，在這兩個前提下，當不具使役義的“令”位於句首，與其後的句子產生語義上的關聯，且這種關聯是假設前提和結果，如果前後句中僅有一個使役的語義功能抽象化程度極高的“令”，那麼表示假設的意義就比較自然地依附在“令”上，“令”就演變為了假設連詞。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界線比較模糊的用例。(87)可以理解為“令”具有使役義，解釋為“讓這兩個人統帥軍隊，讓他們處於君主身邊”。從前後分句的語義關係判斷，也可理解為假設和結果的關係，解釋為“如果這兩個人統帥軍隊，如果他們處於君主身邊”。二者界線雖較模糊，但並不影響前後兩句是假設前提和結果的語義關係。

- (87) **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呂氏春秋·離俗覽·離俗》6-1138）

以下(88)~(90)是明確的假設複句。(88)“秦來年復攻王”，(89)“他馬”以及(90)“冬月益展一月”皆不是受到外力(NP1)作用後而產生的結果，它們分別與其後的“得無割其內而媾乎”，“固不敗傷我乎”及“足吾事矣”的關係是假設前提和結果，這三例中的“令”是假設連詞。

- (88) 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中-694）
 (89) 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9-2754）
 (90) 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記·酷吏列傳》10-3148）

同“使”一樣，“令”具有可表非現實假設情境的語義特徵。這是因為使役動詞“令”句可表祈願義，期盼未來新事態或變化的發生。祈願的內容是非現實的。因此，當假設複句中的假設是非現實的情境時，選擇“令”為假設連詞是一個比較自然的傾向。具有非現實意義的語義功能是“令”表達祈願與表達非現實的假設的共同點。(89)“令他馬”是與現狀相背的假設。(90)“令冬月益展一月”是一個在普遍認知範圍內不可能實現的假設。

其次，在句法結構上，“令”是使役動詞時，其句法結構為 NP1 + “令” + NP2 + VP，因此，“令”用作假設標記時，有必要位於句首。

雖然“令”字句的演變及語義特徵與“使”字句平行，但在“使”字句中可以看到假設讓步“即使”義的萌芽，而在本文考察範圍內，上古漢語中沒有確認到“令”字句具有此種

語義功能的用例²⁴。可見，“使”和“令”在語義功能上並不完全相同。

4. 假設標記“使”“令”的發展--雙音詞及其在中古漢語的發展

上古漢語中也有“使/令”與其他表假設的連詞組成的並列式的複合結構，如：“苟使”“若使”“如使”“假使”“假令”“設令”“如令”等。

- (91) 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墨子·明鬼下》4-153f）
- (92)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公孫丑下》1-176）
- (93)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史記·范雎蔡澤列傳》7-2407）
- (94)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管晏列傳》7-2137）
- (95) **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漢書·睦兩夏侯京翼李傳》10-3176）

對於雙音詞的來源等問題，本文暫不論述。僅就以上雙音詞而言，同義並列的構詞結構上，“使/令”位於後部；語義上，除(91)尚可解釋為“假使鬼神真有的話”和“假使鬼神確實沒有的話”，是以相同句法結構表示假設情境的列舉外，其他同義並列組成的複合結構皆保持了“使/令”表達非現實的假設的語義特徵，如(92)“如使予欲富”，(93)“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94)“假令晏子而在”，(95)“如令處於當今在”都是非現實情境的假設。

由上可見，雖然“如/若”表現的假設多是在未來可能實現的假設，但當它們與“使/令”並列組合為雙音節複合結構時，在雙音詞的兩個語素的語義上的競爭中，“使”“令”隱含的可表非現實性情境的語義功能佔據了支配地位，致使包含“使”或“令”的複合結構的假設連詞也可表現非現實性的情境。

本文還考察了《世說新語》中表假設的“使/令”句用例。(96)(97)“使我解四本”“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是與現狀相背的非現實的假設情境。(98)是有讓步義的假設，“即使是安期有這種性格，尚且毫無可取，更何況是藍田呢”。

- (96) 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世說新語·文學》240）
- (97) **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世說新語·文學》275）
- (98) 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世說新語·忿狷》866）

可以看出，直至中古漢語，“使”和“令”以及二者與其他表假設的連詞並列組成的複合結構仍多保持了以上所論述的語義及句法結構特徵。

5. 結語

本文探討了“使”“令”從使役動詞發展到假設連詞的演變機制，並論證了其語義及句法特徵。

在諸多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梳理了“使”“令”從使役動詞到假設連詞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使”“令”表使役的語義功能的抽象化逐步從淺到深。“使”“令”使役功能的極大抽象化以及其用於句首的句法結構為其演變為假設連詞提供了必不

²⁴ 表假設讓步的“即令”見於明李贄《與友人書》之二：“即令心地不明，胸中有數百篇文字，口頭有十萬詩書，亦足以驚世而駭俗。”（引自《漢語大詞典》第二卷，530頁）

可少的前提條件。在以上兩個前提下，“使”“令”為句首的句子與其後句是假設和結果的語義關係，且前後句中不存在假設連詞和表結果的副詞等時，假設義便有可能依附在“使”“令”上。這樣“使”“令”就從使役動詞演變為了假設連詞。

本文對先行研究進行了補充，指出以下上古漢語中“使/令”假設句的四個特徵：

(一)在上古漢語中已出現了“使”“令”與其他表假設的連詞並列組成的複合結構。在複合結構的雙音詞中，“使”“令”是中心語素，在雙音詞的語義功能上佔據支配地位，可表現非現實性的假設情境。在句法結構方面，也具有用於句首的特徵。從漢語語法史發展角度而言，至中古漢語，單音詞“使”“令”以及包含“使/令”的雙音複合詞亦保持了上古漢語假設連詞“使”“令”的語義以句法結構特徵。

(二)在明確劃分“現實”“非現實”範疇的前提下，“使”“令”與其他假設連詞相比，表現與現狀相背或在普遍認知・說話者認知範圍內難以實現的假設較多。這一語義特徵與“使/令”句表現非現實性的祈願具有共同性。這一共同性在其他語言中也可看到，因此具有普遍性。

(三)在句法結構上，假設句中“使”“令”多用於句首。

(四)假設“令”字句的演變機制及語義特徵與“使”字句平行，但在上古“使”字句中可以看到假設讓步“即使”義的萌芽，而“令”字句在上古沒有演變出此語義功能。可見“使”“令”在語義功能上的演變並不完全相同。

〈引書目錄〉

- 《左傳》：《春秋左傳注》楊伯峻．中華書局，1981年。
 《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阿毘曇毘婆沙論》《佛說放鉢經》《放光般若經》：《大正新修大藏經》．高楠順次郎他．東京：大藏出版社，1924-1934年。
 《韓非子》：《韓非子集解》（諸子集成第五冊）．王先慎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國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漢書》：《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論語》：《論語正義》（諸子集成第一冊）．劉賓楠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孟子》：《孟子正義》（諸子集成第一冊）．焦循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墨子》：《墨子閒詁》（諸子集成第一冊）．孫詒讓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呂氏春秋》：《呂氏春秋》（諸子集成第三冊）．高誘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史記》：《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
 《世說新語》：《世說新語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說苑》：《說苑校證》．向宗魯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戰國策》：《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莊子》：《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三冊）．王先謙著．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参考文献〉

- 江川泰一郎 2016. 『英文法解説』改訂三版．東京：金子書房。
 吳茂一 1978. 『ラテン語入門』改訂三版．東京：岩波書店。
 辻直四郎 1977. 『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東京：岩波書店。
 戸内俊介 2018. 『先秦の機能語の史的発展--上古中国語文法化研究序説--』第二章, 57-84頁．東京：研文出版。
 Hopper, Paul J and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白兆麟 1998. 〈《左傳》假設複句研究〉, 郭錫良主編《古代漢語語法論集》, 583-595 頁. 北京: 北京語文出版社.
- 大西克也 2006. 《從語法角度論簡中的“凶”字》《康樂集曾憲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 310-318 頁.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高婉瑜 2011. 《漢語常用假設連詞演變研究》第五章, 192-223 頁. 台北: 學生書局.
- 龔波 2017. 《上古漢語假設句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洪波 1998. 《論漢語實詞虛化的機制》. 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 370-379 頁.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黃庭頤 2017. 《從述足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十七期, 33-71 頁.
- 劉承慧 2010. 《先秦條件句「苟」、「若」、「使」的功能》. 《清華學報》新四十卷第二期, 221-244 頁.
- 呂叔湘 1982. 《中國文法要略》. 北京: 商務印書館年.
- 梅廣 2015. 《上古漢語綱要》. 台北: 三民書局.
- 邵永海 2003. 〈《韓非子》中的使令類遞繫結構〉, 《語言學論叢》27 輯, 260-312 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 東京: 江南書院.
- 辛嶋雲青 2022. 《試論中古漢譯佛典中表示祈願的“使 / 令”句》. 《中國語學》第 269 號, 92-110 頁.
- 邢福義 2018. 《漢語複句研究》. 《邢福義文集第五卷》.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徐丹 2003. 《“使”字句的演變——兼談“使”字的語法化》.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一)》, 224-238 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張麗麗 2006. 《從使役到條件》.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五期, 1-38 頁.

(『雲漢』1 号, 2023 年 3 月 26 日)

略談“非”的上古音及相關問題*

野原將揮

提要 本文討論“非”的上古音元音和相關問題。採用六元音假設，上古音微部的元音可分為兩類：**-ə-*和**-u-*。不過據甲骨文、《詩經》、諧聲關係、異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中的通假例，我們無法判斷“非”到底屬於**-əj*類還是**-uj*類。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在閩語中“飛”、“尾”、“未”和“肥”、“痲”、“沸”、“吠”有元音對立，也許保留着上古的唇化元音和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最後，本文參看“非=不唯”問題，利用“合音”之說試圖重構“非”的元音，即**-uj*。

关键词 上古音 唇化元音假設 戰國竹簡 閩語 微部

1. “非”與“飛”

1.1 微部的元音

目前，不少上古音學者都採用六元音系統（the six-vowel hypothesis）學說。比如鄭張尚芳（2003/2013）給上古音元音系統構擬出**-i-*、**-e-*、**-a-*、**-o-*、**-u-*和**-w-*。Baxter（1992）、Baxter and Sagart（2014）也構擬**-i-*、**-e-*、**-a-*、**-o-*、**-u-*和**-ə-*的六個元音。其中**-o-*和**-u-*是根據Jaxontov（1960）提出的唇化元音假設（the rounded hypothesis）構擬出來的。據唇化元音假設，微部該有兩種元音：**-ə-*和**-u-*。他還指出這些唇化元音**-o-*和**-u-*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後變成為**-ua*（<**-o-*）和**-uə*（<**-u-*）。

“非”與“飛”的中古音是止攝微韻三等平聲幫母（*pj+j*），來源於上古的微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於元音的圓唇度。“非”與“飛”的元音到底是非唇化元音**-ə-*還是唇化元音**-u-*，這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因為在圓唇舌根音等唇化聲母的環境下，我們難以判斷元音的歸屬。反過來講，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討論通假時我們不需要考慮元音唇化與非唇化的區別。

據Baxter（1992:454），詩經音系裡沒有**Puj*、**Pruj*、**Pjuj*、**Prjuj*等音節。同樣，部分牙喉音聲母字難以判斷其來源。譬如，“歸”（中古音微韻合口*kjwəj*）可來自於**k^wəj*、**kuj*或**k^wuj*。因為“歸”在《詩經》中往往跟**-əj*押韻，Baxter（1992）等學者都採用**k^wəj*¹。但是在少數詩句中，“歸”也跟**-uj*押韻，如“懷”。²因此，Baxter（1992: 460）推測“歸”原是**k^wuj*，經過語音異化演變為**k^wəj*。到了詩經時代，**k^wəj*不再跟**k^wuj*押韻，少數詩句中還保存原貌而已。同樣，更早的時代會有**Puj*等音節，這些**Puj*後來變為了**Pəj*。³“非”也可能來源於**puj*或**pəj*。對此，本文利用一些古文字材料和方言材料來做初步的研究。

* 本文在第六屆重建原始閩語及其相關問題工作坊（2021年6月20日）宣讀。本文承蒙郭必之、Jonathan Smith、John Carlyle、沈瑞清、秋谷裕幸、曾南逸（按音序排列）等先生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建議，謹此深致謝意。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本文是科研項目（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8K12379）的一個成果。

¹ Baxter（1992）擬為**k^wijj*。

² 《詩經·鄭風·揚之水》：“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懷”的上古音是**[g]^ruj*。上古音擬音據Baxter and Sagart（2014）。

³ 與Baxter（1992）不同，Guillaume Jacques（2000: 207）卻認為“歸”原是**k^wəj*，在某些方言中**K^wəj*經過異化而變為**-uj*。

1.2 “非”與“飛”

首先，我們來看《詩經》的押韻情況。“飛”只跟非唇化元音*-əj押韻。比如：

- (1)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周南·葛覃》
 (2)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邶風·柏舟》
 (3)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邶風·燕燕》
 (4)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豳風·東山》
 (5)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小雅·斯干》
 (6)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魯頌·有駉》

“飛”與“萋”、“喈”、“微”、“衣”、“歸”和“躋”押韻，其上古音分別是*[tsʰ]ʰəj、*kʰrəj、*məj、*ʔ(r)əj、*[k]ʰəj、*[ts]ʰəj。據《詩經》的押韻，“飛”不跟*-uj押韻而只跟*-əj押韻。因此“飛”可視為非唇化元音*-əj。可惜，副詞“非”在《詩經》中不押韻。

1.3 “非”與“飛”的諧聲關係以及有關問題

《說文通訓定聲》記載 29 個“非”聲字，如：“菲”、“斐”、“跬”、“誹”、“蜚”、“翡”、“腓”、“養”、“棐”、“蜚”、“痲”、“罪”、⁴“俳（並母）”、“裴（並母）”、“霏”、“扉”、“斐”、“匪”、“駢”、“悲”、“扉”、“排”、“斐”、“匪”、“蜚（古書中通假為“飛”）”、“斐”、“駢（並母）”、“筐”。29 個字中下面 5 個字在《詩經》中押韻（添加方框的都屬於微部）：

(7) “菲”：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邶風·谷風》

(8) “腓”：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小雅·采薇》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小雅·四月》

(9) “斐”：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小雅·巷伯》

(10) “駢”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小雅·四牡》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小雅·四牡》

(11) “悲”：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召南·草蟲》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檜風·素冠》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豳風·七月》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豳風·東山》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豳風·九罭》

⁴ 許慎把“罪”視為會意字（“从岡、非”），段玉裁加注為：“本形聲之字，始皇改為會意字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小雅·杕杜》
 鼓鍾喑喑、淮水滔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小雅·鼓鍾》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小雅·瞻印》

這些“非”聲字都只跟*-əj 押韻。跟上述“飛”字相同，按照“同諧聲者必同部”之原則，“非”也可擬為*-əj。

1.4 “非”聲字的異文

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給“非”構擬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譬如：許慎給“菲”字加注為“芴也”，又給“芴”加注為“菲也。”可見，“菲”與“芴”之間的關係似乎是一種聲訓關係。據諧聲關係，“芴”該屬於物部*-ut。那麼，“菲”也有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

“痺”也有異體字“痲”。其聲符“肥”可能來源於唇化元音*-uj。加之，許慎給“斐”加注為“《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也。’”，今本把“斐”寫成“蔚”字，⁵此字也屬於物部*-ut-s。

就“飛”的諧聲關係，《說文》只收錄一個“飛”聲字，即“驪：馬逸足也。从馬从飛。《司馬法》曰：‘飛衛斯輿。’段玉裁加注為‘逸當作兔。廣韻曰：‘驪兔、馬而兔走。’玉篇曰：‘驪兔、古之駿馬也。’呂氏春秋高注曰：‘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

1.5 本章的小結

據《詩經》的押韻，“飛”屬於非唇化元音*-əj，這一點是應該沒有問題的。關於“非”的元音，雖然“非”字本身不押韻，“非”聲字只跟*-əj 押韻。但是“非”聲字也跟*-uj 有異文關係。一方面跟*-əj 押韻，另一方面跟*-uj 有異文關係。“非”聲字顯示出兩面性。這是因為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əj 和*-uj 似乎不分工。

表 1 “非”與“飛”的押韻和異文

	押韻	異文
飛	*-əj	*-əj
非	—	—
“非”聲字	*-əj	*-əj/ *-uj

可見，通過押韻、諧聲關係和異文的分析，我們還不能判斷“非”的原始形式（遵從多數決定原則的話，也可給“非”構擬*-əj）。下面我們來看出土文獻中的例子。

2. 出土文獻中的“非”與“飛”

2.1 甲骨文

《說文》給“非”加注為“違也。从飛下𠄎，取其相背。凡非之屬皆从非。”許慎指出“非”所从的是“飛”字的“下𠄎”，以下是“非”與“飛”的小篆：

⁵ 《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表 2 小篆“非”與“飛”

①	②
非	飛

從小篆的字形上看，“非”从“飛下翅”之說存疑。何琳儀（1998: 1291）也指出“非：飛之省形。…雙翅相反，故有違背之義。”不過，“非”與“飛”不一定是同源的，以下是甲骨文的“非”字：

表 3 甲骨文“非”

③	④	⑤
合集 33694 “非若”	合集 28299 “非水”	合集 24266 “非”

黃德寬（2007: 3168）則認為“甲骨文作，金文作，不从飛下翅。疑非與北為同源字。

北是背之初文，甲骨文作，象二人相背。（非）則於人形上各加一短橫以與北相區別。違是非的本意，與北（背）義相因。”

順便看一下“北”字的甲骨文。“北”字象“兩個人相背”：

表 4 甲骨文“北”

⑥	⑦	⑧
合集 33694 北土受年	合集 28789 自東西北逐	合集 34157 帝北亞

如黃德寬（2007）的看法，“非”與“北”的字形相近。因為未見單字“飛”，目前我們不能確定“非”與“飛”的字源關係。“北”屬於上古的職部*-ək， “北”與“非”在音韻上沒有任何關係（元音都是*-ə-）。但是，如黃氏所指，兩字在意義上似乎有一定的關係。

2.2 金文

下面我們來看，甲骨文以後的古文字材料。雖然在金文中未見單字“飛”，有“飛”作為義符的字表示{翼}：⁶

表 5. 金文中的“非”與“翼”

⁶ 《說文》“翼，翬也。从飛異聲。翼，篆文翼从羽。”

⑨	⑩	⑪	⑫
			
非 《中山王響壺》 “寡人非之”	非 《班殷》 “班非敢覓”	翼（翼） 《秦公罇》 “翼受明德”	翼 《中山王響壺》 “祇=翼=”

例⑫的上部似乎是“非”上下顛倒的。但是，我們不能判斷“非”與“飛”是否同源。

2.3 戰國竹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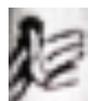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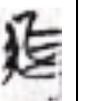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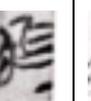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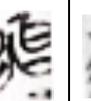
下面我們來看戰國竹簡中的“非”與“飛”。

表 6 戰國竹簡中的“非”與“飛”

⑬	⑭	⑮
		
非 郭店《老子》甲 8 “非（微）弱玄達”	非 睡虎地《秦律》195 非其官人毆（也）	飛 曾侯乙 172 …為左飛（駢）

曾侯乙墓竹簡第 142-209 號簡記載了駕馭各輛車的馬匹。第 171 號簡到 176 號簡中，我們可以看到 12 個“飛”字：

表 7 曾侯乙墓竹簡的“飛”

											
171a	171b	172a	172b	173a	173b	174 a	174b	175a	175b	176a	176b

黃德寬（2007：3171）把第 172b 和第 174b 的字隸定為从馬非聲的“駢”字。不過這

兩個字跟在同一簡上写的从馬字“駢”有明顯的區別，如 （駢）。筆者推測，因為第 142-209 號簡中出現許多从“馬”的字，172b 和 174b 的“飛”字訛變為相近从“馬”的字形。

如上表 5 和 6，有些字比較接近“飛”的下翅。但是，如上所述，在甲骨文中沒有單字“飛”，我們還不能斷定“非”是“飛”的下翅。

關於表 7 的“飛”字，過去學者都認為“飛”表示“非”得聲的{駢}。陳偉（2019）指出“簡文所記六馬駕一車，把兩駢外邊的馬為左駢、右駢，與《說文》的解釋相合。⁷舊注一般認為駢、駢一名同質，非是。”按照上下文，“飛”讀為{駢}是妥當的。⁸

⁷ 《說文》“駢：駢，旁馬。从馬非聲。”

⁸ 《說文》還收錄“駢”字，筆者認為還不能完全排除曾侯乙的“飛”表示{駢}的可能性。如果如此，

另外，在《包山楚簡》中有从厂非聲的字，如“登（鄧）𠄎”（表 8-⑬）。此字應該表示固有名詞（人名）。有趣的是《望山楚簡》第 13 號簡的“翹”字（⑭）。“肥”聲字表示“非”聲的{翹（翡翠）}。加之，《詩經·周南·葛覃》“黃鳥于飛”的“飛”字，在《安大簡》第 4 號簡中寫成“騏”（⑮）。不使用常用字“飛”而用生僻字“騏”來表示{飛}有點不自然（也有可能為了與前面的“鳥”字相配）。無論如何，此處“悲”聲字也表示“飛”。因為“悲”也在《詩經》中與*-əj 押韻，所以這也是合理的。

表 8 “[厂非]”、“[羽肥]”和“[鳥悲]”

⑬	⑭	⑮
		
𠄎 《包山楚簡》45、57 登（鄧）𠄎	翹 《望山楚簡》2.13 翹(翹)翠(翠)之首	騏 《安大簡》4 黃鳥于騏（飛）

可見，在出土文獻中“非”、“悲”跟“飛”還是有著密切關係。

2.4 本章的結論

據古文字材料，我們不能確定“非”與“飛”的字源關係。到了戰國時期，有“飛”聲字表{騏}的例子。加之，由“肥”得聲的“翹”表{翹}。按照這些通假例，我們也許可以說“非”、“飛”和“肥”都屬於非唇化元音*-əj。

表 9 “非”與“飛”的押韻、異文和通假例

	押韻	異文	戰國竹簡的通假例
飛	*-əj	*-əj	“飛” = {騏}
非	—	—	—
“非”聲字	*-əj	*-əj/ *-uj	“翹” = {翹}、“騏” = {飛}

然而在閩語中“飛”與“肥”的元音對立較為明顯。

3. 閩語

3.1 閩語中的對立

秋谷·野原（2019：15-25）指出閩語保存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推測“閩語最古老的語言層次能夠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之前，也就是在戰國時期。”秋谷·野原（2019）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相當於上古音元部的詞，而本文要討論的是屬於微部的“飛”與“非”。

其實，秋谷（1993：11-20）已經指出過原始客家話有兩種微韻唇音字的讀法而構擬*-oi（“飛”“尾”）和*-ui（“癆”“肥”）。秋谷（1993）還指出閩語中也有平行的對立而

“騏”也有與“騏”相近的意義。

給“飛”等字擬為*-yəi，給“肥”擬為*-ui。

首先，我們來看閩南區和莆仙區方言的情況。“飛”與“肥”之間有明顯的對立（暫將前者稱為“飛組”、後者稱為“肥組”）：

表 10 閩南區和莆仙區的“飛”與“肥”

		廈門	漳州	漳平永福	仙游	莆田
飛組	飛	pe	pue ¹	pie ¹	puoi ¹	puai ¹
	尾	be		bie ³	puoi ³	puai ³
	未	be	be ⁶	bie ²	puoi ⁶	puai ⁶
配		p ^h e	p ^h ue ⁵	p ^h ie ⁵	p ^h uoi ⁵	p ^h uai ⁵
肥組	肥	pui	pui ²	pui ²	pui ²	pui ²
	癩	pui	pui ⁵		pui ⁵	pui ⁵
	沸	pui				pui ⁵
	吠	pui	pui ⁶	pui ²	pui ⁶	pui ⁶

與閩南區、莆仙區方言相同，閩東區的“飛”與“肥”也有明顯的對立：

表 11 閩東區方言的“飛”與“肥”

		福清	福鼎	古田杉洋	福安	霞浦	壽寧斜灘
飛組	飛	puoi ¹	puoi ¹	puəi ¹	pui ¹	poi ¹	poi ¹
	尾	mui ³	muoi ³	muei ³	mui ³	moi ³	moi ³
	未	ui ⁶	muoi ⁶	muoi ⁶	mui ⁶	moi ⁶	moi ⁶
配		p ^h uoi ⁵	p ^h uoi ⁵	p ^h uei ⁵	p ^h ui ⁵	p ^h oi ⁵	p ^h oi ⁵
肥組	肥	pui ²	pui ²	poi ²	pəi ²	pui ²	pəi ²
	癩	pui ⁵	pui ⁵	pui ⁵	pəi ⁵	pui ⁵	pəi ⁵
	沸				pəi ⁵		pəi ⁵
	吠	pui ⁶	pui ⁶		pəi ⁶	pui ⁶	pəi ⁶

以下是閩北方言的例子：

表 12 閩北區方言的“飛”與“肥”

		建甌迪口	浦城石陂	政和鎮前
飛組	飛	yε ⁸	fiye ²	poi ¹
	尾	moi ³	mo ³	moi ³
	未			
配		p ^h o ⁵	p ^h o ⁵	p ^h oi ⁵
肥組	肥	pui ²	py ⁵ (～料)	pui ²
	癩	pui ⁵	py ⁵	poi ⁵
	沸	y ⁹	fiy ²	hui ⁹
	吠	pui ⁶	by ⁶	

以下是閩中區的：

表 13 閩中區方言的“飛”與“肥”

		永安	沙縣蓋竹
飛組	飛	pue ²	pue ¹
	尾	bue ³	mue ³
	配	p ^h ui ⁵	p ^h ue ⁵
肥組	肥	pui ²	pui ²
	痲	pui ⁵	pui ⁵
	沸		
	吠	pui ⁵	

除此之外，邵將區的邵武“飛”讀作 p^hei³，“肥”讀作 p^hi²。將樂“飛”讀作 p^he¹、“尾”讀作 me³，“肥”讀作 p^hi²。⁹

可見，飛組（飛、尾、未）和肥組（肥、痲、沸、吠）之間的確有元音的對立，飛組的原始形式可構擬為 *-yəi，肥組為 *-ui。¹⁰

3.2 本章的小節

閩語的“飛組（飛、尾、未 *-yəj）”和“肥組（肥、痲、沸、吠 *-uj）”似乎保留着上古的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飛組”反映着上古的 *-əj，相反，“肥組”反映着上古的 *-uj。雖然我們無法判斷“非”屬於前者還是後者，但是“痲”有異體字“痲”和“痲”。因此，“非”也很有可能原屬於“肥組”，相當於原始閩語的 *-ui，來源於上古的唇化元音 *-uj (> *-əj)。

當然，閩語中的“飛肥”之間的對立說不定是閩語獨自發展的結果。本文的分析不太全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研究。¹¹

4. 合音問題

4.1 合音之說

如上所示，押韻、諧聲關係、古文字材料都沒有提供確切的證據。最後，我們順便討論一下“非”的合音問題。

“非”為否定副詞，一般用來表示判斷的否定，可譯為“不是”。¹²還有跟“是（正確）”的相反的意思，即“錯誤”。

在甲骨文中肯定句（帶“唯”的句子）和否定句（“非”）對言，如：

(12) a 癸酉貞：日月有食，隹（唯）若？（合集 33694）

b 癸酉貞：日月有食，非若？（合集 33694）

癸酉日占卜問：如果真的發生了日食或月食，會是吉利還不吉利呢？

⁹ 李如龍（1999: 323-362）。

¹⁰ 參看秋谷（1993:18）的擬音：

	原始閩語	閩北語	閩東·閩南·莆仙	原始客家
飛	*-yəi	*-ye	*-uoi	*-oi
肥	*ui 或 *-yi	*-y	*-ui	*-ui

¹¹ 另外，據“肥”、“配”和“妃”的古文字，這些詞好像有同源關係（可參看陳劍（2002/2019:14-23））。不過在閩語中“配”似乎屬於“飛組”。本文暫時不討論這個問題，先聚焦於“非”與“飛”的問題。

¹² 張玉金（1993:79）。

- (13) a 非水? (合集 28299)
 b 隹(唯) …? (合集 28299)
 不會是水災呢, 還是水災呢?

除了甲骨文之外, 古典中也有“非”(匪)與“唯”(惟、維、隹)對言的例子:¹³

- (14) 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 不惕予一人。 《書經·盤庚上》
 (15) 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 《書經·呂刑》

在《詩經》中一般用的是“匪”字:

- (16) 匪舌是出, 維躬是瘁 《小雅·雨無正》
 (17) 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 《左傳·昭公三年》

可見, “非”字用來表示否定句, 相反, “唯”字用來表示肯定句。據此, 高亨(1943: 126)、Pulleyblank(1959: 178-180)認為把“非”當作“不唯”二字之合音。譬如高亨(1943)指出:

亨按“其神不傷人”之神, 宜讀為神祇之神。“非”者蓋“不唯”二字之合音, 若合“之於”或“之乎”而為“諸”, 合“之焉”而為“旃”, 合“而已”而為“耳”, 合“不律”而為“筆”, 合“終葵”而為“椎”, 合“扶搖”而為“颿”也。今繹此文曰: “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魘; 不唯其鬼不魘, 其神不傷人; 不唯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¹⁴始怡然理順矣。詩抑“匪手携之, 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匪”亦“不唯”之合音。“非”“匪”古通用。

高亨(1943)將“非”讀為“不唯”({不獨}之意)。與此相似, Pulleyblank(1959)也認為“非”當作“不唯”, 不過他把“不唯”之“唯”當作繫辭。

若合音之說成立, 我們可以通過“唯”的讀音構擬“非”的元音。不過, 就“唯”的擬音, 學者之間還存在一些爭議, 如表 14:

表 14 “非”、“不唯”的上古音比較

	李方桂	鄭張尚芳	Baxter	Schuessler	Baxter & Sagart
非	*pjəd	*pwl	*pjij	*pəi	*pəj
不	*pjəg	*pw	*pji	*pə	*pə
唯	*rədx	* ^g wi	*ljuj?	*wi?	* ^g wij (< * ^g wuj?)

鄭張(2003)、Schuessler(2009)和 Baxter and Sagart(2014)認為“非”屬於微部的非唇化元音(*-əj 之類)。鄭張(2003)把“唯”、“維”歸為脂部*^gij。Baxter and Sagart(2014)在此處打上問號, 保留了“唯”來源於微部唇化元音的可能性(*^gwuj?)。下面我們來看“唯”及有關字的上古音。

¹³ Pulleyblank(1959: 179)所引用的例子。

¹⁴ 《老子》: “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4.2 佳聲字

《說文》收錄 39 個“佳”聲字。根據中古音地位，這些佳聲字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屬於微部唇化元音*-uj 的，另一類是屬於脂部*-ij 的。¹⁵前者音變為中古音灰韻一等和脂韻三等合口舌音、齒音、正齒音；後者音變為脂韻三等合口字的以母字和心母字。

表 15. 第一類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推	*tʰ ^s uj	thwoj 灰一透	tuī
堆	*C.t ^s uj	twoj 灰一端	duī
崔	*[dz] ^s uj	dzwoj 灰一從	cuī
椎	*k.druj	drwij 脂三澄	chuí
佳	*tur	tsywj 脂三章	zhuī

表 16. 第二類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唯	*g ^w ij (< *g ^w uj?)	ywj 脂三以	wéi
維	*g ^w ij (< *g ^w uj?)	ywj 脂三以	wéi
雖	*s-q ^w ij	swij 脂三心	suī

從聲母的角度來講，第一類屬於上古的 T 類聲母和塞擦音 TS，¹⁶第二類屬於小舌音聲母。據諧聲原則，第一類和第二類互不通用。Jacques (2000) 卻認為這些詞都有諧聲關係（也可參看 GSR 575）。

如上所示，有學者認為“非”是“不”和“唯”的合音。不過，因為“唯”屬於第二類，即脂部*-ij，從這一點來講，合音之說不成立。有趣的是 Baxter and Sagart (2014) 還留下給“唯”、“維”和“雖”構擬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但沒有提到其理由）。筆者認為跟 Jacques (2000) 採用的假設有關係。Jacques (2000) 認為：在假設（1）發生之前，“不”與“唯”已經合為“非”，所以沒有經過假設（1）的音變。“不唯”合為*b^puj 之後，經過假設（2）的音變而變為*b^pij。Jacques (2000) 的解釋很有說服力。

表 15 Jacques (2000) 的假設

	不 * ^b pi	唯 * ^b tə-wuj
合音	非 * ^b puj	
假設（1） Labiovelar dissimilation: uj / [+Labial, +Velar] __ > ij	—	
假設（2） Grave dissimilation: uj / [+Labial, +Velar; +Stop] __ > ij	* ^b puj > * ^b pij	

另外，最近還有 Sagart (2020、2021) 的觀點。以下是 Sagart (2020、2021) 所舉的例子（《詩經》的篇名為筆者所加。Baxter (1992) 沒有把下線處的例子視為押韻）。這些均為*-it-s 跟*-ut-s 押韻的例子：

¹⁵ Jacques (2000) 根據聲母分成三類，“plain dental stop（佳堆推誰等）”、“affricate and s- clusters（崔催雖等）”、“tə- presyllable（惟唯帷）”。前兩類帶有唇化元音*-uj，第三類屬於脂部*-ij。他認為第三類也來源於*-uj，只是*-uj 經過異化而變為*-ij 而已。

¹⁶ “崔”也許來源於 T 類。譬如，由“崔”得聲的“催”可構擬為*s-tʰ^suj。

- 58.5 (衛風·氓) 寐 *mi[t]-s with 遂 *sə-li[u]t-s,
- 60.1 (衛風·芄蘭) 悸 * [g]ʷi[t]-s with 遂 *sə-li[u]t-s,
- 65.2 (王風·黍離) 穗 *s.[ɕ]ʷi[t]-s with 醉 *Cə.tsu[t]-s,
- 241.3 (大雅·皇矣) 季 *kʷi[t]-s with 對 *[t]ʰ[u]p-s,
- 241.4 (大雅·皇矣) 季 *kʷi[t]-s with 類 *[r]u[t]t-s,
- 256.4 (大雅·抑) 寐 *mi[t]-s with 內 *nʰ[u]p-s

Sagart (2021) 指出：這些*-it-s 原是唇化元音*-ut-s，在圓唇舌根音等唇化聲母和唇化元音的環境下發生異化，*-ut-s 變為*-it-s。Sagart (2021) 還推測這個語音演變發生在東方地區。¹⁷

這個看法也很有啟發性。同樣的異化也許會發生在“唯”“維”字上，如下：

表 16 唯的擬音*-uj

	上古音	異化 *-uj > *-ij	中古音	普通話
唯	*ɕʷuj	*ɕʷij	ywij 脂三以	wéi
維	*ɕʷuj	*ɕʷij	ywij 脂三以	wéi
雖	*s-qʷuj	*s-qʷij	swij 脂三心	suī

此假設成立的話，“不唯”可擬為*pə *ɕʷuj。“不”和“唯”合音之後，*pə *ɕʷuj 變為*puj，不受到音變(1)的異化（參看以下表 17）。那麼“不唯”的合音詞“非”的元音也可擬為*puj。之後“非”經過音變（2）變為*pəj。¹⁸

表 17 異化的相對年代

		不唯	唯	佳	肥
		*pə *ɕʷuj	*ɕʷuj	*tur	*puj
合音		非 *puj	—	—	—
音變(1)	*-uj / [labiovelar, labiovelar] _ > *-ij	—	*ɕʷij	—	—
音變(2)	*-uj / [+Labial, +Velar; Stop, Nasal] _ > *-əj	*pəj	—	—	*pəj
結果		*pəj	*ɕʷij	*tur	*pəj

4.3 本章的小結

高亨（1943）、Pulleyblank（1959）指出“非”是“不唯”之合音。根據以往學者的擬音，“唯”屬於脂部*-ij，所以無法視為合音詞。不過，據 Jacques（2000）和 Sagart（2020、2021）的看法，我們可以推測*-uj 在圓唇軟顎音或小舌音的環境之下經過異化而變為*-ij。若合音之說成立，“非”也可擬為*puj（< *pə *ɕʷuj “不唯”）。

5. 結語

第一章，我們利用押韻、諧聲關係和異文等分析“非”與“飛”的元音問題。雖然“非”字本身不押韻，但是“非”聲字只跟*-əj 押韻，又與*-uj 有異文關係。“非”字的這

¹⁷ 其實，Sagart（2020）原認為*-it-s 在唇化聲母之下發生同化而變為*-uts，後來 Guillaume Jacques 在網站指出過與此方向相反的意見，提出在唇化聲母下發生異化而由*-ut-s 變為*-it-s 的可能性。

¹⁸ 把“非”視為“不唯合音”的學者都認為否定副詞“微”也是“無（毋）唯”之合音。本文不討論“微”的問題。

兩面性並不矛盾。因為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əj 和*-uj 似乎不分工¹⁹。

第二章，我們參考了古文字材料。據《說文》，“非”是“飛的下翅”。不過，根據古文字材料，“非”與“飛”字並沒有字源關係。到了戰國時代，有“飛”讀為{駢}的通假例（其實，不能排除“飛”字直接讀為{駢}的可能性）。也有“翬”讀為{翬}、“騏”讀為{飛}的例子（表8）。

可見，根據《詩經》押韻、諧聲、異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上的通假例，我們難以判斷“飛”“肥”“非”等字的元音是*-əj 還是*-uj。

另外，在閩語中“飛組（飛、尾、未）”和“肥組（肥、痲、沸、吠）”之間有元音的對立，似乎保留着上古的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飛組”（*-yəi）應該反映着上古的*-əj，“肥組”（*-ui）反映着上古的*-uj。“非”到底屬於哪一組，在閩語內部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我們也還不知道這個對立是上古音的保留還是閩語獨立發展的結果。這一點我們還需要更深的研究。

第四章，我們討論了合音的問題。雖然關於合音的問題還存疑，但如果合音之說成立的話，我們可以通過“唯”的上古音去討論“非”的上古音。按照其中古音，“唯”歸為上古音脂部*-ij。那麼“不唯”的合音該是*pij，就不能視為“非”的讀音。但是，據 Jacques (2000)，Sagart (2020、2021) 的研究，“唯”原是*ɣwuj，在圓唇軟顎音或小舌音的環境下，*-uj 變為*-ij。那麼“不唯”可擬為*pə *ɣwuj。因此，我們也可給“非”構擬唇化元音*-uj。若這個假設成立的話，在閩語中“非”與“肥”便可構成一組（原始閩語*-ui）。²⁰

本文所討論的內容都是初步的研究，對以上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方言材料出處〉

廈門（閩南區）：Douglas (1873)；漳州（閩南區）：馬重奇 (1993)；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莆田：李如龍等 (2019)；仙遊：李如龍 (1999，仙遊方言志)；福清（閩東區）：馮愛珍 (1993)；福鼎：福鼎縣志 (2003)；古田（閩東區）：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福安（閩東區）：秋谷裕幸 (2020)；霞浦：秋谷裕幸 (2010)；壽寧：秋谷裕幸 (2010、2020)；建甌（閩北區）：秋谷裕幸 (2008)；浦城石陂（閩北區）：秋谷裕幸 (2008)；政和：秋谷裕幸 (2008)；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0)；沙縣蓋竹（閩中區）：鄧享璋 (2006)

〈參考文獻〉

- 秋谷裕幸. 1993. 客家語における微韻唇音字，《中國語學》第 240 號。日本中國語學會。
 ——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2010.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18.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2020. 《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秋谷裕幸、野原將揮 2019. 上古唇化元音假說與閩語，《中國語文》2019 年第 1 期。15-26

¹⁹ 或者說“非”已在詩經的年代經過異化而變為*-əj (<*-uj)。非聲字跟帶有*-u-的詞有異文關係也許是更早時代的痕跡。

²⁰ 另外，在閩語中“飛組”和“肥組”反映著上古音的唇化元音的話，我們可以推測閩語沒有經過表 17 的音變 (2) 的異化。

頁。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a.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b.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Online at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 MC 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 6. 18.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王福堂修訂. 2008.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重印本), 1989年第二版, 語文出版社。
- 蔡国妹. 2006. 《莆仙方言研究》博士論文。
- 陳劍. 2002/2019. 《釋《忠心之道》的“配”字》, 《戰國竹書論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載《中國哲學》編委會、煙臺大學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辦《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六期, 2002年12月)。
- 陳偉. 2009.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 經濟科學出版社。
- 鄧享璋. 2006. 福建省沙縣蓋竹話同音字彙, 《開篇》vol.25, 好文出版。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 Co.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1998. 《福州方言詞典》,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郭錫良. 2007. “美”字能歸入微部嗎? ——與梅祖麟商榷, 《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五輯. 296-302 頁。商務印書館。
-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 中華書局。
- 黃德寬. 2007. 《古文字譜系疏證》, 商務印書館。
- 高亨. 1943. 《老子正詁》, 開明書店。
- Guillaume Jacques. 2000. The character 維·惟·唯 ywij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脂 Zhi and 微 Wei rhym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9(2): 205-222.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 Stockholm, 1-332.
- 李如龍. 1999. 仙遊方言志, 《福建是方言志 12種》。福州: 福建出版社。
- 李如龍. 2019. 《莆仙方言調查報告》。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榮主編 李如龍、潘渭水編纂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華大學學報》9, 1-61 頁。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第3期, 199-217 頁。
- 梅祖麟. 2006. 从楚簡“𡗗(美)”字來看脂微兩部的分野, 《語言學論叢》32輯. 173-192 頁。商務印書館。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 35-73 頁。
- Pulleyblank, Edwin. 1959. Fei 非, Wei 唯 and Certain related words, In :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S. Egerod and E. Glahn (eds.) Copenhagen. pp. 1178-1189.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20. "A dialectal sound change in the Shi Jing: -it-s > -ut-s after labial consonant," in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06/02/2020, <https://stan.hypotheses.org/450>.

—— 2021. "Alternating *-it-s and *-ut-s rhymes in the Shi Jing: a dissimilatory change after all," in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14/02/2021, <https://stan.hypotheses.org/1233>.

Sergej Jaxontov (谢·叶·雅洪托夫). 1960/1986. 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 收錄於《漢語史論集》([蘇]謝·叶·雅洪托夫 著、唐作藩、胡双宝 選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53-77 頁。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野原將揮、秋谷裕幸. 2014. 也談来自上古*ST-的書母字, 《中國語文》2014 年第 4 期, 340-350 頁。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鄭張尚芳. 2003/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周長楫、林寶卿. 1992. 《永安方言》。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關於《道行般若經》的一處斷句“正使舉珠出去”*

林智

提要 支謙《道行般若經》卷二“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的斷句頗令人費解，本文對目前通行的 CBETA 電子佛典資料庫與大正藏的斷句方式提出質疑，並根據“去”在東漢時尚未產生“去往”義、同時參考同經異譯與梵漢對勘材料，提出應斷為“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

关键词 《道行般若經》 斷句 “去” 同經異譯 梵漢對勘

1. 問題提出

《道行般若經》卷 2 有一段關於摩尼寶珠的描述：“我所語摩尼珠者，有所著處，若篋中、若函中，其光明倍徹出，正使舉珠出去餘處¹，續明如故，般若波羅蜜、薩芸若之德，至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般泥洹去，舍利供養如故，薩芸若、舍利遍分布天下，供養如故。(8/436a)”CBETA 電子佛典資料庫標點如是；除了頓號不斷開，大正藏的句讀也基本相同。這段話文意簡單，但這句“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記為“標點 1”）的標點恐怕還存在商榷的餘地。有人可能會標點為：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²。（記為“標點 2”）我的觀點是這句話應該標點為：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標點 3”）

2. 論證

2.1 爭議焦點：“去”的詞義

這 3 種標點的爭議在於，“去餘處”是否應該斷開，這又和“去”的句法語義密切相關。眾所周知，趨向動詞“去”在先秦表示“離開”義，可帶起點賓語，如“逝將去女（《詩經·碩鼠》）”；後來又產生了可帶終點賓語的“去往”義，沿用至今。“標點 1”“標點 2”的顯然是把這裡的“去”理解為可帶終點賓語的“去往”義，即將寶珠拿去別處。而“標點 3”則是認為這裡的“去”仍是離開義，即將寶珠拿走。

那麼問題也就變成了：“去”在當時是否產生了“去往”義？這個問題學界早已多有討論。朱慶之（1992）以為“去往”義的“去”出現在兩晉。胡敕瑞（2006）則提出東漢“去”已有“去往”義。更有其他學者提前至西漢。我認為兩漢說為時過早，根據拙文林智（2022），西漢說所舉證的“去+VO”結構（如《史記·項羽本紀》的“去學劍”）中“VO”未必是“去”的目的、不能證明“去”的語義發生改變。而東漢說所舉證的東漢“去”與“往”相互通用的表現（如《論語·述而》“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玄注：“往猶去也”），其實由來已久，早至先秦“往”便可基於“離開”義與“去”相通，因此同樣不能證明“去”在東漢產生了“去往”義。總之，東漢三國的譯經及中土材料，並沒有表示“去往”義的“去”的用例，因此推斷“去”的“去往”義應該是直到晉代才產生的。

* 本論文得到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及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語言學視野下的漢譯佛經時代考辨”（編號：202230215）資助。

¹ 這裡還有異文，宮本和聖語藏本沒有“餘”字，應是受《大明度經》（見下文例（1））的影響、不可取。仍從大正藏本。

² 這是第十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學研討會（2022，杭州）上討論時一位匿名學者的觀點。

2.2 平行文本

接下來再通過同經異譯和梵漢對勘來說明選擇“標點 3”的理由。

(1) 如我所說者，異天下寶輕，不如彼德尊十百千萬億倍，若以著篋函中，其明徹出，正使出去，處明如故。天中天！一切知德至如來滅度後，是一切知舍利遍布供養如故。（三國吳·支謙《大明度經》卷 2，8/485b）

(2) 我所說寶者，若著函中、若著篋中，其光明徹出去。正使舉珠去其處，續明如故。若有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者，其處則無眾患之難，其處所尊，譬如摩尼珠之處。（《放光般若經》卷 7，8/52c）

(3) 如我所語摩尼者，若著篋中、若著函中，其光明徹照於外；假使舉珠出去，其處續明如故。般若波羅蜜者，是薩芸若之慧，至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般泥洹去後，舍利續得供養。（《摩訶般若鈔經》卷 2，8/518a）

(4) 世尊！若是珠在篋中，雖舉珠去，以珠功德故，其篋則貴。世尊！以般若波羅蜜薩婆若智功德故，如來滅後，舍利得供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2，8/545c）

(5) 如是無價大寶神珠威德無邊說不可盡，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無邊威德。設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為眾人愛重。（《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128，5/700b）

(6) 是天摩尼寶圓滿一切相，若以寶函盛此妙寶，若時取其寶去，而此寶函亦具諸功德，人所尊敬。何以故？以盛大寶殊妙器故。（《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8/602b）

(7) yatra 哪兒-ind. ca 和-ind. karaṇḍake 籃子-loc.sg.m. tan^{tat} 它-nom.sg.n. maṇiratnaṃ 摩尼寶珠-nom.sg.n. prakṣiptaṃ 被安置-nom.sg.n. bhavati^{√bhū} 是-pr.sg.3 utkṣiptaṃ 放上-nom.sg.n. vā 或-ind., tata tatas 在那兒-ind. uddhrte 取出-loc.sg.n. 'pi 也-ind. tasmin 它-loc.sg.n. maṇiratne 摩尼寶珠-loc.sg.n. karaṇḍakāt 籃子-abl.sg.m. sprhaṇīya 為人所欲求的-nom.sg.m. eva 表強調-ind. sa 它-nom.sg.m. karaṇḍako 籃子-nom.sg.m. bhavati^{√bhū} 是-pr.sg.3. / tair 它-ins.pl.n. maṇiratnaguṇaiḥ 摩尼寶珠+功德-ins.pl.n. parā 最、至高-nom.sg.f. tatra 於是-ind. karaṇḍake 籃子-loc.sg.m. sprho³ 渴望 sprhā-nom.sg.f. tṣpadyate utpadyate-產生、成為-pr.sg.3. (Vaidya, 1960: 50)

現漢翻譯：摩尼寶珠被放在籃子的裡面或上面，當從籃子裡取出寶珠後（注意 uddhrte tasmin maṇiratne 用獨立依格表條件狀語，按梵文原文其實是“當寶珠被從籃子裡取出”⁴），籃子也為人所欲求。因為摩尼寶珠的功德，籃子於是成為了至高的追求。

If that jewel were now put into a basket, or placed upon it, then that basket would still be desirable after the jewel had again been taken out. The basket, through the qualities of the jewel, would become an object of supreme longing. (Conze, 1975: 118)

2.3 解釋說明

可以看到，與《道行般若經》例句語義匹配的異譯經，主要是前 3 例。自鳩摩羅什（例（4））起以及梵文本的 4 例，在文意上略微偏差。不過這裡都是想說，摩尼寶珠光明無限，即便將它從原先盛放的匣子中拿走，匣子本身也（因為曾經盛放摩尼寶珠的緣故）仍然一如之前地明亮/受人追求。例（1）（3）（4）（6）更明顯地能看出“（出）去”是指將寶珠拿走，而不強調拿去放到某個地方（目的地），同樣有利地證明了此處的“去”依舊是離開義，且不會是及物用法，因為“去（離開）+餘處”在該語境中不成立。

再來看兩漢時“出去”的用法，都表示離開義，且一般不及物⁵。如：

³ sprhā 為渴望之義，其渴望追求的对象表現為依格，即此句的“籃子” karaṇḍake。

⁴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

⁵ 《孟子·離婁下》“出妻屏子”趙岐注：“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這裡的“出去”後接賓語，是一種臨時的使動用法。

(8) 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史記·陳丞相世家》)

而《道行般若經》中另一例“出去”也在上下文中與“去”對當、表離開。

(9) 已得須陀洹道證，若於中住不樂因出去；已得斯陀含道證，若於中住不樂因去… (《道行般若經》卷 1, 8/429c)

同時，這時期“去”也沒有成為趨向補語，它與“出”是同義並列。可以參考梁銀峰(2005)。也即，《道行般若經》的“舉珠出去”的句法結構關係是：

舉珠 + 出去

動賓 並列

並 列

總之，“去”在東漢時還沒有發展出“去往”義，且根據同經異譯和梵漢對勘，這裡都是離開之義，只能斷為“正使舉珠出去，餘處續明如故”。

此外，例(2)的斷句問題與《道行》例如出一轍，應該改為“正使舉珠去，其處續明如故。”前一小句的“其光明徹出去”的“去”字，應該是涉後句而衍。

唯一還剩下的小問題是“餘處”應該怎麼理解。根據異譯經和梵本，是指原先盛放寶珠的地方，但是“餘處”按字面理解，是“其他/其餘地方”的意思，應是指匣子相對於被拿走的寶珠而言，是“其餘地方”。這樣理解或恐稍嫌迂曲，但似乎沒有更好的解釋方式了。

〈参考文献〉

胡敕瑞 2006 《“去”之“往/至”義的產生過程》，《中國語文》第 6 期。

梁銀峰 2005 《論漢語趨向補語產生的句法動因——從東漢魏晉南北朝出現的三種句法格式談起》，《漢語史學報》第五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林 智 2022 《關於“去”的“去往”義的判斷標準和產生年代》，第十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11. 5, 杭州)發表。

朱慶之 1992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Conze Edward, 1975,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 Its Verse Summary* (second printing), Bolinas: Four Seasons Foundation.

Vaidya, P. L. (ed.), 1960,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With Haribhadra's Commentary Called Ālok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六朝文人における虞韻唇音・云母字と魚韻の通押現象

三輪大樹

要旨 從陸機、陸雲兄弟所代表的西晉吳地文人の用韻中可以看出，魚韻和虞韻間有著明顯區別，但虞韻の唇音和云母字與魚韻字之間存在通用現象。這種通用現象在張融等吳人，彭城劉氏、謝超宗、謝朓、王儉、江淹、張纘、徐陵、庾信等南渡士人の後裔，以及牛弘等北朝人の用韻中也可以觀察到。從音位學的角度，可以考慮是唇音和云母所共有的特徵引起了魚韻/o/和虞韻/u/的元音的中和（neutralization）。基於以上觀察，本文對三國、西晉時期吳語的云母構擬了和唇音一樣具有強烈圓唇性的聲母 w。同時，提出了三國、西晉時期吳語的模韻元音也等於/o/和/u/的超音位（archiphoneme），其聲母也存在和圓唇性相似的有標特徵這一可能性。

キーワード 魚虞通押 中和 声母 w 吳方言

1. はじめに

魏晉南北朝において「南北」あるいは「士庶」の言語間に差異があったことは古来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が、その中でも魚・虞韻の区別は非常に重要な争点である。古くは『顔氏家訓』音辭篇に「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北方人は“庶_{魚去}”を“戍_{虞去}”、“如_{魚平}”を“儒_{虞平}”とする）」（周祖謨 1943/1966: 413）、「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北方人の音では多く“舉”“莒”を“矩”とする）」（同 423）と「北人」は魚・虞韻を区別しないことが記され、現代の羅常培（1931）や Ting（1975）による押韻資料の分析でも魚・虞韻の区別が魏晉南北朝の諸言語のうち、本来的には吳方言に由来する特徴で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

しかし、吳方言を母語としていた西晉の陸機・陸雲兄弟、あるいはその後の南朝文人の押韻において、大勢としては確か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ものの、わずかに通押例が見られる。このような通押の発生条件について、先行研究では十分な検討が加えられていたとは言い難い。本稿では、そのような魚・虞通押の条件を明らかにし、その音声学・音韻論的原理を論じたい。

2. 先行研究とその問題

魏晉南北朝時代の魚・虞韻の分合について最初に整理を行ったのは羅常培（1931）である。彼は六朝の押韻資料全体に対して定量的な分析を行い、吳籍すなわち吳に本貫を有する文人が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ことを論証した。しかし、その用例の数が膨大であったこともあり、問題点もいくつか存在する。以下で簡単に論じる。

2.1 文人の出身地認定の誤り

羅常培（1931/1963: 6-7）は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のが江南の金陵を中心として、彭城を北限、余姚を南限とした円の中に収まるとする。その結論自体は誤りではない。し

¹ 字の右下に適宜『廣韻』の韻目（平声で代表させる）と声調を補う。以下同様。

かし、彼は各文人の出身地を本貫を基準に判定したため、文人の実際の出身地が反映されないという問題を生むこととなった²。ここでは従来あまり指摘されてこなかった問題点として、彭城劉氏の出身地について論ずる。

上述のように羅常培は彭城を魚・虞韻を区別する方言区に含めるが、これは専ら宋の皇族である彭城劉氏が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ことを根拠とする。しかし、彼らは明らかに南渡士人である。『宋書』卷1武帝本紀(1)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劉旭孫は劉混を生んで、ようやく長江を渡り、晉陵郡丹徒県の京口里に居を構えた）」とあり、宋武帝劉裕の曾祖父である劉混の段階で既に江南に移っ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ため、彭城そのものを吳方言区と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3.2.2節で見るように彭城劉氏が吳方言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た可能性は非常に高い。

2.2 魚・虞韻通押条件の誤り

羅常培が論ずるように、確かに吳地の文人は魚・虞韻を区別する。しかし、そのような文人においても通押例がわずかながら存在する。羅常培(1931/1963: 7)は、そのような例において、魚韻と通押する虞韻字の声母はいずれも牙音、唇音、喉音喻母、来母字に限られるとする。しかし、3節で詳しく論ずるように、陸機・陸雲兄弟、あるいは宋の彭城劉氏といった最も魚・虞韻を区別する文人においてごく少数に見られる通押例を精査すると、その全てが虞韻唇音・云母に偏するという明確な傾向を見せる。

また、仮に上記声母の全てが通押するとして、その音声原理に対する説明も不十分である。羅常培(1931/1963: 21)は声母の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を受けて虞韻字の主母音の音価が変わった可能性を想定するが、これらの声母がなぜ異化作用を発生させるのか不明確である。

2.3 韻字認定の誤り

そして、最大の問題は氏の韻字認定に誤りあるいは疑わしいものが非常に多いことである。以下は呉籍文人の作品中、氏が魚・虞通押例として挙げたものである³。

- (1) 望九衢以遠肆，明皇極而永舒_{魚平}。蔽陽光于湯谷，闔天文乎帝居_{魚平}。齊濛荒于無極，等混昧于太初_{魚平}。翼靈鳳于蒼梧_{模平}。起滯龍于潢汗_{模平}。(陸機，白雲賦，全晉文 96-1b)

「舒」「居」「初」は魚韻である。羅常培は「汗」を虞韻として魚・虞通押例と見なすが、「潢汗」は『左傳』隱公三年に由来し、『經典釋文』15-4aが「汗音烏」とするよう模韻字である。模韻は一等韻であり、魏晉南北朝時代では一般に三等韻の魚・虞韻双方と通押する。なお、周祖謨(1996: 211)では模韻字「梧」も韻字に含める。ただし、ここでは模韻の2句は「龍」「鳳」という特別な動物について歌う待遇表現であり、そもそも換韻している可能性も併せて指摘しておく。いずれにせよ、魚・虞通押例ではない。

- (2) 余本水郷士，閉門江海隅_{虞平}。時逢世道泰，蹇足步高衢_{虞平}。名成宦雖立，效微功日疏_{魚平}。入仕乘肥馬，出守擁高車_{魚平}。關門遊昔吏，遷亭有故書_{魚平}。江派資賢牧，宗英出建旗_{魚平}。不勞王布鼓，無賴露田車_{魚平}。弼政非責實，求名已課虛_{魚平}。長卿病猶在，修齡疾未祛_{魚平}。詎知亭長肉，寧掛府丞魚_{魚平}。(陸倕，以詩代書別後寄贈詩、梁詩 13-1775)

² この点については潘悟雲(1983)が詳しい。

³ 以下、本稿の例は全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から採る。なお、羅常培は詩のみ『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 1916)を用いている。

この例は、冒頭の「隅」「衢」のみが虞韻平声であり、残りは全て魚韻平声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場合、通押にも換韻にも見える。まずこの続きを全文挙げる。

- (3) 不能未能止，内訟慚諸已。僂俛從王事，纜舟出淮泗。（以上脂部）
 朋故遠追尋，暝宿清江陰。明旦一分手，飜飛各異林。歸舟隨岸曲，猶聞歌棹音。行者日超遠，誰見別離心。夕次洌洲岸，明登慈姥岑。水流多迴復，余歸良未尋。（以上侵部）
 江關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以上豪部）
 葭葦日蒼蒼，親知慎早涼。劉兄消渴病，休攝戒無良。殷弟癡眩疾，行止避風霜。劉侯有餘冷，宜餌陟釐方。伏子多風咳，門冬幸易將。率更愛雅體，體弱思自強。吏曹勉玉潤，諷議勗金相。比部多暇日，奚用肆龍章。建德何為者，無墮無人鄉。記室朋從暇，露謁附行商。議曹坐朝罷，尺板嗣徽芳。雙栖成獨宿，俱飛忽異翔。眷言思親友，沈思結中腸。（以上陽部）
 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塵埃靜，飛蓋遙相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談終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朋婭。（以上麻部）
 今者一乖離，漼然心事差。山川望猶近，便似隔天涯。玉躬子加護，昭質余未虧。八行思自勉，一札望來儀。（以上支部）

4句のみで換韻する韻字を太字で示している。4句で脂部「止」「已」「泗」が押韻した後、侵部「尋」「陰」「林」「音」「心」「岑」「尋」に換韻している。また、その後も4句で豪部「早」「草」「道」が押韻した後、陽部「蒼」「涼」「良」「霜」「方」「將」「強」「相」「章」「郷」「商」「芳」「翔」「腸」に換韻している。この流れを踏まえると、虞韻が4句のみで押韻した後魚韻に換韻していると見なすことも可能であろう。周祖謨(1996: 1110)でも「隅」「衢」を独立させており換韻と見なしている。筆者もこの説に従いたい。

- (4) 桂舟既容與_{魚平}，綠浦復回紆_{虞平}。輕絲動弱芰，微楫起單鳧_{虞平}。扣舷忘日暮，卒歲以為娛_{虞平}。（沈約，釣竿，梁詩 6-1623）

「紆」「鳧」「娛」は虞韻平声である。羅常培は初句魚韻「與」も韻字と見なす。「容與」は沈約自身が「梁三朝雅樂歌六首」の「寅雅」（梁詩 30-2171）で「禮莫違，樂具舉。延藩辟，朝帝所。執桓蒲，列齊苴。垂袞毳，紛容與。升有儀，降有序。齊簪紱，忘笑語。始矜嚴，終酣醕。」と魚韻の上声字同士で押韻させている。また、魏晉南北朝時代の「容與」の「與」が韻字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詩の例には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魏詩 9-482）、阮籍「詠懷詩十三首」一（魏詩 10-493）、謝朓「江上曲」（齊詩 3-1417）、陶功曹「採菱曲」（齊詩 6-1476）、何遜「贈江長史別詩」（梁詩 8-1686）、「初發新林詩」（梁詩 8-1689）、徐勉「採菱曲」（梁詩 15-1811）、謝朓「濟黃河應教詩」（梁詩 15-1820）があるが、全て上声字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容與」は双声の擬態語であることから、本来の上声で読まれていない可能性も完全には否定できないものの、以上のような例から(4)の「與」も上声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く、韻字とは見なし難いように思われる。周祖謨(1996: 1109)も韻字と見なしていない。

- (5) 輕生宅園籊_{魚上}，復得棲嘉樹_{虞去}。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遇_{虞去}。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_{虞去}。（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梁詩 7-1655）

「樹」「遇」「住」は虞韻去声である。羅常培は魚韻上声「籟」も韻字とするが、声調が異なる。周祖謨（1996: 1123）も韻字とするものの、四声説を唱えた沈約の作品であることを重視し⁴筆者は韻字と見なさない。

- (6) 成閏暑與寒，春秋補小月。念子時無閒。折楊柳_{尤上}，陰陽推我去_{魚去}，那得有定主_{虞上}。（西曲歌・月節折楊柳歌十三首・閏月歌，晉詩 19-1068）

羅常培はこれを誤って「吳聲歌曲」とするが、正しくは「西曲歌」である。また、「主」は虞韻上声である。「去」は魚韻であり、羅常培は上声と見なした上で通押と見なしているが、意味の上でも明らかに去声であり、声調が合わない。「折楊柳歌」の各首は(6)のように五言3句+「折楊柳」3字から成る句+五言2句の形式で構成されるが、13首ある中の他首で最後の2句が押韻する例はない。これらの点から、これを魚・虞通押例とは見なせない。周祖謨（1996: 254）はむしろ尤韻字「柳」と「主」が韻字であるとしており、筆者もこれに従う。

また、北籍文人の押韻例についても検討の余地がある。本論と関わるもののみ挙げる。

- (7) 白露掩江臯，青滿平地蕪_{虞平}。長夜亦何際，銜思久踟躕_{虞平}。企余重蘭貝，清才富金瑜_{虞平}。獨豔始東山，擅麗終西都_{模平}。雲精無永滯，水碧豈慙濡_{虞平}。屬我茲景半，賞爾若光初_{魚平}。折麻異離羣，芻蕘非索居_{魚平}。頻贈既雅歌，還懷諒短書_{魚平}。（江淹，郊外望秋答殷博士詩，梁詩 3-1565）

羅常培（1931/1963: 11）はこれを魚・虞通押例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が、潘悟雲（1983/2002: 42）は換韻と見なせるとする。江淹については3.3.3節で詳細に論ずるが、確かに換韻と見なせ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 (8) 開轅門於淮渚_{魚上}，泛餘皇之容與_{魚上}。吟紫騮之長歌，奏玄雲之疊鼓_{模上}。開右座而納文，設左廣而投武_{虞上}。既風起而雲飛，復摧班而拉虎_{模上}。泛樓船而鬱紆_{虞平}，憶霸楚之雄圖_{模平}。悲騅馬之不逝，忘鹿逐之長驅_{虞平}。豈烏江之天險，資赤帝之神符_{虞平}。（元帝蕭繹，玄覽賦，全梁文 15-3b）

羅常培（1931/1963: 14）はこれら全てを韻字と見なす。しかし、「渚」「與」「鼓」「武」「虎」は上声、「紆」「圖」「驅」「符」は平声であり、少なくともこれらは換韻と見な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お、周祖謨（1996）は魚部上声字「渚與」（1103）、模部上声字「鼓」「武」「虎」（1113）、模部平声字「紆」「圖」「驅」「符」（1111）でそれぞれ換韻しているとする。

- (9) 梅樹耿長虹，芳林散輕雨_{虞上}。蜀郡隨仙去_{魚去}，陽臺帶雲聚_{虞上}。飄花更濯枝，潤石還侵柱_{虞上}。詎得零陵燕，隨風時共舞_{虞上}。（張正見，賦得梅林輕雨應教詩，陳詩 2-2496）

羅常培（1931/1963: 10）は「蜀郡隨仙去」の「去」を韻字に含めた上で魚・虞通押例と

⁴ 沈約には上・去通押例が「正陽堂宴勞凱旋詩」（梁詩 6-1632）の「祐杜戶賈_{模上}傳_{虞去}」の1例あるものの、これは彼の2例しかない虞・模通押例の1つでもあり、極めて例外的なもの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なお、虞・模通押例のもう1例は「反舌賦」の「暮素_{模去}樹_{虞去}」（全梁文 25-8a）である。

するが、潘悟雲（1983/2002: 41）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これは奇数句でありしかも声調が異なり、韻字とすべきではない。

以上、羅常培の韻字認定には少なからず問題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3. 魚・虞通押例の検討

しかし、以上の例を除外したとしても魚・虞通押例が存在することは確かである。以下、時代を追って各文人の魚・虞韻の使用状況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3.1 三国・西晋期の呉方言：陸機・陸雲兄弟

3.1.1 魚・虞通押例

まず、三国呉に生まれ、呉の滅亡後は西晋に仕えた陸機（261~303）・陸雲（262~303）の二陸兄弟の押韻資料を検討する。彼らは言語形成期を呉地で過ごしており、呉方言のサンプルとしては最適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二陸の作品では、魚韻と虞韻はそれぞれ独用されて基本的に同用されない。木津（1996: 45）によれば、二陸以外にも夏靖をはじめとして多くの呉人が洛陽に移り住み、北方人優位の洛陽社会において「呉人集団」と呼ぶべき同郷集団を形成していた。彼らの作品でも魚・虞韻は同用されず⁵、呉人集団の言語の均質性の高さを物語る。しかし、二陸の作品の中で魚・虞通押例がわずかに見られる。

- (10)昔予翼考，惟斯伊撫_{虞上}。今予小子，繆尋末緒_{魚上}。（陸機，與弟清河雲詩三，晉詩 5-675）
- (11)指明星以脈路，景即陰而無旅_{魚上}。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_{魚上}。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窮處_{魚上}。雖遭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侮_{虞上}。仰眾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佇_{魚上}。（陸雲，九愍・涉江，全晉文 101-1b）
- (12)乾鑿南眷，誕降我祖_{模上}。顯考尚書，納言帝宇_{虞上}。正命惟允，銓衡攸序_{魚上}。（陸雲，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全晉文 104-7a）
- (13)威靈既授，六軍有序_{魚上}。乃誓我眾，乃整我旅_{魚上}。神干山立，雄旗電舉_{魚上}。懸旌汜陽，即戎江澨_{模上}。我后日敬，上帝臨予_{魚上}。靖端夙夜，匪窳匪處_{魚上}。經始緜緜，滂沱惟海_{喻上}。乃幹中軍，入作內輔_{虞上}。公侯陟降，在帝左右_{尤上}。關羽滔天，作雲西土_{模上}。帝曰將軍，整爾熊虎_{模上}。赫赫明明，皇輿出祖_{魚模上}。龍舟照淵，旗旒映野_{魚上}。鋪敦江濱，仍執醜虜_{模上}。（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全晉文 104-5b）
- (14)乾鑿南眷，誕降我祖_{模上}。顯考尚書，納言帝宇_{虞上}。正命惟允，銓衡攸序_{魚上}。（陸雲，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全晉文 104-7a）

太字が虞韻字である。「撫」「輔」「侮」は虞韻唇音、「宇」は虞韻云母であ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唇音と云母はどちらも『切韻』において魚韻字があきまとな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は偶然であるとは思われない。もちろん、虞韻唇音・云母字は他の虞韻字と問題なく押韻する。例えば、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全晉文 98-6a）は「藪武宇主_{虞上}」を韻字とする。この点から、唇音・云母字が「虞韻ではなく魚韻に属していた」と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⁵ 「呉人集団」の魚韻および虞韻の押韻例として、夏靖「答陸士衡詩」（晉詩 5-694）の「輿書舒_{魚平}」、鄭豐「答陸士龍詩・鴛鴦」五（晉詩 6-720）の「遊流浮憂舟_{尤平} 蹶_{虞平}」、同「南山」二（晉詩 6-722）の「鱗處舉與序語_{魚上}」、同「中陵」四（晉詩 6-723）の「周浮_{尤平} 渝殊踰蹶_{虞平}」、張翰「杖賦」（全晉文 107-11b）の「手久首_{尤上} 距_{魚上}」がある。魚韻と尤韻、虞韻と尤韻の通押例は見られるものの、魚韻と虞韻が通押することはない。

3.1.2 模韻との関係

ここで、模韻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も述べておく。用例(12)(13)(14)では魚・虞韻の他に一等模韻も通押している。周祖謨(1996)の韻部では魏晋宋は魚・虞・模韻を全て魚部に帰属させ(もちろん呉方言では魚韻と虞韻は区別される)、齊梁陳隋では魚韻のみを魚部、虞韻と模韻を模部に帰属させる。陸機・陸雲の同時代の北方文人は確かにこれらの韻を区別せずに通押させる。しかし、陸雲・陸機は、模韻は虞韻よりも魚韻と同用される傾向がある。魚・模通押例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 (15)肇敏厥績，武功聿舉_{魚上}。烟煴芳素，綢繆江澣_{模上}。昊天不弔，胡寧棄予_{魚上}。(陸機，與弟清河雲詩二，晉詩 5-675)
- (16)厥鎮伊何，實幹心簪_{魚上}。文教內輔，武功外禦_{魚上}。淮方未靖，帝曰攸序_{魚上}。公于出征，奄有南浦_{模上}。(陸雲，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三，晉詩 5-698)
- (17)亶亶嘉時，飄忽棄予_{魚上}。有瞻逝深，永歎潛澣_{模上}。登願扶桑，仰結飛晷_{脂上}。伊人匪存，遺芳孰與_{魚上}。(陸雲，失題三，晉詩 6-715)
- (18)嗟痛薄祐，並罹哀苦_{模上}。堂構既崩，過庭莫覩_{模上}。我悴西鄰，子沈東土_{模上}。契闊艱辛，誰與晤語_{魚上}。身滯情往，神遊影處_{魚上}。發夢宵寐，以慰延佇_{魚上}。(陸雲，失題，晉詩 6-716)

一方、虞・模通押例は上述(13)(14)のような魚韻とも押韻している例の他は、以下の1例にとどまる。

- (19)悠悠縣象，昭回太素_{模去}。清濁迭興，升降啓度_{模去}。遺和既爽，季春告暮_{模去}。朱明來思，青陽受煦_{虞去}。(陸雲，失題一，晉詩 6-714)

この点から、陸機・陸雲の呉方言では、模韻は虞韻ではなく魚韻と近いことが分かる。

3.1.3 唇音・云母以外の通押例について

なお、魚・虞通押例として、他に以下の例がある。

- (20)哀時命之險薄，懷斯類以結憂_{尤平}。手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_{尤平}。生遺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_{虞平}。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高遊_{尤平}。結垂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_{魚平}。揮采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舒_{魚平}。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闕_{哈平?}。(陸雲，九愍・口征⁶，全晉文 101-4b)

最後の「闕」は『廣韻』では哈韻去声である。しかし、「九闕」は『漢書』卷 22 禮樂志の「專精厲意逝九闕，紛云六幕浮大海」(1062)に由来し、顔師古は如淳注「闕亦陔也」を引く。「陔」であれば哈韻平声となり、声調が合う。

この例では虞韻歯音字「須」が魚韻「輿」「舒」と押韻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ただし、前半の「憂」「愁」「遊」は尤韻字である。尤韻字は少なくとも陸機・陸雲の作品では例えば陸機「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晉詩 5-671)の「秀_{尤去}數裕_{虞去}」ように虞韻とは通押するものの、上の用例(13)の「右」を除いて魚韻と通押する例はない。一方、「闕」

⁶ □は闕字。

は哈韻字である。哈韻字は陸機・陸雲の作品では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全晉文 98-5b)の「舉_{魚上}海_{哈上}旅_{與楚}魚上」のように魚韻とは通押するものの、虞韻と通押する例はやはり上の用例(13)の「海」のみである。

つまり、陸機・陸雲の作品では、**尤韻は(他に虞韻が韻字にない状態で)魚韻のみと、哈韻は(他に魚韻が韻字にない状態で)虞韻のみと通押することはない**⁷。この点を踏まえると、「憂」「愁」「須」「遊」と「輿」「舒」「閔」で換韻していると思わせ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の場合、「須」を魚・虞通押例から除外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いずれにせよ、陸機・陸雲の作品において魚韻と通押する虞韻字は概ね唇音・云母字に限られると見て良いだろう。以下、この唇音と云母に注目しながら、他の文人の通押例を検討する。

3.2 東晋～宋

3.2.1 魚・虞韻を区別しない呉籍文人

呉人集団も世代が進むにつれて首都である洛陽方言の影響を強く蒙るようになる。二陸ら以降の晋の押韻例において、呉籍・北籍を問わず、明確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と断定できる文人を見つけ出すのは難しい。晋の南渡以降、首都が建康に移ってからも、その傾向はしばらく続く。例えば、以下は晋陵郡無錫の顧愷之(344~405、東晋)の作品であるが、明確に魚韻と虞韻が通押している。

- (21)崩巒填壑，傾堆漸隅_{虞平}。岑有積螺，嶺有懸魚_{魚平}。(觀濤賦，全晉文 135-3a)
 (22)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_{虞平}。翕然靈化，得漸已籠_{模平}。緗白隨川，方圓隨渠_{魚平}。義剛有折，照壺則虛_{魚平}。託形超象，比朗玄珠_{虞平}。(冰賦，全晉文 135-3a)
 (23)與八風而降時雨_{虞上}。音中鍾律，步則規矩_{虞上}。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翾其高舉_{魚上}。歷黃冠于招搖，陵帝居之懸圃_{模平}。(鳳賦，全晉文 135-3b)

このように、晋においては、魚・虞韻を声母の条件無く自由に通押する北方方言の影響力が非常に強かったことが見てとれる。

3.2.2 魚・虞韻を区別する北籍文人

その一方で、宋以降の南渡士人の間で魚・虞韻を区別する呉方言特徴が見られる例が出現する。魚・虞韻の用例が多く残っている例として、宋の皇族の彭城劉氏である江夏王劉義恭(413~465)、宋孝武帝劉駿(430~464)、南平王劉鑠(431~453)、明帝劉彧(439~472)の作品を取り上げる。いずれも、明らか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

- (24)江南遊湘妃，窈窕漢濱女_{魚上}。淑問流古今，蘭音媚鄭楚_{魚上}。瑤顏映長川，善服照通澣_{魚上}。求思望襄滢，歎息對衡渚_{魚上}。中情未相感，搔首增企予_{魚上}。悲鴻失良匹，俯仰戀儔_{魚上}。徘徊忘寢食，羽翼不能舉_{魚上}。傾首佇春鶯，為我津辭語_{魚上}。(江夏王劉義恭，豔歌行，宋詩 6-1247)
 (25)騁鶯辭南京，弭節憩東楚_{魚上}。懿蕃重遐望，興言集僚侶_{魚上}。于役未云淹，時遷變滹暑_{魚上}。眷戀江水流，迴首獨延佇_{魚上}。(江夏王劉義恭，彭城戲馬臺集詩，宋詩 6-1248)
 (26)二象攸分，三靈樂主_{虞上}。齊應合從，在今猶古_{模上}。天道誰親，唯仁斯輔_{虞上}。皇功帝績，理冠區宇_{虞上}。(江夏王劉義恭，嘉禾甘露頌，全宋文 12-4b)

⁷ この傾向は呉方言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真誥』でも同様である。詳しくは木津(1992: 491-493)を参照。

- (27)督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_{魚平}。帆檣如芒檉，督護今何渠_{魚平}。（宋孝武帝劉駿，丁督護歌三，宋詩 5-1219）
- (28)督護上征時，儂亦惡聞許_{魚平}。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_{魚平}。（宋孝武帝劉駿，丁督護歌五，宋詩 5-1219）
- (29)宵登毗陵路，旦過雲陽郭_{虞平}。平湖曠津濟，菰渚迭明蕪_{虞平}。和風翼歸采，夕氛晦山嵎_{虞平}。驚瀾翻魚藻，頽霞照桑榆_{虞平}。（宋孝武帝劉駿，濟曲阿後湖，宋詩 5-1220）
- (30)思甲陵寢，歡結粉都_{模平}。眇懷沛濟，勤念宛吾_{模平}。納壽遺老，設飲先居_{魚平}。堂序朝秀，充廷集閭_{模平}。（宋孝武帝劉駿，巡幸舊宮頌，全宋文 6-10a）
- (31)白露秋風始，秋風明月初_{魚平}。明月照高樓，露露皎玄除_{魚平}。迨及涼風起，行見寒林疏_{魚平}。客從遠方至，贈我千里書_{魚平}。先敘懷舊愛，末陳久離居_{魚平}。一章意不盡，三復情有餘_{魚平}。願遂平生志，無使甘言虛_{魚平}。（南平王劉鑠，擬孟冬寒氣至，宋詩 5-1215）
- (32)琴角揮韻白雲舒_{魚平}，簫韶協音神鳳來_{哈平}。拊擊和節詠在初_{魚平}，章曲乍畢情有餘_{魚平}。（明帝劉彧，白紵篇大雅，宋詩 12-1371）

しかし、羅常培（1931/1963: 7）も挙げるように、魚・虞通押例が 2 つある。

- (33)於穆不已，顯允東儲_{魚平}。生知夙叡，嶽茂淵虛_{魚平}。因心則哲，令問弘敷_{虞平}。繼徽下武，儷景辰居_{魚平}。（江夏王劉義恭，嘉禾甘露頌，全宋文 12-4b）
- (34)密盼林梁，側眺池籟_{魚上}。起北阜而置懸河，沿西原而殿清暑_{魚上}。編茅樹基，采椽成宇_{虞上}。（宋孝武帝劉駿，華林清暑殿賦，全宋文 5-1a）

「敷」は唇音、「宇」は云母である。虞韻唇音・云母の魚韻との通押は、明らかに二陸と同じ現象である。また、(32)に見られる魚・哈通押も、二陸と共通である。宋に至って、吳方言の特徴が南渡士人である彭城劉氏の間で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が分かる。

3.3 齊・梁

吳籍文人による魚・虞韻の混同と北籍文人による区別という相反する傾向は齊・梁以降特に顕著に見えるようになる。周祖謨（1996: 738）が指摘するように、齊・梁期から地区（本貫）の違いによって魚・虞韻の分合状況が分かれるようなことはなくなる。周祖謨の齊梁陳隋韻部で魏晉宋韻部の魚部（魚・虞・模韻）が魚部（魚韻）と模部（虞・模韻）に分割されるのはこの点に基づいている。

3.3.1 魚・虞韻の区別が厳密である吳籍文人

まずは魚・虞韻の区別が厳密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人々を見てみよう。

吳人の沈約（441~513、宋~梁、吳興武康）には魚・虞通押例が一つも存在しない。上述のように、羅常培が通押とみなした用例(4)(5)は、実際には魚・虞通押例ではない。さて、彼の撰になる『宋書』卷 81 顧琛伝（2078）に「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これより前、宋代江東の高貴な者は会稽の孔季恭、季恭の子の靈符、吳興の丘淵之と顧琛が、吳音を変えなかった）」とある。このことは、陳寅恪（1936/1992: 299）が指摘する通り、大部分の吳人はすでに「吳音」を使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示唆する。当然沈約もそのはずであり、実際彼の押韻の枠組は同時代の韻部の枠組を逸脱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前時代の陸機・陸雲らのような吳方言の特徴は見られない。彼の押韻が北方にルーツを持つ士族と同じであったことは魯國堯（2002-2003/2003: 158）も指摘する通りである。吳音を用いていなかった沈約であっても、

魚・虞韻の区別のみは受け継いでいたのである。

この点は、沈約よりも後の世代の呉人である陸倕（470~525、宋~梁、呉郡呉）、張率（475~527、宋~梁、呉郡呉）、虞羲（?~510?、齊~梁、会稽餘姚）についても言える。彼らも周祖謨（1996: 738）が指摘するように魚・虞韻を明確に区別していた。上述のように羅常培が通押と見なした陸倕の用例(2)は実際には魚・虞通押例でない可能性が高い。

それでは、虞韻唇音・云母と魚韻の通押についてはどうか。筆者はここで、沈約と同時代の呉人である張融（444~497、宋~齊、呉郡呉）の例を検討する。張融は、『南齊書』卷41 張融伝（721）に「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越の山中、凶悪な異族が張融を捕え、殺して食べようとした。張融は顔色を変えず、「洛生詠」を歌ったところ、賊は立派な人物だと感心して危害を加えなかった）」と記載する。「洛生詠」とはすなわち「洛陽書生の詩詠」であり、陳寅恪（1936/1992: 299-301）も指摘するように、呉人である彼も洛陽の詩詠に親しんでいたことが分かる。

確かに張融の押韻も、沈約と同様に呉方言的特徴は見られない。しかし、上記エピソードの直後、交州へと向かう海上で詠まれた「海賦」には、魚韻の用例が3つ存在する。

(35)是其回堆曲浦_{模上}，欽關弱渚_{魚上}之形勢也。（海賦，全齊文 15-1b）

(36)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_{魚平}。高岸乳鳥，橫門產魚_{魚平}。（同 2a）

(37)陰鳥陽禽，春毛秋羽_{虞上}。遠翅風遊，高翻雲舉_{魚上}。（同 3a）

用例(36)は、明らかに魚韻が独用されている。また、用例(35)のような魚・模通押は陸機・陸雲らに見られた特徴であり、特に模韻字「浦」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は陸雲の用例(16)を想起させる。そして、最も重要なのは(37)である。魚韻字「舉」と通押している虞韻字「羽」は云母字である。このような例は、「洛生詠」を見事に歌うことのできた張融であっても、魚・虞韻を区別し、虞韻云母（及び唇音）のみ魚韻と通押する二陸以来の呉方言本来の特徴を受け継いで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だろう。

3.3.2 魚・虞韻の区別が厳密である北籍文人

宋で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た彭城劉氏一族である劉孝綽（481~539、齊~梁）、劉孝威（496~549、齊~梁）らは、周祖謨が指摘するよう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また、王僧孺（465~522、宋~梁、東海郟）、何遜（468~518、宋~梁、東海郟）らも魚・虞韻を完全に区別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文人には魚・虞通押例が皆無である。筆者が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のは、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にも関わらず、通押例もわずかに見られる文人の例である。例えば、謝超宗（430?~483、宋~齊、陳陽夏）は「齊南郊樂章・登歌」の「序舉_{魚上}」（齊詩 7-1490）、「齊明堂樂歌・肅咸樂」の「序俎_{魚上}」（齊詩 7-1494）、「齊明堂樂歌・嘉薦樂」一の「舉序_{魚上}」（齊詩 7-1495）では魚韻を独用しているが、魚・虞通押例が2つある。

(38)夤承寶命，嚴恭帝緒_{魚上}。奄受敷錫，升中拓宇_{虞上}。巨地稱皇，罄天作主_{虞上}。月域來賓，日際奉土_{模上}。開元首正，禮交樂舉_{魚上}。六典聯事，九官列序_{魚上}。（齊南郊樂章・肅咸樂，齊詩 7-1489）

(39)戲繇惟則，姬經式序_{魚上}。九司聯事，八方承宇_{虞上}。鑾迥靜陳，縵樂具舉_{魚上}。凝旒若慕，傾璜載竚_{魚上}。（齊太廟樂歌・永至樂，齊詩 7-1504）

齒音字「主」も用いられているものの、云母字「宇」が 2 例ともに用いられることはやはり注目に値する。なお、謝超宗の虞・模通押例は用例(38)のみであるが、魚・模通押例は用例(38)の他に「齊明堂樂歌・昭夏樂」の「車_{魚平}都_{模平}虛_{魚平}」（齊詩 7-1498）、「齊南郊樂章・引牲樂」の「俎_{魚上}祜_{模上}」（齊詩 7-1489）がある。

同じく謝氏の謝朓（464~499、宋～齊、陳陽夏）は、周祖謨（1963/1966: 465-466）が指摘するように同時代の文人の中では沈約と並んで最も用韻が厳密であるが、魚・虞通押例が 2 例のみ存在する。うち 1 例で用いられている虞韻字は唇音「武」、云母「宇」のみである。

(40) 濬哲維祖_{模上}，長發其武_{虞上}。帝出自震，重光御宇_{虞上}。七德攸宣，九疇咸敘_{魚上}。靜難荆衡，凝威蠹浦_{模上}。（齊雩祭歌・世祖武皇帝，齊詩 7-1499）

魚・虞通押のもう 1 例は「奉和隨王殿下詩」八（齊詩 4-1446）の「布_{模去}樹_{虞去}豫_{魚去}賦_{虞去}」であり虞韻齒音字「樹」が魚韻字「豫」とともに韻字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が、これは隨郡王蕭子隆（散佚）に唱和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め彼固有の押韻例からは除外すべきである。

なお、模韻については「詠蒲詩」の「蒲_{模平}珠_{魚平}塗_{模平}軀_{虞平}」（齊詩 4-1451）、「齊雩祭歌・迎神」四の「舞_{虞上}祖_{模上}」（齊詩 7-1498）、「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詩」九の「舞柱武_{虞上}祜_{模上}」（齊詩 3-1423）のように虞・模通押例はあるものの、魚・模通押例は用例(40)以外に見られないように、魚韻よりも虞韻に近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変化がある。

いずれにせよ、謝超宗・謝朓のこのような魚韻と通押する虞韻字の声母の偏りは、同じ謝氏でも彼らより前の謝靈運らには見られない傾向であり、彼らが時代を経ても二陸が見せた呉方言的特徴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に注意したい。

また、やはり同世代の王儉（452~489、宋～齊、琅琊臨沂）も、魚・虞通押例が 2 例のみあるが、いずれも唇音字「武」、云母字「雨」である。

(41) 康世以德，撥亂資武_{虞上}。威以雷霆，潤以風雨_{虞上}。六術允昭，四義克舉_{魚上}。自東徂北，遐方即敘_{魚上}。（高帝哀策文，全齊文 11-5b）

(42) 伊宋之季，天衢荐阻_{魚上}。咨我儲貳，締縉江澨_{模上}。衛女事齊，樊姬贊楚_{魚上}。美著嬪嗣，徽音踵武_{虞上}。（皇太子妃哀策文，全齊文 11-6a）

以上のように、齊代には謝超宗、謝朓、王儉のような呉人以外の南朝文人においても、魚・虞韻を区別し、通押する場合にも虞韻唇音・云母字に偏るという傾向が見て取れる。

3.3.3 魚・虞韻の区別が厳密ではないものの通押に声母条件が見られる北籍文人

一方で、魚・虞韻を概ね区別する傾向にはあるものの通押例もかなり見られる文人も存在する。特に興味深いのは、江淹（444~505、宋～梁、濟陽考城）である。羅常培（1931/1963: 11）は江淹を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ない文人の例に挙げる。しかし、潘悟雲（1983/2002: 42）も指摘するように明らか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

潘悟雲は詩の用例のみを挙げているが、文を含めた全ての魚韻独用例を挙げると「去故郷賦」の「墟疏居_{魚平}」（全梁文 33-7a）、「丹砂可學賦」の「居虛餘_{魚平}」（全梁文 34-1b）、「麗色賦」の「女渚佇侶_{魚上}」（全梁文 33-3b）、「橫吹賦」の「序呂_{魚上}」（全梁文 33-12b）、「蓮華賦」の「女與渚楚佇_{魚上}」（全梁文 34-5a）、「齊太祖高皇帝誄」の「楚舉序渚_{魚上}」（全梁文 39-6b）、「雜體詩・張黃門協苦雨」の「渚礎序舉侶楚佇_{魚上}」（梁詩 4-1574）となる。これらに加え、羅常培が通押と見なした用例(7)も魚韻独用例に含められるだろう。

このように、江淹は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が、魚・虞通押例も非常に多い。ただ、管見によれば、通押例において用いられている魚韻字・虞韻字の割合に応じて、その用字傾向に差が出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まずは、虞韻の押韻に魚韻字が例外的に同用される例を挙げる。

- (43)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虞去。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魚去。伊余荷寵靈，感激狗馳驚虞去。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虞去。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魚上。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模去。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模去。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模去。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虞去。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魚去。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模去。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虞去。（雜體詩・劉太尉琨傷亂，梁詩 4-1575）
- (44)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虞去。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虞去。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虞去。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模去。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虞去。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模去。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魚去。（雜體詩・殷東陽仲文興矚，梁詩 4-1576）

このような例において、虞韻用字の声母条件を見つけ出すことは困難である。ただし、潘悟雲も指摘するように用例(44)の魚韻字は末句の「慮」のみである。潘悟雲はこの例を以て江淹が魚・虞韻を分けていなかったとするには根拠不十分であるとする。また、用例(43)の魚韻字の1つ「舉」が上声字である点にも留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一方、虞韻字の数が魚韻字の数と等しい、あるいは魚韻の押韻に虞韻字が同用される例になると、その用字に偏り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る。

- (45) 餘形可擊，殘色未去魚去，曜葳蕤而在草，映青蔥而結樹虞去，昏青苔於丹渚，暖朱草於石路模去，霞晃朗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模去，俯形命之窘局，哀時俗之不固模去，定赤舄之易遺，乃鼎湖之可慕模去。（赤虹賦，全梁文 33-2a）
- (46) 於是臨虹蜺以築室，鑿山楹以為柱虞上。上暘暘以臨月，下淫淫而愁雨虞上。奔水潦於遠谷，汨木石於深嶼魚上。鷹隼戰而櫓巢，鼉鼉怖而穴處魚上。（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全梁文 33-4b）
- (47) 九重已閉，高門自蕪虞平。青苔積兮銀閣澁，網羅生兮玉梯虛魚平。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以分居魚平。傷營魂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魚平。（倡婦自悲賦，全梁文 33-8b）
- (48) 所以樂精玄於太一，妙宮徵於清都模平。簫含聲而遠近，琴吐音而有無虞平。奏神鼓於玉袂，舞靈衣於金裾魚平。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模平。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敢模模平。（丹砂可學賦，全梁文 34-2a）
- (49) 霞輕重而成采，煙尺寸而作緒魚上。熱風翕而起濤，丹氣赫而為暑魚上。對滂流之蛟龍，衝汶漭之霧雨虞上。耀綠葉於冬岫，鏡朱華於寒渚魚上。斂慧性及馴心，騫頰翼與青羽虞上。終絕命於虞人，充南琛於祕府虞上。（翡翠賦，全梁文 34-6b）
- (50) 高秩方臻，元禮有序魚上。王曰念哉，輝寵是與魚上。職褒宮閣，任卷文武虞上。飾華麗貂，榮金豐組模上。宏猷溢俗，曾芬冠古模上。（齊太祖高皇帝誄，全梁文 39-6a）
- (51) 雁縣告靜，象郡無虞虞平。杳鬱遠域，清麗瓊都模平。國填氓負，朝委事虛魚平。實翳哲相，嶽曜神居魚平。（齊太祖高皇帝誄，全梁文 39-6a）
- (52) 二妃麗瀟湘，一有乍一無虞平。佳人承雲氣，無下此幽都模平。當追帝女迹，出入泛靈輿魚平。掩映金淵側，遊豫碧山隅虞平。曖然時將罷，臨風返故居魚平。（悼室人詩，梁詩 4-1585）

(45)の「樹」、(46)の「柱」、(51)の「虞」、(52)の「隅」を除き、(46)(49)の「雨」、(47)の「蕪」、(48)(52)の「無」、(49)の「羽」、(49)の「府」、(50)の「武」のように魚韻と押韻

する虞韻字は全て唇音・云母字である。

興味深いのは張纘（499~549、齊~梁、范陽方城）である。周祖謨（1982/1996: 720）が指摘するように、確かに彼は魚・虞韻の区別をしていない。しかし、通押例には分布の偏りが見られるように思われる。以下、彼の通押例を全て書き出す。

- (53)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_{虞上}。乘豐而運，席卷三楚_{魚上}。師克在和，仁義必取_{虞上}。形猶積決，應若颿舉_{魚上}。（南征賦，全梁文 64-2b）
- (54)曬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_{虞上}。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_{虞上}。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于盛主_{虞上}。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_{虞上}。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_{魚上}。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_{魚上}。（同 3a）
- (55)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_{虞上}。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_{魚上}。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于前古_{模上}。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于鄒魯_{模上}。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_{虞上}。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_{模上}。（同 3b）
- (56)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_{虞上}。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_{虞上}。羣飛沙漲，掩薄草渚_{魚上}。奇甲異鱗，雕文綵羽_{虞上}。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_{魚上}。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_{魚上}。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_{模去}。（同 4a）
- (57)臨赤崖而慷慨，推雄圖於魏武_{虞上}。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_{魚上}。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_{魚上}。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于蕭斧_{虞上}。霸孫赫其靈奮，杖邁俗之英輔_{虞上}。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_{魚上}。（同 5a）
- (58)于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_{虞去}，砥課庸薄，夕惕兢懼_{虞去}。存問長老，隱恤氓庶_{魚去}。奉宣皇恩，寬徭省賦_{虞去}。遠哉盛乎，斯邦之舊_{尤去}也。（同 5b）
- (59)令龜兆良，葆引遷祖_{模上}。具僚次列，承華接武_{虞上}。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_{魚上}。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_{魚上}。（丁貴嬪哀策文，全梁文 64-11a）
- (60)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_{魚上}。淥池解餘凍，丹霞霽新雨_{虞上}。良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_{魚上}。皇儲惜將邁，金樽留宴醕_{魚上}。（侍宴錢東陽太守蕭子雲應令詩，梁詩 17-1861）

(53)の「取」、(54)(55)の「主」、(56)の「聚」、(58)の「懼」を除き、(53)(54)(57)(59)の「武」、(54)(57)の「輔」、(54)(55)の「宇」、(56)の「府」、(56)の「羽」、(57)の「斧」、(58)の「務」、(58)の「賦」、(60)の「雨」は全て唇音・云母字である。

3.3.4 魚・虞韻の通押に声母条件が見られない文人

一方で、齊・梁期には魚・虞通押例が非常に多い文人も存在する。その典型は、大量の用例が残る梁の皇族である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南蘭陵）、簡文帝蕭綱（503~551、南蘭陵）、元帝蕭繹（508~555、南蘭陵）らであろう。

用例が膨大になるため韻字のみを挙げると、蕭統は「殿賦」「隅廡_{虞平書魚平}」（全梁文 19-1b）、「七契」の「裾_{魚平}軀_{虞平}」（全梁文 20-5a）、「隅軀_{虞平}慮_{魚平}」（同 6b）、「示徐州弟」の「軀襦俱_{虞平}廬_{魚平}」（梁詩 14-1793）、「示雲麾弟」の「阻舉渚_{魚上}雨_{虞平}所予佇_{魚上}」（梁詩 14-1801）、蕭綱は「七勵」の「疏_{魚平}衢珠_{虞平}居_{魚平}」（全梁文 11-9b）、「怨歌行」の「餘初虛_{魚平}軀_{虞平}除舒魚疎祛輿_{魚平}」（梁詩 20-1907）、「有所思」の「輿疏虛_{魚平}燕_{虞平}」（梁詩 20-1910）、「舞賦」の「侶_{魚上}拊赴_{虞上}」（全梁文 8-5b）、「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詩」の「裕樹賦_{虞去}馭_{魚去}」（梁詩 21-1929）、「丞相長沙宣武王碑」の「符_{虞平}圖_{模平}虞_{虞平}初_{魚平}徒_{模平}」（全梁文 14-2a）、「吳郡石像碑」の「書_{魚平}銖_{魚平}驅_{虞平}軀_{魚平}軻_{模平}祛_{魚平}吳_{模平}」（全梁文 14-6b）、「望同泰寺浮圖詩」の「圖_{模平}珠_{虞平}吾_{模平}殊_{魚平}難_{魚平}趣_{魚平}軀_{魚平}踰_{虞平}居_{魚平}」（梁詩 21-1935）、「蕭繹は「玄覽賦」の「愚衢_{虞平}墟_{魚平}書_{魚平}」（全梁文 15-1b）、「魚_{魚平}鬚_{魚平}軀_{魚平}珠_{虞平}書_{魚平}」（同 6b）、「娛渝_{虞平}書_{魚平}珠_{虞平}」（同

7a)、「戲作豔詩」の「夫躑珠_{虞平餘魚平}」（梁詩 25-2051）、「庾先生承先墓誌」の「府_{虞平舉魚平}」（全梁文 18-2b）である。

他に、呉人である呉均（469~520、宋~梁、呉興故鄣）の「碎珠賦」の「濡_{虞平舒魚平}珠_{虞平}」（全梁文 60-2a）と「食移」の「阻佇_{魚上}縷_{虞上}」（全梁文 60-3b）、王儉よりも一世代後の文人である王融（467~493、宋~齊、琅邪臨沂）の「法樂辭」六の「樹_{虞去}慕路_{模去去魚去}」（齊詩 2-1390）と「贈族叔衛軍儉詩」七の「務_{虞去}譽_{魚去}素_{模去}樹_{虞去}」（齊詩 2-1394）のような魚・虞通押例がある。「贈族叔衛軍儉詩」には唇音字「務」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やはりこれらの文人には魚・虞通押の声母条件が見られない。

以上のような文人は、魚・虞韻区別の押韻習慣が部分的には見られるものの、大勢としてはこれらを区別しない前時代の北方文人の用韻を想起させる。

3.4 六朝末

六朝末の詩人において、魚・虞の区別は非常に厳密なものとなる。例えば張正見（523?~576?、梁~陳、清河東武）、あるいは呉籍の後主陳叔宝（553~604、呉興）には魚・虞通押例が一つも存在しない。2.3 節で述べたように羅常培が通押と見なした用例(9)は実際には魚・虞通押例ではない。

この時期の最も重要な文人は徐陵（507~583、梁~陳、東海郟）と庾信（513~581、梁~北周、南陽新野）であろう。潘悟雲（1983/2002: 40-41）でも論証しているように、この両者は明らかに魚・虞韻を区別している。しかし、通押例がわずかに見られる。まずは徐陵の例を挙げる。

- (61)白馬號龍駒_{虞平}，雕鞍名鏤渠_{魚平}。諸兄二千石，小婦字羅敷_{虞平}。倚端輕掃史，召募擊休屠模平。塞外多風雪，城中絕詔書魚平。空憶長楸下，連蹠覆連跗_{模平}。（驄馬驅，陳詩 5-2523）
- (62)我皇纂武_{虞上}，攀號東序魚上。謁渭同周，迎門惟呂_{魚上}。流矢為暴，攬搶斯舉_{魚上}。慄慄蒼黎，危危刀俎_{魚上}。（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全陳文 11-5a）

遼欽立は、(61)の「渠」は本集では虞韻字「衢」に作ると注する。いずれにせよ、虞韻唇音「敷」が韻字に用いられている。(62)は周祖謨（1996: 1104）は「武」を韻字に含めず魚韻独用とするが、仮に韻字に含められるのならやはり「武」が唇音であ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

次に、庾信の例を挙げる。

- (63)坤以為輿_{魚平}，剛柔卷舒魚平。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魚平，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模平。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_{虞平}。（象戲賦，全後周文 9-3a）
- (64)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魚平。閒尊卑之垂悅，隨上下之游紆_{虞平}。（邛竹杖賦，全後周文 9-4b）
- (65)乃數軍實，乃握兵符_{虞平}。澆沙成壘，聚石成圖模平。風雲順逆，營陣孤虛魚平。靈雨鉦鳴，燿火飛孤模平。（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全後周文 14-3a）
- (66)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模平。壁開金石篆，河浮雲霧圖模平。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模平。誦書徵博士，明經拜大夫_{虞平}。璧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魚平。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模平。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模平。子雲猶汗簡，溫舒正削蒲模平。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模平。（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北周詩 3-2373）
- (67)昔我文祖，執心且危慮_{魚去}。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模去。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_{魚去}。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虞去。（周五聲調曲・商調曲二，北周詩 5-2428）

(64)の「紆」、(67)の「懼」を除き、いずれも虞韻唇音字「符」「夫」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なお、周祖謨(1996: 1123)は他に「鏡賦」(全後周文 9-5b)の「取」を韻字と見なし魚・虞通押例とするが、これは「還從粧處取將歸」という句の一部であり明らかに韻字ではない。

この他、北朝出身者ではあるが牛弘(545~610、北周~隋、安定鶉觚)の押韻例も参考になる。彼は魚・虞韻はもちろん、周祖謨(1982/1996: 720)が指摘するように虞・模韻の区別も行っていた。唯一以下のような魚・虞通押例があるが、やはり「雨」は虞韻字である。

(68)天地之經，和樂具舉_{魚上}。休徵咸萃，要荒式序_{魚上}。正位履端，秋霜春雨_{虞上}。(園丘歌・文舞，隋詩 9-2756)

ただし六朝末でも沈炯(502~560、梁~陳、吳興武康)のように魚・虞韻がほとんど区別されない文人も存在する。王力(1936/1991: 18)では沈約や何遜らと比べて審音の度合が低かった可能性を指摘するが、正確な原因は不明である。

3.5 考察

以上のような齊以降の文人の魚・虞通押状況、通押例に用いられる唇音・云母字の状況をまとめたのが表 1 である。用例は上で特に論じたもの以外は全て周祖謨(1996)より採取し計上している。第 1 列は文人名、第 2 列はその生年⁸、第 3 列は吳籍であるか否か、第 4 列は北朝での滞在の有無を記している。齊以降、吳籍であるか否かが魚・虞韻の区別に影響しないことは、この表からも裏付けられるだろう。沈炯が魚・虞韻をほとんど区別せず、また庾信に魚・虞通押例が一定数見られるのは、北朝での滞在経験が影響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

第 5 列は魚・虞通押例の絶対数を示し、5 例以上の場合網掛けを施している。第 6 列は魚・虞通押例が魚・虞韻の用例全体の中で占める割合を分数と百分率により示し、半数以上の場合網掛けを施している。いずれの文人もそもそも用例が少ないため、用例の絶対数と割合の 2 つの基準を設け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たためである。

第 7 列は魚・虞通押例の虞韻字のうち唇音・云母字が占める割合を分数と百分率で示し、半数以下の場合網掛けを施している。なお、江淹のみ、左側には全ての例、右側には韻字の中で虞韻字が魚韻字よりも多い例を省いたものを示している。

表 1 から、魚・虞韻の区別自体は齊以降のほとんどの文人が行っていることが読み取れる。蕭統・沈炯といった少数の文人を除き、魚・虞韻の全押韻例の中で魚・虞通押例が過半数を占めることはない。このことから、齊以降の韻部において魚部(魚韻)と模部(虞韻)を分ける周祖謨の説は妥当であることが確かめられる。そして、通押例の多寡を問わず、ほとんどの文人において魚・虞通押例の虞韻字において唇音・云母字が占める割合は過半数を占める。南朝全体の字音変化(あるいは字音の規範意識の変化)の中で、魚・虞韻の区別及び虞韻唇音・云母の魚韻との通押という本来二陸ら三国吳~西晋の六朝初期の吳方言にしか見られなかった特徴が、文人の中で広く共有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が分かるだろう。

一方で、王融、吳均、蕭統、沈炯、蕭綱、蕭繹といった、明らかに唇音・云母字の割

⁸ ここでは年代ごとの言語の変遷を可視化するため、生年順に並べている。なお、虞羲は生年不詳であるが、510 年頃卒であるためここでは 519 年卒の何遜の前に配している。

合が低い文人も存在する。このうち、王融と呉均を除いた四人は、魚・虞通押例の絶対数（第4列）あるいは割合（第5列）が多いという相関関係を見せる。このような文人においては、魚・虞韻を区別しない前時代の北人の押韻習慣を色濃く受け継いで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だろう。

表1 齊以降の文人の魚・虞韻通押状況と通押例における唇音・云母字の割合

文人	生年	呉籍	北朝滞在	魚虞通押例	通押例/総数(%)	唇音・云母/虞韻字(%)
謝超宗	430?	×	×	2	2/7(29)	2/3(67)
沈約	441	○	×	0	0/35(0)	—
張融	444	○	×	1	1/3(33)	1/1(100)
江淹	444	×	×	11	11/29(38)	11/20(55), 8/12(67)
王儉	452	×	×	2	2/5(40)	3/3(100)
謝朓	464	×	×	2	2/17(12)	2/2(100)
王僧孺	465	×	×	0	0/7(0)	—
王融	467	×	×	2	2/13(15)	1/3(33)
虞羲	?	○	×	0	0/4(0)	—
何遜	468	×	×	0	0/9(0)	—
呉均	469	○	×	2	2/11(18)	0/3(0)
陸倕	470	○	×	0	0/4(0)	—
張率	475	○	×	0	0/3(0)	—
劉孝綽	481	×	×	0	0/4(0)	—
劉孝威	496	×	×	0	0/9(0)	—
張纘	499	×	×	8	8/10(80)	14/19(74)
蕭統	501	×	×	5	5/9(56)	2/9(22)
沈炯	502	○	○	4	4/6(67)	2/9(22)
蕭綱	503	×	×	8	8/52(15)	6/23(26)
徐陵	507	×	○	2	2/8(25)	2/3(67)
蕭繹	508	×	×	5	5/23(22)	2/12(17)
庾信	513	×	○	5	5/69(7)	3/5(60)
張正見	523?	×	×	0	0/6(0)	—
牛弘	545	×	○	1	1/6(17)	1/1(100)
陳叔宝	553	○	○	0	0/6(0)	—

4. 魚・虞韻通押の音声学・音韻論的説明

それでは、本来二陸ら六朝初期の呉方言において固有であり、六朝時代を通じて南朝文人の詩作全体に広く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虞韻唇音・云母字の魚韻との通押現象は、音声学・音韻論的にどのようなメカニズムに基づくのであるか。本節では、まず分布を手がかりに音韻論的解釈を施し、その後音声学的メカニズムを論じたいと思う。

4.1 分布

周知の通り、『切韻』魚韻では云母と唇音は「あきま」となっており字が存在しない。これは、上古中国語の唇音および円唇軟口蓋音（牙喉音）字が、中古中国語（『切韻』音系）で虞韻に変化したためである。Baxter-Sagart（2014: 223）の変化規則を示すならば以

下の通りである⁹。

*P(r)a > Pju
*K^w(r)a > Kju

それ以外の声母（非円唇牙喉音含む）は、中古で魚韻に変化した。

*C(r)a > Cjo

円唇化していない軟口蓋音（牙音・影母・曉母）は魚韻に変化したものの、云母は必ず円唇化声母であったため、結果として魚韻云母があきまになってしまった。魚韻の由来は原則として魚部であり、他の韻部からの補充もなかった。

云母・唇音の魚韻字をあきまとするのは、あくまでも『切韻』において魚韻云母・唇音字が存在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に過ぎない。音韻論的には、云母・唇音に後続する開音節の三等字において/u/と/o/の対立がない、すなわち/u/と/o/が中和（neutralization）していると言うべきである。『切韻』では唇音・云母字を虞韻に帰属させているが、実際の六朝初期呉方言では/u/と/o/が開口度[high]あるいは円唇性[round]の弁別特徴の点で中和し、後舌性[+back]および非広母音性[-low]の弁別特徴のみを有する原音素（archiphoneme）/O/（=u-o/）が現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原音素/O/は/u/と/o/の中間的な音声実現であり、呉方言話者にとっては魚韻と虞韻の両方に近いと感じられたため、両者とも通押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遠藤（1991: 256）は『切韻』において唇音声母の後で合口介音の対立が中和しているとするが、このような中和が六朝初期呉方言では介音のみならず主母音においても発生していたのだろう。

4.2 音声

上古の魚部唇音・円唇軟口蓋音声母が中古で虞韻に移行した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らの声母に共通する音声特徴、すなわち円唇性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声母の強い円唇性は母音の強い狭母音化・円唇化を促し、虞韻/u/に変化させた。しかし、少なくとも上述の例において、円唇軟口蓋声母のうち「矩*k^wa?（巨声）」「衢*q^wa（瞿声）」「娛*ŋ^wa（呉声）」「紆*q^wa（于声）」のような云母以外の声母については魚韻との通押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い。発表者は、六朝初期呉方言において、云母以外の牙喉音声母の円唇性が介音（わたりの半母音）ないしは主母音の円唇性の弁別特徴という形で声母から分離した（*k^w > kw）のに対して、云母および唇音では声母において円唇性が保存されていたた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唇音の声母は p, p^h, b, m であり、声母の中に円唇性が含まれている。仮に合口介音が発生していたとしても、声母それ自体の円唇性が無くなることはあり得ない。それでは、牙喉音、云母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に声母の中に（同時調音ではなく）円唇性を含んでいる子音は何か。Jaxontov（1977）は上古の云母に*w を再建したが、発表者は、六朝初期呉方言においてもこの w が云母に保持されていた可能性を提唱する¹⁰。もちろん、同じく円

⁹ *P は唇音（*p, *p^h, *b, *m）、*K は牙喉音（*k, *k^h, *g, *q, *q^h, *g）、*C はその他の子音を代表させている。牙喉音の右肩の^wは Jaxontov（1960）が再建した円唇軟口蓋化声母を表す。*a は魚部の主母音である。ju と jo はそれぞれ中古の虞韻、魚韻の韻母である（j は介音）。なお、これらはいくまでも音素表記であることに注意されたい。

¹⁰ この他、俞敏（1984/1999: 15）は後漢三国の梵漢対音で梵語の v が匣母合口や云母字で音訳されて

唇性を有する子音として潘悟雲（1997）や Baxter-Sagart（2014）の上古音のように、円唇化した口蓋垂音 g^w を立て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が、同じく円唇化の同時調音を持っていた「矩」* k^w などの牙喉音と異なる振る舞い（すなわち云母以外の牙喉音は魚韻と通押しない）を説明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ように思われる。冒頭で引用した『顔氏家訓』からも、南方で虞韻「矩」は明らかに魚韻と区別さ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矩」が魚韻と中和していたとは到底考えられないだろう¹¹。

そして、このような円唇子音に後続する環境における中和から、六朝初期呉方言において魚・虞韻主母音の対立を決定づけていた弁別特徴も開口度[high]よりはむしろ円唇性[round]であ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中古中国語の魚韻について平山（1995）が再建した韻母[$ɪə$]に類する音価は、六朝初期呉方言に対しても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虞韻唇音・云母字の原音素/O/は、[u]~[ə]の間のいずれかの音声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が、特定することは難しい。魚韻と通押することから考えて、他の虞韻と比べて円唇性が弱めで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羅常培は魚・虞通押のメカニズムとして「異化作用」を想定したが、魚韻と通押するのが唇音・云母のような円唇声母に限定されるのであれば、そのような声母の円唇性に対して母音に「異化作用」が働いたことは十分に考えられるだろう。

魚・虞韻の上古 > 六朝初期呉方言の音韻変化を示すと、表2のようになる（声調略）。呉方言における三等介音の発生時期は明らかではないため、ここでは表記していない。

表2 魚・虞韻の音韻変化

	上古	六朝初期呉方言
虞韻唇音：夫	*ba	bO [bə~bu]
虞韻云母：宇	*wa	wO [wə~wu]
虞韻牙喉音（魚部円唇軟口蓋化声母由来）：矩	* k^w a	k(w)u [ku]
虞韻牙喉音（侯部由来）：拘	*ko	k(w)u [ku]
魚韻（魚部非円唇軟口蓋化声母由来）	*Ca	Co [Cə]

4.3 模韻について

また筆者は、六朝初期呉方言、更には南朝士人の詩作言語においては一等韻である模韻の主母音にもこの原音素/O/が現れていたと考え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再建することで、（文人や時期により魚・虞韻のどちらかに偏る傾向があるとはいえ）模韻が六朝を通じて魚韻、虞韻の双方とも通押することも説明できると考えられる。

主母音/o/と/u/が三等韻である魚韻と虞韻では唇音・云母を除いて中和しないにも関わらず、一等韻である模韻では子音を問わず中和していた（すなわち模韻という1種類の韻目しかなかった）ことは、1つの興味深い可能性を示唆する。すなわち、中和は通常、

いることを根拠に、これらの声母の音価が[w]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とする。また、鳥羽（2018: 97-99）は匣母（一部）と云母字が疑母や唇音字とも諧声・通仮することがあることを根拠に、これらの匣母・云母字の上古音が疑母・唇音と音声的に類似する*wであったとする。

¹¹ 虞韻牙喉音字に対し魚韻の反切下字が使われている例として『經典釋文』に12-11a「馭（虞韻平声）」（「驅」の異体）の「起居反（魚韻平声）」、20-28a「劬（虞韻平声）」の「其居反（魚韻平声）」、6-34b「鯀（虞韻去声）」の「於據反（魚韻去声）」の3例があるが、いずれも僻字であり、これら以外の虞韻牙喉音字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な混同を示す例はない。また、これら3字はいずれも上古侯部字であり、円唇牙喉音由来ではない。なお、唇音・云母字については『經典釋文』17-1b「侮（虞韻上声）」に「亡呂反（魚韻上声）」と付す例が見られる。『經典釋文』の反切例は王懷中（2019: 717-718）より採った。

有標環境において発生する¹²。虞韻の場合も、円唇子音という有標環境において中和が発生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は、中古より前において非三等韻ではなくむしろ三等韻が無標であったという近年の説¹³を裏付ける可能性を示唆する。

特に、Norman (1994) や Baxter-Sagart (2014) が非三等韻の上古音として咽頭化子音を再建してい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Jakobson-Fant-Halle (1952: 31) は、円唇化と咽頭化の聴覚上の類似を指摘し、両者に対して同じ弁別特徴[flat] (変音調性) を与える。呉方言、あるいは南朝士人の詩作言語において非三等韻は一等韻に対して有標的であり、その有標性は声母の咽頭化あるいは円唇化に類する特徴で代表され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5. 結論

二陸を中心とする三国～晋の呉方言では魚韻と虞韻は明確に区別されていたが、虞韻の唇音と云母字のみ魚韻と通押していた。特に、虞韻唇音・云母字と魚韻の通押現象は宋の彭城劉氏のような南渡士人に強く見られ、齊・梁以降は程度の差はあれど謝超宗・謝朓・王儉・江淹・張纘・徐陵・庾信、あるいは北朝出身の牛弘といった多くの文人に広く共有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のような南朝文人の用韻傾向が呉方言から直接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なのか、あるいは『切韻』につながる押韻の規範言語が整えられていく中で呉方言とは独立して「共通改新」的に発生したものなのかには決定できないが、六朝全体を通して広く見られる根拠のある言語現象であることは確実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六朝初期呉方言で虞韻唇音、云母字のみ魚韻と通押するのは、これらが介音や主母音ではなく声母に共通する音声特徴すなわち円唇性を保持しており、その円唇性が主母音の対立を中和させたた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のことから、六朝初期呉方言での云母の音価は唇音と同じく声母自体に円唇性を有する w であると推定される。これは Jaxontov の上古再建音価にも符合する。また、このような中和した原音素母音は模韻にも現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このことは音韻論的に一等韻が本来三等韻に対して有標的であった可能性を示唆する。

本稿で詳しく論じられなかった問題として、尤韻や哈韻などの隣接韻との関係がある。六朝初期呉方言ではこれらの韻が魚・虞韻と通押することがあるが、この特徴は魚・虞韻の区別とは違って後の南朝文人には受け継がれ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な隣接母音との連鎖関係は、模韻が魚韻よりも虞韻と近い関係に変化していった理由を解き明かす鍵にもな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このような点は、今後六朝全体の押韻状況を精査していく中で明らか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う。

〈参照文献〉

遠藤光暁 1991. 「『切韻』における唇音の開合について」, 『日本中国学会報』43: 247-261

¹² 例えば、現代北京語は藤堂 (1956) によれば主母音の開口度のみが弁別的である /a ə ɪ/ の三母音体系であるとされる。しかし、半母音 (介音) /j/ と韻尾 /n/ に挟まれた環境で、母音は /a ə/ の二母音体系に減ずる。藤堂 (1956: 241-242) は、「煙」 yān と「陰」 yīn の音素表記をそれぞれ /jan/ と /jən/ であるとする。これは、中和の概念を用いないアメリカ構造主義的な解釈である。もし中和の概念を用いるならば、これは /j/ 介音に後続し、/n/ 韻尾に先行するという有標環境において母音の開口度の対立が中和しているに他ならない。/j/ 介音 (及び /n/ 韻尾) の強い狭母音性の特徴が、主母音における開口度の対立を阻害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¹³ 中古において三等韻は介音を持つという点で非三等韻に対して有標的である。しかし、三等韻は韻目数を見ても非三等韻のほぼ同数に相当するほど数が多い。この点から、鄭張尚芳 (2013: 171-172) は三等韻が上古では無標であり、中古になって有標に変化した可能性を指摘する。

- 頁。
- 木津祐子 1992. 「『真誥』中の押韻字に見える言語的特性」, 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 同朋舎出版。
- 木津祐子 1996. 「陸機と「楚」: 聲律意識の形成について」, 『中國文學報』1996(53): 32-51 頁。
- 藤堂明保 1956. 「北京語の音韻」, 『中国語学』1956(54): 235-244 頁。
- 鳥羽加寿也 2018. 「上古音における喉音の再分類について」, 『待兼山論叢 哲学篇』52: 93-107 頁。
- 陳寅恪 1936. 《東晉南朝之吳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 1-4 頁。(1992 所収)
- 陳寅恪 1992. 《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魯國堯 2002-2003. 《“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 《中國語文》2002(6): 536-549 頁, 2003(2): 137-147 頁。(2003 所収)
- 魯國堯 2003. 《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 1931.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358-85 頁。(1963 所収)
- 羅常培 1963.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北京: 中華書局。
- 潘悟雲 1983. 《中古漢語方言中的魚和虞》, 《語文論叢》2: 78-85 頁。(2002 所収)
- 潘悟雲 1997. 《喉音考》, 《民族語文》1997(5): 10-24 頁。(2002 所収)
- 潘悟雲 2002.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潘悟雲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平山久雄 1995. 《中古漢語魚韻的音值: 兼論人稱代詞“你”的來源》, 《中國語文》1995(5): 336-344 頁。
- 王懷中 2019. 《《經典釋文》陸氏音系》, 北京: 中華書局。
- 王力 1936.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 《清華學報》11(3): 786-842 頁。(1991 所収)
- 王力 1991. 《王力文集 18 中古音: 等韻及其他》。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 俞敏 1984. 《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 《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 光生館。(1999 所収)
- 俞敏 1999. 《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
- 鄭張尚芳 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 1943.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 《輔仁學誌》12(1,2): 201-220 頁。(1966 所収)
- 周祖謨 1963.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語言學論叢》5: 39-70 頁。(1966 所収)
-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北京: 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82. 《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 《語言研究》1982(1): 6-17 頁。(1996 に《齊梁陳隋時期韻部總說》、《齊梁陳隋時期韻部的演變》として所収)
- 周祖謨 1996. 《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 Baxter, William H., and Sagart, Lauren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kobson, Roman, Fant, C. Gunnar M., and Halle, Morris. 1952.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Cambridge: M.I.T. Acoustics Laboratory.
- Jaxontov, Sergej E. 1960. Fonetika kitajskogo jazyka I tysjačletija do n. e. (labializovannye glasnye). *Problemy Vostokovedenija* 1960(6): 102-115.
- Jaxontov, Sergej E. 1977. Načal'nyj w v drevnekitajskom jazyke. *Vostokovedenie* 3: 57-66.
- Norman, Jerry. 1994.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 397-408.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引用出典〉

班固『漢書』，二十五史系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陸德明『經典釋文』，黃坤堯・鄧仕樑編《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年。

遼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中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沈約『宋書』，二十五史系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蕭子顯『南齊書』，二十五史系列，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四，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

〈付記〉

本稿の執筆に当たり、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鈴木慎吾先生作成の「諸家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韻譜韻讀」データベース (<https://suzukish.sakura.ne.jp/search/xianqin/>、未公開データ含む) を活用しました。執筆に当たりご助言を下された先生方、また貴重なコメントを下された査読者の先生方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雲漢』1号，2023年3月26日)

試談敦煌變文中的兩類名量詞及其語義功能的差異*

松江 崇

Summary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eight classifiers and the noun phrases constructed from the classifier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Tang-Five Dynasties period, this study shall point to the division of these eight classifiers into two types. The first type is the “initially-dominant,” generally ordered as “numeral +classifier+noun,” with the classifier preceding the noun. The second is the “following-dominant” type, which is generally ordered as “noun+ numeral +classifier,” with the classifier following the noun. The study will show that the two types had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former served to assign the noun a particular “form” or “attribute,” while the latter type did not have this function. It was because the noun phrase ordered as “numeral +classifier+noun,” produced the syntactic meaning of high “individuality” that the former generally preceded the noun.

Keywords: classifiers, individuality, word order, Dunhuang manuscripts

1. 導言

關於漢語量詞的歷時發展問題，一直以來為很多學者所關注。其原因應該是：從語言類型學和漢語史的兩個方面來看，這一論題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漢語名量詞的系統性研究以劉世儒(1965)為嚆矢¹。其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量詞的界定與分類、出現時期、與其搭配的名詞的種類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並指出“這類名量詞（引用者注：指名量詞）在南北朝時期特別得到發展，其詞量的豐富，分工的細密，規範的明確，都不是這個時代以前任何一個時代所可比擬的”。此後，陸續出現了探討名量詞的研究，關於這些古漢語名量詞的研究概況，李建平(2016:2-24)、張顯成·李建平(2017:51-74)作了比較詳細的概括，可參考²。前人研究已對每個量詞的出現時期、與其搭配的名詞的種類、數量結構的詞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基本上闡明了主要名量詞的產生時期及其發展過程³。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有關量詞歷時發展的所有問題都得到了闡明。本文認為，在某一個時期同時共存的量詞之間存在著語義功能方面的共性和差異，對於這樣的共性和差異尚未展開充分的討論。這個問題可能關係到量詞在歷時過程中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將以敦煌變文為語料，對唐五代的八個量詞進行窮盡性的調查，根據詞序分佈

* 本文的主要內容曾在北京語言大學舉辦「首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2015.11.28)上宣讀。寫作過程中承蒙木村英樹教授、大西克也教授、木津佑子教授、宋亞雲教授指教，並得到了《雲漢》匿名審稿專家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本文得到了以下兩項科學研究項目的資助。

• 「中国語における文法的意味の史的変遷とその要因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118H00662, 研究代表: 大西克也)
• 「古代中国語方言の動態的研究」(18K00532, 研究代表: 松江崇)

¹ 就表示數量的各種形式及其語義特徵而言，太田(1958)已經做過概括性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太田(1958:155)把表示“計數”的形式歸納為三種：A式 名+數+名、B式 名+數+量、C式 數+量+名，並簡單地介紹了每個形式的來源及其歷時發展。他提出的這種數量結構的分類對以後的研究的影響較大。

² 除了李建平、張顯成先生所提及的研究以外，橋本(2014)也探討過古漢語量詞的語法化問題。

³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關於上古時期名量詞的界定和生成時期、生成機制的問題，學者們的看法並不一致。關於這一問題，參見姚振武(2009)、戶內(2022)等。

的不同將其分為兩類：前置優勢類與後置優勢類；同時推定詞序的不同是由於該名量詞的語義功能的不同而形成的。

文中敦煌變文採用的版本是潘重規《敦煌變文新書》（上、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4 年版，簡稱“新書”），同時參照了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 年版，簡稱“校注”）進行對比較勘，此外，還盡量參照了這些版本所依據的古寫本掃描版⁴。

2. 關於名量詞詞序的先行研究

古漢語的數量名短語（“數”“量”“名”分別表示數詞、量詞、名詞）中的名量詞有兩種詞序：一是“（數+）量+名”這種數量詞前置詞序（簡稱“前置詞序”），二是“名+數+量”這種數量詞後置詞序（簡稱“後置詞序”）。圍繞這兩種形式的構式語義的不同，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2006）根據從先秦到南北朝的語料，對兩種詞序（主要是量詞為單位詞⁵的情況）進行了調查，指出先秦漢語的“數+單位詞（+之）+名”這種前置詞序是描寫性的，而“名+數+單位詞”這種後置詞序則是計量性的。他們還指出：西漢前後，“數+單位詞+之+名詞”中的“之”的脫落誘發“數+單位詞+名詞”獲得實際計量的功能；漢代出現的“數+個體量詞+名詞”格式，是仿照“數詞+單位詞+名詞”格式類推而來。

此外，松江（2014）以唐五代的《降魔變文》《舜子變》《伍子胥變文》為語料，著眼於兩種詞形式話語功能，提出“前置詞序具有[個別性]較高的這一語義特徵⁶，後置詞序則具有[個別性]較低的語義特徵”的假說。這種假說的根據是：前置詞序經常作存在動詞或知覺動詞的賓語，被引進語境中且充當主題（topic），其後面常帶有對其進行描寫和說明的描述詞語；而後置詞序沒有這種傾向。

可以說，這些研究對兩種形式的構式語義提出了假說，但未充分考慮到每個量詞的語義功能的不同。其實，如下所述，唐五代的名量詞在兩種詞序中出現的情況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而這種情況很可能和名量詞本身的語義功能具有密切的關係。由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名量詞的語義功能與數量名短語的詞序（即前置詞序或後置詞序）之間的對應關係，對其關係試圖做出合理的解釋。

3. 敦煌變文中的名量詞

3.1 兩類名量詞

本文對敦煌變文中“條”“片”“種”“個”“枚”“頭”“斤”“尺”等八個量詞（前六者為個體量詞，而後二者為單位量詞）進行探討，它們的詞序情況如下：

表 1 前置優勢類與後置優勢類

	前置優勢類					後置優勢類		
	條	片	種	個	尺	枚	頭	斤
前置詞序：數+量+名	13	11	55	102	27	1	3	0
後置詞序：名+(數)+量	0	1	4	1	0	5	7	12

⁴ 法藏伯希和敦煌文獻基本上參照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所收的圖片，其他敦煌文獻（包括斯坦因整理的文獻）參照了拇指數據庫《敦煌變文》（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所收的圖片。

⁵ 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2006）所說的“單位詞”主要包括：標準度量單位詞（如“尺”“里”）、表示集體概念的單位詞（如“乘”“雙”）以及由部分容器名詞（如“簞”“瓢”）、動作動詞（如“束”“堆”）轉用而來的臨時單位詞。由於吳福祥等（2006:396）認為個體量詞到了兩漢以後作為一個語法範疇出現，所以這幾位學者在討論先秦的數量結構時，原則上沒有探討個體量詞出現在數量結構中的情況。

⁶ 松江（2014）所說的“個別性”概念主要依據大河內（1985）對漢語量詞的“個體化”功能的看法。

*表中數字表示出現頻率。

*表中“個”包括“個”“箇”“个”三個字表示的量詞。

從[表 1]可以看出敦煌變文中的八個量詞可分為兩類：“條”“片”“種”“個”“條”“尺”等為前置優勢類，“枚”“頭”“斤”等為後置優勢類。以往的研究中諸多學者已指出，在唐五代量詞的前置詞序佔絕對優勢，而後置詞序已經衰落。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如[表 1]所見，我們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量詞的詞序因量詞而不同，個別量詞仍然保持後置詞序。下面我們首先對每個量詞的語義功能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探討語義功能和詞序之間的因果關係。

本文認為兩種量詞呈現出詞序分佈上的差異是其語義功能的不同造成的：前置優勢類具有為其所搭配的名詞賦予某種[形象]或[屬性]的功能，且這種功能可以提高該名詞所指的[個別性]，所以前置優勢類一般表示為[個別性]較高的前置詞序，而後置優勢類一般表示為[個別性]較低的後置詞序。下面將對敦煌變文中八種量詞的語義功能逐一進行分析。

3.2 前置優勢類

3.2.1 “條”

“條”字的本義是樹枝(《說文解字·木部》“條，小枝也”(118)⁷)，“條”的名量詞用法應是由此通過語法化而來的。李建平(2017:68)把“條”歸為稱量線狀或長條事物的“線狀個體量詞”的一種，並指出用作量詞的“條”在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包山楚簡》中可以看到。

名量詞“條”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抽象名詞搭配，賦予該名詞[細長]的形象。

敦煌變文的數量結構中名詞表示具體事物時，有兩種情況：一是名詞本身具有[細長]的形象特徵(如用例(1)(2))，二是名詞本身具有形狀可變的特徵，而不具有[細長]的形象特徵(如用例(3)(4))。用於後者時，名詞所指的形象特徵是“條”所賦予的，而不是名詞本身具有的，因此可以認為其具有賦予該名詞[細長]的形象的語義功能。

- (1) 何曾見有一條蛇，都是忘(妄)心生兼執。便是似我陡貪幼(幻)境，忘(妄)心緣盧(慮)計為真。(維摩碎金/維摩詰經講經文(二) 377/807)⁸
- (2) 高聲喚言象兒：“與阿耶三條荊杖來，與打殺前家歌(哥)子！”(舜子變 953/201)
- (3) 淨能柱內又奏：“臣且歸大羅天去也！”皇帝與高力士見一條紫氣昇空而去。(葉淨能詩 1114/340)
- (4) 千道光明遐邇照，幾條明焰色如霜。化緣菩薩出於世，所以名為妙吉祥。(十吉祥講經文 409/612)

數量結構中的名詞表示抽象事物的情況只有 1 例(用例(5))。劉世儒(1965:102)指出，“‘條’量‘事’是起於把‘事’寫成‘條文’(中略)，可見這種用法，其實也還是同‘木條’有聯繫的。在漢代這種用法雖然就已經常見，(中略)南北朝這種真寫成條文的用法仍然通行，由此推衍，更虛靈的用法也就跟著產生了”。⁹用例(5)中的“惡業”根本沒被寫成條文，其前的“條”相當於劉世儒(1965:102)所說的“更虛靈的用法”，其功能可能是通過轉喻賦予“惡業”與條文那樣的[細長]的形象的。

⁷ 引用句後的數字表示該句在本文採用的版本中的頁數。採用版本參見〈引書目錄〉。

⁸ 敦煌變文的作品名後的數字表示《新書》和《校注》中的頁數。“/”左邊為《新書》中的頁數，而右邊為《校注》中的頁數。該文獻未收在《校注》時，只表示《新書》中的頁數。

⁹ 李建平(2017:69)指出在先秦兩漢文獻中量詞“條”稱量條形物的用例並不多見，而更為虛化的用法，如稱量“法律條文”“事件”等的用例在兩漢文獻中卻非常常見。

(5) 凡夫十惡未能拋，努力今朝須懺悔。十條惡業最難言，百千萬劫出無緣。(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149/680)

3.2.2 “片”

“片”字的本義是木片(《說文解字·片部》“片，判木也”(143))，“片”的名量詞用法應是由此通過語法化而來的。李建平(2017:68)把“條”歸為稱量典型外形特徵為平面的“面狀個體量詞”的一種，並指出用作量詞的“片”已在兩漢文獻中可以看到。

名量詞“片”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 / 抽象名詞搭配，賦予該名詞[扁平]的形象。

敦煌變文的數量結構中名詞表示具體事物時，有兩種情況：一是名詞具有形狀可變的特徵(如用例(6)(7))；二是名詞具有[扁平]且可劃分的特徵(如用例(8))。在前一種情況下，名詞所指的形象特徵應是由“片”所賦予的，可以認為“片”具有賦予[扁平]形象的語義功能。在後一種情況下，“片”表示較大部分中被劃分的較小部分。

(6) 盡忠盡節奉明君，數片祥雲捧日輪。自古詩書明有語，須知主聖感賢臣。(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49/623)

(7) 論情實是綺羅人，若說容儀獨超春。身挂天宮三珠(銖)服，足躡巫山一片雲。(破魔變文 596/534)

(8) 列表文曰：“…臣今離鄉別國，來事大王龍庭，陛下慈潤於朝庭，一片¹⁰地將何惜！頓首死罪。”(秋胡變文 983/233)

數量結構中的名詞表示抽象事物時¹¹，“片”所賦予的具體形象並不明確，但是往往從語境中可以看出：“片”通過賦予[扁平]的形象，起到凸顯該名詞所指具有的某種屬性的作用。

(9) 汝母在生之日，都無一片善心，終朝殺害生靈，每日期(欺)凌三寶。(目連緣起 671/1012)

(10) 倏忽絲綸安大國，滂沱雨露灑諸侯；垂衣端拱深宮裏，一片慈心蓋九州。(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44/621)

3.2.3 “種”

李建平(2016:136)把“種”歸為“非外形特徵類集體量詞”中“非定指集體量詞”的一種，並指出“種”用作量詞的用法來源於“種類”義，典型的用例在西漢初年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沿用，到隋唐五代時期使用非常廣泛。

名量詞“種”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 / 抽象名詞搭配，賦予該名詞所指的部分成員某種屬性。

敦煌變文的數量名短語中名詞表示具體事物時(如(11)-(13))，“數+種”並不表示“名”的個體量(“兩種人”並不等於“兩個人”)，所以“種”的主要功能不可能是充當衡量個體數量單位的。從語境中可以看出，“種”起到賦予某種屬性的作用，且其賦予的對象一定限定在該名詞所指的部分成員之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用例中用“數詞+種”表達數量很多的意思(如(12)(13))。

(11) 將軍報言和尚“世間兩種人不得見王面：第一之人，平生白日，修於十善五戒，死後神識得生天上。不見王面。第二之人，生存在日，不修善業，廣造之罪，命終之後，便入地獄，亦不得見王面。…”(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 696/1029)

¹⁰ “片”，潘重規 1984 校作“席”，本文據黃征、張涌泉 1997 校作“片”。

¹¹ 名詞為表示抽象事物時，名詞原則上都和“心”有關。其他用例，如“一片之信心”(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一片心”(伍子胥變文)等。

(12) 歸依法者，乃五千卷藏經，名之為法。歸依僧者，號出家。乃是四果(果)四向，剃■(髮)染衣，二部僧眾，真佛弟子，號出家人，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此間則有波斯、摩尼、火祇，哭神之輩，皆言我已出家，永離生死，並是虛誑，欺謾人天。(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151/681)

(13) 如人得到寶山中，百種珠珍遍尋覓，有手方能採得他，無時空往終無益。(維摩詰經講經文(一)220/752)

數量名短語中的名詞表示抽象事物時(如(14)-(16))，“數+種”往往等於“名”的數量，“種”的賦予屬性作用不那麼明顯，似乎接近於典型的個體量詞。

(14) 老人聞說，雅責須達大臣，將千種愆違，豎百般過失，振睛怒目，叱訶須達大臣，解太子之瞋心，免善事之留難處，若為(降魔變文[一卷]616/556)

(15) 彼菩薩堪紹聖種，故名法王子。何以名為妙吉祥？此菩薩當生之時，有十種吉祥之事。(十吉祥[講經文]409/612)

(16) 死王強壯，奪人命根，一息不來便歸後。假使千人防援¹²，直饒你百種醫術，自從渾沌已來，到而[今]留得幾個？(不知名變文(二)/(一)807/1131)

3.2.4 / 個 /

表示量詞“個”的字有“個”“箇”和“个”¹³。對於這些字形和名量詞“個”間的複雜關係，洪誠(1963/2000)、陳紱(2002)、張顯成·李建平(2017:582)等已經探討過。李建平(2016:11)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名量詞“個”有三個來源：一是由“介”形變為“个”；二是源自“箇”；三是二者合流後的新造字“個”。關於這個問題，本文掌握的材料並不多，所以暫時按照李建平(2016)的看法，把敦煌文獻中的“個”“箇”和“个”視作一個詞(下文中記作/個/)。/個/屬於所謂泛指量詞，在南北朝時代已經可以和表“物”和“人”的名詞搭配(劉世儒(1965:83))。

敦煌變文中的名量詞/個/的語義功能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義：和具體/抽象名詞搭配，賦予該名詞某種特殊屬性。

/個/出現在敦煌變文的數量名短語中有兩種情況：一是語境賦予該名詞特殊屬性，二是該名詞本身具有特殊屬性。用於前者時，名詞的特殊屬性是由語境通過/個/而賦予的，因此可以認為/個/具有賦予該名詞某種特殊屬性的語義功能。

數量名短語中的名詞為不具有特殊屬性的名詞時(102例中70%左右)，多數是人或動物等生命度較高的具體事物(如(17)-(19))。但也有生命度較低的事物(如(20))，還有抽象名詞的情況(如(21))。用於此種用法時，數量名短語後面往往有對其進行說明的詞語。在這些用例中/個/賦予名詞某種特殊屬性的語義功能很明顯。比如，用例(17)中“一箇道士”，其實並不是普通的“道士”(因為這個道士具有從瓮子上的畫中變化而來特殊屬性，這種特殊屬性並不是每個屬於“道士”的成員都具有的)，而是語境賦予這個“道士”的。其他用例中的情況類似。

(17) 於是淨能懷中取筆，便於瓮子上畫一道士，把酒盞飲，帖在瓮子上，其瓮子便變作一箇道士。身長三尺，還着擣(擣)[冠]黃被，立於殿西角頭。(葉淨能詩1108/336)

(18) 時有左勒將賀若弼越班走出，啟言陛下：“臣願請軍去得。”賀若弼才請軍之次，有一個人不恐。是甚人？是即大(積代)名將韓熊男，幼失其父，自訓其名號曰衮虎，心生不分，越班走出…(韓擒虎話本1082/504)

(19) 殿下遂喚車匿問之，“此是何人？”喪主答曰：“此是死人。”“[何名死人]？”

¹² “援”，《新書》作“撲”，本文據《校注》校作“援”。

¹³ 這些字在《廣韻》中是同音的(古賀切、見母箇韻開口一等去聲)。

“即此**一箇人**死，諸人亦然？”（太子成道經一卷 594/438）

(20) 佛語難陀道：“我緣今日齋去，是汝且與我看院。有**四個水研(瓶)**與添滿。更有院中田地，並須掃却。待我到來，一任汝去。”…這難陀在院悶悶不已…連忙取得**四個瓶**來，便着添瓶。纔添得三個，又到(倒)却兩個；又添得四個，到(倒)却三個。（難陀出家緣起 649-650/591）

(21) 子玉遂乃奏曰：“陛下若□□(不通)文狀，臣有**一箇問頭**，陛下若答得，即却歸長安；若□□(答不)得，應不及再歸生路。”（唐太宗入冥記 1099/322）

數量名短語中的名詞為本身具有某種特殊屬性的名詞時（102 例中 30%左右），多數表示人（具有某種特殊屬性的人）或佛、神等生命度較高的事物。在這些用例中 / 個 / 賦予名詞某種特殊屬性的語義功能並不明顯，但還是可以認為其通過賦予名詞某種特殊屬性，起到凸顯該名詞特殊屬性的作用¹⁴。比如，用例（22）中“一箇飲流”，語境要求該名詞具有[好酒、酒量多]的特殊屬性（因為需要與“陛下”痛飲），且屬於“飲流”（意為“酒徒”）的成員已都有“好酒、酒量多”的這種特殊屬性，在這種情況下 / 個 / 通過賦予“飲流”其已經具有的[好酒、酒量多]的屬性，凸顯“飲流”本身具有的這種特殊屬性。其他用例中的情況類似。

(22) 淨能奏曰：“臣見陛下飲似不樂，臣與陛下邀得**一箇飲流**，此席的畢(必)歡矣。”（葉淨能詩 1108/336）

(23) 於是道安聞語，作色動容，噴善慶曰：“……聽經時光，可昔(惜)汝不解，低頭莫語，用意專聽。上座講筵，聽眾宣揚，普皆聞法。不事在作**一箇問法之人**。”（廬山遠公話 1064/264）

(24) 須達啟言陛下：“如來先世，且出**千箇輪王**，枝葉相承，尊榮不絕。爰祖及父，皆居萬乘之尊；卓子玄孫，咸稱鸞鳳之嫡。父稱淨飯，居八國之最尊，母號摩耶，處[□](五)天之絕世。（降魔變文[一卷] 625/560）

(25) 六師自道無般比，化出**兩箇黃頭鬼**，頭腦異種醜屍骸，驚恐四邊令怖畏。（降魔變文[一卷] 635/566）

3.2.5 “尺”

“尺”是度制單位（《說文解字·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尺，所以指尺規架事也”（175）），名量詞“尺”屬於度制量詞。其用例在成書不晚於戰國時期的《銀雀山漢簡》中就已經可以看到（張顯成·李建平 2017:266）。

名量詞“尺”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名詞搭配，賦予該名詞有關[長度]的屬性。

一般認為，“尺”表示衡量該名詞的長度單位。這種看法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從具體用例中可以看出：“數詞+尺”一般並不表示實際長度，而往往表示跟該長度有關的屬性。比如，用例（26）（27）中的“百尺井底”、“百尺炎爐”都用表示比喻性的長度，凸顯“井底”的深度和“炎爐”的長度；用例（28）中的“六尺丈夫身”為較為固定的說法（參見用例（29）），用於表示比喻性的長度，凸顯“體軀”具有的[堂堂的成年男子的]這種屬性。具體用例，如（29）-（31）。

(26) 妻曰：“**百尺井底**，大石鎮之，豈有治(活)理。”（孝子傳）

(27) 須達啟言陛下：“千鈞之弩，[□](不)為驢鼠發機；**百尺炎爐**，不為毫毛蒸焰。不假我大聖天師，最小弟子，亦能祇敵。”（降魔變文[一卷] 626/561）

(28) 堂堂**六尺丈夫身**，雪色衣裳稱舉人；霄漢會當承雨露，高科登第出風塵。（父母恩重

¹⁴ 木津(2014)對《朱子語類》中的 / 個 / 進行了詳細的探討，指出 / 個 / 具有凸顯名詞屬性的功能。

經講經文(一) 461/975)

(29) 楚之上相，姓仵（伍）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清（請）託六尺之軀，萬邦受命（伍子胥變文 831/1）

那麼，“尺”不能用於表示衡量某物的“長度”單位嗎？其實表示這種語義功能時，“尺”一般用“‘長’等形容詞+數詞+尺”這種格式（共 15 例）。如：

(30) “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頰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伍子胥變文 831/1）

(31) 一日二日竹生根，三日四日竹蒼蒼。竹竿¹⁵森森長百尺，節節兵馬似神王。（孔子項託相問書 1123/359）

(32) 火至濕草邊，遂即滅矣，純得免難，犬燃死。太守及鄉人等與造棺木墳墓，高千餘尺，以禮葬之。（搜神記一卷 1226）

這種格式應不是數量名短語，而是述補結構。儘管有時名詞出現在這個格式之前（如用例（30）中的“髮”），但是“數詞+尺”與表示具體事物的名詞不具有直接的句法關係，所以這種格式不會賦予該名詞任何〔形象〕或〔屬性〕。

3.3 後置優勢類

3.3.1 “枚”

“枚”字的本義是“樹幹”（《說文解字·木部》“枚，榦也。可為杖”（118））。張顯成·李建平（2017:78-79）認為，早期泛指量詞“枚”來源於稱量“樹”的單位的參證難以得到證據，但其量詞用法已在公元前三世紀的《里耶秦簡》中可以看到。劉世儒（1965:77）早已指出，泛指量詞“枚”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適應力最強的量詞，除了不和抽象名詞及個別事物搭配以外，幾乎是無所不可搭配的。但是，至少從敦煌變文的情況來看，唐五代的“枚”主要和〔細長〕的形象的具體事物搭配¹⁶。

名量詞“枚”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名詞搭配，為衡量該名詞的單位。

數量名短語中的名詞多數為具有〔細長〕形象的具體事物，但是也有和不具有〔細長〕形象的具體事物搭配的情況。我們之所以認為“枚”未有賦予〔細長〕形象的語義功能，是因為其和不具有〔細長〕形象的名詞搭配時，不能為該名詞賦予其〔細長〕形象。如，用例（35）中的“桃”應不是〔細長〕的。這一點和上述“條”“片”等不同。“枚”出現在數量名短語的主要動機是表示數量的單位，其具有〔細長〕的形象不明確。本文認為，“枚”只是利用其形象，起到複指名詞而表示數量單位的作用¹⁷。

(33) “臣能止得吳軍，不須寸兵尺劍，唯須小船一隻，棹棹一枚，鮑魚一雙，麥飯一匾（甌），美酒一榼，放在城東水中，臣自有其方法。”（伍子胥變文 851/13）

(34) 淨能曰：“此病是野狐之病，欲得除喻（愈），但將一領氈來，大釘四枚，醫之立差。”（葉淨能詩 1106/335）

(35) 至七月七夕，西王母頭戴七盆花，駕雲母之車，來在殿上。空中而遊，帝見之心動，

¹⁵ S5674、S395 作“葦”（《校注》366 頁，注 119）。

¹⁶ 游黎（2018:172）對唐五代文獻中的量詞“枚”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調查，指出“‘枚’的量詞用法在唐五代仍然非常廣泛，與南北朝相比，其適用範圍雖有一定的縮小，但並不明顯”。這種情況和本文所介紹的敦煌變文中的情況不完全一致，這可能是因為游黎（2018）所採用的一些唐五代文獻的口語性不那麼高，所以“枚”的適用範圍的縮小現象並不明顯。關於“枚”的適用範圍的歷時演變，向熹（2010:315）也指出：“宋元以後，‘枚’的應用範圍大大縮小了。‘枚’所表示的單位大都有別的量詞來代替”。

¹⁷ 關於後置詞序中量詞的複指作用，游順釗（1988）探討甲骨文中出現在後置詞序中的量詞時，已經指出過。

遂不得仙。西王母將桃五枚，[來]在殿上奉帝：帝食桃，手把其核如(而)不棄之。
(前漢劉家太子傳 1037/244)

3.3.2 “頭”

“頭”字的本義是“首”(即腦袋)(《說文解字·頁部》“頭，首也”(184))。李建平(2016:104)把“頭”歸為“用顯著很強的部分來代替整體”的這種“替代型量詞”的一種，並指出“由本義而引伸為稱量動物的個體量詞，可以稱量牲畜、魚類或昆蟲等‘有頭之物’，但恰恰不能用於一般的人”。至於名量詞“頭”的出現的時期問題，王彤偉(2005:38)指出，在上古時期，表示“腦袋”之義時主要用“首”而不是“頭”，並認為量詞“頭”的量詞用法直到西漢《史記》中才出現。

名量詞“頭”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有以“頭”為形象特徵的具體名詞¹⁸搭配，表示衡量該名詞的數量單位。

“頭”在敦煌變文中所搭配的名詞種類不多，一般都是“牛”“大象”“駱駝”等(如(36)-(38))¹⁹。

本文認為“頭”也沒有賦予名詞以“頭”為特徵的形象的語義功能，這是因為其一般專門和以“頭”為形象特徵的具體名詞搭配，所以未能看出其具有賦予名詞形象的語義功能。本文認為，“頭”只是利用其形象，起到複指名詞而表示數量單位的作用。

(36) 梁王聞吳軍欲至，遂殺牛千頭，烹羊萬口，飲食堆如山岳，列在路邊，帳設鋪施。(伍子胥變文 853/14)

(37) 蕃王聞語，連忙下馬，遙望南朝拜舞，吋呼萬歲。拜舞既了，遂揀紉馬百疋，明駝千頭，骨咄、羶羶、糜(糜)鹿、麝香，盤纏天使。衾虎便辭，登途進發(韓擒虎話本 1089/304)

(38) 須達應時順命，更無低昂，當處對面平章，立地便書文契。多著保證，重置悔罰。恐太子之改張，剋先心而不遂。應時便開庫藏，般(搬)出紫磨黃金。選壯象百頭，昇即送。(降魔變文 [一卷] 618/557)

3.3.3 “斤”

“斤”是衡制單位(《漢書·律歷志上》“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969))。量詞“斤”屬於衡制量詞，其用例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可以看到(李建平 2016:303)。

名量詞“斤”在敦煌變文中主要用法可歸納如下：

語義功能：和具體名詞搭配，表示衡量該名詞的重量單位。

我們可以看出“斤”不具有賦予該名詞屬性或形象的功能。比如，(39)中“魚肉五斤”表示單純的重量，即使把它改為“魚肉六斤”，也只能表示重量的改變，而不表示屬性或形象的變化。在“名詞+數詞+斤”的結構中，名詞所指應具有較強連續性的語義特徵。

(39) 其魚(漁)人乃取得美酒一榼，魚肉五斤，薄餅十翻，飯攜一罐，行至船所，不見蘆中之士，唯見岸上空船。”(伍子胥變文 543/8)

(40) 霸王聞奏，龍顏大悅，開庫償(賞)盧綰金拾斤。盧綰接得金十斤，便辭楚王……(漢將王陵變 883/70)

(41) 管輅曰：“君但且還家，備覓麋鹿脯一斤，清酒一斗，明日午時尅(刻)到君家，

¹⁸ 文中“以頭為形象特徵”的這種說法難免帶有一定的模糊性。本文傾向於認為，以“頭”為形象的認知理據可能和人們抓住這些動物時的方式有關。這一點，請參照 Aikhenvald (2000) 對美國原住民語言中動詞的類別詞的探討以及西光義弘 (2004) 對日語中量詞“枚”“本”等的分析。

¹⁹ 中古還看到用於“虎”“鹿”“兔”“蛇”等用例。

方始救之，未知得否？”（搜神記一卷 1215）

3.4 例外詞序的出現條件

前置優勢類有時表示為後置詞序，後置優勢類也有時表示為前置詞序。對於例外現象，在此探討其出現的條件和動因。本文認為形成例外現象的主要動因有兩個。

一是文體修飾層面的要求。比如，用例(42)中的“頭”（=後置優勢類）可能是受到前面“五百個童女”的類推作用而出現的；用例(43)的“片”是可能是受到“明月半輪”的類推作用而出現的²⁰。如：

(42) 給孤長者，心中大越(悅)，偏(徧)布施五百個²¹童男，五百個童女，五百頭犍牛並犢子，金錢、舍勒、三故，便是請佛為王說法。（不知名變文（三）/（二）809/1134）

(43) 我今歡喜百千重，暗夜明燈忽爾逢，明月半輪居世上，慈雲一片入城中。（維摩詰經講經文（四）326/865）

二是話語層面的要求。用例（44）-（46）中的“二枚虫”“一斤之肉”“一頭水牛”都屬於後置優勢類，但都作話語中的主題(topic)，有後續部分對其進行描述。據松江(2014)的研究，前置詞序和後置詞序的構式語義的不同在於：前者帶有較高的[個別性]，而後者的[個別性]較低。本文認為，由於下列用例中的數量名短語都充當話語中的主題，所以語境為其賦予了較高的[個別性]，為了顯示這種語義特徵，這些數量名短語都呈現出前置詞序。這種現象表明數量名短語利用前置詞序的構式語義來表達其語義特徵。如上所述，前置優勢類具有“賦予形象或屬性”的語義功能，這些語義功能帶有凸顯[個別性]的功能，這是因為“賦予形象或屬性”的語義功能應該帶有凸顯名詞所指的作用，而這種被凸顯的該名詞的所指自然具有較高的[個別性]²²。

(44) 昔齊景公夜夢見病鬼作二虫(蟲)得病，著人遂向外國請醫人秦瑗(緩)至齊國境內。

景公夜夢見病鬼作二枚虫從景公鼻出，化作二童子，並著青衣，於景公·前而立…（搜神記一卷 1216）

(45) 勞度叉忽於眾裏，化出一頭水牛。其牛乃瑩角驚天，四蹄似龍泉之劍；垂斛(胡)曳地，雙眸猶日月之明。喊吼一聲，雷驚電吼。四眾嗟嘆，咸言外道得強。（降魔變文[一卷] 632/564）

此外，還有一些例外現象²³。本文不得不承認，誘發這些現象產生的動因難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如，用例（46）中/個/呈現出後置詞序的原因，尚未搞清。

(46) 行次臨河，舜見以郡(一群)鹿，歎曰：“凡為人身，遊鹿不相似也。”泣淚呼(吁)嗟之次，又見商人數個，舜子問云……（舜子變 955/203）

4. 兩類語法功能上的差異

上文從詞序分佈和語義功能差異的角度對敦煌變文中八個量詞進行了考察，量詞分為兩類，且兩類之間存在語義功能的差異。在此基礎上，下文將探討兩類量詞是否存在在語法功能上的差異。

²⁰ 文體修飾層面的要求可能還包括韻律方面的影響。此觀點承蒙北京大學宋亞雲教授的指教。

²¹ 個：《校注》作“頭”。本文對此字持保留看法。

²² 下列中“一斤之肉”也似乎因話語層面的要求而出現的例外詞序。但是《新書》作“一片之肉”，本文不作語料。

· “若逢五虎擬山之陣，須排三十六萬人倫槍之陣，擊十日十夜，勝敗由(猶)未知。我把些子兵士，似一斤之肉，入在虎牙，不螻咬嚼博啜之間，並乃傾盡。……”（韓擒虎話本 1086/302）

²³ 下列用例中的“百頭壯象”也算是例外現象。不過其作狀語修飾“當日登途”，較為特殊。

· 當日處分家中，遂使開其庫藏，取黃金千兩，白玉數環，軟錦輕羅，千張萬疋，百頭壯象，當日登途。（降魔變文[一卷] 610/553）

4.1 構成修飾名詞的重疊形式的情況

只有前置優勢類的“種”/個/“片”常用於重疊形式²⁴。一般認為，量詞重疊形式表示[每個][逐個]的語義(太田辰夫(1958)等)。這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敦煌變文中上述量詞的重疊形式不僅表達這些語義，還帶有其他語義特徵。如：

“種”的重疊形式帶有包括眾多種類的語義特徵，即其起到凸顯說明對象多樣性的作用(如(47)(48))。“種種”共有20例，多作定語(17例)，但還可以作狀語(1例)和謂語(2例)，如：

(47) 復次，舍利弗，彼國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三)173/704)

(48) 莫是中私藏幻術，為曾上世奉神靈。免吾種種疑心起，幸望通傳何姓名。(雙恩記 88/939)

/個/的重疊形式帶有某個特殊屬性的範圍中無例外的語義特徵，即起到凸顯說明對象的周遍性的作用(如(49)(50))。“個個”共有23例，“一個個”共有7例，二者原則上都作主語(往往前面有表示主體的詞語)。

(49) 若說內宮天子，個個盡皆堅志，朝朝樂聽深經，日日忻聽妙理。(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 420/962)

(50) 其魔女者，一個個如花菡萏，一人人似玉無殊。身柔軟兮新下巫山，貌娉婷兮纔離仙洞。盡帶桃花之臉，皆分柳葉之眉。(維摩詰經講經文(五)343/884)

“片”的重疊形式帶有[扁平]形象的語義特徵，起到凸顯其形象性的作用(如(51)(52))。“片片”的用例只有如下2例，一個作定語，另一個作謂語。

(51) 閑雲當戶，如片片之奇峯；老檜倚檐，似沈沈之洞水(維摩碎金 388/維摩詰經講經文(二)388/802)

(52) 會中羅(漢)好儀形，月面長眉眼紺青。身掛納²⁵袍雲片片，手捶(搖)金錫嚮(響)玲玲。(雙恩記 64/928)

本文認為，前置優勢類中具有較高的[個別性]，所以才能表示上述語義，並可以構成重疊形式。

4.2 和數詞搭配的情況

只有前置優勢類的/個/和“片”可以省略數詞，出現在缺少數詞的“(指示詞)+量詞(+名詞)”的這種格式中²⁶。這種現象表明，兩種量詞在這種結構中並不表示數量單位，而起到賦予[屬性]或[形象]的作用。所以這也可以說是支持我們假說的有利證據。

/個/一共有173例，缺少數詞的現象較多，有70例(如(53)-(55))，其比例達到40%左右²⁷。

(53) 正見雀兒臥地，面色恰似坩土，脊上縫箇服子，髣髴亦(欲)高尺五。既見雀兒困頓，眼中淚下如雨，口裏便灌小便，瘡上還貼故紙。(鶯子賦(一)1145/377-378)

(54) 鍾(鐘)聲豈滅輪迴苦，磬韻難消生死憂，與汝個修行疾徑路，須知萬法在心頭。(維

²⁴ “頭”也可以構成重疊形式(一共14例)。但這種重疊形式中的“頭”原則上都是名詞的，而不是衡量動物個體量的後置優勢類的“頭”。如：

· 緣國無二王，世無二佛，所以權為長者之身，示現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內，頭頭接物，處處利生，處處中無不歸依，在皇闕尋常教化。(維摩詰經講經文(一)253/767)

²⁵ “納”，《新書》84作“紬”，據《校注》改為“納”。“納袍”指“百衲衣”(《校注》947頁，注81)。

²⁶ “片”的用例不包括“片時”“片句”等中表示“短”義的用例。本文不把這裡的“片”視為量詞。

²⁷ 木津祐子(2014)已經指出，《朱子語類》中的/個/不和數詞搭配的情況較多。

摩詰經講經文(四)330/867)

(55) 瞽叟喚言舜子：“阿耶暫到遼陽，遣子勾當家事，緣甚於家不孝？阿孃上樹摘桃，樹下多埋惡刺，刺他兩腳成瘡，**這個**是阿誰不是？”（舜子變 952/201）

“片”缺少數字的情況較少，只有如下 2 例。

(56) 若得**片雲**遮頂上，楚將投來總安存，唯有季布鍾離末，火炙油煎未是迍。（捉季布傳文一卷 991/92）

(57) 上無**片瓦**可亭居，自長身來一物無，八節夫妻嘔咒願，只求富貴免軀貧。（不知名變文(一) 803）

5. 結論

唐五代的敦煌變文中的名量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表示為前置詞序的前置優勢類，另一類是表示為後置詞序的後置優勢類。二者在語義功能上的區別在於，前者具有賦予名詞[形象]或[屬性]的語義功能，而後者則沒有這種語義功能。前置優勢類之所以一般表示為前置詞序，是因為前置詞序具有[個別性]較高的這一構式語義特徵，且前置優勢類所具有的“賦予[形象]或[屬性]”的語義功能都帶有提高[個別性]的作用。本文這一結論和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2006)的看法並不矛盾，可以說本文是在吳福祥等(2006)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每個名量詞的語義功能和數量名結構的構式語義之間的具體對應關係。

最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一個名量詞屬於前置優勢類還是後置優勢類的這一現象會因歷史時期不同而有差別。本文僅對敦煌文獻中八個量詞進行了考察，所以上述結論充其量是對量詞歷時發展問題提出了初步的推定而已，今後還需要對每個時期、對更多量詞進行系統性的調查和研究，才可以判斷本文的假說是否合理。這一工作有待將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引書目錄〉

說文解字：《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漢書：《漢書》（二十四史縮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敦煌變文：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書》（上、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4年版。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8 冊、第 17 冊、第 2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001年、2002年。

（古寫本掃描版）拇指數據庫《敦煌變文》（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大河內康憲 1985「量詞の個体化機能」，《中國語學》232 号，1-16 頁。

太田辰夫 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木津祐子 2014「不定指稱としての“一箇”の成立前史」，《中國語學》261 号，46-63 頁。

西光義弘 2004「類別詞と認知様式の相關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西光義弘、水口志乃扶編『類別詞の対照』23-38 頁。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橋本永貢子 2014『中國語量詞の機能と意味—文法化の観点から—』。東京：白帝社。

松江崇 2014「唐五代における不定名詞目的語の数量表現による有標化—敦煌變文を主資料として—」，《中國語學》261，26-45 頁。

陳紱 2002《從“枚”與“個”看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語言研究》2002 年 1 期，33-35 頁。

洪誠 1963/2000《略談量詞“个”的語源及其在唐以前的發展情況》，《南京大學學報(人文

- 科學)》1963年第2期,收錄在《洪誠文集》,139-14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戶內俊介 2022《殷商汉语数量表达研究—兼论汉语个体量词的起源》,ICSTLL-55 發言稿(2022年9月16日,於京都大學)。
- 李建平 2016《隋唐五代量詞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李建平 2017《先秦兩漢量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世儒 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 2006《漢語“數+量+名”格式的來源》,《中國語文》2006年第5期,387-399頁。
- 向熹 2010《簡明漢語史》(修訂本)(下)。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彤偉(2005《量詞“頭”源流淺談》,《語言科學》2005年第4卷第3期,68-73頁。
- 姚振武 2009《上古漢語個體量詞和“數+量+名”結構的發展以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第二輯,164-177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游黎 2018《唐五代量詞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游順釗 1988《從認知角度探討上古漢語名量詞的起源》,《中國語文》1988年第5期,361-365頁。
- 張顯成·李建平 2017《簡帛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張楨 2012《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studies in typology and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茶を淹れる動作」

荒木 典子

要旨『金瓶梅詞話』の「茶を淹れる」動作（抽出する動作）を表す動詞には、“點”を筆頭に複数の種類が存在する。劉 2002 はその理由を、本書に「宋人茶」と「明人茶」の特徴が混在しているためだとする。これらの動詞は作品内での分布や文法的ふるまいに偏りがある。字義通りの動作を表すならば、淹れ方の違いに応じて使い分けられているからだと言えるが、原因はむしろ本書の成立事情にある。本論文では主に“點”、“頓”の用例について、表される動作が抽象的な「活動」なのか具体的な「事件」なのか（沈 1995、石・李 2004）、共起する語法成分を参考に検討し、本書にみられる語彙の歴史的变化の痕跡を明らかにする。

キーワード 金瓶梅詞話 茶を淹れる動作 内部差異 有界 無界

1. はじめに

明代萬曆 45(1617)年の序を持つ『金瓶梅詞話』には、飲食の描写が非常に多い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喫茶の描写も多い。¹喫茶の場面において「茶を淹れる（抽出する）動作」を表す動詞には以下のものが見られる。（ ）内は用例数である。²

點(33),頓(28),煮(5),泡(3),燒(3),烹(4)

2. “點”

用例数：33

用例の見られる章回：

2,3,4,6,11,37,39,43,50,51,52,54,72,73,74,75,79,81,85,86,87,89,99

2.1 “點”が表す茶の抽出の動作

劉学忠 1999:77 で、時代ごとの“烹法”（茶の淹れ方）を以下のように紹介している。

唐代煎茶、宋代点茶、明代泡茶、这是古代茶在烹法上的三个基本阶段。³

¹ 有人曾做过统计,《金瓶梅》中提到茶的多达 629 处,这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空前的现象,可见饮茶之普遍。(郭孟良 2002:129)

² 収集した用例は“茶”を目的語に取るものに限るが、目的語は動詞に後置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動詞に前置、あるいは、これらの動詞が含まれる文よりもっと前の部分で提起される場合も用例数に含めた。

³ “點茶”以外の淹れ方は以下の通り。“煎茶”は、加工した茶葉を固めた餅茶、団茶を、飲むときに削って粉末にして煎じる(陳 1998:42)、“泡茶”は“散叶茶”(固めていない茶葉。リーフ・ティー)に熱湯を注ぐ(陳 1998:42、王・呉・呉 2009:22)。

『金瓶梅詞話』の成書年代は明代だが、舞台は宋代であるため、「宋人茶」「明人茶」の特徴が混在している（劉 2002:37）ため、茶を抽出する動作として“點”が見られる。とはいえ、方法まで宋代と同じだろうか。

劉 2002:38 によれば、“點”は粉末にした茶葉を湯呑みに入れてから熱湯を注ぎ、“擊拂”「擊払」する動作だという。布目 1989:213 は、これを以下の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

唐末のころの人、蘇廙の『十六湯品』には、「湯を注ぐ」ことが見えるから、唐末には茶碗に湯を注いで、茶を点てることが始まっていたらしい。茶末（筆者注：固形茶をすって粉にしたもの）の量は一錢（約三・七グラム）、これを茶匙ですくって入れ、ちょっと湯をいれて、むらのないように掻きまぜ、また湯を入れ、かきまわして「擊払」する。擊払は強くかき廻すことである。まだこの時には茶筴はないので、匙で擊払する。

茶葉の形態および抽出方法は時代によって異なる。明代には、固形茶よりも葉の形を保持した茶葉が主流になり⁴、抽出方法は熱湯を注ぐ方法が主となった。⁵そのため『金瓶梅詞話』（中華書局,1991年）では“點茶”を以下のように定義している。（例文は省略）

①本为烹茶。这里指沏茶；泡茶。点，烹茶方法。②拿点心配茶。⁶

（①本来は“烹茶”である。ここでは“沏茶”、“泡茶”〔茶葉に熱湯をかけ茶を淹れる〕を指す。“点”は茶を淹れる方法。②菓子茶を茶請けにする。）

『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1997年）でも“沖茶，泡茶。”とする。つまり『金瓶梅詞話』の“點茶”は、宋代の「擊払」をする抽出方法ではないと解釈されている。

2.2 “點”の用例の分類と分布

33例の用例すべてにおいて、“點”は述語動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點”を用いた述語フレーズを、単純な動賓構造(VO)と、動詞あるいは目的語に付加成分が付く形式の二つに分けてみたところ、形式と作品内における分布に相関関係が見られた。

まず、用例の分類を示す。

A.単純な動賓構造(VO) 10例

1)迎春打掃房裡，抹淨桌椅，燒香點茶。(54/11b-6)⁷

⁴ 尤も、布目 1989:206 によれば、宋代には既に片茶（固形茶、ケーキ・ティー）散茶（葉茶、リーフ・ティー）の二大別が存在していた。なお、明代にリーフ・ティーに熱湯をかける抽出方法が盛んになった理由は、明の太祖洪武帝だったらしい。洪武帝は茶どころの出身であるため、農民が手間のかかる餅茶、団茶の製造に苦勞し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洪武 24 年、宮廷に献上する龍団（団茶の表面に龍の図案をあしらったもの）の製造を停止し、若芽で作った茶を献じるように命令を出した。（王・呉・呉 2009:22、布目 1989:236）

⁵ 注 3 を参照。

⁶ ②が茶を抽出する動作から派生したものかどうかは待考。

⁷ 巻数、葉数、表裏、行数を表す。

- (迎春は部屋を掃除しテーブルや椅子をきれいに拭き、香を焚いて茶を淹れた。)
- 2) 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72/10b-7)
(急いで春梅に茶を淹れさせ彼[西門慶]に飲ませた。)
- 10 例中 2 例は「茶請けの菓子を出す」意味である。
- 3) 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39/9b-10)
(各人に二箱ずつ上等の茶菓子を茶請けとして出した。)
- B.A 以外のものはすべてこちらに分類した。下位分類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 B-1. 動詞に、数量詞の付いた目的語“茶”が後置する。(V+num+“茶”) 3 例
- 4) 不多時, 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2/10a-1)
(ほどなくして二杯の濃い茶をテーブルの上に置いた。)
目的語“茶”に更に修飾語が付く例もこのグループに入れた。
- 5) 那婆子…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 與婦人吃了。(3/6a-8)
(王婆は…すぐに濃く淹れた一杯の胡桃と松の実の入った「泡茶」⁸を淹れ、潘金蓮と飲んだ。)
- B-2.B-1 に、単純方向補語“來”⁹が後置する。(V+num+“茶”+“來”) 4 例
- 6) 乾娘, **點**兩杯茶來我吃。(2/9b-11)
(おばさん、お茶を一、二杯淹れてきてくれ、飲みたい。)
- 7) 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 兩個吃了。(3/7b-5)
(王婆はすぐに茶を一杯入れてきて、二人で飲んだ。)
- B-3. 動詞に、目的語“茶”、単純方向補語“來”が後置する。(V+“茶”+“來”) 8 例
- 8) 連忙**點**茶來吃了。(4/3b-5)
([王婆は] 急いで茶を淹れてきて [西門慶に] 飲ませた。)
- 9) 玉簫**點**茶來吃。(43/1a-11)
(玉簫が茶を淹れてきて [西門慶に] 飲ませた。)
- B-4. 動詞に、“了”と目的語“茶”が後置する。(V+“了”+“茶”) 1 例
- 10) 虔婆…一面**點**了茶, 一面下去打抹春檯, 收拾酒菜。(11/10a-3)
(やり手婆は…お茶を淹れたり、下がって机を拭き酒肴を整えたりした。)
- B-5.B-4 の目的語“茶”に更に数量詞が付いている。(V+“了”+num+“茶”) 3 例
- 11) 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 遞與他。(37/6b-2)
(潘金蓮はすぐに濃い茶を一杯淹れ西門慶に飲ませた。)
目的語“茶”に修飾語が付く例もこのグループに入れた。
- 12) 婦人…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 雙手遞與武松吃了。(87/6b-10)
(潘金蓮は…また一杯の濃いスイカの種の入った「泡茶」を淹れた。両手で武松に渡して飲ませた。)
- B-6.B-4 に、単純方向補語“來”が後置する。(V+“了”+“茶”+“來”) 1 例
- 13) 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51/13a-10)
(春梅は本当に茶を淹れて持ってきた。)
- B-7. 動詞に、目的語“茶”、複合方向補語が後置する。(V+“茶”+C₁+C₂) 1 例
- 14) 王六兒**點**茶上來。(99/1b-10)
(王六兒が茶を淹れて来た。)

⁸ 名詞用法。茶の種類。後述。

⁹ 方向補語ではなく連動文ととらえたほうがふさわしそうな例文もあるが、判断の基準が定まらず「V (+α) +“茶”+“來”」の“來”はすべて動詞の方向補語とした。

B-8.動詞に後置した複合方向補語の間に目的語“茶”が割って入る。
(V+C₁+“茶”+C₂) 1例

15)長老連忙點上茶來。(89/7a-10)

(長老は急ぎ、茶を淹れてきた。)

B-9.動詞に、複合方向補語が後置する。(V+C₁+C₂) 1例

16)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¹⁰水坐在火上,使他搗了些炭在火内,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73/17b-8)

(春梅は急いで湯沸かしに汲んだ水を火にかけた。彼女[秋菊]に炭を持って来させて火にくべさせ、しばらくすると湯が沸いた。湯呑みをきれいに洗い、[茶を]濃く淹れ、女[潘金蓮]に手渡した。)

A(10例),B(23例)それぞれの用例が、作品内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分布していたかを説明する前に、この作品そのものの構成に触れておきたい。『金瓶梅詞話』はその成立事情から、全体を少なくとも三つ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その三つの部分は少しずつ違う時期の言語を反映している。

I.第1~6回:『水滸伝』武松故事に由来する部分。底本となった版本は未確定だが、物語の都合上少し設定を変え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

II.第53~57回:沈徳符『萬曆野獲編』の記述から、この部分は早い時期に失われ、現在見られるのは後から別人が補作したものとされる。ほかの部分と比べると語彙や文法に違いがあるという指摘が数多くある。¹¹

III.以上二つを除いた部分:ここもさらに細かく分けられるという説もある。¹²

単純に成立時期で並べるとI>III>IIになる。これらは合わせて刊行される時に全体を見直し、整えた可能性は当然あるが、先行研究において文法や語彙の不統一性が指摘され、それはしばしば三つの箇所基礎方言の違いや成立のタイムラグと関連付けられる。¹³今回は試みに、先ほどのA,Bの用例が、この三つの箇所のどこに多く表れるかを表1にまとめてみた。

表1

	A	B	計
I	0	9	9
II	1	0	1
III	9	14	23

¹⁰ “銚”は、原文では旁が異なる。排印本により改めた。“子”も原文では“了”であるが排印本により改めた。“銚”は湯沸かし器のこと(布目1989:244)、これに接尾辞“子”がついたものであろう。

¹¹ 朱徳熙1985、荒木2007ほか。

¹² 地藏堂1993。

¹³ 例えば伊原1994では、『水滸伝』由来の冒頭部(第1~6回)と補われた中央部(第53~57回)を南方系の言語(あるいは南方系作品の文体)を反映する部分、そうでない部分を、北方語を反映する部分と考え、いくつかの語彙・語法の偏在を示し、南北の言語の特徴、新旧言語の差異がその要因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

33 例中 9 例、三分の一弱が、6 回分しかない I にある。かつ、すべて B の用例である。用例が多いのは、主に茶店で物語が進むからであるが、抽出を表すのはすべて“點”で、後で述べる別の動詞が出てこない。II は 1 例のみ、A の用例である。III も B の方が多いが、I では 0 例だった A の用例が見られる。

続いて、単純な動賓構造の A、動詞や目的語に付加成分を伴う B の形式上の違いが意味するところを考えるために、沈 1995 の概要を示す。

- ・人間の認知には「有界」と「無界」の対立がある
- ・名詞の「有界」とは、一定の空間を占め、一定の境界を持つ個体であること、動詞の「有界」とは、時間軸において起点と終点があること。
- ・現代漢語ではそれが文法的手段によって表示される。有界化を示すマーカが存在する。名詞のマーカは、数量詞、指示代名詞、または名詞自体が固有名詞であること、動詞のマーカは、間接目的語、結果補語、方向補語、完成・実現の“了”。
- ・有界化された動作を「事件」(event)、されていない動作を「活動」(activity)と呼ぶ。
- ・動詞と目的語を組み合わせる場合、動詞が有界化されていれば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も有界化されていないと文終止ができない。
- ・動詞にマーカがなくても名詞が有界化されていればそれは「事件」である。(形容詞＋名詞の組み合わせにも「有界」「無界」の概念が影響するがここでは省略する)

石・李 2001:158-166 では、宋元以降、述語動詞に構造の変化が生じたことがきっかけで、およそ 15 世紀ごろには新しく、アスペクトマーカ、量詞、結果補語という三大文法範疇が誕生し、現代漢語の有界性成分が持つ文終止への機能へと発達していったとする。これら三大文法範疇は沈 1995 で動詞の有界化のマーカ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金瓶梅詞話』は 17 世紀初めには成立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アスペクトマーカ、量詞、結果補語という三大文法範疇がふんだんに見られる。しかし、有界、無界の概念の表出が現代と全く同じであるかと言うとそれほど厳密とはいえない。動詞が有界化されていたら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も必ず有界化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けない、さもないと文終止ができない、とは必ずしもいえないからである。動賓構造ではないが、関連する例を挙げる。「物に働きかけ結果としてどこかに置く」ことを表すのに、現代漢語では普通、処置式を使うことが多いが、「V＋O＋“在”＋場所」という形式を用いることもある。ただし、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が不定でかつ数量詞をとまなうという条件が必要である。例文で示すと以下のようなになる。

*写名字在上头

*写这个名字在上头

写一个名字在上头

この形式の成否も動作の有界性と関係がある。「“在”＋場所」は、動作の終点を示す(そこへ到達すればこの動作は終了する)、つまり有界化されている。だから動詞の目的語である名詞も有界化さ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定、不定

の問題は今回除外する)。「V+O+“在”+場所」は『金瓶梅詞話』に 88 例あり¹⁴、うち 39 例が裸名詞である。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は有界性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制限はないのだ。¹⁵

今回の“點”の例の中でも、動詞には“了”や方向補語が後置しているのに“茶”は裸名詞、という例が複数ある。それで文終止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は、白話小説の文体は切れ目がわかりにくいため判別がしにくいことも多いが、少なくとも動詞が有界化したらその目的語の名詞も必ず有界化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ほど厳しいルールは『金瓶梅詞話』にはないようだ。

以上を踏まえて先ほどの“點”の用例の分類を見てみると、グループ A は動詞も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も有界化していない(「活動」を表す)、グループ B は動詞と目的語となる名詞の両方あるいはどちらかが有界化している(「事件」を表す)。言い換えれば A で表される「茶を淹れる」は抽象的、概念的なものである。例えるならば日本語の「お茶くみ」である。対して B は具体的な個別のできごとを表す。¹⁶このことを表 1 に書き足したのが以下の表 1'である。

表 1'

	A(無界)	B(有界)	計
I	0	9	9
II	1	0	1
III	9	14	23

“點”は I において専ら「事件」すなわち個別の「茶を淹れる」ことを表すのに用いられる。IIには 1 例、一般的な「活動」を二つ並べた“燒香點茶”しかない。この部分については後述する。IIIは、「事件」の用例の方が多いが「活動」も 9 例ある。つまり III の言語体系では、“點(茶)”が概念的に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増えている。IIでは概念的にしか用いられない。宋代の茶について使われていた“點茶”は III および II の体系ではさらに古いもの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¹⁴ 荒木 2005:245。動作の進行を表す「“在”+場所+V+O」に書き換えられるものや、V が“有”、“留”などで、兼語式として成立するものを除く。

¹⁵ 荒木 2005。

¹⁶ 木村 2014:78 で、無界、有界の形式によって表される動作の抽象、具体の区別を端的に説明している。

周知のとおり、動作・行為を表す一般動詞は、辞書形、すなわち無標のかたちでは、個別・具体の動作の言及に適さない。例えば動詞の“扛”がアスペクト助詞の付加もなく、様態表現の修飾も受けずに、無標の形で用いられている(22)の文は、経常的行為として、すなわち、職業として「荷担ぎ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ており、特定の時空間における個別・具体のアクチュアルな動きを語ってはいない。

(22)我爸爸在农场扛麻袋。(お父さんは農場で荷担ぎをしています。)

(中略)

職業、習慣あるいは習性として繰り返し行われる経常的な行為とは、主体にとっての一種の属性的な存在であり、個別・具体のアクチュアルな存在ではない。つまりは、知識的、概念的な存在であって、知覚的、実体的な存在ではない。(引用ここまで)
本文で例として挙げた「お茶くみ」は習慣と位置付けられる。

3. “頓”

用例数：28

用例の見られる章回：7,12,22,23,24,29,37,39,46,50,52,73,74,75,91,95

3.1 “頓”が表す茶の抽出の動作

前述の劉 1999:77 では、明代の茶の淹れ方を“泡”で代表しているが、本作品において“點”に次いで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は“頓”である。“頓”は“燉/炖”に通じ、食材などを鍋に入れ火にかけて、あるいは湯煎して、加熱する動作を表す。『金瓶梅詞話』をはじめとする明代の作品でも“飯”、“羹”、“水”などを目的語に取る例が見られる。“茶”の場合、“頓”とはどのような抽出方法を表すのだろうか。明代以降、葉茶に熱湯を注ぐ方法が始まったといわれるが、劉 2002:38 によれば、これと同時に当時流行した方法に“頓,煮,熬,煨”があり、水と茶葉をポットに入れて火にかける方法だという。¹⁷

3.2 “頓”の用例の分類と分布

28 例のうち、多くが“頓”を述語動詞に用いている。連体修飾語に用いる場合もある。“點”と同様に、単純な動賓構造(VO)と、動詞あるいは目的語に付加成分が付く形式に二分した。連体修飾語の用例は後者に入れてある。

A. 単純な動賓構造(VO) 6 例

17) 與他頓茶頓水, 做鞋腳針指。(23/12a-7)

(彼女[潘金蓮]のために茶を沸かし、湯を沸かし、靴を作り、裁縫をした。)

18) 也不搽臉了, 也不頓茶造飯了。(91/11b-9)

(化粧もせず、茶を淹れたり食事を作ったりもし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概念的な、家事の種類の一つとして、日本語の「お茶くみ」のように使われている。¹⁸

B. “頓”の後ろ、あるいは目的語“茶”の前に何らかの成分が付くもの 22 例

¹⁷ 目的語に“泡茶”[名詞]を取る場合もある。この時も煮出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今日茶是誰頓的?(24/10b-1) (今日のお茶は誰が淹れたんだ。)

この“茶”は文脈から“泡茶”とわかる。“泡茶”とは茶湯の中に香料や果実などを入れた飲み物の名称である。(劉 2002:36)。郭孟良 2002:131 では“大多为香花、果仁、芝麻、盐、姜等物入茶沸水冲泡而饮。”(多くの場合、香りのする花や果物のさね、ごま、塩、生姜などを茶葉と一緒にし、沸騰した湯を注いで飲む)とし、『近代漢語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では“用花朵、药材冲泡制成饮品;也指用干果、蜜饯等与茶叶一起沏泡。”(花や薬材に湯を注いで作る飲み物、また、ドライフルーツ、果物の砂糖漬けと茶葉と一緒にして湯を注いだものも指す)としている。『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1997)では“用茶葉或乾果等沏的茶。區別於白開水。”(茶葉、或いはドライフルーツに湯を注いで淹れた茶。白湯と區別される)とする。名称に“泡”とあるからには沸騰した湯を注ぐもので煮出すものでは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そうであるならば“頓”は「水と茶葉を火にかけて煮出す」ではなく「湯を沸かし、それを茶葉などに注ぐ」動作を表す場合もあるのではないか。日本語の「茶を沸かす」も同様な含意を持つ。麦茶などは実際に水と一緒に麦を煮出すが、煎茶などなら水のみを先に沸す。尤も、李佳瑜 2021:87-88 では“泡茶”を、茶葉とその他のものを煮出して作ると考えている。

¹⁸ 尤も、次の例のようにその場の状況が説明されると個別の事件に感じられる。

旋戩開爐子頓茶。(24・5a-9) (すぐに炉に火をおこし、茶を淹れた。)

“點”の用例よりも付加成分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が豊富で、分類すると煩雑になるので細かい下位分類は省略する。

“頓”に“了”や補語のつくもの

19)分付玉簫頓下好茶。(74/11a-10)

(玉簫に言いつけ、いいお茶を淹れさせようとした。)

“茶”に数量詞や定語がつくもの

20)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24/9b-2)

(今日はこんな茶を淹れて人に飲ませてしまった)

そのほか、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も入れてある。

21)是竈上頓的茶。(24/9b-2)

(台所で淹れた茶です。)

強調構文にも連体修飾語にも解釈できる。

22)你頓的茶不好。(24/10a-4) 連体修飾語

(お前の淹れた茶がまずい。)

様態補語を伴っている。

23)多著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73/17a-6) 様態補語を取る

(茶葉を多めに、苦くして私に飲ませなさい。)

“點”と同様に、これらの用例が作品中の三つの箇所どこに表れるか、有界・無界の区別も併せて表2にまとめた。

表 2

	A(無界)	B(有界)	計
I	0	0	0
II	0	0	0
III	6	22	28

茶の抽出を意味する“頓”はⅢにのみ現れ、「事件」を表す用例が多い。ⅠとⅡでは、茶の抽出の動作を表すのに“頓”を使わない。¹⁹伊原 1994:186では、(本発表でいう)ⅠとⅡの部分に共通して認められる要素を、南方系の言語(あるいは南方系作品の文体)において比較的長期間にわたって特徴的に保存され続けた語彙・語法と説明している。茶の抽出を表す“頓”については「使わない」ことが共通要素として認め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今回は『金瓶梅詞話』に三段階の時間軸があることを前提にしているが、さらに時間が進んだ先にあると言えるのが詞話本の改訂版とされる崇禎本である。詞話本のⅠの部分には、“頓”が“茶”を目的語に取る用例はないが“頓羹頓飯”(1/16b-5)ならある。これが、崇禎本の該当箇所では“頓茶頓飯”(2/2b-1)²⁰となっている。崇禎本の編者にとって“頓茶”は、抵抗のない言い回しになっていたようだ。

¹⁹ 『金瓶梅』の元となった底本が未特定なので絶対とは言えないが、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で『水滸伝』の“頓”を検索したところ、“茶”を目的語に取る用例は見られなかった。

²⁰ 崇禎本における巻数、葉数、表裏、行数。

4. 茶の抽出を表すその他の動詞

このほかにも用例は少ないが茶を抽出する動作を表す動詞がいくつか見られる。

4.1 “泡”

用例数:3

現代漢語でも、茶葉に熱湯を注ぐ意味で用いられている。前述の通り明代における主流の抽出方法を表す語彙だが、『金瓶梅詞話』には第 53、54 回に 3 例（付加成分あり 2 例、単純な動賓構造が 1 例）しかない。²¹つまり、I や III の部分の言語体系にはない語彙である。

24) 大娘來, 泡一甌子茶在那裏, 請坐坐去。(53/2a-5)

(奥さま、こちらへどうぞ。お茶を一杯淹れてありますから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

崇禎本『金瓶梅』ではこの 3 例をすべて削除するが、一方新しい用例を第 15 回に 1 例追加している。

25) 須臾泡出茶來, 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 陪着吃畢, ……(15/8b-8)

(茶を持ってきてから桂卿、桂姐がそれぞれ湯呑みを手渡し、付き合っ飲み終えた後、……)

第 53、54 回の 3 例が削除されたのは、物語の修正によるものであり、特にこの語を避けたものとは限らない。全く別のところに新たに増や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崇禎本の編者にとって“泡”を茶の抽出の動作に使うことはおかしな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のだろう。

4.2 “燒”

用例数:3

“泡”と分布の状況が似ている。現代漢語では、“烧飯”（飯を炊く）、“烧开水”（湯を沸かす）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る。『金瓶梅詞話』では“茶”を目的語に取るものが第 53 回に 2 例、54 回に 1 例（付加成分あり 2 例、単純な動賓構造が 1 例）見られる。崇禎本では物語の修正に伴い、これらの用例がすべてなくなっている。用例を 1 例だけ挙げる。

26) 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 教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 點些安息香在房裏。

(53/1b-9)

(李瓶兒は急いで髪をとかし、迎春をせきたてて茶を沸かせたり部屋に安息香を焚かせたりした。)

4.3 “煮”

用例数:5

現代漢語では“煮鸡蛋/面条/饺子”（卵/麵/餃子を茹でる）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る。『金瓶梅詞話』では、第 12 回に 1 例、71 回に 3 例、77 回に 1 例見られる。

27) 旋炊火煮茶, 伐草根喂馬。(71/17b-5)

²¹ 潘 1999:8 では、詞話本に 30 例近くも現れる名詞“泡茶”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から、詞話本においては茶葉に湯を注ぐ動作を“頓茶”、茶を湯呑みに注ぐ動作を“點”とするのに、この五回（第 53～57 回）の作者は（名詞の）“泡茶”を理解しておらず、湯茶を作る動作動詞だと誤用している、とする。

(すぐに火を起こして茶を沸かし、草を刈って馬に食べさせた。)

28) 煮出茶來。(71/17b-5)

(茶が沸いた。)

以下の2例は四字句の連続の中で用いられている。

29) 爐上茶煮寶瓶, 篆内香焚麝餅。(71/9a-9)

(炉では立派な瓶の中で茶が沸いており、香炉では麝香が焚かれている。)

30) 茶煮龍團²², 酒斟琥珀。(77/8a-9)

(茶は龍団を煮て酒は琥珀を酌む。)

4.4 “煮”

用例数:4

現代漢語では、「煮る」、「油でさっと炒め、調味料を加えて手早くからませる」の意味のほか、書面語では“烹茶”で「茶を沸かす、茶を入れる」の意味で用いられる。『金瓶梅詞話』では、茶を抽出する動作を表す用例が4例見られる。2例は、第21回、呉月娘が雪を集めて湯を沸かし、上等の茶を家族たちにふるまうときに用いられる。うち1例はこの回のタイトルの一部である。

31) 呉月娘掃雪烹茶。(21/1a-3)

(呉月娘が雪を掃き、茶を沸かした。)

32) 教小玉拿著茶罐, 親自掃雪, 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²³, 與眾人吃。(21/9a-11)

(小玉に甕を持たせ、彼女〔呉月娘〕自身は雪を掃いて取って、江南の鳳団雀舌という有名な茶を沸かして皆に飲ませた。)

高級な茶に合わせてほかの部分では使われない書面語的な動詞を使い、特別な場面であることを演出し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²⁴

後の2例は、四字句の連続の中に見られ、先の“煮”と状況が似ている。

33) 火邊茶烹玉蕊, 卓上香裊金猊。(72/16a-2)

(火の傍では玉蕊の茶が沸き、机の上では獅子の香炉から煙がゆらゆらと出ている。)

34) 酒汎金波, 茶烹玉蕊。(78/9a-8)

(酒は金波を泛べ、茶は玉蕊を煮る。)

5. 小結

本稿では、「茶の抽出」を表す動詞を例に、『金瓶梅詞話』という同一の作品の内部で観察される言語の通時的変化を報告した。調査の結果、“點”が減り、“頓”が増えたほか、“點”の運用の変化(付加成分を伴い具体的な「事件」を表す>抽象的な「活動」を表す方向へ)が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一方、用例は少ないが、“泡”、“燒”は、補作部分とその他の部分の言語を分ける指標の一つと言えるだろう。その後の崇禎本の編者も、少なくとも“泡”には抵抗を

²² 龍團：北宋時代、帝室用に龍や鳳凰の模かたにいて作った茶を龍団鳳餅茶と呼んでいた。ここでは上等な茶を表現しているだけかもしれない。

²³ 鳳團雀舌牙茶：“鳳團”は注22を参照。布目1989:210には「採んだ茶の最高のものを小芽という。雀舌・鷹爪ともいう」とある。小野忍・千田九一訳『金瓶梅』（平凡社、1972年）上巻p.250では「ここではそういう茶を飲んだという意味ではなく、茶の美称」と注釈している。

²⁴ 大野広之氏のご教示による。

感じなかった。以後、“泡”の現代に続く発展を裏付けるように、『儒林外史』、『岐路灯』、『紅樓夢』で“茶”を目的語に取る用例が見られる。一方“煮”、“烹”は文言的で用例が限られている。

〈使用テキスト〉

詞話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大安,1963年。(影印本)

劉本棟・校注、繆天華校閲『金瓶梅』(上・下)(第三版)三民書局,2007年(初版は1980年)。

崇禎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会校本)齊魯書社,2011年。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影印本)線装書局,2012年。(天津図書館蔵本の影印)

〈参照文献〉

【日本語】(日本語読み、五十音順)

荒木典子 2005. 「“VO在L”の動詞賓語と数量詞—『金瓶梅詞話』と現代漢語の対比を中心に—」, 『中国文学研究』, 第31期:242-254。

荒木典子 2007.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疑問副詞“可”」, 『中国語学』, 第254号:181-198。

伊原大策 1994. 「《金瓶梅》における言語の同質性と異質性」, 『筑波大学言語文化論集』, 第38号:185-196。

木村英樹 2014. 「“指称”の機能—概念、実体および有標化の観点から—」, 『中国語学』, 第261号:64-83。

地藏堂貞二 1993. 「《金瓶梅》の言語—その分布について」, 『中国語研究』, 第35号:81-91。

布目潮風 1989. 『緑芽十片 歴史にみる中国の喫茶文化』, 岩波書店。

【中国語】(日本語読み、五十音順)

王東明, 吳細卯, 吳小芹 2009. 「宋元明清時代中国茶文化發展過程的研究」, 『黃岡職業技術学院学報』, 第3期:21-23。

郭孟良 2002. 「《金瓶梅》与明代的飲茶風尚」, 『明清小説研究』, 第2期:128-136。

朱德熙 1985. 「漢語方言里的兩種反復問句」, 『中国語文』, 第1期:10-20。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無界」, 『中国語文』, 第5期:367-380。

石毓智, 李訥 2004. 『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陳偉明 1998. 「雜談《金瓶梅》与明代茶文化」, 『農業考古』, 第2期:42-68。

陳平 1987. 「釋漢語中与名詞性成分相關的四組概念」, 『中国語文』第2期:81-92。

潘承玉 1999. 『金瓶梅新証』, 黄山書屋。

李佳瑜 2021. 「《金瓶梅詞話》中的飲茶習俗」, 『書屋』第8期:86-88。

劉学忠 1999. 「試論《儒林外史》与明清茶文化」, 『古籍研究』, 第3期:73-132。

劉学忠 2002. 「論《金瓶梅》与中国茶文化」, 『阜陽師範学院学報(社会科学版)』, 第6期:36-40。

(『雲漢』1号, 2023年3月26日)

日中近代訳語における「日中欧分業型訳語」

李瑶

提要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译词中，有一部分与古代汉语、日本汉字词都有很深的纠葛。本文以“思想”“资料”等44个经日回流的传教士译词为考察对象，考察其词义、词结构、词性和使用率的历时变化后，发现难以判断这些词词源的问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词源判断难点，本文提出“中日西合作译词”的概念，旨在客观评价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完成语词对译上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重视日语在借入该词后对之注入的新概念以及普及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 来华传教士 日本汉字词 中日西合作译词 词源

1. はじめに

近代¹中国語（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初めの中国語）の時期には、西洋の新概念を翻訳するために、新たな訳語が大量に作られた。それらの訳語の一部は西洋宣教師²が当時の中国の学者と協力しながら古典中国語を基に造語し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そういった語のすべてがそのまま中国語で常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ではない。中には漢訳洋書を通して日本語に入り、幕末明治初期の学者に借用され、新たな意味を与えられてから、或いは日本語の中で普及した後、中国へと逆流入したものもあった。これらの語は、まず中国語において語義、語構造や品詞などの面で古典中国語と異なるものへと変化し、その後、日本語に受容され、さらにもう一度、語義・語構造・品詞または使用頻度の点での変化を生じた。換言すれば、この種の語は古典中国語、西洋宣教師による造語、日本漢字語という三種の要素と関連している。そのため、その語源、或いは近代以降に生じた新しい意味の出处を特定すること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

本稿は、以上のような複雑な背景をもつ西洋宣教師による造語を研究対象として、「思想」「資料」など44語を考察した結果を踏まえ、「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という概念を提案するものである。在中西洋宣教師が西洋の概念・物事を中国語に翻訳した際に工夫をこらしたことを確認すると同時に、日本語がそれらの訳語を借用した後に、さらに新たな意味を与えたことにも注目する。そして現代中国語で使われる意味が生じた時点からそれが普及するに至る過程で、在中西洋宣教師と日本語の双方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たことを主張した上で、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作られた訳語の語源判定の問題点について私見を述べたい。

¹ 中国語の年代区分については研究者の見解は必ずしも一致をみていない。一般には「上古」「中古」「近代」「現代」という四区分が設定されている。本稿で問題となる「近代」の年代上限と下限については、上限を晩唐五代、下限を清代中期にする立場が有力であるが、蔣紹愚・曹広順（2005）は、近代時期の言語にかかわる言語資料であれば、それよりもやや早い或いは遅い時期も近代中国語の研究範囲に収められるとする。本稿においても、「近代」はアヘン戦争から「五四運動」までの時期を指すこととし、「清末民初」と表現することもある。

² 本稿で言う「在中西洋宣教師」は時代によってカトリック宣教師と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に分けられる。それに伴い、明代末期（16世紀末）から清代の雍正帝による布教禁止（1724年）の時期にかけて発行されたマッテオ・リッチ（利瑪竇/Matteo Ricci）を代表とするカトリック宣教師と中国人協力者による著書と訳書を前期漢訳洋書という。19世紀初頭から日清戦争の時期にかけて発行されたモリソン（馬礼遜/Robert Morrison）をはじめとする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たちによる著書と訳書を後期漢訳洋書という。

2. 先行研究

本稿において「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に分類される語については、中国語の近代新語、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日本漢字語などの研究者がその語源を判定するとき、異なる結論に至ることが多い。

下表 1 で示されたように、本稿の研究対象である 44 語の状況もそうである。

表 1 語源判定が困難な 44 語

	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	日本語の影響 で普及した語	西洋宣教師の造語	中国古典語	判定が困難で あるもの
宇宙	松本 (1983) 杉本 (2005)		黄 (2010)	沈 (2019)	史 (2019) ³
運動	劉 (1984) 黄 (2010) 朱 (2020)	高野 (1983)	中山 (1998)	沈 (2019)	史 (2019)
気体	劉 (1984) 蘇 (2005) 黄 (2010)		沈 (2019) 朱 (1993)	朱 (2020)	史 (2019)
教師	沈 (2019)		黄 (2010) 佐藤 (2007)		
空気	中山 (1998)	荒川 (2018) 荒川 (2020)	黄 (2010) 沈 (2019)	Masini(1997)	
結晶	中山(1998)佐藤(2007)黄(2010) 荒川 (2018) 朱 (2020)		沈 (2019)		史 (2019)
原則	劉 (1984) 佐藤 (2007) 朱 (2020)		沈 (2019) 朱 (1993)		史 (2019)
細胞	劉(1984)惣郷(1986)中山(1998) 杉本(2005)佐藤(2007)朱(2020)	沈 (2012)	黄 (2010) 沈 (2019)		Masini(1997) 史 (2019)
西洋			黄 (2010) 沈 (2019)		斎藤 (1977) 佐藤 (1979)
思想	劉 (1984) 惣郷 (1986) 黄 (2010) 沈 (2019) 朱 (2020)				史 (2019)
視角	沈 (2019)				史 (2019)
視線	佐藤 (2007) 沈 (2019)		黄 (2010)	朱 (2020)	史 (2019)
視点	沈 (2019) 朱 (2020)				
資料	劉 (1984) 黄 (2010) 沈 (2019)		朱 (1993) 朱 (2020)		
周辺	佐藤 (2007)				史 (2019)
重点	劉 (1984) 沈 (2019) 朱 (2020)		黄 (2010)		
重力	惣郷 (1986) 中山 (1998) 杉本 (2005)	陳 (2019)	黄 (2010) 沈 (2019)		
小説	惣郷 (1986)	唐 (2007) 陳 (2019)	黄 (2010) 沈 (2019)		史 (2019)
審美	劉 (1984) 惣郷 (1986) 朱 (1993)		沈 (2019)	黄 (2010)	史 (2019)
新聞		斎藤 (1972) 佐藤 (2007) 周 (2007)	黄 (2010) 沈 (2019)		Masini (1997) 史 (2019)
全線					

³ 史有為 (2019) は日本製音訳語を「粵」というマークを付して日中間の借用関係があることを表し、語源を明記するのではなく、参考となる資料を提供するという形をとることで、語源についての断言を避け、さらなる研究の余地を示すことを意図している。

大学	Masini(1997)沈 (2019)		佐藤 (2007)		
投票	Masini(1997)朱 (2020)		沈 (2019)	黄 (2010)	
東洋		斎藤 (1977) 佐藤 (2007)	沈 (2019)		
動力	劉 (1984) 中山(1998)沈 (2019)	陳 (2019)	黄 (2010) 史 (2019) 朱 (2020)		
同意		沈 (2019)			
同情	劉 (1984) 朱 (1993)	沈 (2019)			
白熱	劉 (1984) 朱 (1993)		沈 (2019)		
発電			沈 (2019)	黄 (2010)	
反映	惣郷 (1986) 沈 (2019)		黄 (2010) 沈 (2008)		史 (2019)
反響	劉 (1984) 惣郷 (1986) 黄 (2010)		朱(1993)沈 (2019)		史 (2019)
反射	劉 (1984) 惣郷 (1986)		朱(1993)沈 (2019)	黄 (2010)	史 (2019)
必要	劉 (1984)		朱 (1993)		
表面	沈 (2019)		黄 (2010)		史 (2019)
病院	佐藤 (1980)		荒川 (2018) 沈 (2019)		
文学	さねとう (1960) 劉 (1984) 惣郷 (1986) 朱 (1993)	陳 (2021)	黄 (2010)	沈 (2019)	Masini(1997) 史 (2019)
文法	Masini(1997)	鄭 (1958)	黄 (2010) 沈 (2019)		
法学	Masini(1997) 沈 (2019)			黄 (2010) 朱 (2020)	
法律	劉 (1984)	沈 (2019) 李 (2018)		Masini(1997) 朱 (2020)	
民主	劉 (1984) 佐藤 (2007)	陳 (2019)	黄 (2010) 沈 (2019)		Masini(1997)
民族	黄 (2010) 沈 (2019)			朱 (2020)	徐 (2007) 史 (2019)
理科	Masini(1997)沈 (2019)		佐藤(2007)黄(2010)		
理学	惣郷 (1986) 沈 (2019)	陳 (2019)	黄 (2010)		
恋愛	朱 (2020)	柳父 (1982) 清地 (2016)	広田 (1969) 惣郷(1986)沈(2019)	黄 (2010)	

なぜこのように異なる結論が出された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は、これらの語の語義、語構成、品詞、文法機能について歴史的な考察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以下においては、そのような考察を行った後、これらの語の語源判定を困難にする要因となる問題点を指摘し、語源の再認識と語源判定の基準について私見を述べる。

3. 研究対象の抽出

まずは『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を『新明解国語詞典』（第5版）と対照し、その中から日中同形語を抽出した。その上で、先行研究の成果を整理したうえで、『漢語大詞典』『辞源』『近現代辞源』などの辞書、『中国基本古籍庫』『近代報刊庫』などのデータベース、前期及び後期在中西洋宣教師による漢訳洋書・新聞・英華字典、日本の蘭学⁴と英学

⁴ 日本の蘭学の全盛期は『解体新書』（1774年）の刊行から幕末まで約90年間続いた。蘭学書はカトリック宣教師の漢訳洋書にある語と造語法を受け入れると同時に、多くの漢字語を新たに作り出し

資料、日本語の大型辞書と歴史コーパスなどを参照し、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た 2647 語を認定した⁵。

次に、この 2647 語について、中国語における意味の変化を下図 1 で示した手順に従って考察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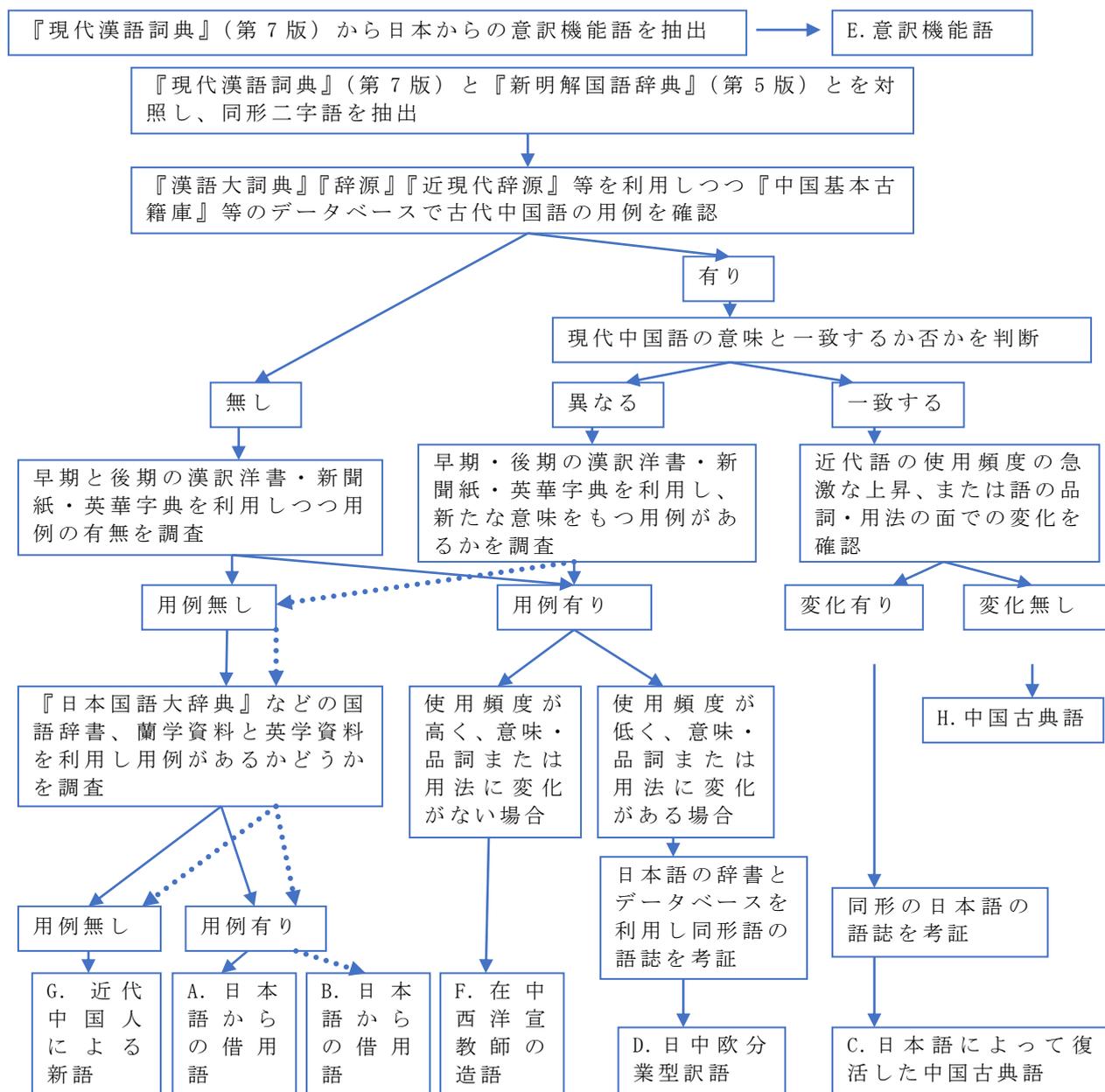


図 1 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た 2647 語の抽出方法

た。そして、蘭学者の造語は明治以降の学術用語にそのまま受け継がれたものが相当あることを考えると、明治期の造語を判断する際に、まず蘭学の文献にその語が存在しないことを確認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なる。

⁵ 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に関する研究資料及び研究対象の確定については、朱京偉 (2003 : 6-18) 「日中の語彙交流に関する研究資料」と沈国威 (2019 : 237-240) で示された図が参考になる。

上図 1 では、抽出した語は、日本語との関係から以下の三種類に分けられる。

第一種は、「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である。これは日本語から借用された漢字語⁶、語形或いは新しい意味が日本語において生じた語が含まれる。借用された日本語は「A.日本人が造語した漢字語」と「B.中国古典語の転用語」を含む。

第二種の「日本語の影響で普及した語」は C.日本語によって復活した中国古典語、D.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と E.意識機能語を含む。

第三種の「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ない語」は F.在中西洋宣教師の造語、G.近代中国人による新語と H.中国古典語を含む。

以上を要するに、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た 2647 語は、上述の第一種と第二種を含め、下表 2 のように分類される（具体的な語彙の出現頻度も補足した）。

表 2 日本語の影響を受けた 2647 語の分類

項目		語数
I.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計 2294 語）	A.日本人が造語した漢字語	1604
	B.中国古典語の転用語	690
II.日本語の影響で普及した語（計 353 語）	C.日本語によって復活した中国古典語	302
	D.日中欧分業型訳語	44
	E.意識機能語	7
合計		2647

これらのうち、語源判定の困難なものは小項目「D.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に属している。本稿はこの小項目に属する 44 語を研究対象にし、語義の歴史的変化を調査し、語源判定の基準について私見を述べる。その 44 語は、具体的には「宇宙、運動、気体、教師、空気、結晶、原則、細胞、西洋、思想、視角、視線、視点、資料、周辺、重点、重力、小説、審美、新聞、全線、大学、投票、東洋、動力、同意、同情、白熱、発電、反映、反響、反射、必要、表面、病院、文学、文法、法学、法律、民主、民族、理科、理学、恋愛」である。

4. 意味の歴史的変化の調査

これら 44 語について、意味、語構成、品詞の歴史的変化を考察した。個々の考察結果は、本稿末 7. に「付録：日中欧分業型訳語一覧（44 語）」に示した。その考察の結果を踏まえると、44 語が二種の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されることが知られる。以下においては、それぞれのカテゴリーの代表例を紹介する。

4.1 意味変化の影響が顕著な語：「思想」

本稿の考察の対象となる 44 語は、「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であり、すべて清末民初に日本語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そのなかの一類は日本語としての意味と一致するために、日本語の強い影響により新たな意味へ変化したと推定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もう一つの類は、意味変化は発生せず、日本語としての同形語を中国語に借用したことに伴って使用頻度が高くなり、現代中国語のなかで普及したものである。

⁶ ここでは、「漢語」「字音語」ではなく、「漢字語」という用語を用いる理由は次のようになる。まず、漢字を音読する語が必ず漢語かどうかと、そうとは限らない。「寿司」などの和語の当て字、「瓦斯」などの洋語の当て字、「旦那」など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の音訳語や「組合」などの普通に漢字で書かれる語も含まれる。本稿は以上のような語の総称として、「漢字語」という用語を用いる。

4.1.1 古代中国語の「思想」

古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思想」は動詞であり、語の意味は以下の三つの項目からなる。

① 想念（恋しがる）、懐念（懐かしむ）。足下去後、甚相**思想**（あなたと別れてから、とてもあなたが懐かしい）。応璩『与侍郎曹長思書』〔三国・魏〕

② 相思（思い続ける）。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阮三が家にいてひどく相手を思い続けて病気になるなんて思わなかった）。「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憤戳舌」『金瓶梅詞話』第三十四回〔明代〕

③ 思忖；考慮（考える）。那婆娘把東西收拾起、**思想**道：‘我把石家两个丫頭賤勾了，丈夫回来，必然厮鬧。’（その女は荷物を片付けて、「石さんの二人の娘さんを売ってしまったので、旦那が帰ったらきっと私とけんかになる」と考えた）。「兩県令競義婚孤女」『醒世恒言』第一卷〔明代〕

以上のような「思想」の品詞と意味は民末まで変わらなかった。しかし、現代中国語の「思想」は名詞であり、＜觀念・判断体系＞（例えば、「他的**思想**有点守旧（彼の思想は少し保守的である）」）または＜イデオロギー＞（例えば、「毛沢東**思想**」）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品詞と意味の変化はどのように発生したのだろうか。

4.1.2 清末民初の「思想」

明末以前には、上述の変化は発生していなかったが、清代中期以降の資料を調査すると、清末の新聞に見られる「思想」の品詞と意味は、現在使われているものとほぼ同じであることが知られる。以下の例を見られたい。

(1) 専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西洋文明の思想を導入することを趣旨とする）。「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第一号

例(1)の「思想」は名詞であり、＜イデオロギー＞を表す。

「思想」の品詞と意味の変化は、清末に起こった急な変化であり、他に多くの語が同じ時期に同様の变化を遂げているため、中国語内部における自律的な変化である可能性は低い⁷。清末の在中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辞書と創刊された新聞などの資料も調査を行ったところ、西洋宣教師のメドハースト（1847-48年）の『英華字典』の中で、「思想」が17ヶ所で用いられ、そのうちの一つは英語の名詞 *thought* の対訳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したがって、中国語の「思想」の品詞の変化、それに伴う意味の変化は最初に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しかし、注意すべきなのは、残りの16ヶ所では動詞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対訳された英語の項目は *to consider/ to intend/ to reflect/ to speculate/ to study/ to think/ to conceit/ to deem/ to imagine/ to muse/ to ponder* などの動詞である。

その後のロプシャイト（1866-69年）『英華字典』の状況もメドハースト（1847-48年）の『英華字典』と同様である。ただし、メドハースト（1847-48年）『英華字典』とは異なり、名詞 *thought* の訳語は「念頭、意思、想頭、意、心頭、心思、神思、心曲、意態」であり、「思想」ではない。ドゥーリットル（1872年）『英華萃林韻府』も同様に、*thought* の訳語に「思想」は用いられていない。また、当時の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創刊された新聞の中では、「思想」は古代中国語の品詞と意味を踏襲し、動詞として、＜考える＞という意味を表す。例えば、

(2) 再三**思想**，並無計策（何回考えても仕方がな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伝』1837年

⁷ 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は、李瑤（2020）を参照。

5月

以上のことから、清末の西洋宣教師が英語の名詞 **thought** の対訳として「思想」という語を、古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思想」から品詞と意味とを変更して用いたものの、それは一時的に出現しただけで広く使用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4.1.3 中国語に逆流入した日本漢字語「思想」

しかし、この新たな意味は日本語になかで出現・普及したのである。日本の明治時期の多くの漢字語は、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翻訳された漢訳洋書または編纂された英華字典から借用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る。井上哲次郎等編『哲学字彙』（初版 1881 年，再版 1884 年，三版 1912 年）も同じく英華字典の影響を受けた。『哲学字彙』の三種類の版全ての **thought** の訳語は「思想」となっている。名詞として中国語の中で広く使用されている「思想」は、英華字典を通して日本語に入ってから、日本語の中で普及したのである。

また、明治時期の日本語の「思想」は、＜観念・判断体系＞という意味も表す。例えば、

(3) 此れは是れ貴富人多数の持論なり、旨義なり、何の政治**思想**(シソウ)か有るや。
中江兆民『国会論』〔1888 年〕

まとめると、日本語の「思想」は英語 **thought** を対訳したほか、新たな意味も生じていた。そして、この意味変化は中国語より早かったのである。上述のように、中国語の「思想」の変化は清末に突然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り、品詞と語の意味は日本語のものと一致しているため、現在中国語で使われている「思想」は、清末に日本語から借用されたものと推測できる。ただし、借用された日本漢字語「思想」は、その意味が確定する過程において、西洋宣教師の造語の影響も受けた。また、西洋宣教師が造語した「思想」は古代中国語の動詞「思想」の品詞と意味を変えたものである。

4.2 使用頻度の影響が顕著な語：「資料」

次は、二つ目のカテゴリである使用頻度の影響がより顕著であった語に属する「資料」を例としてとりあげる。

4.2.1 古代中国語の「資料」

古代中国語における「資料」の用例は見られない。最初の用例は、明代の在中西洋宣教師の漢訳洋書にある。

(4) 先観物、観事、観人、観時勢、而習覚道理以相質、所謂種種議論之**資料**是也（まずは物、事、人、時勢を観察し、その中の道理を発見する。いわゆる各種の議論の資料とはこれらのことである）。アレーニ『西學凡』第 530 頁〔明代〕

ところが、筆者が『中国基本古籍庫』で「資料」を検索したところ、明代末期まで、上述の用例しか見つからなかった。明代までの中国語においては「資料」という新しい語がまだ常用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と推測できよう。

4.2.2 清末民初の「資料」

清末民初の新聞などでは、「資料」という語がよく見られる。

(5) 本論所徴引之**資料**多出日本獨立評論（本論で引用された資料の多くは日本独立評論から出典する）。「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新民叢報』第二十六號

筆者は『申報』で「資料」の用例を調査したが、1895 年以前の用例は探し出せなかった。つまり、清末になっても、日本語からの借用が増加した時期以前には、この語は常

用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4.2.3 日本漢字語「資料」

日本語の「資料」は明治初期にはすでに広く使用され、＜何かをするための材料。特に、研究や調査などのもとになる材料。もと。＞という意味を表している。

(6) 鎌倉時代の諸書中にも智慧を進むるの「資料」に至りては殆んど之を欠くと雖も。田口卯吉「四・八」『日本開化小史』〔1877～82年〕

この用例から、「資料」の意味は中国語の「資料」と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る。幕末の漢訳洋書の輸入に伴い、そのなかの漢字語が日本語に借用されたことは多くの学者によって考証されている。そして、明治時代に入ると、それらの多くが日常的の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それにも関わらず、中国語の「資料」は在中西洋宣教師に造語されたが、当時は普及しなかった。清末民初に入ってから、日本語の「資料」の借用に伴い普及したと考えられる。

5. 語源及び語源判定に関する諸問題

5.1 漢字語における「語源」の問題

一般にある語の語源を判定する場合、その語の語形、すなわち音形と意味との組み合わせに対応する語を、音韻の規則的变化を踏まえつつ、古文献ないし再構成された祖語のなかに見出す方法が採られる。しかし、本稿の研究対象である漢字語の場合、表示される漢字の組み合わせが一致していれば、一般に語形が一致するものとみなされる。漢字の一致は音形の一致を必ずしも意味しないが、漢字語の場合、音声言語のレベルではなく、純粋に書面語のレベルにおいて漢字の字形を媒介に語が伝播することがあり得るからである。よって本稿でも語源を検討する際は、漢字の一致を語形の一致とみなすこととし、漢字の組み合わせが一致したものにつき、意味面での対応を、歴史的・地域的な観点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になる。

5.2 語源認定の問題点

先に挙げた2語に加え、他の42語を検討すると、古代漢語に由来する近代訳語の語源の判定には困難が伴うことが知られる。主要には、以下の三点に整理される。

第一点は、新出の意味に関する問題である。この類の語は古代中国語でも用いられていたため、最初に西洋の新概念の対訳に用いた人物、或いは最初に出現した文献に出現を基準に語源を認定するならば、容易に問題が生じてしまう。先の2語のように、ある語が在中西洋宣教師の著作で新語の対訳に用いられたかのものであっても、実際には近代的な意味での使用ではなく、古代中国語での意味の枠内での使用であり、語の品詞や語構成なども古代中国語のものを継承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り得る。語の「新たな意味」をどのように認定するかという基準は明確ではない。

第二点は、意味変化の連続性に関する問題である。一部の語（「民族」「小説」「新聞」など）は、古代の意味と近代の意味との間に断絶が見出し難い。西洋宣教師が訳語を選択する際、中国人の受容度を考慮したため、しばしば当該の語の新しい意味と古い意味とは密接な連続性を備えており、明確には分離し難い。大凡の意味の出現を基準にすれば、その語を古代中国語に出典のある語とみなす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新たな意味の出現を基準にすれば、西洋宣教師によって西洋の新概念の対訳に用いられた以上、西洋宣教師の造語といってもよい。しかも、これらの語は日本語に借用され、日本語において

意味が変化し、その意味が定着してから中国語に逆流入したために、最終的な意味の定着という観点から、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と認定する立場もあり得る。このように、意味変化が連続しているために、語源を認定することはいっそう難しくなる。

第三点は、使用頻度と普及に関する問題である。西洋宣教師による造語のうち、一部のものは日本語に借用されてから大きな意味変化を生じなかった。しかし、これらの語は、もともと中国語では常用語ではなかったが、日本語に入ってから普及した後、清末民初にまた中国語に逆流入し、近代中国語において常用の新語となったものである。従って、これらの語は、普及の面で日本語からの影響を認め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ただし、使用頻度を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統計をとるかという問題が残されている。

5.3 本稿の語源認定の立場

在西洋宣教師の多くは中国語に精通していたが、翻訳する際には中国人の学者と協力しており、彼らが文章に手を加えることも多かった。このように造語されたものは、西洋宣教師と中国人協力者とが共同して作り出したものだと言える。一部の語はもともと中国人協力者の著作で用いられ、彼らの使用によって普及した。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語は外来語ではなく、一般に中国語の近代新語だとみなされている。本稿もこれに異を唱えるものではない。

5.2 で言及した語源認定に関する三つ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本稿は以下のような立場をとる。

第一点の新出の意味の認定については、朱京偉（1994）が中国語の新しい意味が日本語からきたと認定する基準を以下の三点にまとめている。すなわち、①新出の意味が必ず日本で発生していること、②新出の意味が短時間のうちに発生したものであり、連続した意味変化の結果生じたのではないこと、③新出の意味が古い意味に取って代わ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本稿はこれらの三つの基準に賛成した上で、以下の二点を補足したい。④語の意味が変わらなくとも、意味項目が減少すること、或いはその結果として一つの項目に固定されること、も新しい意味の発生だと見なす。⑤先に述べた「思想」の例のように、多くの語の意味変化は語構成または品詞の変化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ているため、新出の意味が発生したかどうかを認定する際、語構成または品詞の変化も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点の意味変化の連続性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に考える。最も早くその語を西洋の新たな概念の対訳に用いたのはどの人物か、ということだけから判断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新しい意味と古い意味の間の連続性を無視することはできず、新しい意味が定着するまでの全過程を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変化の過程の中における意味変化を引き起こした要因をすべて考慮すべきである。

第三点の使用頻度と普及について、使用頻度をどのように計量化すべきかということは、次のような点から着手できると考える。まず、古代中国語のデータベースや、漢訳洋書と英華字典などを利用し、その用例数を検索し、近代の日本語を大量に借用した近代時期の資料を集めたデータベースでの検索結果と比較し、その数量の差が大きければ、当該の西洋宣教師の造語が普及する過程において、日本語が大きく作用し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語の文法機能から判別する方法も考えられる。つまり、ある西洋宣教師の造語が、同形日本語が借用された後に、その語が用法の上で一定の特殊性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その特殊性が日本語と一致している場合、その語は西洋宣教師と日本語との双方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たと言える。

6. おわりに

本稿は、上述の検討を踏まえ、「日本語借用語」「西洋宣教師の造語」以外に、日中間において在中西洋宣教師と中国の学者とが相互に影響を与えつつ造語した訳語を、「日中欧分業型訳語」と称し、独立した類として設けるべきだと考える。この類に属する個々の訳語の具体的な変遷過程を跡づける研究は、すでに先行研究により少なからず行われてきたが、総括的な研究は、語彙の変遷が複雑かつ多岐を極めているために十分には行われてはいなかった。本稿の意図は、漢字語の造語から普及までの過程における、西洋宣教師と日本語からの影響を、明確に位置づけるべきことを主張するところにある。

7. 付録 - 日中欧分業型訳語一覧 (44 語)

カテゴリ-1: 意味変化の影響が顕著な語

語彙項目	古代中国語 (出現時期・品詞:意味)	宣教師資料 (出現時期・品詞:意味)	日本語 (出現時期・品詞:意味)	現代中国語 (品詞:意味)
1-1 運動	後漢・動詞: ① 運行し移動する、② 動かす、③ 施行する、④ 巡り動く	清末・動詞: 同左	明治・名詞 (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 ① 時とともに変わって行くこと、② 健康の目的で、体を動かすこと、③ ある目的を達するためにいろいろな方面に働きかけること、④ 軍隊が移動すること	[同左]
1-2 空気	明代・名詞性フレーズ: 「天」と「地」の中間地帯 = 「空」の「気」	清末・名詞: 地球の大気の下層部分を構成する無色、透明の気体	① 幕末・名詞: 地球の大気の下層部分を構成する気体 ② 明治・名詞: 雰囲気	[同左]
1-3 結晶	無し	清末・動詞性フレーズ: 結晶体になる	① 幕末・動詞性フレーズ: 結晶体になる ② 幕末・名詞: 結晶体 ③ 明治・名詞: 愛、努力、悲しみなど、抽象的な事柄が積み重なって集まった結果	名詞: [同左 ②③]
1-4 原則	無し	明代・名詞: 原理、要旨	明治・名詞: 一般の現象に共通する法則	[同左]
1-5 思想	本稿 4.1 節を参照。			
1-6 視角	無し	明代・名詞: 目と対象物の両端を結ぶ二直線のなす角	① 幕末・名詞: [同左] ② 昭和・名詞: 観点、視点	[同左]
1-7 視線	無し	明代・名詞: 眼球の中心点と外界の見られる	明治・名詞: 見つめている方向	[同左]

		対象とを結ぶ直線		
1-8 視点	無し	清末・名詞：視線のそそがれるところ	①大正・名詞：[同左] ②昭和・名詞：物を見たり考えたりする立場	[同左]
1-9 周辺	無し	明代・名詞：数学で、円・多角形のような閉じた図形の外形を囲む曲線または折線	幕末・名詞：物のまわり	[同左]
1-10 重点	無し	清末・名詞：てこで重さを受けるところ	大正・名詞：①重心のかかる所、②大切にして注意すべき点	[同左②]
1-11 重力	前漢・名詞性 フレーズ:大きな力	清末・名詞：物体の重さ	幕末・名詞：地球の引力	[同左]
1-12 小説	後漢・名詞：ちまたで耳にするような、つまらない話	清末・名詞：novel の概念	明治・名詞：[同左] ただし西洋の文学形態の変遷を踏まえた上で、novel を最も進んだ段階のものとして、romance などの他の文学形態と明確に区別した上で、複数の原語に対応していた「小説」を novel に限定し、近代的な概念を注入したもの	[同左]
1-13 審美	無し	清末・名詞：Aesthetics の訳語。詳しく美しいもの	明治・名詞：Aesthetics の訳語。美を識別すること	[同左]
1-14 新聞	唐代・名詞：近頃聞いたこと、最近の社会の出来事	清末・名詞：①[同左]、②news の訳語	①幕末・名詞：news の訳語 ②明治・名詞：新聞紙のこと	[同左①] なお、清末民初に②の意味でよく使われている
1-15 全線	無し	明代・名詞：数学の線の一種	明治・名詞：①線路の全体、②戦線の全体	[同左]
1-16 投票	無し	清末・動詞：入札する	明治・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vote の訳語。選挙または議案を採決するときの方式	[同左]
1-17 動力	前秦・動詞性 フレーズ:力を使う	明代・名詞：移動する力	①幕末・名詞：機械などを動かす力 ②明治・名詞：ある行動を起こさせる原因	[同左]
1-18	無し	清末・名詞：物体が高温に	明治・名詞：①物体が高温に	[同左②]

白熱		温に熱せられると、白色光に近い光を放つこと	熱せられると白色光に近い光を放つこと、②最高潮に達した状態になること	
1-19 発電	無し	清末・動詞性フレーズ：ファックスを送る	明治・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電気を発生させること	[同左]
1-20 反映	無し	明代・動詞性フレーズ：逆に映る	明治・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光や色が反射して光って見えること	動詞：上部機関に報告する なお、清末民初に同左
1-21 反響	無し	清末・名詞：山びこ、こだま	①幕末・名詞：[同左] ②明治・名詞：ある出来事が世間に影響を与え、それに応じて出てくる反応や、一般の人々の意見・論議など	[同左②]
1-22 反射	唐代・動詞性フレーズ：振り返って射る	明代・動詞：光・電波・熱・音などが物の表面に当たって、反対の方向に進むこと	①幕末・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同左] ②明治・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医学で、意識とは無関係に一定の刺激に対して、一定の反応を示すこと	[同左]
1-23 必要	前漢・動詞性フレーズ：必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①清末・動詞性フレーズ：must、will の訳語、[同左] ②清末・形容詞/名詞：necessary の訳語。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こと）	明治・形容動詞：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同左]
1-24 民主	前秦・名詞：①君主、②官吏	清末・名詞：republic 或いは democratic の訳語	明治・名詞：「デモクラシー」の意味。一国の主権が人民にあること	[同左]
1-25 理科	無し	明代・名詞：哲学	幕末・名詞：物理、化学、生物、地学などの科目の総称	[同左]
1-26 理学	宋代・名詞：宋・明儒家の哲学思想	清末・名詞：フィロソフィーの訳語	①幕末・名詞：[同左] ②明治・名詞：自然科学。特に、明治初期の物理学の名称	[同左②]
1-27 恋愛	宋代・動詞：恋い慕う	清末・動詞：to love の訳語	明治・名詞（スルが付加された場合は動詞）：特定の異性に特別の愛情を感じて恋い慕うこと	[同左②]

カテゴリー2：使用頻度の影響が顕著な語

語彙項目	古代中国語 (出現時期：意味)	宣教師資料 (出現時期・使用頻度：意味)	日本語 (出現時期・使用頻度：意味)	現代中国語 (使用頻度：意味)
2-1 宇宙	①前秦：天地 ②前漢：軒下と棟梁 ③明代：時代	清末・低：天文学的には、すべての天体を含む空間	幕末・高：Universeの訳語、すべての天体を含む空間	高：[同左]
2-2 気体	①前秦：精力と体 ②南北朝：気の実体 ③宋代：文章のスタイル ④明代：人の気質と見た目	①清末・低：ガス体 ②清末・不明：同左	幕末・高：ガス体	高：[同左]
2-3 教師	①晋代：宗教上の指導者（仏教用語） ②元代：歌、劇、武術などの術を教える人	①清末・高：宗教上の指導者 ②清末・低：学校などで、学業を教える人	明治・高：学校などで、学業を教える人	高：[同左]
2-4 細胞	無し	清末・低：生物体を構成する基本単位	明治・高：①生物体を構成する基本単位、②ものごとを構成する要素の一つ一つ	高：[同左]
2-5 資料	本稿 4.2 節を参照。			
2-6 西洋	宋代：南海西方海中及び沿海の各地	明代・低：インド洋沿岸地域全体。或いはアフリカ、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の三州	幕末・高：日本や中国などから欧米の国々をさす総称	高：[同左]
2-7 大学	前漢：太学のこと。	明代・低：西洋の学校の対訳。最高等の学校	明治・高：学術の研究および教育の最高機関	高：[同左]
2-8 東洋	元代：中国東方の海中	明代・低：ハワイ付近の海中を「大東洋」、日本の東方海中を「小東洋」と称する	幕末・高：日本・朝鮮・中国・インド・インドネシアなどの総称	高：[同左]
2-9 同意	①前秦：思いや心を同じくすること ②後漢：意味が同じであること	清末・低：agreeの訳語	明治・高：他人の行為に賛成ないし肯定の意思表示をすること	高：[同左]
2-10 同情	①前秦：同一の性質 ②三国：思いや心を同じくすること	清末・低：sympathyの訳語	明治・高：他人の気持や境遇、特に悲哀や不幸を、その身になって	高：[同左]

	③前漢：志が同じであること ④唐代：共謀者		思いやること	
2-11 表面	元代：物の外側をなす面	明代・低：数学用語、物体や立体と空間との境界のこと	明治・高：① [同左]、②ものごとの外から見える様子	高：[同左]
2-12 病院	無し	明代・低：患者の治療をするための施設	幕末明治・高：[同左]	高：[同左]
2-13 文学	前秦：古典、古代の規範・制度など	清末・低：literatureの訳語	明治・高：[同左]	高：[同左]
2-14 文法	前漢：文書、法令など	明代・低：grammarの訳語	幕末・高：[同左]	高：[同左]
2-15 法学	南北朝：①見習う、②刑法の名称、法治の学	明代・低：西洋の法に関する科学	明治・高：法に関する学問の総称	高：[同左]
2-16 法律	①前秦：刑法、律令 ②元代：修業の戒律 ③明代：文章の創作ルール	明代・低：lawの訳語	明治・高：[同左]	高：[同左]
2-17 民族	宋代：家族の団体	清末・低：強い連帯感をもち、同じ文化を共有し、生活様態を一にする人間集団	明治・高：[同左]	高：[同左]

〈使用テキスト〉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文選』中冊第四十二卷,中華書局,第598頁

金瓶梅詞話：蘭陵笑笑生著・戴鴻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420頁

醒世恒言：(明)馮夢竜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頁

西學凡：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第7卷,鳳凰出版社,第530頁

〈参照文献〉

(日本語)

さねとう けいしゅう 1960.『中国人日本留学史』(1970年増補版)くろしお出版

広田栄太郎 1969.『近代訳語考』東京堂出版

斎藤毅 1972.「新聞名辞考」『参考書誌研究』

斎藤毅 1977.『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講談社

佐藤喜代治 1979.『日本の漢語：その源流と変遷』角川書店

佐藤亨 1980.『近世語彙の歴史的研究』桜楓社

柳父章 1982.『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書店

佐藤喜代治 1983.『講座日本語の語彙第9巻 語誌I』明治書院

佐藤喜代治 1983.『講座日本語の語彙第10巻 語誌II』明治書院

佐藤喜代治 1983.『講座日本語の語彙第11巻 語誌III』明治書院

高野繁男 1983.「医学用語における語基と基本漢字—『医語類聚』の訳語—」『人文学研究所報』,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松本宙 1983.「うちゅう(宇宙) あめのした(天下) せかい(世界)」『講座日本語の

- 語彙第9卷 語誌 I』佐藤喜代治編，明治書院
- 惣郷正明・飛田良文 1986.『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堂出版
- 中山茂 1998.「近代西洋科学用語の中日貸借対照表」『科学史研究』日本科学史学会編集
第Ⅱ期 第31卷
-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 2000.『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小学館
- 朱京偉 2003.『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白
帝社
- 杉本つとむ 2005.『語源海』東京書籍
- 蘇小楠 2005.「日中学術用語交渉の一試論—訳語〈固体・気体・液体〉の由来について」
『名古屋大 学国語国文学』96
- 佐藤亨 2007.『現代に生きる幕末・明治初期漢語辞典』明治書院
- 沈国威 2008.『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改訂新版）笠間書院
- 木村秀次 2013.『近代文明と漢語』おうふう
- 清地ゆき子 2016.「近代訳語「恋愛」の成立とその意味の普及」『東アジア言語接触の研
究』関西大学出版社
- 荒川清秀 2018.『日中漢語の生成と交流・受容—漢語語基の意味と造語力』白帝社
- 陳力衛 2019.『近代知的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三省堂
- 李瑶 2020.「日本漢字語の中国語に対する文法面での影響—漢字を通じた語彙借用の一側
面」『日本漢字學會報』（2）
- 荒川清秀 2020.『漢語の謎』ちくま新書
- 陳力衛 2021.「近代訳語のいわゆる転用語について—「文学」と「教育」を例として」『中
国語学』（268）
- 荒川清秀 2021.「日中同形語を歴史的に考える—江戸の蘭学文献を史料に」『中国語学』
（268）
（中国語）
- 鄭奠 1958.「談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詞彙』」『中国語文』第2期
- 劉正焱・高名凱・麦永乾・史有為編 1984.『漢語外来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 朱京偉 1993.「現代漢語中日語借詞的弁別和整理」『日本学研究』
- 馬西尼著・黄河清譯 1997.『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漢語大詞
典出版社
- 蔣紹愚・曹広順 2005.『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総述』商務印書館
- 徐傑舜 2007.「『民族』：一個歷史文化語義学的個案」『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
- 周光明 2007.「『新聞』術語之厘定与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動」『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
版社
- 唐宏峰 2007.「当『小説』遭遇 novel 的時候——一種新的現代性文類的產生」『語義的文
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
- 黄河清 2010.『近現代辭源』上海辭書出版社
- 沈国威 2012.「回顧与前瞻日語借詞的研究」『日語學習与研究』第3期
- 李運博 2018.『近代漢日詞彙交流研究』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史有為 2019.『新華外来詞辭典』商務印書館
- 沈国威 2019.『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触与漢語的近代演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朱京偉 2020.『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軌跡——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商務印書館

（『雲漢』1号，2023年3月26日）

証拠性から見た動詞「知る」の文法化序論：

雲南チベット語・西南官話における「知らんけど」の用法*

鈴木博之

摘要 本文针对云南迪庆藏语（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及迪庆汉语（西南官话滇西小片）中句末出现的“不知”相关形式进行分析。考虑到日语方言中出现的“不知”的用法以及示证范畴的框架，本文认为出现在句末的“不知”相关表达是一种推测示证（inferential）功能在不同语法化阶段的表现，并指出其现象与示证的范畴化有关。由于本文作为尝试性讨论，今后研究需要从此观点更深入的描写。

キーワード 証拠性 推測 文法化 カムチベット語 西南官話滇西小片

1. はじめに

本稿では、雲南省西北部に位置する迪慶チベット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で話されるカムチベット語及び漢語西南官話で用いられる、動詞「知る」に相当する語を用いて、動詞の本義とは異なる用法で用いられる例について記述する。記述に当たっては、「証拠性」の角度から検討することで類型的特徴を把握し、「文法化」の度合いによってある程度特徴づけられることを示す。

動詞「知る」が動詞の本義ではなく一種のモダリティを表す形態素として機能することは、複数の言語で見られる現象である。日本語の「かもしれない」や「かしら（ん）」は動詞「知る」の本義としての意味を持たず、話者の推測を表し断定を避ける機能を持つ。漢語普通話の「不知」もまた、疑問文に先行して用いられ、話者の判然としない気持ちを示す。

日本語で2022年流行した関西方言の「知らんけど¹」も、本来は動詞「知る」の本義ではなく話者の推測を表す文末標識である²。ところが、非関西方言母語話者が使う「知らんけど」やその受け取り方は、動詞「知る」の本義を表すものと考えている事例が認められ、関西方言母語話者から見ると違和感を覚えることも少なくない。これはすなわち1つの言語体系にある要素が別の言語体系に不完全に借用・導入され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以下に、本稿の議論に関わる「知らんけど」の用法を簡単に整理してみたい。

上に言及した「知らんけど」という表現は、ひとまとまりの発話が終わった後に追加的に現れるものであり、(1)に示すように、先行する発話には終助詞がついていても許容される。なお、「知らんけど」と先行する発話の間にはポーズが入り、先行する発話とひとかたまりで発音しない。このため、以下の例では「知らんけど」の前に読点を配す

* 本稿にかかる現地調査は、2017-2020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若手研究（A）「チベット文化圏東部の未記述言語の解明と地理言語学的研究」（研究代表者：鈴木博之、課題番号17H04774）および2018-2020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高精細度広域地図による中国および隣接する多言語地域の地理言語学的研究」（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課題番号18H00670）の援助による。

¹ 「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選 ユーキャン新語・流行語大賞 第39回 トップテンに選出されている。

² これは筆者の内省に基づく解釈である。その詳細は以下の記述で示す。

る。

- (1) a. あの先生や、知らんけど。
 b. あの先生やな、知らんけど。
 c. あの先生やて、知らんけど。

(1) の用例の中で、(1c) の事例は「知らんけど」が動詞「知る」の本義と理解される可能性が十分にある。これは先行する発話が伝聞標識「て」を伴う文であることによるもので、伝聞の内容について知らないという事実を発話する意図がある場合である。このため、場合によっては「知らんけど」という表現を構成する語の原意がまだ意味解釈に影響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1) に見た「知らんけど」は、「かもしれない」や「かしら(ん)」と意味上は近いが、文法的ふるまいに異なりが見られる。「名詞句+や」(標準語「名詞句+だ」)に「かも(しれない)」が後続する場合、(2) に示すように、終助詞「や」は脱落しなければ不適格になる。

- (2) a. *あの先生や、かも。
 b. あの先生かも。

以上の用例を踏まえ、「知らんけど」を標準日本語で文法構造を変えなく言い換えるならば、「おそらく」や「たぶん」の語義に最も近くなる。また、(1a) の「知らんけど」を「おそらく」や「たぶん」と置換し語順に変更を加えなくても、(3b) のように、文は自然な発話と理解できる。このことはさらに、(3c) のように、文意は変わるが「きっと」や「絶対」など別の副詞と交換可能であることも意味する。加えて、(3d) のように、「知らんけど」に先行する文に終助詞があってもよい。

- (3) a. あの先生や、知らんけど。(= 1a)
 b. あの先生や、たぶん。
 c. あの先生や、絶対。
 d. あの先生やな、知らんけど。

一方で、これらの副詞は用言の直前など文中に置くことも可能である(4a, b)が、「知らんけど」は不可能である(4c)。このことは、「知らんけど」の品詞が完全な副詞とはみなせ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 (4) a. あの人たぶん先生や。
 b. あの人絶対先生や。
 c. *あの先生や、知らんけど先生や。

また、「知らんけど」という表現は語彙的に固定されており、同表現を構成する形態素を変更すること(5b-e)は、筆者の内省に基づけば、不可能である。加えて、もし(5f)のように「知らんけど」に念押しの終助詞がついた場合や、強調の副詞がついた場合(5g)、ほぼ動詞「知る」の本義で解釈され、「先に述べたことの実偽は実のところ知らない」という解釈が優先する。

- (5) a. 知らんけど (話者の推測を表す用法)
 b. *知りませんけど (敬体;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不適格)
 c. *知っとらんけど (持続アスペクト;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不適格)
 d. *分からんけど (異なる動詞語幹;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不適格)
 e. *知らんけれども (異なる接続詞;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不適格)
 f. ??知らんけどな (終助詞を付加;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曖昧さが残る)
 g. ??よう知らんけど (副詞を付加; 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曖昧さが残る)

(5) の状況から、どのような発話スタイルであっても「知らんけど」を用いることになる。敬体 (聞き手敬語; いわゆるです・ます体) と併用される場合を (6) に示す。ただし、敬体を用いる聞き手に「知らんけど」を用いる場面は相対的に少ない。

- (6) a. あの先生です、知らんけど。
 b. *あの先生です、知りませんけど。(5a の意味を意図した場合不適格)

また、(1) や (6a) の発話は、聞き手に確認・訂正を促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これらの発話に呼応して確認の応答を期待するのも会話のストラテジーとして問題なく受け入れられるが、返答がなくても会話は成立する。すなわち、話者の発話に対する不確かさが少しでも存在するという点を補足的に表し、したがって断定した発言であるとみなされるのを後出しで避けることが主たる機能であるといえる。

以上の点を考えると、「知らんけど」は形態統語論的には語彙化した文末標識 (sentence final tag) と考えられる。一方で、非関西方言母語話者が使う「知らんけど」は、文末標識として機能するというを受容しているが、その表す意味までも模倣しているかどうか不明確で、動詞「知る」の本義として理解している場合がある。一方で、関西方言母語話者であっても、以上の意味で「知らんけど」を用いない地域 (方言差異) や、受容度に関する世代差も認められる。特に老年層では受容度が下がる例もある。これらについては、筆者の内省および厳密な検証には不十分な量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に基づく観察と分析であり、より妥当な方法論を用いて詳細な記述言語学的分析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は指摘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1つの見通しとして、動詞「知る」から文末標識へと文法化していく過程について、地域差 (方言差) と年代差に差異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える。

本稿の主題は、証拠性が高度に文法化かつ体系化したチベット系諸言語 (Tibetic³) とその言語と密接な接触関係にある漢語 (地域方言) に見られる、動詞「知る」を用いた表現の基礎的な記述、およびそれに基づく問題提起にある。以下、2節では雲南省迪慶 (デチェン) 州で用いられる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事例について、証拠性の体系と範疇化を紹介したのち、動詞「知る」の本義でない用法を記述する。続く3節では迪慶州で用いられる漢語に現れる文末の「不知」について記述し、その用法を明らかにしつつ、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事例も参照してその来歴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本稿において、依拠する言語資料および解釈の記述は、注記のない限り筆者が2004年より継続的に行ってきた現地調査、加えて2020年以降に行ったSNSを介したアンケート調査 (文字でのやりとりとビデオ通話) を通じて得られたものである。各言語資料はい

³ Tibetic という用語の定義は Tournadre (2014) に従う。また、Tournadre & Suzuki (2022) も参照。

ずれも音韻表記を用いず、カムチベット語の形式は対応するチベット文語形式⁴のローマ字転写 (de Nebesky-Wojkowitz 1956 による) で示し、漢語の形式は簡体字で示す。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中であっても、漢語借用語についてはそのまま簡体字で示す。例文には各言語の形式と和訳を掲げ、分析が不可欠な箇所にはグロス⁵を添える。なお、本稿では「知らない」という語形式が話者の推測を表す場合において、先の記述と考察を踏まえ、一律「知らんけど」と訳す。

2. 雲南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事例

本節では、主に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で話されるカムチベット語香格里拉方言群に属する複数の方言について記述する⁶。一部香格里拉市以外の迪慶州の事例も含む。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は体系化された証拠性標示を形態統語論的特徴として備える言語群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 (Tournadre 2017; Suzuki et al. 2021; Tournadre & Suzuki 2022)。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証拠性の体系は、狭義の証拠性 (evidentiality; Aikhenvald 2018 参照) に加えて認識性 (epistemicity) も加わった性質を持ち、Tournadre & LaPolla (2014) で証拠性 (evidentiality) の定義を従来の「情報源 (information source)」を「情報へのアクセス (access to information)」と「情報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に分けて定義することにより、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証拠性の体系を説明できるとした (Tournadre 2017)。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は言語ごとに証拠性の体系化されている範囲が異なり、個別言語の記述研究によって差異が徐々に明らかとなる⁷一方、Tournadre & LaPolla (2014) の立場を採用して記述を進めると、中国に分布する諸言語については、ある程度共通の枠組みをもっていることも分かってきた (Suzuki et al. 2021)。本稿では、この理論的枠組みを具体例とともに見て注目する部分を抜き出し、続いて個別の地域方言 (建塘方言) の事例を検討する。

2.1 カムチベット語香格里拉方言群における証拠性の枠組み

カムチベット語香格里拉方言群に属する方言で、Tournadre & LaPolla (2014) の立場から全面的な証拠性の記述が提出されているものには、Suzuki & Lozong Lhamo (2021) の吹亞頂 (Choswateng) 方言⁸と Zhou & Suzuki (2022) の安南 (Alangu) 方言がある。両者の証拠性の体系については若干の異なりが認められ、おそらく香格里拉方言群の内部で細かな差異が存在すると見込まれる。

香格里拉方言群に属する諸方言において、形態統語論的に区別される証拠性のカテゴリーは次のようである: 向自己 (egophoric)、陳述 (statemental)、視覚感知 (visual sensory)、非視覚感知 (nonvisual sensory)、推定 (inferential)。方言によって推定が知覚推定 (sensory

⁴ ただし古チベット語のつづりも含みうる。また、対応する文語形式が存在しない場合も、語源と音対応を考慮して仮の文語つづりを与える。ここでいう「チベット文語形式」はいずれをも含む。

⁵ 本稿で使用するグロスはカムチベット語と漢語に共通とし、次の通りである。1=1人称; 3=3人称; ACP=達成; CPV=判断動詞; EGP=向自己; EXV=存在動詞; INFR=推定; LGINFR=論理推定; NEG=否定; PL=複数; PROG=進行; Q=疑問標識; SFT=文末標識; SNINFR=知覚推定; STA=状態; STEM=複音節動詞の動詞語幹; STM=陳述; VSEN=視覚知覚。加えて、例文の初頭に付す記号として、次のものを用いる。*=非文法的または意図する意味を表す表現として不適格; ?=文法的であるが違和感があり、用いない; ??=指示のある意味を表す表現として適格であるかどうかを言明するのが困難である。

⁶ カムチベット語およびその下位方言群の分類およびその方法についての見解は、Suzuki (2022) および Tournadre & Suzuki (2022) による。

⁷ たとえば、Gawne (2016) のヨルモ語、Zeisler (2018) のラダック語、Zemp (2018) のプリク語など。

⁸ 本稿では簡便のため、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方言名を漢語地名で示す。

inferential) と論理推断 (logical inferential) を区別するものもある⁹。まず、吹亞頂方言の証拠性の体系について具体的に見る。判断動詞肯定形を例に、表形式で掲げる (表 1)。

表 1 吹亞頂方言の証拠性の体系：判断動詞 (Suzuki & Lozong Lhamo 2021 に基づき加筆修正)

向自己	陳述	視覚感知	非視覚感知	推定
zin yin	red a 'bo	zin snang	grag zin grag	zin log zin pa a zin 'dug a yin bzhin snang zin 'dra a snang zin a yin zon zin a 'dug zon

もし表 1 の形式を体系にとらえた場合、1つのカテゴリーに複数の異なる形式を配置するのは体系 (の区分) として不完全であるという批判もある。ただし、表 1 は証拠性のみに基づいて分類したものであり、複数の語形が異なる基準で使い分けられることを記述していないため、この批判は該当しない。加えて、1コラムに記される語形間の関係は各証拠性カテゴリーによって異なる点にも注意が必要である。向自己の形式である zin と yin はスタイルの違い (後者はフォーマルな口調に現れる) である。陳述の形式である red と a 'bo は確かさ (certainty) の度合い (後者は前者より確かさの度合いが低い) を反映する。非視覚感知の形式である grag と zin grag は派生の関係 (後者が前者に先行して存在した) にある。そして、推定の形式の多様性は確かさの度合いが区別されていると説明でき、「zin+推定を表す形態素」と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稿の興味は、1節に示したように、推定の表現の多様性にある。そのため、表 1 の諸形式について、作業仮設として語構成を分解し考察を進めていく¹⁰。

表 2 吹亞頂方言の判断動詞・推定の語形式の形態素分析

確かさの度合い	語形	作業仮設としての形態素分析
高	zin log	zin-log 'CPV-INFR'
	zin pa a	zin-pa-a 'CPV-INFR.SFT-SFT'
	zin 'dug	zin-'dug 'CPV-INFR'
	a yin bzhin snang	a-yin-bzhin-snang 'Q-CPV-PROG-STA.VSEN'
	zin 'dra a snang	zin-'dra-a-snang 'CPV-似ている-Q-STA.VSEN'
	zin a yin zon	zin-a-yin-zon 'CPV-Q-CPV-疑う'
低	zin a 'dug zon	zin-a-'dug-zon 'CPV-Q-INFR-疑う'

表 2 から、推定の証拠性を形成する諸形式には、推定の意味を含む形態素が向自己の

⁹ これらの証拠性カテゴリーを Aikhenvald (2018) の分類と対照すると、視覚感知は visual、非視覚感知は sensory、知覚推定は inferential、論理推断は assumptive にそれぞれ対応関係があるとみてよい。ここに向自己 egophoric や提題 factual (または陳述 statemental) を含めて一体的に取り扱うのが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および Tournadre (2017) の立場である。

¹⁰ 文法化した接辞にどのようにグロスをつけるかは、主に 2つの立場がある。歴史言語学的立場から、語源に従い各形態素ごとにグロスをつける方法と、記述言語学的立場から、1つの機能を担う形態素群にまとめて1つのグロスを与える方法である。立場の違いについては、Zeisler (2004: xxiv-xxv) も参照。双方の立場を統合した記述方法 (星 2016 など) もあるが、共時的記述としてあまり用いられてはいない。本稿のグロスでは記述言語学的立場を採用するが、「作業仮設」という視点で前者の方法を意図して用いる。表 2 は歴史言語学的立場からの記述であるが、記述言語学的には、すべての形式が等しく CPV.INFR と書かれるものである。

形式（動詞語幹）と組み合わせあって形成されるものとともに、動詞の本義として「似ている」や「疑う」がある語幹も含まれ、加えて視覚感知の形態素も含まれるもの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加えて、これまで収集した言語資料の中には、以上に示したもののほかに、これらの形式に *myi shes* 「知らない」という形式が後続する例が認められるが、先行研究ではこの形式を推定の証拠性の中に独立して配してこなかった。これは、吹亞頂方言の場合、*myi shes* 「知らない」は理論上すべての推定の形式に付加できる要素であるうえ、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統語論において *shes* 「知る」という動詞は文末に置かれるため、語順の上で特別な形式ではないことによる。ところが、音声実現の上で、当該の2音節は常に独立の声調を持たず軽声のように発音され、また意味の上で、*myi shes* の付加は「知らない」という意味を持たず、推定に対する確かさの度合いを若干引き下げる修辞表現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 (7) a. *kho* *dge rgan* *zin log*
 3 先生 CPV.INFR
 「彼は先生に違いない」
- b. *kho* *dge rgan* *zin log-myi shes*
 3 先生 CPV.INFR-SFT.INFR
 「彼は先生に違いない、知らんけど」

ただし、吹亞頂方言では *myi shes* は推定の形式と共起するのが大半で、他の証拠性の形式の場合、使用例は少ない。特に陳述の形式 *red* または *a 'bo* と共起する例は未見である。また、推定の形式を構成する「推定を表す形態素」の位置に *myi shes* が現れることはない。すなわち、**zin myi shes* という表現は、現在のところ確認されていない。

一方で、安南方言では、吹亞頂方言の推定のカテゴリーについて形態論的に知覚推定と論理推断に分かれる。表 3 に示すように、吹亞頂方言の推定と一致または酷似する形式は論理推断の形式に現れる。

表 3 安南方言の知覚推定と論理推断：判断動詞（Zhou & Suzuki 2022: Appendix に基づき加筆修正）

知覚推定	論理推断
<i>zin min snang</i>	<i>zin 'dug</i> <i>zin a zon</i> <i>a zin zin</i>

表 3 の知覚推定の形式 *zin min snang* を表 2 のように語構成分析すれば、*zin-min-snang* ‘CPV-CPV.NEG-STA.VSEN’ となり、肯定と否定の判断動詞の連続に視覚感知の証拠性標示が組み合わせられている。カムチベット語には、 $V_1+NEG+V_1$ タイプの構文で諾否疑問文を形成することは少ないが、自問自答になる事例がある。この知覚推定の形式は、この自問自答を安南方言で独自に推定の枠組みに文法化させた可能性が指摘できる。

また、安南方言でも *myi shes* が論理推断の形式に後続する事例がある。観察例が吹亞頂方言より少ないため、使用頻度について比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形態統語論上可能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観察されている。

以上、2種の雲南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事例について、推定の証拠性と共起し文末に現れる *myi shes* 「知らんけど」の概要を示した。続く 2.2 節では、先の2方言と同一方言群に属する建塘（rGyalthang）方言の *myi shes* の用法について見ていきたい。

2.2 建塘方言の記述

建塘方言は迪慶州香格里拉市の政治経済の中心地である建塘鎮で話されている変種であり、これまでもっとも多く記述研究の対象となってきた(陸紹尊 1990、《中甸县志》1997、《云南省志 卷五十九》1998、Hongladarom 2007 など¹¹⁾。一方、地域方言としての建塘方言は漢語の影響を強く受けて漢化が激しく、周辺の村々の変種と一定の異なりが見られるほか、母語として身につける人が急激に減ってきている。加えて、迪慶州の他の地域のチベット人も居住するようになり、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他の方言による建塘方言への影響も無視できない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さて、建塘方言における証拠性標示を見ると、表 1 に示したものに近い体系を示す。ただし、推定の形式については、吹亞頂方言と同様の *zin log*, *zin pa a*, *zin 'dug*, *a yin bzhin snang*, *zin 'dra a snang*, *zin a yin zon* のほかに、*zin myi shes* という表現もあることが特筆に値する。

- (8) *kho* 老师 *zin myi shes*
 3 先生 CPV.INFR
 「彼は先生だろう、知らんけど」

(8) の文脈は、「彼」で指示される人物が (A) 学校内で子供を引率している大人であることを視認しての発言である場合 (感知推定)、(B) 師範大学を卒業して地元の高校に就職しているとすれば守衛や清掃員ではなく先生のはずと判断した発言である場合 (論理推断) のいずれの可能性もある。また、いずれの文脈でも描写対象が 3 人称であって *zin myi shes* という表現が成立するとすれば、これを *zin myi-shes* ‘CPV.EGP NEG-知る’すなわち向自己の判断動詞に後続して「知らない」という動詞が付加された形式とは分析できない。この文脈で向自己は用いられないからである。

ところが、建塘方言では、(9a) のように陳述の証拠性と共起できる。(9a) と (9b) は同一の形態素から構成される発話であるが、(9b) の *myi shes* は独立の声調を担う点で異なる。建塘方言では補文標識が義務的でないことから、(9b) のような形式が文法的となる。

- (9) a. *kho* 老师 *red-my i shes*
 3 先生 CPV.STM-SFT.INFR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
 b. *kho* 老师 *red* *myi-shes*
 3 先生 CPV.STM NEG-知る
 「彼が先生であることを (私は) 知らない」

ここで注目すべきは、(9a) において *myi shes* が独立の声調をもたない点である。記述言語学の観点から見て、この特徴は有標である。なぜなら、否定接辞は動詞句の内部に現れたときも後続の動詞語幹とともに独自の語声調のパターンを取るからである。このことから、*myi shes* が形態統語的に見て独立した動詞句ではなく、高度に文法化し接辞として成立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と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ながら、(9b) のように、動詞「知る」の本義を意図し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ため、さらに調査が必要である。

¹¹ 研究史については鈴木 (2018) を参照。

さて、(8) と (9a) が共存することは、次の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9a) のように、*myi shes* が推定の文末標識として機能すると同時に、(8) のように、*myi shes* が推定の証拠性を構成する一部としてその体系にすで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8) に現れる推定の形式 *zin myi shes* を形態素分析すると、陳述の動詞語幹がその第 1 要素に来ない傾向にある¹²。このことから、(9a) の構造は (8) よりも先行して生じ、さまざまな動詞句に後続できたことが指摘できる。実際のところ、*myi shes* は判断動詞だけでなく、存在動詞 (10) や他の語彙的動詞句 (11) にも後続しうる。この点で、*myi shes* は文末標識としての機能を獲得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10) *kho* *phag* *'dug red-myi shes*
 3 ぶた EXV.STM-SFT.INFR
 「彼はぶたを飼っている、知らんけど」

(11) *kho* *zan* *za-thon-myi shes*
 3 ごはん 食べる-ACP-SFT.INFR
 「彼はごはんを食べ終わった、知らんけど」

もし使用に制約があるとすれば、*myi shes* は向自己の証拠性とは共起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向自己とは、話者自身の行為・動作・状態について述べるときに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い¹³が、向自己で標示されることに「知らんけど」を付加することは、語用論上意味をなさない発話になるといえる。

さて、日本語関西方言の「知らんけど」の現象を参照して建塘方言の文末標識としての *myi shes* を見ていくと、次のことが言える。まず、(1) のような事例と異なり、建塘方言の *myi shes* は、その直前に他の文末標識が現れない。

(12) a. *kho* 老师 *red-myi shes* (=9a)
 3 先生 CPV.STM-SFT.INFR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
 b. **kho* 老师 *red-'o-myi shes*
 3 先生 CPV.STM-SFT-SFT.INFR
 (「彼は先生だよ、知らんけど」を意図して)

建塘方言では、文末標識の共起は特定の組み合わせで可能であるが、その組み合わせに *myi shes* が入る例は観察されず、また文法的でない判断される (12b)。一方で、(3) のように、確かさの度合いを表す語 (漢語からの借用語) と *myi shes* は交換可能であり、

¹² この点については複数の見方がある。まず、陳述と感知に形態上の対立が認められない場合、あたかも陳述の形式が推定の形式の第 1 要素に来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実際には感知の形式からの派生である場合が報告されている (Suzuki et al. 2021)。また、推定の証拠性の形式には向自己の動詞語幹が使用されるように見えるが、表 2 の分析で示したように、推定の証拠性の範疇に現れる向自己の形式には向自己 (EGP) をグロスに表示していない。そもそも向自己の形式は「それが単独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向自己の証拠性を獲得する」という歴史的側面を重視する立場と、「向自己の動詞語幹が派生形で用いられるとき向自己の機能が中立的になる」という共時的側面を重視する立場に分かれる。

¹³ 「1 人称」と言えない例として、内的感覚動詞 (endopathic; 例えば「空腹である」や「病気である」など; Tournadre 1996:226 参照) を用いた表現や、記憶を失った状態、夢の中に出てきた本人についての描写などでは、向自己の証拠性で標示されない。詳細は Tournadre & Suzuki (2022) を参照。

(13) のような発話は認められるが、漢語の影響を多大に受けた発話であり、このような発話（言葉遣い）を快く思わない話者もいる。

- (13) kho 老师 red-可能
 3 先生 CPV.STM-たぶん
 「彼は先生だ、たぶん」

カムチベット語に限らず、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確かさや頻度を表す副詞は動詞の直前に現れるのが広く受け入れられる構造である。ただし、確かさについては推定の証拠性の標示に組み込む変種が多い¹⁴。一方で、確かさの多様な度合いを漢語からの借用語（「肯定」や「可能」など）で示し、かつ動詞の直前に配置する変種もある（鈴木、四郎翁姆 2018）。建塘方言の場合、(13) のように「可能」を借用しているが、出現位置は文末に限られ、動詞を修飾する副詞の占める一般的な位置である動詞語幹の直前に現れることはない。このことから、(4) に類する表現は、myi shes も「可能」も不適格となる。

(5) に対応する形式を建塘方言で見出すことは困難であるが、(5d) と並行するように類似の意味を持つ異なる動詞語幹 ha go 「分かる」を用いた例 (14) や、(5f) と並行するように文末標識'o が後続する例 (15)、または否定辞が myi でない例¹⁵ (16) は、いずれも不適格と判断される。

- (14) *kho 老师 red-ha myi-go
 3 先生 CPV.STM-分かる NEG-STEM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を意図して)

- (15) *kho 老师 red-myi shes-'o
 3 先生 CPV.STM-SFT.INFR-SFT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を意図して)

- (16) a. *kho 老师 red-ma shes
 3 先生 CPV.STM-SFT.INFR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を意図して)
 b. *kho 老师 red-gar shes
 3 先生 CPV.STM-SFT.INFR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を意図して)

ただし、(14, 15) とともに、動詞 ha go, shes を文末標識ではなく動詞の本義と理解することで、それぞれ「彼は先生であることは私には分からない」、「彼は先生であることを私は知らないよ」という解釈は可能である。

ところが、(8) の例には文末標識が現れうる。

¹⁴ 特にアムドチベット語では、当該の語形が豊富にある (Suzuki et al. 2021)。一方で、確かさを証拠性に組み込む立場 (Oisel 2017) のほか、証拠性とは別建ての構造を設定する立場 (Mélac 2014) もある。

¹⁵ 雲南のカムチベット語では、3種類の否定辞がある (myi, ma, gar)。詳細は Suzuki & Lozong Lhamo (2021) を参照。

- (17) kho 老师 zin myi shes-'o
 3 先生 CPV.INFR-SFT
 「彼は先生だろうな、知らんけど」

(17) が示すのは、zin myi shes という形態素の連続がすでに判断動詞の 1 単位として認められ、単一の動詞句と判断されているため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る。したがって、(17) の文末標識は、myi shes だけにではなく zin myi shes 全体に対する確認を表すため、対応する日本語訳は「彼は先生だろうな、知らんけど」となり、「彼は先生だろう、知らんけどな」ではないと解釈する。

以上、日本語の事例を参照して建塘方言の myi shes の用法を記述した。その結果、建塘方言の myi shes は「知らんけど」と形態論的な派生関係と用法の面で一定の対応関係が認められ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また、建塘方言と近い関係にある吹亞頂方言や安南方言と比べると、myi shes が証拠性の体系の中に入り込んでいる点で、文法化の度合いが高いと判断できる。

3. 西南官話の事例

本節では、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で話される地域共通語として機能する西南官話（雲南片滇西小片；以下「迪慶漢語」）の事例を記述する。主にチベット族による発話を対象とするが、漢族のほか、ナシ族、回族、ペー族などによる発話も観察対象に含まれる。以下に記述するデータでは、漢語の母語話者であるかどうかは問わず、また迪慶州内の出身地についても問わない¹⁶が、迪慶州で言語形成期を過ごした話者からのデータを採用する。

3.1 言語現象の記述

まず、迪慶漢語における典型的な例として、作例 (18) を示す。

- (18) a. 他 是 老师 不知
 3 CPV 先生 SFT.INFR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
 b. 他 不-是 老师 不知
 3 NEG-CPV 先生 SFT.INFR
 「彼は先生じゃない、知らんけど」

迪慶漢語の場合、文末の「不知」の前にはポーズが入らず、先行する語とひとかたまりに発音され、かつ声調は軽声に準じて低平となる。また、(18) の文自体は疑問文ではなく、平叙文である。平叙文であれば、肯定 (18a) も否定 (18b) も用いられる。迪慶漢語の諾否疑問文は、雲南の西南官話で広く認められるように、動詞に先行して [kə⁵⁵]¹⁷ を配したり、「V₁ 不 V₁」型を取ることで成立する（《云南省志 卷五十八》1989）。そして、これら諾否疑問文の形式になる場合、「不知」は共起しない。

¹⁶ 本稿で記述対象とする方言は、同じく迪慶州で話されている維西方言（呉成虎 2007）とは、音形・語形ともにある程度異なりがある。

¹⁷ 対応する字は不明であるが、迪慶漢語使用者の中では「给」と表記することが多い。本稿でも「给」を用いて表記する。Zeng (2018: 38–39) は官話の中で類似の諾否疑問を形成する地域を示しており、その中で当該字に「格」を用いている。なお、本稿で [] に入れて示す音形式は中国方言学における厳密な意味での字音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調査時に記録した口語形式に基づく音声表記である。

- (19) a. *他给是老师不知?
 b. *他是不是老师不知?

発話環境を考慮に入れると、「不知」の使用は確認の応答を期待する場面が多いが、単に発話者の推定を述べるにとどまる場合も少なくない。したがって、(18a)に続く会話としては、「そうだ、彼は先生だ」または「違う、彼は事務員だ」というように発話への返答のほか、(18a)の内容を真ととらえて、「とりあえず彼は責任者のように見えるから、様子を尋ねてみよう」というように会話を進めることもまた自然である。

(18a)のような肯定文の場合、「不知」が動詞の直前に現れる例もあるが、それは「肯定」「可能」などの副詞と同種で、確かさの度合いにを意味する副詞的な要素であり、「たぶん」と訳出できる。この場合も、形式上は平叙文であり、疑問文とは共起しない。

- (20) 他 不知 是 老师
 3 たぶん CPV 先生
 「彼はたぶん先生だろう」

さて、(18)のタイプの「不知」は疑問詞と共起する場合が認められるが、その疑問詞は不定代名詞の用法である。(21)の発話にある「几个」は「いくらかの人」という意味であり、「不知」はそれに先行する文の内容全体について確かさの度合いが低くなる意味で「知らんけど」と対応する。このため、人数について尋ねる意図はない。

- (21) 他们 有 几个 不知
 3PL EXV いくつ SFT.INFR
 「彼らは数人いる、知らんけど」(「彼らは何人いるのか知らない」ではない)

(21)の発話を受けて、聞き手は数を特定して答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が、(22)のように「不知」を含む場合と、(23)のように「说」を含む場合と、(24)のように「么¹⁸」を含む場合がある。

- (22) 有六个不知。
 「6人だ、知らんけど」
- (23) 有五个说。
 「5人だって」(伝聞)
- (24) 有五个么。
 「5人だね」(確認ずみ)

(21-24)の発話は、実際のところ、レストランであった対話である。予約に従ってテーブルを準備している状況で、3人の従業員A, B, Cが話している。(21)の話者Aは4人以上いることを把握しており、規定の6人用1テーブルで準備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そこに別の人Bが記憶に基づいて(22)を発話した。続いて、予約の電話を受けた人Cが

¹⁸ 迪慶州の中で維西県出身者は特に「么 me³⁵」と発音する。

(23) を発話し、予約確認表を B が確認しに行つて (24) を発話した。この一連の発話において、(22-24) で文末に来る要素について見ると、「不知」「说」「么」の中で文末標識は「么」のみと考える。「说」は迪慶漢語では伝聞を表す表現であり、その否定形「不说、不有说、没说」は現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れば、動詞由来の文末標識と考え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¹⁹。「不知」が肯定形で現れないのと並行する関係にあると言える。

さて、以上の記述では「不知」を文末標識として取り扱ってきたが、それが文末標識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以下に検証する。迪慶漢語では、「知っ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を表す動詞語幹には 2 種あり、「知道」と「晓得」である。「知」というように 1 音節では決して用いられない。このため、「不知」を「不知道」としたり (25a)、「晓得」と交替すること (25b-25d) は、(18a) の意味として受容されない。加えて、迪慶漢語の否定詞には「不、不有、没、哪²⁰」などがあるが、「不知」以外の表現はない (25e-25f)。

- (25) a. *他是老师不知道。(「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の意味で不適格)
 b. *他是老师不晓得。(同上)
 c. *他是老师晓不得。(同上)
 d. *他是老师不晓。(どんな文脈においても「不晓」は未確認)
 e. *他是老师不有知。(どんな文脈においても「不有知」は未確認)
 f. *他是老师没知。(どんな文脈においても「没知」は未確認)

(23-24) に現れる文末標識の組み合わせてみると、以下のような制限が認められた。

- (26) a. 有六个不知说。
 「6 人だ、知らんけど、って (誰かが言っていた)」
 b. *有六个不知么。
 (27) a. 有五个说不知。
 「5 人だって、知らんけど」
 b. *有五个说么。
 (28) a. 有五个么不知。
 「5 人だね、知らんけど」
 b. 有五个么说。
 「5 人だね、って」

この結果は、文末標識が 2 つ連続しても許容されるものは、本来は文末標識の間で統語論的に断絶してい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26a) の場合は「[[有六个不知]说]」、(27a) の場合は「[[有五个说]不知]」、(28a) の場合は「[[有五个么]不知]」というように分析できる。一方、受容されない (26b) の場合は「*[[有六个]不知么]」となつて、「不知」と「么」

¹⁹ これは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伝聞の証拠性が現れる位置にその標識の来歴である動詞語幹 zer「言う」を翻訳借用した可能性を考える。カムチベット語と漢語の接触については、意西微薩・阿錯 (2004) の倒話 (四川省雅江県) や Zhou & Suzuki (2022) のシリブ (水磨房) 語 (雲南省香格里拉市) などを参照。一方、言語接触ではなく漢語 (成都方言) 自体の「说」の機能語化とする分析もある (熊 2007: 75-91)。

²⁰ 「哪」は修辭疑問 (反語) に由来する形式であるが、反語よりも幅広い文脈で用いられ、否定副詞としての機能が現れている。

が連続し、それが許容されない原因という解釈である。

また、文末に現れる「不知」の第2音節は[tʂʊ⁰]という発音のほか、しばしば韻律的に有意な長さのある[tʂʊ⁰]という発音がある。後者は「知」と何らかの音節の縮約というよりは、単に「知」に対応する音に特別な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が被さったものと理解する。すなわち、長音形式であっても「知」に後続する要素を認め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に考えると、「不知」に直接続く文末標識は現段階での言語資料の中には現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不知」によって発話が終わっていることが示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不知」に後続して、聞き手に同意を求める表現[ga⁵²]²¹（嘎、噶；以下「嘎²²」）が現れる。ただし、「不知」と「嘎」の間には常にポーズがある。(29)は、話者に確かな人数を確認する意図はなく、「6人いるとして考えていいよね」ということに同意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ある。

- (29) 有六个不知，嘎？
「たぶん6人いる、でしょ？」

「嘎」は文末標識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り、自身の発言を確認し、納得したことを示す。この場合は、「么」と同じく直前の語句とひとかたまりに発音される。ただし、この用法の「嘎」には「不知」は後続しない。

- (30) a. 有六个嘎。
「6人いるのか」
b. *有六个嘎不知。

「嘎」は直前の発言に納得し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ため、それに「不知」を付加して推測であると述べるのは意味の上で相反することになる。また、(26-28)で見たように、2つの文末標識が連続することはないが、(30b)の場合は「嘎」の直前で文が途切れると考えられ、「不知」を文末標識とするならばそれ単独で文となりえないため、これが受容されないと判断される要因であるといえる。

最後に、「不知」が確かさの度合いを示す副詞との交替と共起制限について見る。迪慶漢語では、「不知」はそのままの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維持して確かさの度合いを示す副詞とは交替できず(31a)、その副詞の前にポーズを置くことで受容される(31b)。また、動詞の前に副詞を用いた文とは共起しにくいようであるが、表現として受容できないわけではない(31c)。

- (31) a. *有六个可能。
b. 有六个，可能。
「6人いる、たぶん」
c. ?可能有六个不知。
「たぶん6人いる、知らんけど」

²¹ 「嘎」の声母は音声実現が有声閉鎖音に極めて近く、諾否疑問を形成する「给」の声母が常に無声無気音であることとは対照的である。

²² 熊(2007:92-97)は成都方言(西南官話)について、類似の「嘎」を「该是哈」の縮約と考えている。ただし、迪慶漢語では「该是哈」という音形は観察されていない。

以上が現段階での言語資料に基づいた記述となる。日本語の事例と対照すると、「不知」と「知らんけど」は、形態論的な派生関係と用法の面でほぼ対応関係があるように見える。また、「知らんけど」では成立しないが、「不知」を副詞のように動詞に先行する位置に現れる事例も認められる。文末標識の共起関係および副詞との交替可能性について見ることで、「不知」が文末標識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3.2 迪慶漢語「不知」とカムチベット語 *myi shes* 及び日本語「知らんけど」との対照

3.1 で記述した「不知」の用法は、普通話の「不知」と比べて、「文における出現位置」及び「文の種類」の2点で異なる。(31)は普通話の辞書的記述の一例である。

- (32) 我有一个主意，不知行不行？
「私に1つの考えがあるが、よいかどうかしら？」(伊地智 2002:120)

(32)の用例では、普通話の「不知」は「動詞の直前に出現」し、その動詞が「疑問文」の形式を示す点が特徴的である。疑問文は「V₁不V₁」型の諾否疑問文のみの例があり、疑問詞疑問文と共起する場合は「不知」の意味も文型も異なる。この点で、3.1節で記述した「不知」と異なりが見られる。加えて、(32)の「不知」は統語論上動詞として考えられ、「肯定」や「可能」などの副詞とは交替できない点もまた異なる。

北京で使用されるという限定条件がつくけれども、倉石(1990:49)にも「不知」について記述があり、動詞の扱いの中で「・・・かshれない」という訳語も挙げられている。また、「不知道」にも並行する記述があり、「・・・かshれない」という訳語も挙げられている。倉石(1990)の記述で注目できるのは、「不知」という表現が、目安としてはあるが、「古典のなかのことばではあるが、耳で聞くことばの中に混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というレジスターに当たる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ある。「不知」は「不知道」に比べて硬い表現であると分析している。

一方で、「不知道」という形式について、(32)と同様の意味を表すことを文法化の観点から考察しているものに、森(2005)と丁(2012)がある。いずれも「不知」という言い方には言及がないが、記述にある「不知道」と(32)の「不知」は機能として同じとみてよいだろう。丁(2012:32)は「不知道」の機能を「疑いの気持ちを表す」とし、類似の機能を持つ文末助詞の「呢」との用法を対比している。しかし、提示する例文において「不知道」を文末に置く例は見えず、普通話の例として当該要素が文末を占めることは少なくとも観察されていないものと判断する。

「不知」をめぐる迪慶漢語と普通話の相違点は、以上のように際立つものである。一方で迪慶漢語「不知」はカムチベット語の *myi shes* の文末標識としての用法と共通点を持つように見える。以下に迪慶漢語「不知」、カムチベット語 *myi shes*、そして日本語「知らんけど」を表形式にして対照してみたい。当てはまる項目にはY、そうでない場合はNと記す。また、参考となる例文番号および必要な解説を付す。

表4 「知らんけど」をめぐる諸特徴の対照

特徴	迪慶漢語 「不知」	カムチベット語 myi shes	日本語 「知らんけど」
当該語句が文末に出現する	Y (18)	Y (7b, 8, 9)	Y (1)
文末に来る当該語句の直前にポーズがある	N (18)	N (9a)	Y (1)
当該語句が文中に出現する	Y (20)	N	N (4)
当該語句は文末標識と分析できる	Y (26-30)	Y (15)	Y (1-6)
当該語句を韻律特徴を変えずに「たぶん」などの副詞と置換可能	N (31a)	Y (13)	Y (3)
当該語句を構成する形態素を変更可能	N (25)	N (14, 16)	N (5)
当該語句が証拠性の体系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る	N* 証拠性は体系化されない	Y/N (7b, 17) *変種による	N*証拠性は体系化されない
当該語句に文末標識が先行しうる	Y (28a)	N (12b)	Y (3d)
当該語句に文末標識が続さうる	N (26b)	N (15) *証拠性の体系の一部を構成する場合は Y (17)	N (5)

まず、形態論的に見ると、「不知」、myi shes、「知らんけど」のいずれも、それを構成する形態素の変更が不可能であるという点で、一種の語彙化を達成しているといえる。以上の3言語で、当該要素が文末に現れる点も共通している。そして、文末におけるまいから、当該要素が文末標識という性質を獲得しているものと分析できる。一方、迪慶漢語の場合は「不知」を文中（動詞の直前）に置いても受容され、その他の「可能」などの副詞と交替可能であるが、文末の「不知」は他の副詞とは交替できない。この特徴は、カムチベット語と日本語の現象と異なる。文末標識という特徴に着目すると、迪慶漢語とカムチベット語では、当該要素と先行する要素の間にポーズが置かれませんが、日本語ではポーズが入る。また、迪慶漢語と日本語の場合は先行する句の末尾に異なる文末標識が先行しうるが、カムチベット語では受容されない。逆に、カムチベット語はmyi shesが証拠性の体系の一部に組み込まれる変種とそうでない変種が共時的に認められる。他の2つの言語では証拠性が体系化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カムチベット語と同列に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カムチベット語の変種の中で差異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を観察の結果として並列しておく。

さて、3言語におけるいずれの現象も、「知る」という意味の動詞と否定を表す形態素の組み合わせで成立している語句がまとまって語彙化し文末標識になるという点は、自立語から機能語へと変容する文法化（grammaticalisation）の過程を経たと言える。語彙的に特定の形態素のみに固定されているため、文法化の程度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文末標識としては、それ自体が独立した機能を持っているが、カムチベット語、特に建塘方言では、文末標識から文法化の度合いがさらに一歩進んで、推定の証拠性を示す形態の構成要素となっている。

意味的な点を考えると、いずれも先行する発話に対する確かさについて推測を含むことを表す点で共通する。このため、「たぶん」や「おそらく」といった意味の副詞と酷似した機能があり、置換も可能であるが、迪慶漢語の場合、副詞の場合はその直前にポーズが必要となり、この点で「不知」は副詞とは異なる特徴を示す。カムチベット語の場合、「可能」という副詞とは韻律特徴を変えずに置換可能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し、日本語の場合は意味的に同類の副詞とおおむね置換可能であるという点で、文末標識と副詞の関係について各言語間で異なりが見られる。

以上の状況から見て、「動詞＋否定辞」が文法化し「文末標識」となったのは、3言語に共通して認められる現象である。それがさらに深化し文法化して証拠性の体系の一部にまで入り込んだ言語（建塘方言）もある一方で、確かさの度合いを表す副詞の機能を獲得し、機能語から自立語への脱文法化（degrammaticalisation）を経て、他の副詞と似たようなふるまいを獲得しつつある言語（関西方言）もある。漢語について考えると、そもそも「不知」という形式で動詞の本義とは若干異なる意味を持つ表現、たとえば(32)が存在しており、このことが他の言語には見られない文中での使用が受容されている要因と見られる。

一方で、語順の性質を考えれば、むしろ迪慶漢語が文末に「不知」を受容したことが有標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れがカムチベット語をはじめとする非漢語との接触によって発生したと考えることは、伝聞を表す「说」といった並行例(23)もあるため、非常に蓋然性の高いものである。ただし、迪慶漢語の場合、カムチベット語と同じく動詞を文末に置くという構造を完全に受容しているとはいいがたく、「不知」は文末に出現するとしても、語彙動詞が文末に移動する例は限られている。(33b)のように存在を表す「有」は文末に出現するが、判断を表す「是」（繫辞）は出現しない。この点で、迪慶漢語は動詞が原則として文末に現れる雅江倒話（意西微薩・阿錯 2004）などと異なる構造をもつといえる。

- (33) a. 有六个不知。(=22)
 「6人いる、知らんけど」
 b. 六个有不知。
 「6人いる、知らんけど」
 c. 他是老师不知。(=18a)
 「彼は先生だ、知らんけど」
 d. *他老师是不知。

ただし、(33b)の「有不知」という形式は(20)のような表現と異なり、「*不知有」という語順が認められない。(33b)のような迪慶漢語特有の語順による事例では、(20)や普通話で認められる「不知＋動詞」という語順が受容されない。このことから、「不知」は文末標識としてすでに成立していて、逆に(20)のような例は普通話に見られる構造（副詞＋動詞）を反映したうえでの発話形式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本来は否定副詞＋動詞という構成をとる「不知」が文末標識としての用法を獲得したことを言語接触によると判断するためには、言語接触の過程に関する精緻な検討が必要である。迪慶州における漢語とカムチベット語の関係については、反語用法の疑問副詞が否定辞として文法化する過程について Suzuki & Lozong Lhamo (2021) や鈴木 (2022) が言語接触の可能性を検討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議論はなお不十分であり、漢語の事例が先か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事例が先か、それとも相互に対応する形態素を用いた文法化が言語を超えて同時多発的に成立したのか、結論は出ていない。さらに検証可能な例を収集し、詳細な研究を進める必要がある。

4. まとめと課題

本稿では、日本語関西方言の「知らんけど」を参照点に、雲南省西北部に位置する迪慶チベット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で話されるカムチベット語及び漢語西南官話で用いられる、動詞「知る」に相当する語を用いて動詞の本義とは異なる用法となる例について記

述した。両者に見られる形式「myi shes」と「不知」は、偶然にも「知らんけど」に非常に近い形式と意味合いを持つ。これらの要素は、証拠性の体系の一部を占めるカムチベット語では推測の証拠性を表す形式の1つ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が、「myi shes」という形態自体を証拠性の体系に組み込んでいるか、付加的な表現と考えるかで方言差が現れる。一方、漢語や日本語では、表現が固定化され文末に出現しかつ推測を表す語彙化した標識であるといえ、その用法が定着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で差異が出るのが分かった。

以上の発展は文法化という枠組みで理解できる。いずれの言語にも共通して見えるのは、動詞が語彙的動詞としての機能を失い、特定の語形式で文末標識を形成するという過程である。この中で、カムチベット語はさらに文法化が一步進んで証拠性を表す接辞を構成する一部分となることで自立性を失うという過程を経た変種がある。一方で、3言語ともに、文末標識としての意味がより副詞的になり、他の確かさの度合いを表す語彙的副詞と交換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つつあるのもうかがえる。これは文末標識から副詞への脱文法化現象であるように見えるが、逆に文法化と呼んだ現象が完成していない状況で、動詞句から副詞へと語類が転用した可能性もある。これについては、さらに研究を深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本稿では、データ収集の面で不十分な点がある。各言語で最も適切な調査計画を策定し、調査対象をより限定的にして定量的な検証を行うなど、より詳細な研究が俟たれる。

〈参照文献〉

- 伊地智善継（編）2002. 『白水社中国語辞典』、東京：白水社。
- 倉石武四郎 1990. 『岩波中国語辞典 簡体字版』、東京：岩波書店。
- 鈴木博之 2018. 「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形成」『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 5–63 頁。doi: <https://doi.org/10.15026/92458>
- 鈴木博之、四郎翁姆 2018. 「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の述部に標示される証拠性」、『言語記述論集』10: 13–42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2000/>
- 丁寧 2012. 「日本語の疑い表現「やら」の意味と用法—中国語の疑い表現との対照を兼ねて—」、『一橋日本語教育研究』1: 25–36 頁。URI: <https://hdl.handle.net/10086/25451>
- 星泉 2016. 『古典チベット語文法：『王統明鏡史』（14世紀）に基づいて』、府中：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URI: <https://hdl.handle.net/10108/94480>
- 森宏子 2005. 「“不知道”の文法化現象について」、『中国学志』20: 31–48 頁。
- 熊進 2007. 「成都方言の文法研究—文法化のアプローチ」、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URI: <http://hdl.handle.net/2065/28520>
- 鈴木博之 2022. 《从“哪”到“不”：云南迪庆藏语否定标记的语法化》，林範彦・池田巧（編）『シナ＝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文法現象5：否定の多様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73–83 頁。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75707>
- 陆绍尊 1990. 《藏语中甸话的语音特征》，《语言研究》第2期：147–159 页。
- 吴成虎 2007. 《维西汉语方言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意西微萨・阿错 2004. 《倒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89. 《云南省志 卷五十八 汉语方言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98. 《云南省志 卷五十九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中甸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8. Evidentiality: The framework.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52pp. doi: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8759515.013.1>
- Gawne, Lauren. 2016. *A sketch grammar of Lamjung Yolmo*.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URI: <http://hdl.handle.net/1885/110258>
- Hongladarom, Krisadawan. 2007. Evidentiality in Rgyalthang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 17–44. doi: <http://doi.org/10.15144/LTBA-30.2.17>
- Mélaç, Éric. 2014. L'évidentialité en anglais - approche contrastive à partir d'un corpus anglais-tibétain. Paris: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 Paris 3 PhD dissertation. URI: <https://tel.archives-ouvertes.fr/tel-01230545>
- de Nebesky-Wojkowitz, René.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 Oisel, Guillaume. 2017. Re-evaluation of the evidential system of Lhasa Tibetan and its atypical functions. *Himalayan Linguistics* 16(2): 90–128. doi: <https://doi.org/10.5070/H916229119>
- Suzuki, Hiroyuki. 2022.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 Suzuki, Hiroyuki & Lozong Lhamo. 2021. /ka-/ negative prefix in Choswateng Tibetan (Shangri-La, Yunn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4): 593–629. doi: <https://doi.org/10.1075/lali.00092.suz>
- Suzuki, Hiroyuki, Sonam Wangmo & Tsering Samdrup. 2021. A contrastive approach to the evidential system in Tibetic languages: Examining five varieties from Khams and Amdo. *Gengo Kenkyu* 159: 69–101. doi: https://doi.org/10.11435/gengo.159.0_69
- Tournadre, Nicolas. 1996. *L'ergativité en tibétain moderne. Approche morphosyntaxique de la langue parlée*. Louvain: Peeters.
- Tournadre, Nicolas. 2014.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In Thomas Owen-Smith & Nathan W.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05–129.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310832>
- Tournadre, Nicolas & Randy J. LaPolla. 2014.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2): 240–263. doi: <https://doi.org/10.1075/ltba.37.2.04tou>
- Tournadre, Nicolas & Hiroyuki Suzuki. 2022.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Xavier Becker and Alain Brucelle for the cartography).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08183>
- Zeisler, Bettina. 2018. Don't believe in a paradigm that you haven't manipulated yourself!—Evidentiality, speaker attitude, and admirativity in Ladakhi (extended version). *Himalayan Linguistics* 17(1): 67–130. doi: <https://doi.org/10.5070/H917136797>
- Zemp, Marius. 2018. *A grammar of Purik Tibetan*. Leiden: Brill. doi: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66312>
- Zeng, Xiaoyu. 2018. A case study of dialect contact of early Mandarin. *Lingua* 208: 31–43. doi: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8.03.004>

Zhou, Yang & Hiroyuki Suzuki. 2022. Evidentiality in Selibu: A contact-induced emergence. *Diachronica* 39(2): 268–309. doi: <https://doi.org/10.1075/dia.19055.zho> ; With an online appendix, 42pp.: <https://doi.org/10.1075/dia.19055.zho.additional>

(『雲漢』1号, 2023年3月26日)

漢代の西域と敦煌の羌族*

柿沼陽平

要旨 懸泉漢簡所見の西域人のうち、康居・蘇雍の人びとはもともと遠方より敦煌を訪れた者達であった。彼らを含む西域人は、天山南路・西域南路に沿って東進し、時には孔雀河沿いに、時にはホータン河沿いに、タクラマカン砂漠を縦断する経路をも活用しつつ、敦煌にやってきた。かくして漢代敦煌は国際色豊かな外交・交易の要衝となり、そこでは漢人・西域人・羌人が、完全には融合することなく、共存していた。とくに羌人はおもに遊牧に従属し、あるいは農耕に従事する者もいた可能性もあるが、交易に携わった形跡はない。彼らは、農業を主とする漢人や、外交・商業に携わる傾向の強い西域人とは異なる存在だった。羌人は独自の秩序を有し、別々の種族を構成していた。羌の人名や種族名の命名方法には羌人独自のルールもあり、ゆえに彼らは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堅持していたと思われる。

キーワード 漢代 西域 楼蘭 敦煌 羌人

1. はじめに

前漢後期～後漢前期の西域諸国の名称や位置については、『史記』大宛列伝や『漢書』西域伝などに記録が散見する。西域諸国の詳細については、実地調査をふまえたスウェン＝ヘディンやオーレル＝スタイン以降の研究があるほか、歴代正史西域伝に対する訳注もあり¹、いまや多くのことが判明している。日本でも、大谷探險隊の現地調査にはじまり、白鳥庫吉氏や松田壽男氏以来の文献研究の蓄積がある。だが、それでもなお不鮮明な点はある。そのひとつは、西域と羌人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である。

羌人は一般に、青海湖以東の地（とくに蘭州付近）に住み、半農半牧の生活様式を営む人びとであったといわれることが多い。その様子や生活様式に関しては、馬長寿・周錫銀・李紹明・冉光栄・王明珂諸氏の古典的研究がある²。また『後漢書』西羌伝の訳注もある³。伝世文献をみると、漢代に羌人は次第に拡散し、とりわけ東方に進出したようである。その理由としては、自然環境の変化や、漢の侵攻による根拠地失陥といった点が挙げられている⁴。漢は「以夷制夷」政策の一環として、当初はすすん

* 本稿は、学会報告「漢代の西域と敦煌の羌族」Workshop: Chinese languages and its surroundings (2022年12月17日、於京都大学)に基づく。JSPS 科研費 JP21K00913 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¹ 余太山 (2005)。

² 馬長寿 (1984)、周錫銀・李紹明・冉光栄 (1985)、羌族簡史編写組 (1986)、黄烈 (1987)、何光岳 (2000)、王明珂 (柿沼陽平訳) (2007: 157-195)、同 (2011: 139-166)、同 (2012: 120-137)。

³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2006: 304-424) 等。

⁴ 馬長寿 (1984: 91) は政治的要因を主要因とする。尚新麗 (1997: 5-6) は経済的要因、漢の対羌政策、気候的要因を挙げる。

で降羌を受け入れた⁵。その代表例として、漢側の将軍である趙充国や馬援による措置が挙げられ、羌人は他種族に先駆けて漢化し⁶、他種族以上に漢内部への内徙を許されたともいわれている⁷。内徙の定義は諸説あり、ゆえに事例数に関しても諸説あるが⁸、ともかく漢帝国の内部には多くの羌人が居住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ところが後漢永初元年（107年）以降、羌人は後漢との対立を深め、対羌戦争が後漢滅亡の一因になり⁹、その戦費は莫大な額にのぼった¹⁰。こうしたなかで、羌人は西や南にも拡散していったといわれている¹¹。

以上によれば、漢代の羌人は隴西郡・金城郡一帯（現在の甘粛省・青海省一帯）を中心に、徐々に西・南・東に分布範囲を広げていったことになる。では、羌人は北には進出しなかったのか。王明珂氏によれば、「羌」とは基本的に外名（外部者が特定の間人集団をさすために創造もしくは使用する呼称）であり、漢帝国の拡張に伴い、漢人がその西北方面にいた雑多な非漢人を「羌」と呼んでいた。ゆえに漢代の羌人は、実際に移住や拡大をしていたというよりも、むしろ漢人の対非漢人認識の変化に伴って移住・拡大し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にすぎないという¹²。これは、従来の諸説とは一線を画す考えである。だが「羌」が内名か外名かはともかく、いずれにせよ「羌」の北限がどこかという問題は残されている。周知の通り、蘭州や青海湖の北側には河西回廊があり、その西方には敦煌、さらにはシルクロードが広がっており、漢代には国際商業の舞台となる。とりわけ敦煌は、西域諸国の使者や商人が往来する玄関口にあたる。そこに「羌」はいたのか否か。

この問題を解き明かすうえで注目されるのが、西北地域出土の簡牘群である。たとえば居延漢簡には「羌」に関する記載が散見し、「反羌」（E.P.F22:235¹³）などの語がみえ、漢帝国と対立する羌人がいたとわかる。また居延漢簡に「天子將兵在天水聞羌胡欲擊河以西」（E.P.F22:325A）、肩水金關漢簡に「酒泉羌騎」（73EJT37:721）、「張掖居延縣破羌願與口」（72EJC:366）とあり、これらは羌人が張掖郡（居延県を含む）や酒泉郡・天水郡に及んでいたことをしめす¹⁴。もともと、これらの漢簡も、羌人が蘭州以北に散在していた証拠にはなるが、羌人が敦煌にまで達していたことをしめすものではない。

だが近年公開された敦煌懸泉漢簡には、羌人と敦煌との関係を明示する史料が数多く含まれていた¹⁵。懸泉漢簡は敦煌市の「懸泉置」とよばれる郵駅関係の漢代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簡牘群で、その内容は詔書・通行文書・律令・司法文書・簿籍・私信・典籍など、多種にわたる。それによって、羌人が敦

⁵ 楊建新（1988：199）、李紀祥（1977：449）。

⁶ 李紀祥（1977：443）。

⁷ 熊谷滋三（1988：49）。また熊谷氏は、「内徙」を行った馬氏・竇氏・梁氏は羌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ったことから、塞内羌は必ずしも過酷な環境に置かれていなかったとし、ゆえに反乱もしにくかったとする。

⁸ 熊谷滋三（1988）は4例、塙博（1981）は6例を挙げ、黄烈（1987）は後漢時代の29例を挙げる。

⁹ 多田狷介（1999：49-76）。

¹⁰ 柿沼陽平（2018B：63-101）。

¹¹ 顧頡剛（1977）、錢伯泉（1984：34-40）。

¹² 王明珂（柿沼陽平訳）（2011:139-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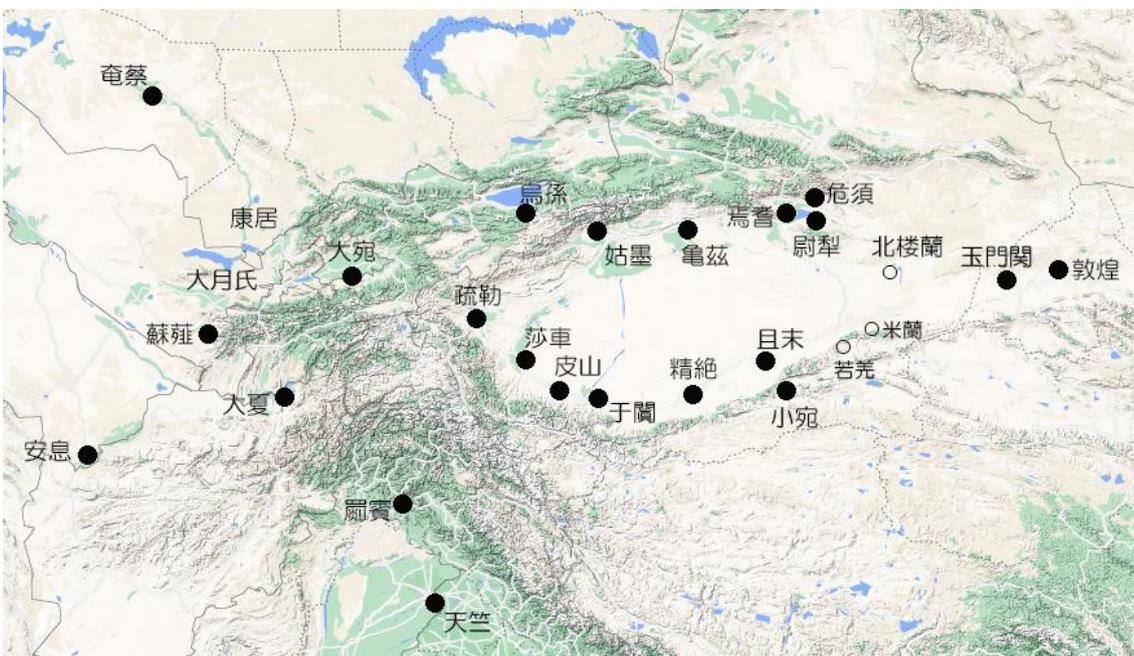
¹³ 甘粛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粛省博物館・文物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編（1994）。

¹⁴ 甘粛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2011-2016）。

¹⁵ 懸泉漢簡の積文については胡平生・張徳芳（2001）のほかに、写真・積文をふくむ甘粛簡牘博物館・甘粛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2019）、甘粛簡牘博物館・甘粛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2020）、張徳芳（2009）がある。

煌に達していたことは明瞭となった。しかも懸泉漢簡には、西域諸国の使者や商人に関する記載もあり、漢人・西域人・羌人の三者関係が改めて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敦煌在住の羌人は具体的にいかなる生活を営み、漢帝国やシルクロードとどう関わり、漢人・西域人とどのような関係性を有したのか。

これらの問題に関しては、目下すでいくつかの研究があり、初歩的な分析がおこなわれている¹⁶。そこで本稿では先行研究の驥尾に付し、まず敦煌を訪れた西域諸国の国名と位置を確認し、それらの人びとがどのルートを通して敦煌にやってきたのかを確認する。そのうえで、敦煌における漢人・西域人・羌人の三者関係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い。



[図1] 漢代の西域 (●は漢代の王国、○は現代の地名。ただし北楼蘭は本稿の造語)

2. パミール高原とその西方から到来した人びと

まずは漢代敦煌を訪れた西域諸国の様子を概観してみよう。懸泉漢簡 (II90DXT0216②877) によれば、康居王の使者は、蘇犂王の使者とともに敦煌を訪れている¹⁷。

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扁闐、蘇犂王使者姑墨、副沙因即・貴人爲匿等皆叩頭自言……。

ここにみられる「蘇犂」とは、『史記』『漢書』等に散見する「蘇婁」国であろう。『漢書』巻96西域伝上や『通典』巻193边防9西戎5康居条によれば、蘇婁国は長安から「萬二千三百里」離れている。漢代では1里=400m程度ゆえ、12300里は4920km程度である。『漢書』西域伝上によれば、康居国には5人の「小王」(蘇離・附墨・窳匿・罽城・奥鞬)がおり、陽関(敦煌西方の関所)までの距離は、蘇離・附墨が8025里、窳匿が7525里、罽城が8555里、奥鞬が8355里であったとされる。『漢書』西域

¹⁶ 胡平生・張徳芳 (2001)、郝樹声・張徳芳 (2009)、汪桂海 (2010)。

¹⁷ 懸泉漢簡に基づいて漢帝国と康居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検討した論文として袁延勝 (2009) がある。

伝に「凡五王、屬康居」とあり、これら小王国は、康居本国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康居国の属国であった¹⁸。それでは、蘇薤はどこにあったのか。陽関からの距離（里数）をしめす前掲史料（12300里、4920km）を信じるならば、蘇薤は現在のトルコやシリアに位置したことになり、それでは遠すぎる。ゆえに前掲史料の里数は、直線距離ではありえず、一部の論者も論ずるように、そもそも実際の旅程をしめ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どうかも疑問がのこる。

そこで『新唐書』巻221西域列伝下をみると、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

とあり、「蘇薤」はのちの史国（羯霜那、Shahrisabz）にあるとある。史国はソグディアナに位置し、ソグディアナはソグド人（粟弋人）に由来する地域名である。それでは「蘇薤」はソグディアナに位置した国であったことになるのかといえ、答えはそう単純ではない。というのも、『晋書』巻97四夷伝西戎康居国条には、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

とあり、康居の拠点（蘇薤）が「粟弋」に「鄰接」していたとあるからである。これは一見すると、康居の拠点（蘇薤）が「粟弋」内部にはなかったことをしめすかのようである。しかも『史記』巻123大宛列伝には、

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とあり、「姑師・扞采・蘇薤之屬」が大宛以東に位置したかのごとく示されている。後述するように、大宛はフェルガナに位置する国であり、この点はいまや疑いえない。すると『史記』によれば、「姑師・扞采・蘇薤之屬」はフェルガナ以東の国々であったことになるが、それは本当であろうか。

そこで伝世文献をしらべると、「姑師」と「扞采」はたしかにフェルガナ以東の国である。このことをふまえて、白鳥庫吉はつぎのように論じている。①前掲『晋書』四夷伝によれば、蘇薤は「粟弋」（ソグディアナ）の内部には位置していないことになる。②前掲『漢書』西域伝によれば、蘇薤は「粟弋」の属国であり、蘇薤と粟弋は隣接していた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る。③前掲『史記』大宛列伝によれば、蘇薤は「宛東」に位置することになるが、もし蘇薤がフェルガナの真東にあれば、粟弋とは隣接しえないことから、漢代の蘇薤の位置は真東からずれ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以上の①～③をふまえると、蘇薤は大宛の北東に位置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¹⁹。以上が白鳥説である。これは、諸史料間の矛盾を解消しようと図った巧妙な説である。だが残念ながら、推測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

これに対して余太山は、前掲『史記』大宛列伝の「宛東」を「宛西」の誤記とし、「蘇薤」が Soghd の音訳であ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ている²⁰。これも推測ではあるが、『資治通鑑』巻21漢紀武帝元封6年条に「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に作り、そこに「宛西」

¹⁸ 『漢書』巻96西域伝「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輿鞬王、治輿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¹⁹ 白鳥庫吉（1970：90-91）。

²⁰ 余太山（2003：122、239）。

と「宛東」の語はない。『資治通鑑』は後世の編纂史料にすぎないが、編者の司馬光も「宛東」の二字の存在に疑問を抱き、削除したと思われる。すると余太山も指摘するように、前掲『史記』大宛列伝には誤記がある可能性があり、蘇薤をフェルガナ北東とする必然性は失われることになる。

しかも白鳥庫吉は『晋書』四夷列伝をふまえ、蘇薤城は「粟弋」に位置しないとするが（前掲①②）、ここでの「粟弋」は、いわゆるソグディアナ地方を意味する地理的範疇とは限らず、むしろソグド人集団やその政体を意味する政治的・民族的範疇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すると蘇薤城は、政治的・民族的にはソグド人集団の直接統治を受け入れ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ものの、地理的にはいわゆるソグディアナ地方に位置していた可能性が浮上するのである。そう考えれば、いちおうすべての史料を整合的に解釈できる。つまり結論としては、前掲『旧唐書』がのべるように、漢代の「蘇薤」城は Shahrīsabz（のちの史国、羯霜那）に位置したとみてよい。

以上の点をふまえ、あらためて検討すべきが、漢簡にもみえる「康居」の位置である。漢代の康居と蘇薤が別々の国である点は伝世文献にもものべ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が、前掲懸泉漢簡（H0216② 877-883）によって、それは改めて裏づけられたことになる。では漢代の康居とはいかなる勢力か。周知のごとく、隋唐期の「康居」はサマルカンド（Samarqand）をさす。だが『史記』大宛列伝によれば、前漢期の康居はほんらい大宛の「西北」もしくは「北」に位置する遊牧集団よりなる小国で、大宛の北東には匈奴、西には大月氏、西南には大夏、東北には烏孫、東には扞罽・于闐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ゆえに大宛はフェルガナに位置していたものと考えられ²¹、前漢期の康居は大宛（フェルガナ）との相対的位置関係から推して、「フェルガナ北方からトルキスタン方面にいたる地域で遊牧生活を営む集団」であったことになる²²。康居は、大月氏とはべつの国であったとされるが、しかし両者の習俗は類似し、康居はやがてサマルカンドに移住して「康国」を建国し、当該王族は後々「月氏人」として語りつがれるようになる²³。一方、既述のとおり、晋代の康居は蘇薤を拠点とし、蘇薤は一貫してサマルカンド以南に位置していた。すると康居は、漢代にはすでにサマルカンド周辺に影響力をもっており、漢魏交替期にはさらにサマルカンド周辺を直接統治下におくに至ったものと解釈される²⁴。

²¹ Pullyblank（1966: 9-39）は「大宛＝ソグディアナ」とするが、多くの論者は「大宛＝フェルガナ」とし、最近では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2004/2019 邦訳：16-17）が地理学・考古学をふまえ、改めて「大宛＝フェルガナ」説を裏づけている。

²² 『史記』大宛列伝「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²³ 『魏書』卷 102 西域列伝康国条「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

²⁴ 関尾史郎（2019：242）は「柿沼陽平氏は、第一次「北伐」であえて西方に偏った祁山道が採られたのは、「支富や康植らの援軍を得やすい涼州方面に進出しようとした」からだとするが（同『劉備と諸葛亮』、221頁）、支富を「商人をひきいる人物」、康植を「軍団をひきいる人物」とするなど（同、220頁）、一部に誤解があるようだ」と批判する。だが柿沼陽平（2018A: 220～221）は正確には「一般的に、支富は月支（中央アジアのパミール高原西側にすむ遊牧民の大月氏）の商人をひきいる人物、康植は康国の軍団をひきいる人物で、涼州に散在する西域商人集団を統括していたといわれる。彼らは曹魏と通商関係をもつとともに、蜀漢との連携も図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森安 2007）。ただ、まさかサマ

以上によれば、康居・蘇雍の人びとはいわゆるソグディアナ地方の者を含んでいたことになる。そして、目下公開されている懸泉漢簡をみるかぎりでは、彼らこそはもっとも遠方から敦煌を訪れた西域人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なお敦煌懸泉漢簡（稗第 51 条、II0114②：293）には「中郎安意」なる人物が登場し、「中郎」は官職名、「安」はソグド姓、もしくは安息（Parthia）にちなんだ姓と考えられるが、「安息」の国名は目下漢簡にみえない。また伝世文献によれば、康居北西には「奄蔡」なる遊牧集団がおり²⁵、現在のクズロルダ（Kyzylorda）からアラル海（Orol dengizi）に至るシル河流域にいたとおぼしいが、彼らも漢簡には登場しない。

3. パミール以東のシルクロード

つぎにパミール以東の様子をみてみよう。懸泉漢簡によれば、康居・蘇雍を含む国々の関係者は、東進してパミールを越えたのち、いくつかの経路のうち、そのどれかを通して敦煌に赴いたようである。その点については、つとに郝樹声氏・張徳芳氏が関連史料を収集しているほか、金秉駿氏の研究がある。とくに金氏によれば、西域人は天山南路、もしくは西域南道に沿って敦煌に赴き、各沿線にはオアシス国家が複数ならび、諸国の人びとはまとまって移動したという。

そこでパミール以東の国名を確認すると、懸泉漢簡には、

姑墨王遣使者休靡奉獻橐佗馬（IT0209⑤:8）。

出送龜茲王傳車二乘白車四乘□□□（I91DXT0405④A:24）。

とあり、天山南路沿いの「姑墨」（現在のアクス）や「龜茲」（現在のクチャ）の王が敦煌に使者を派遣している。懸泉漢簡には「車師前王使者（I91DXT0404④A:7）」や「疏勒王使者（I90DXT0208S:35）」も登場する。車師前国は焉耆北東に位置する国、疏勒はカシュガル付近の国である。

また次簡（I91DXT0309③:98）は、「大月氏」と「龜茲」の人物が一緒になって天山南路をへて、敦煌を訪れたことをしめす。

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貴人業（僕？）一人、男一人。自來龜茲王使者二人、貴人三人、凡九人。

以上は天山南路の国々である。懸泉漢簡の大月氏に関しては、すでに初歩的研究がある²⁶。

一方、次簡（I91DXT0309③:97）は、大月氏や大宛の者が、タリム盆地西端の国（疎勒）やタリム盆地南側の国（于闐・莎車・渠勒・精絶・扞彌）の者と同道した可能性を示唆する。

客大月氏・大宛・疎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絶・扞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

ルカンドから援軍がくるわけがないので、じっさいには涼州などに散在する中央アジア系の人びとが蜀漢に加勢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安定郡に月支城なるところがあり、この時期に曹魏にそむ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ので、彼らはそのあたりに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する。つまり私は俗説を批判し、支富や康植を「涼州などに散在する中央アジア系の人びとで、曹魏とも蜀漢とも関係を有していた」と結論づけたのであり、関尾氏は拙著を誤読している。また関尾氏は「涼州諸国王」や「胡侯」を「全て虚構の称号」とするが（244 頁）、これには根拠がない。むしろ『三国志』巻 1 魏書武帝紀「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のごとく後漢末の隴西には王を自称する者がいた。また著名なソグド語古代書簡にはソグディアナから涼州に到来し、涼州で自律的秩序を有する集団を築いていたソグド人の様子が描かれている。よって涼州にそうした「王」を自称する者がおり、その部下（支富・康植）が月氏やサマルカンドに出自をもつ人びとの集団を率いていた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それを「虚構の称号」とするのは、関尾氏が中国王朝側の視点に立っているためにほかならない。

²⁵ 『史記』大宛列伝「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²⁶ 馬智全（2012：13-18）、小谷仲男（2015：15-37）。

また次簡 (I90DXT0116②:106) 所見の「疎勒・于闐・渠勒・皮山・小宛」は、タリム盆地南側の諸国を西から順番に数えあげたものである。

舉案罷斥候千人輔迎疎勒・于闐・渠勒・皮山・小宛口……。

これらによれば、最西の大月氏や大宛はキャラバン隊を組織して東進し、疏勒（カシュガル）を經由して、タリム盆地南側の諸国に立ち寄り、当該諸国の使者とともに敦煌に至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この点は金秉駿氏もつとに指摘しており、ゆえに金氏は、タリム盆地以西の諸国が疎勒付近まですすんだのち、タリム盆地北側ルート（天山南路）かタリム盆地南側ルート（西域南道）かを選択し、各沿線上の者はまとまって敦煌に向かったとする。

たしかに、天山南路と西域南路の存在は『漢書』巻 96 西域伝上にもみえ、漢側にも広く知られた経路であった²⁷。また松田壽男氏が論ずるように、『漢書』西域伝上にはさらに天山北路の存在も示唆され、それは匈奴の支配下にあった²⁸。かかる天山北路に関しては、『三国志』巻 30 東夷伝評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伝にはっきりとした記述があるが、そこには混乱もあり、その大筋はむしろ『漢書』西域伝上に依拠している²⁹。よって天山北路の存在が漢代にさかのぼ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つまり漢代には、すでに天山北路・天山南路・西域南路の存在が知られており、そのなかでも天山南路と西域南路が敦煌への経路として、漢側にとくに認識・利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になる。前掲懸泉漢簡はまさにそのことを裏づける。

だが懸泉漢簡をみると、天山南路上の国と西域南路上の国が同一簡上に一緒に登場する例も、じつは皆無ではない。

來清絶・危須游到毋察移效穀口 (IIT0111①:457)。

ここでの「清絶」はタリム盆地南側に位置する国であり、現在のニヤ遺跡はその関連遺跡であったと目されている³⁰。一方、「危須」は、伝世文献によれば、焉耆・伊犁の隣国である。「元康五年」の紀年をふくむ懸泉漢簡 (I91DXT0310③:13) に「危須王」の語がみえるため、危須王国の起源は元康 5 年（前 61 年）以前に遡る。

また次簡 (I91DXT0309③:20A) には、「烏孫」と「莎車」が登場する。

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人】獻橐佗六匹。陽賜記教。

文中の【】内には文字が欠けており、文意から文字を補った。「莎車」はタリム盆地南側に位置する国である。また「烏孫」は一種の遊牧民であり、その本拠地はイシク・クル（清池）南岸にあったと目されている。ただし、懸泉漢簡に「以給烏孫諸國客獻罷…… (I90DXT0109②:34)」とあるように、「烏孫」はいくつかの国の総称でもある。ここでいう「國」とは、おそらく現代の国民国家の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く、のちのモンゴル時代の「ウルス (ulus)」のごときのものであろう。そして居延漢簡 (387.19、562.27) に「烏孫小昆彌」、敦煌漢簡 (2210、TH.1915) に「烏孫小昆彌」、懸泉漢簡 (V1509②:4、積粹 205) に「烏孫小昆彌」、懸泉漢簡 (V1712⑤:1、積粹 203、V1611③:118、積粹 204) に「烏孫大昆彌」

²⁷ 『漢書』巻 96 西域伝上「白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²⁸ 松田壽男 (1970 : 3-24)。

²⁹ 松田壽男 (1970 : 118-121)。

³⁰ 長澤和俊 (1996 : 228-266)。

とあることから推せば、「烏孫」には大昆彌・小昆彌の別があり、それぞれが大小の集団を率いる長であり、彼らが「烏孫諸國」を構成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前掲簡 (IT0309③:20AB) をみると、莎車と烏孫の使者はいずこかで合流し、敦煌に至ったことになる。また次簡 (IT0309③:19) には「于闐」・「渠犂」・「疎勒」がみえ、やはりそこにはタリム盆地の北と南の国名が含まれている。

使送于闐王、渠犂・疎勒諸國客爲駕二封軺傳載從者一人……

以上によれば、タリム盆地の北側と南側の国々は、しばしば合流する場合もあった。それでは、彼らは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に合流したのか。まず想定されるのは、彼らが天山南路と西域南路の狭間に広がるタクラマカン砂漠（孔雀河流域とホータン河流域を除く）を縦断しつつ、徐々に集合して敦煌に赴いた可能性である。ただし、河道に沿うことなくタクラマカン砂漠を縦断した例は、史上皆無ではないものの³¹、ほとんど類例はなく、そこには大きな困難が伴い、あまり現実的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タクラマカン砂漠の途中で水分を補給するのは至難の業だからである

そこでまず注目すべきが、孔雀河流域を縦断する経路の存在である。孔雀河流域には、現在も漢代烽燧跡が点々と残っており³²、漢代にはその途上に、ロプ湖と楼蘭王国もあった。じっさいに懸泉漢簡 (VT1310③162) には、

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太守守屬漢剛送客移過所縣置自來焉耆・危須・鄯善副使……。

とあり、鄯善—焉耆—危須間は漢代にすでにつながっており、三国はみな孔雀河流域に位置していた。また慧生という仏僧は、北魏神龜元年（518年）に中国から西行したさいに、「京師（神龜1年11月出發）→（40日）→赤嶺→（20日）→吐谷渾国→（3500里）→鄯善城→（1600里）→且末城→（3750里）→末城→（22里）→捍磨城→（878里）→于闐国→朱駒波国（神龜2年7月29日到着）→渴盤陀国→（600里）→葱嶺山」という経路をたどっている³³。このとき彼が孔雀河に沿って移動したことは明白である。

またホータン河流域を縦断する経路にも注目される。実際に、後秦高祖弘始6年（404年）に仏法を求めて西進した智猛は、長安から涼州・陽関をへて、鄯善・龜茲・于闐の諸国をめぐり、于闐の西南から葱嶺（パミール）に向かっており³⁴、龜茲から于闐にゆくさいにホータン河を南下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によれば、清絶・危須の者や、于闐・渠犂・疎勒・烏孫・莎車の者は、以上の孔雀河経路とホータン河経路のいずれかをへて、途中で合流し、ともに敦煌に赴いたのであろう。

4. 敦煌の羌人とその生業

³¹ ホータン河や孔雀河に頼ることなく、タクラマカン砂漠のど真ん中を縦断した数少ない先例が橘瑞超氏である。橘瑞超（2004：209-335）参照。

³² 張安福・田海峰（2021）。

³³ 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魏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與敦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凡得百七十部。……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山無草木、有鳥鼠、同穴。又西行二十日、至吐谷渾國。又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里、至且末城。……又西行千三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又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大正51・866下）。なお『大正新脩大藏經』より引用する場合には「大正十卷数+頁数+段（上・中・下）」の形で出典を略記する。

³⁴ 『出三藏記集』卷15 智猛法師伝「釋智猛、雍州京兆郡新豐縣人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戊辰之歲。……至涼州城。……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大正55・113中）。

以上本稿では、漢代西域の経路と諸国の位置を確認した。東進する西域人の大半は、やがて敦煌に流入し、敦煌は多種多様な顔つきの人びとがゆきかい、さまざまな言語が飛び交う国際都市となった。では、漢人・西域人・羌人の関係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か。

敦煌在住の漢人についてはすでに多くの研究があり、農民や兵士が多い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また敦煌来訪中の西域人は、金秉駿氏も指摘するように、おおむね外交使節の名義のもとで東西交易を図る者達であった³⁵。だが、なかには外交使節を名乗らぬまま、商業に従事する「胡人」もいた。

・胡人歸義占數、敦煌稟食。縣官長吏宜數存問所疾苦。其爲吏民庸舍、長者當廬有賈、以爲之本業 (I90DXT0116②:62)。

ここでの「胡」は、懸泉漢簡に「□諸國胡客往來過稟食傳馬如 (I90DXT0207②:9)」とあるごとく、西域諸国にまたがって存在する人びとで、匈奴をさす場合もあり³⁶、非漢人の汎称のようである。また懸泉漢簡 (IIT0111①:223) には「戎」も登場する。

宗守奉法、吏毋入。衆中不道、或賊殺人、不發覺、御史胡君使案驗、通等皆亡。疑過豪吏民臧匿人、變更名姓、往來州部、以吏逐事商賈爲名戎。十一月中、過姑臧葦亭西。堪與臨涇。游徼胡君郎……。

これによると、「不道」「賊殺人」の犯罪者に関して「御史胡君」は立件を試みたが、当該犯罪者は「豪吏民」に匿われて州境を越え、「商賈」に付き従い、「戎」の偽名を用いて逃亡を図った。逃亡先の一つは武威郡姑臧県のようで、「御史胡君」「游徼胡君郎」は「胡」字を含み、非漢人であろう。本文によれば、敦煌郡・武威郡には「戎」の商人もいた。「胡」と「戎」の意味をめぐっては諸説あり³⁷、いまいち両者の相異点は判然としないが、いずれも非漢人をさすのは間違いない。

以上の戎・胡に加え、懸泉漢簡には「羌」も登場するが、敦煌の羌人が商業に関与した証拠は見当たらない。かつて王明珂氏は、対羌戦争において漢側が捕らえた羌人の家畜がウシ・ウマ・ヒツジを含み、ラクダをほぼ含まぬことから、羌人は遠距離商業に従事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したが³⁸、現時点で、その説は可能性が高い。それでは、敦煌の羌人はいかに生活を送り、漢は彼らをどう統治したのか。

すでに馬智全氏らも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敦煌の羌人は馬や羊を遊牧し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³⁹。懸泉漢簡 (積粹第 214 条、II0214①214+II0214①26+II0114③440) はまさにその一証とみなされる。

……年八月中、徙居博望萬年亭。徼外歸兩谷、東與歸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驢掌子男芒封與歸何弟封當爭言鬪、封唐以股刀刺傷芒封二所、驢掌與弟嘉良等十餘人共奪歸何馬廿匹・羊四百頭。……羌人逐水草移徙……。

文中の芒封はおそらく後掲懸泉漢簡所見の羌人の「封芒」(II0214①:4) と同一人物、もしくはその関

³⁵ 金秉駿 (2016 : 530-550)。

³⁶ 懸泉漢簡 (⑩2000ES9SF3:4ABCDE) 「建武四年九月戊子、從史閔敢言之。行道、以月十日到橐他候官、遇橐他守尉馮承。言「今月二日、胡虜入酒泉□□□(A)。入肩水塞、略得焦鳳牛十餘頭・羌女子一人、將西渡河。虜四騎止都倉西、放馬。六十餘騎止金關西。月九日日蚤食時□(B)」とあり、建武4年9月に「胡虜」が侵攻し、「焦鳳牛十餘頭・羌女子一人」を奪った事件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る。本文の「胡虜」は匈奴と解される。一方、懸泉漢簡 (IT0210①:83) には「胡王使者」が登場するが、匈奴は一般に「單于」を戴くもので、その配下には「日逐王」(IT0309③:167) もいるが、「胡王」とは書き分けられている。すると、「胡」の範疇は文脈に応じて変化するとみられる。

³⁷ 漢簡所見の「胡」字に関しては陳勇 (2005 : 60-68)、宋超 (2012 : 69-84)。

³⁸ 王明珂 (柿沼陽平訳 2007 : 157-195)。

³⁹ 馬智全 (2011 : 38-43)。

係者である。また本文末尾の「逐水草」は遊牧をさす慣用表現⁴⁰、その主語も羌人である。よって本文は、羌人が遊牧をしていた証左とみなされる。

また懸泉漢簡には「護羌校尉」・「護羌使者」・「主羌使者」・「護羌都吏」・「主羌史」等の官名がみえ、彼らは敦煌の羌人を管轄していた。そのなかでも護羌使者の属官には「從事田掾」がいたようであり、そうすると羌人には農業従事者もいた可能性がある。馬智全氏らはその点に否定的だが、懸泉漢簡（釈粹第 227 条、II0214①：74）は、農耕に従事する羌人の存在を窺わせる史料かもしれない。

入東、合檄四。其二從事田掾印、二敦煌長印。一詣牧君治所、一詣護羌使者幕府口。

護羌使者は、護羌校尉の属官や、幕府を有する巡察官⁴¹、もしくは護羌校尉の前身とされるが⁴²、本文によれば、少なくとも護羌使者は開府し、皇帝と羌人をつなぐ使者役にとどまらず、田畑管理をふくむ羌人関連業務を管轄し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むろん筆者も、この史料だけで十分に実証できた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ので、農業に従事した羌人がいたか否かは、今後の検討課題として残しておきたい。

ちなみに護羌使者は、複数の「部」（管轄区域）を巡察し、犯罪を取り締まり⁴³、時には自ら武具を携えて羌人と戦っているが⁴⁴、前 86 年以降の両漢交替期（新朝期を除く）の命令文とおぼしき懸泉漢簡（釈粹第 51 条、II0114②：293）には「破羌將軍」も登場する⁴⁵。破羌將軍は「破羌」を目的とする將軍号で、著名な任官者に辛武賢がおり⁴⁶、懸泉漢簡（釈粹第 239 条、II0114③：214）にも「破羌將軍・西河太守臣武賢」とみえる。羌人討伐には後將軍趙充国や強弩將軍許延寿が随行した例もあるが、破羌將軍が対羌軍事の担い手の一人であったのは間違いない⁴⁷。このほかに護羌校尉もおり、護羌使者・破羌將軍の三者関係が問題となるが、その詳細も今後の課題であろう。いずれにせよ対羌軍内には「羌騎」が含まれることもあり⁴⁸、一部の論者がのべるように、「以夷制夷」思想の発露と解せる。

5. 羌人社会の自律的秩序

⁴⁰ 楊富学・樊麗沙（森田大智訳 2022：247-267）。

⁴¹ 郝樹声・張徳芳（2009：161-176）。

⁴² 佐藤達郎（2018：215-242）。

⁴³ 懸泉漢簡（釈粹第 222 条、II0215③：83）「護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馬爲盜、長必坐論。過廣至、傳馬見四匹、皆瘦、問廢吏言「十五匹送使者、太守用十四」。

⁴⁴ 懸泉漢簡（釈粹第 225 条、I0112②：39）「護羌使者良射傷羌男子。良對曰「傷、送調馬已死」。第廿(A)。護羌使者良射傷羌男子。對「傷者送調馬已死」(B)。

⁴⁵ 「十一月丁巳、中郎安意使領護敦煌・酒泉・張掖・武威・金城郡農田官、常平糴、調均錢穀、以大司農丞印封、下敦煌・酒泉・張掖・武威・金城郡太守。承書從事、下當用者。破羌將軍軍吏士畢已過、具移所給吏士、賜諸裝實……」。本文によれば、破羌將軍の軍糧は敦煌郡・酒泉郡・張掖郡・武威郡・金城郡から錢と穀物に基づく。諸郡の錢と穀物は「農田官」が監督し、命令書は「大司農丞印」で封緘された。大司農丞の上官は大司農（国家財政の主管者）で、加藤繁（1952：35-156）によれば、少府率いる帝室財政とは別系統である。よって破羌將軍に軍糧は国家財政に基づく。国家財政を主管する官名は時代ごとに変化し、大司農は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以来の官名で、新代には王莽が羲和、のち納言、後漢成立後に大司農に更名された。文中の諸郡のうち、金城郡は始元 6 年（前 86 年）に、他郡はそれ以前に成立している。すると本文は、前 86 年以降の両漢交替期（新朝期を除く）の命令文で、当時の前掲諸郡（敦煌を含む）には敵対的な羌人もいたとわかる。

⁴⁶ 『史記』卷 22 漢興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神爵元年欄「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韓曾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⁴⁷ 『漢書』卷 8 宣帝紀神爵元年（前 61 年）条「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

⁴⁸ 前掲『漢書』卷 8 宣帝紀神爵元年（前 61 年）条。

以上のように、敦煌には従順な羌人もおれば、敵対的な羌人もいた。彼らは、おもに遊牧に従事しており、農業に従事していた可能性もなくはないが、ともかくシルクロード交易従事者はほとんどい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では、彼ら羌人はどのような社会秩序を形成していたのか。

その手がかりをさぐると、たとえば懸泉漢簡（积粹第 235 条、II0216②：80）には「羌王唐調」、懸泉漢簡（II90DXT0113①:4）には「羌王索盧」とあり、羌人集団内には独自の上下関係があっ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懸泉漢簡（积粹第 252 条、II0213②：106）には「羌豪」もいる。前漢時代にかつて趙充国は皇帝に「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撃、勢不壹也」と上申したことがあり⁴⁹、これによれば「羌豪」はそれぞれ別々の種族を率いており、複数の羌豪を統括したのが「羌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また羌人の自律的組織を調べるうえで、次簡にも注目される。

歸義壘渠歸種羌男子奴葛（II0114②:180、积粹第 240 条）

歸義聊榼良種羌男子芒東（II0114②:181）

歸義壘甬種羌男子潘胸（II0114③:423）

歸義壘卜苳種羌男子狼顛（II0114③:459）

歸義聊藏耶苳種羌男子東隣（II0214①:1）

歸義聊卑爲苳種羌男子唐堯（II0214①:2）

歸義聊卑爲苳種羌男子蹠當（II0214①:3）

歸義壘卜苳種羌男子封芒（II0214①:4）

歸義榼良種羌男子落蹠（II0214①:5）

■右榼良種五人（II0214①：6）

これらは「歸義」羌の人名記録である（以下、歸義簡）。ほかに「羌男子狼煎」（I90DXT0112②:39AB）、「壘羌龍耶種男子榦芒」（积粹第 242 条、II0214②:195）、「劉危種南歸」「藏耶苳種零虞」（积粹第 228 条、II0112①B:63）がおり、さらに次簡（I90DXT0210③:6）には「牢羌」「琅何羌」も登場する。

敦煌太守快使守屬充國送牢羌斥候羌候人十二。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丙午、敦煌太守……以次琅何羌口君疆藏奉獻詣。行在所以令爲駕二乘傳。十一月辛未留宿。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なかでも「牢羌」という種族名は『後漢書』西羌伝麻奴条にも、

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

とみえる。本文は永初 7 年（後 113 年）の記録である。よって「牢羌」は、少なくとも神爵 2 年（前 60 年）から永初 7 年（後 113 年）まで存在したとわかる。加えて「琅何」は「狼何」にも作り、『漢書』卷 69 趙充国伝において趙充国が「狼何」を陽關西南の「小月氏種」だと説明している⁵⁰。月氏をめぐっては従来、中国西北地方に古来広く分布し、やがて匈奴に敗れ、一部は西北地方に残って「小月氏種」とよばれたとするのが通説であったが、最近では月氏を中国西北地方出自種族でないとする説もあ

⁴⁹ 『漢書』卷 69 趙充国伝「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撃、勢不壹也」。

⁵⁰ 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る⁵¹。ともあれ前掲簡からは次の点が指摘できる。

まず「歸義」は一般に、異種族が漢に帰順する意とされるが、史料上は典属国の司る「降者」と、服属の度合いの低い「歸義蠻夷」とを区別する見解もある⁵²。また最近では、「歸義」者は周辺民族に限らず、徼外から来入した者が県治に出頭して帰順する意であるとする論者もいる⁵³。だが後掲敦煌漢簡（2186）に「降歸義烏孫女子」とあり、「降」と「歸義」がどれほど厳密に区別されていたかは疑問もある。また徼外の漢人が漢に「歸義」す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のかどうかとも疑問である。さらに前漢前期の胡家草場漢簡（第 1272 簡）には、

亡道外蠻夷及略來歸自出外蠻夷人歸義者、皆得越邊塞徼入。

とあり、歸義者のなかには、「亡道外蠻夷」のみならず、「略來歸自出外蠻夷人」も含まれる（そしてそのなかに漢人は含まれていない）。加えて、西北の「歸義」は駱駝や驢馬を敦煌官吏に献上している例があり、敦煌漢簡（2186。釋 TH1906。大庭 370⁵⁴）に、

降歸義烏孫女子復奇獻驢一匹騂牡兩祛齒口歲。封頸以敦煌王都尉章。

とある。よって、献上品なき投降者が「歸義」とされたか否かも依然として不明である。これらの史料を総合的に解釈すると、どうやら敦煌の「歸義」者は、身分や性別に関わらず、漢への帰属を申し出た異種族を広くさす語であり、かつ漢人とは完全には同化していない状態にある者をさす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をふまえて種族名をみると、複雑怪奇な漢字名となっており、羌語の漢語訳と思われる。種族名を構成する字に注目すると、「壘」字を含む名（壘渠歸種・壘甬種羌・壘卜苳種・壘羌龍耶種）、「聊」字を含む名（聊蔵耶苳種・聊卑爲苳種）、「良」字を含む名（聊榼良種・榼良種）、「苳」字を含む名（壘卜苳種・聊蔵耶苳種・聊卑爲苳種・蔵耶苳種）が多い。なかでも「苳」字を含む種族は伝世文献にもみえ、『三国志』卷 30 東夷伝評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伝には敦煌以西の南山中（陽関南方か）に「葱苳羌」がいたとあり⁵⁵、関係するものとみてよい。「良」字もよく羌人名に含まれ（良封・号良・忍良・吾良・滇良）、護羌使者の「良」（积粹第 224 条、II0215②：42）も羌人の可能性があり、「以夷制夷」政策による結果かもしれない。

次に人名に注目すると、「奴葛」「芒東」「潘胸」「狼顛」「東隣」「唐堯」「封芒」「落蹠」「南歸」「零虞」のとおりで、一見すると規則性はないよう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て高栄氏は、こうした命名方法が西羌のいわゆる父子連名制に基づく点を指摘している⁵⁶。父子連名制とは、父の名前の一部を子どもが継承するという仕組のことである。ただし懸泉漢簡所見の羌人の人名がほんとうに父子連名制に基づくものかどうかは、なお確証がない。しかも王明珂氏は近年、漢代の羌人が父子連名制を採用していたとする通説を批判し、羌人の種族名は父の名前（たとえば迷唐であれば、迷か唐のどちらか一方）

⁵¹ Valerie Hansen (2017: 46-48)。

⁵² 熊谷滋三 (1997: 19-71)。最近の研究として渡邊英幸 (2017: 3-24) も参照されたい。

⁵³ 山元貴尚 (2017: 407-429)。

⁵⁴ 敦煌漢簡の积文番号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1) と大庭脩 (1990) による。図版は大庭本による。积文は図版によって柿沼自ら判断した。

⁵⁵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苳羌・白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

⁵⁶ 高栄 (2010:100-106)。

と、母の姓（彼女の出身種族の酋長名に由来）より構成され、酋長名はつねに種族名となったとする新説を提唱した。王氏の新説は、伝世文献所見の酋長名と種族名を従来以上に整合的に説明しうるものである⁵⁷。ただし、王氏自身も認めるように、この命名方法は種族名や酋長名に関わるものではあるが、それが西羌の一般的命名方法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までは従来不明であった。

そこで改めて前掲帰義簡所見羌人名の構成文字をみると、羌人名同士に重複があるほか、伝世文献所見の羌の人名や種族名とも重複が目立つ。『後漢書』西羌伝をみただけでも、「奴」字は麻奴、狐奴、「東」字は東吾、東號、東岸、東羌、「狼」字は參狼種、狼莫、「顛」は滇良、滇吾、滇岸、先零別種滇零、滇那、「唐」字は迷唐、鞏唐、種唐旄、「封」字は封養牢姐種、封養種、鍾羌良封、「零」字は先零、先零別種滇零、零昌、零吾に含まれる。すると西羌の一般的命名方法には、種族名や酋長名の命名方法と同じものとは限らぬものの、やはり血縁継承に伴う一定のルール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これより羌人社会には、いわゆる漢人社会とは異なる自律性があ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かつて王明珂氏は、「羌」が彼らの内名でなく外名である点を指摘し⁵⁸、最近では王説をふまえ、漢代の「羌」は「漢人の意識の中のみ存在した「概念」に過ぎない」との説も出されている⁵⁹。しかし以上の考察をふまえると、漢帝国内部にはいわゆる上古漢語話者とは異なる集団が含まれており、少なくとも彼らの漢語名には一定の命名ルールがあった。彼らの言語・生活様式・支配秩序は、いわゆる上古漢語話者とは明らかに異なっていた。このように独自のルールをもつ彼らが、何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も共有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は思われない。当該集団が外名の「羌」ときれいに一致するか否かはともかく、漢人側はしばしば通訳を交えながら当該集団と情報交換もしており、漢側の指称する外名としての「羌」が何らの実体的根拠も伴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するのは言い過ぎであろう。

6. おわりに

本稿では近年新たに公開された敦煌懸泉漢簡等を活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漢代の西域と、敦煌における漢人・西域人・羌人の三者関係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その結果、以下の点がわかった。

- ① 懸泉漢簡所見の西域人のうち、康居・蘇薹の人びとはもともと遠方より敦煌を訪れた者であった。とくに康居は、もともとフェルガナ北方からトルキスタン方面にいたる地域で遊牧生活を営む集団であったが、漢魏交替期までにサマルカンドを制圧するに至り、隣接する粟弋勢力を支配下に置き、彼らはやがて粟弋と同一視された。
- ② パミール方面と敦煌を結ぶ経路には、天山南路・西域南路のほかに、孔雀河沿いに吐谷渾・鄯善・且末を縦断する経路と、ホータン河流域を縦断する経路があった。
- ③ 漢代敦煌はとくに国際色豊かな東西交易の要衝で、漢人・西域人・匈奴に加え、羌人もおり、羌人はおもに遊牧に従属しており、なかには農耕に従事する者もいた可能性がある。漢は破羌將軍（不常置）を派遣するほか、護羌使者を派遣して軍事・行政双方を司らせた。
- ④ 敦煌郡在住の羌人（の一部）は、完全に漢人と同化することなく、「歸義」として分類された。彼

⁵⁷ 王明珂（柿沼陽平訳）（2007：157-195）。

⁵⁸ 王明珂（柿沼陽平訳）（2011：139-166）。

⁵⁹ 酒井駿多（2017：57-75）。

らは羌王—羌豪—羌人（一般男女）というヒエラルキーを有し、羌王や羌豪のもとで別々に種族を構成した。また羌の人名や種族名の命名方法には、羌人独自の血縁継承に伴うルールがあった。これより、羌人社会には、漢人社会とは異なる自律性があ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繰り返すように、かつて王明珂氏は「羌」が彼らの内名でなく外名である点を指摘し、最近では王明珂説をふまえ、漢代の「羌」は「漢人の意識の中にのみ存在した「概念」に過ぎない」との説も出されているが、漢代には独特なルールに基づく漢語名を共有する集団があり、その集団こそが「羌」の核をな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ただし、彼らの帰属意識と、漢側の有する「羌」認識とが、完全に一致するとは限らないという点はいままでのない）。

このように、漢代には康居・蘇薤などの西域諸国から使者や商人が来訪し、敦煌は国際色豊かな東西交易の要衝となったが、敦煌の漢人・西域人・羌人は完全には融合することなく、共存していた。漢人が農業や軍事、西域人が外交・商業に従事する一方で、羌人はおもに遊牧に従属し、あるいは農耕に従事する者も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が、交易に携わった形跡はない。こうした棲分けこそが国際都市敦煌の社会背景にあったと結論づけられる。

〈参考文献〉

【日文】

- 大庭脩 1990. 『大英図書館蔵敦煌漢簡』。同朋舎出版
- 小谷仲男 2015. 「敦煌懸泉漢簡に記録された大月氏の使者」, 『史窓』第 72 号。15-37 頁。
- 柿沼陽平 2018A. 『劉備と諸葛亮：カネ勘定の『三国志』』。文藝春秋社。
- 柿沼陽平 2018B. 「後漢時代における金銭至上主義の台頭」, 『中国古代貨幣経済の持続と転換』。汲古書院。63-101 頁。
- 加藤繁 1952. 「漢代に於ける国家財政と帝室財政との区別並に帝室財政一斑」, 『支那経済史考証』上。東洋文庫。35-156 頁。
- 金乗駿 2016.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対外貿易のかたち——敦煌懸泉置漢簡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東方学報（京都）』第 91 冊。530-550 頁。
- 熊谷滋三 1988. 「後漢の羌族内徙策について」, 『史滴』第 9 号。49-74 頁。
- 熊谷滋三 1997. 「前漢における「蛮夷降者」と「帰義蛮夷」」,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34 冊。19-71 頁。
- 酒井駿多 2017. 「漢代の「羌」という虚像：白馬と東羌を例に」, 『上智史学』第 62 号。57-75 頁。
- 佐藤達郎 2018. 「漢代における周辺民族と軍事——とくに属国都尉と異民族統御官を中心に——」, 宮宅潔編『多民族社会の軍事統治——出土史料が語る中国古代』。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15-242 頁。
- 白鳥庫吉 1970. 「西域史上の新研究」, 『白鳥庫吉全集』第 6 卷。岩波書店 90-91 頁。
- 関尾史郎 2019. 『三国志の考古学：出土資料からみた三国志と三国時代』。東方書店。
- 多田狷介 1999. 「黄巾の乱前史」, 『漢魏晋史の研究』。汲古書院。49-76 頁。
- 橘瑞超 2004. 「中亜探検」, 大谷探険隊著・長澤和俊編『シルクロード探検』。白水社。209-335 頁。
- 長澤和俊 1996. 「西域南道と精絶国考」, 『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学術調査報告書』第 1 卷。228-266 頁。

- 埒博 1981. 「東・西羌の区分に関する一考察」, 『史滴』第2号。38-60頁。
- 松田壽男 1970. 『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 [増補版]』。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粂山明 2001. 「漢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発と防衛線の展開」, 富谷至編『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楼蘭・尼雅出土文書を中心に——』。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427-475頁。
- 森安孝夫 2007.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
- 山元貴尚 2017. 「簡牘にみえる帰義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八——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研文出版。407-429頁。
-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2006. 『後漢書』西羌伝訳注(一),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4号。304-424頁。
- 渡邊英幸 2017. 「戦国秦の国境を越えた人びと——岳麓秦簡『為獄等状』の「邦亡」と「帰義」を中心に——」, 『周縁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国』六一書房。3-24頁

【中文】

- 陳勇 2005. 「史記所見胡与匈奴称謂考」, 『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60-68頁。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1. 『敦煌漢簡』。中華書局。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編 1994. 『居延新簡 甲渠候官与第四隧』。中華書局。
-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 2011-2016. 『肩水金閔漢簡 (壹・貳・参・肆・伍)』。中西書局。
-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 2019. 『懸泉漢簡 壹』。中西書局。
-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 2020. 『懸泉漢簡 貳』。中西書局。
- 高栄 2010. 「敦煌懸泉漢簡所見河西的羌人」, 『社会科学戦線』2010年第10期。100-106頁。
- 顧頡剛 1977. 「天山南路之羌」, 『史林雜誌』。中華書局。
- 郝樹声・張徳芳 2009. 『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
- 何光岳 2000 『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 胡平生・張徳芳 2001. 『敦煌懸泉置漢簡积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黄烈 1987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 李紀祥 1977. 「兩漢御羌策略」, 『勞貞一先生七秩栄慶論文集 (簡牘学報第五期)』。簡牘学会。443-466頁。
- 馬長寿 1984. 『氐与羌』。広西師範大学出版社。
- 馬智全 2011. 「漢代所見漢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38-43頁。
- 馬智全 2012. 「論漢簡所見漢代西域帰義現象」, 『中国边境史研究』第22卷第4期。13-18頁。
- 錢伯泉 1984. 「西域的羌族」, 『西北史地』第1期。34-40頁。
- 羌族簡史編写組 1986 『羌族簡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 尚新麗 1997. 「秦漢時期羌族的遷徙及社会狀況」, 『南都学壇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4-7 頁。
- 宋超 2012. 「“匈奴人”与“胡虜”: 兩漢時期匈奴稱謂變化考察——以居延漢簡為中心的討論」, 『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69-84 頁。
- 汪桂海 2010. 「從出土資料談漢代羌族史的兩個問題」, 『西域研究』2010 年第 2 期, 1-7 頁。
- 王明珂 (柿沼陽平訳) 2007. 「中国漢代の羌 (三) ——生態学的辺境と民族的境界——」, 『早稲田大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5 号。157-195 頁。
- 王明珂 (柿沼陽平訳) 2011. 「中国漢代の羌 (四) ——生態学的辺境と民族的境界——」, 『史滴』第 33 号。139-166 頁。
- 王明珂 (柿沼陽平訳) 2012. 「中国漢代の羌 (五) ——生態学的辺境と民族的境界——」, 『史滴』第 34 号。120-137 頁。
- 袁延勝 2009. 「懸泉漢簡所見康居与西漢的關係」, 『西域研究』2009 年第 2 期, 9-15 頁。
- 楊富学・樊麗沙 (森田大智訳) 2022. 「司馬遷の「行国」史観とその後世への影響」, 『中国文化の統一性と多様性』。汲古書院。247-267 頁。
- 楊建新 1988.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 余太山 2003. 『兩漢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伝研究』。中華書局。
- 余太山 2005. 『兩漢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伝要注』。中華書局。
- 張安福・田海峰 2021. 『環塔里木漢唐遺址』。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德芳 2009. 「从懸泉漢簡看楼蘭 (鄯善) 同漢朝的關係」, 『西域研究』第 4 期。7-16 頁。
- 周錫銀・李紹明・冉光荣 1985 『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英語】

- Valerie Hansen, 2017.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with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win G. Pullyblank, 1966.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2 (April) 9-39.

【仏文】

-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2004.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Deuxième édition révisée et augmenté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エチエンヌ・ドゥ・ラ・ヴェシエール著 影山悦子訳 2019. 『ソグド人商人の歴史』。岩波書店) .

(『雲漢』1号, 2023年3月26日)

〔執筆者紹介〕

雷 塘洵 (LEI Tangxun)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員
辛嶋 雲青 (KARASHIMA Aoi)	京都大学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博士課程院生
野原 将揮 (NOHARA Masaki)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
林 智 (LIN Zhi)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課程院生 京都大学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特別研究学生
三輪 大樹 (MIWA Daiki)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院生
松江 崇 (MATSUE Takashi)	京都大学人間・環境学研究科・教授
荒木 典子 (ARAKI Noriko)	東京都立大学人文社会学部・准教授
李 瑶 (LI Yao)	北京外国語大学日本語学院・研究員
鈴木 博之 (SUZUKI Hiroyuki)	京都大学国際高等教育院・非常勤講師
柿沼 陽平 (KAKINUMA Yohei)	早稲田大学文学学術院・教授

雲漢 1号

2023年 3月26日発行

編集・発行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606-8501 京都市左京区吉田二本松町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
松江崇研究室内

題字 宮島翠雨

印刷所 株式会社 田中プリント
〒600-8047 京都市下京区石不動之町677-2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https://kurs10026.sakura.ne.jp/kchgk/index.html>